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民国要案寻踪



编者的话

国史通俗刊物《民国春秋》双月刊，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创办于1987年1月，至今年底已历10载，出刊60期，600余万字。虽然本刊在史学期刊中发行量是较高的，但仍有很多读者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能订到本刊，或没有能订到前几年的本刊，并以此为憾。而本编辑部又一时出不了《民国春秋》合订本，不能弥补这部分读者的缺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编辑出版《民国春秋杂志荟萃》，以应众多读者阅读之需。

本刊创办10年来，承读者厚爱，专家、学者扶持，始终保持了自己显明的特色，在林林总总的期刊的激烈竞争中，占有了相当的优势。先是被评为全国历史专业类核心期刊，继之又荣获华东地区首届优秀期刊评比一等奖，1995年夏获江苏省首届优秀期刊评比一等奖。本刊同仁精心组稿，精心编稿，使刊物真实可信，清新生动，贴近社会，贴近读者，始终呈上升趋势，在读者中影响日广。

不但新近出版的《民国春秋》以题材新、史料新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而且数年前刊于《民国春秋》的文章，重读之下，也别有一番情趣。本刊有保存价值、使用价值、研究价值。海内外数十家报刊，包括《人民日报》、《新华文摘》、《文汇报》及台北《传记文学》等，都转载过本刊文章。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复印过本刊数十篇文章。编写某些民国史书籍，更是须以本刊为重要参考资料之一。如撰写关于审讯汪伪汉奸的书籍，必得要参考本刊，因本刊有的文章纠正了一些图书的谬误，甚至补正了档案史料中的疏失。

《民国春秋杂志荟萃》共分四册：《民国要闻探秘》、《民国要人剪影》、《民国要案寻踪》、《民国艺苑风景线》。《民国要闻探秘》，收入角度较小，写法较新、真实再现民国重大历史事件的文章；《民国要人剪影》，收入生动记叙民国军政、外文等名人一生经历重要侧面或片段的文章；《民国要案寻踪》，收入详细描述民国重大的、轰动一时的、至今人们知之尚少的暗杀事件和诉讼事件的文章；《民国艺苑风景线》，收入深刻反映民国电影界、戏剧界和文化各界名人的风貌、情操、遭遇、成就的文章。4册字数共100多万字，约占《民国春秋》创刊以来所载文章总字数的大约1/5。《民国春秋》10年所刊文章，大体集粹于此编。

读者对本书有何批评、建议，对《民国春秋》有何批评、建议，望随时指陈，不吝指正。

民国要案寻踪

“春阿氏案”与清末民初社会

清朝末年，北京城内发生了一桩时事公案——“春阿氏案”。“春阿氏一案，为近十年最大疑狱。京人知其事者，或以为贞，或以为淫，或视为不良，或代为不平，聚讼纷坛，莫明其真相也久矣”。时人说，“其事之因因果果，虚虚实实，既足已使人惊愕不已，而其情之哀哀艳艳，沉沉痛痛，尤足以使人悲悼，为之惋惜，终日不能去怀。盖此中情节离离奇奇，远出寻常人意料之外”。它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北京一地，而是遍及全国，甚至远至海外，成为当时中国民众和海外传媒的一大关注热点。

其实，说起春阿氏案的来龙去脉，原也普通不过。

光绪年间，北京城内住着一户旗人阿洪阿，生有一女叫三蝶儿，长得如花似玉，而且知书达理。三蝶儿自幼与表兄弟聂玉吉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双方家长亦早有“结亲”之议。年岁及长，三蝶儿与聂玉吉更是灵犀一点，心心相印。谁知不久之后，玉吉父母同日暴亡，家境陡然败落。嫌贫爱富的三蝶儿之母德氏，悍然悔婚，将其另嫁家道殷实的小官吏文光之子、蠢傻的春英为妻（以夫为姓，是为春阿氏）。昔日的爱情遭到破坏，于是婚后仅仅三个月，就演出了一场悲惨的情杀案件。

三蝶儿嫁给春英后，婆婆“平日管束较严，家内早晚两餐，俱由伊做饭。自祖婆母以下衣服，皆由伊浆洗。伊平素做事迟慢，每早梳头稍迟，即被大婆母斥骂，间逢家内诸人脱换衣服浆洗过多，不能早完，亦屡经大婆母斥责，因此常怀愁急”，整日心情忧郁，以泪洗脸。“自思过门不及百日，屡被谴责，嗣后何以过度？不如乘间寻死，免得日后受气”。再加上公公文光娶了一个大号“盖九城”的妓女为妾，三蝶儿的婚后生活就更加不幸了。“盖九城”刁蛮、凶悍，又与常在其家进出的帮闲普二有染，被春阿氏无意中撞见，于是，她把春阿氏看做眼中钉，肉中刺，常常借故生事，时时加以欺凌。一直未能忘情于三蝶儿的聂玉吉，听说了她婚后的不幸遭遇，忿忿不平。一次，他看到春阿氏当众受到婆婆责骂，气愤之下，丧失理智，夜间潜入春阿氏家中，杀死了春阿氏的丈夫春英，逃往外地。

案发后，春英家人皆视春阿氏为凶手，“盖九城”更是一口咬定春阿氏因奸谋害亲夫，必欲其为春英偿命而后快。春阿氏为了保护聂玉吉，也并不多作申辩，只说持刀自杀，误伤其夫，如今悔不当初，只求速死。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发现了许多疑点和难以解释之处，处处表明春阿氏决不是杀夫凶手，但是，清廷官员并无能力理清头绪，查明真相，在拖延了很长时间以后，为了敷衍塞责，只得草草宣布结案。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清廷大理院的结案奏折中这样写道：“臣等再四斟酌，拟请援强盗伙决无证、一时难于定讞之例，将该犯妇春阿氏改为监禁，仍由臣等随时详细访查。倘日后发露真情，或另出有凭证，仍可据实定断；如始终无从发觉，即将该犯妇永远监禁，遇赦不赦，似于服制人命重案更昭郑重。”圣旨也就居然批示：“依议，钦此”。真是一笔糊涂帐。

审判（法庭）不明，执法（监狱）更凶。春阿氏被判“永远监禁，遇赦不赦”，投入监狱以后，“此时正值瘟疫流行，狱内的犯人，不是生疮生疥的，便是疮疗腐烂、臭味难闻的……一间房内多至二十口人犯，对面是两张大床，床上铺着草帘子，每人有一件官被，大家乱挤着睡觉。那一份肮脏气味，不必说日久常住，就是偶然间闻一鼻子，也得受病。你望床上一看，黑

洞洞乱摇乱动，如同蚂蚁打仗的一般。近看，乃是虱子、臭虫，成团树垒，摆阵操练……所有狱中人犯，生疮生疥的也有，上吐下泄的也有，疟疾痢疾的也有”，活脱脱一个人间地狱！在这样的人间地狱里，春阿氏“浑身是疥，头部浮肿红烧，可怜那一双素手，连烧带疥，肿似琉璃瓶儿一般。揭开脏被服一看，那雪白两段玉臂，俱是疥癣，所枕的半头砖以下，咕咕咙咙，成团论码的，俱是虱子、臭虫”，很快，春阿氏就染上了“头晕眼花，上吐下泄之症，每日昏昏沉沉”，水米不沾，不久就玉殒香消。春阿氏死了，沉冤未能昭雪，造成了清末历史上一桩著名的冤狱。总的来看，春阿氏案不过是一件普普通通的情杀致死人命案。像春阿氏这样的弱女子蒙冤受屈，死于狱中，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也是屡见不鲜的事情。它之所以会惹人注意，引起风潮，是因为它发生于清朝末年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它是清末民初社会状况的一面镜子。

春阿氏案能够激荡风潮，引起人们越来越强烈的关注，首先是由于新闻媒介的介入。

清朝末年，迫于民间的要求，清政府不得不放松了报禁，一时间，民间办报蔚然成风。当时，除了上海《时务报》、天津《国闻报》等著名报纸外，各地都有一些民办的报纸，北京也有一份叫做《京话日报》的小报，专门报道北京消息、坊间新闻，在京城小有名气。春阿氏一案案发和审理期间，从光绪三十二年六月至八月，《京话日报》连篇累牍地刊登有关春阿氏案情的消息报道、读者来函及质疑文章，扮演了一个推波助澜的厉害角色。

春阿氏案发受审以后，《京话日报》馆立即发表“编者按”：“春阿氏的冤枉，京城已经传遍，事关人命，本馆可不敢硬下断语。究竟有什么凭据，有甚么见证，知道底细的人，请多多来信，以便查考。”随后，《京话日报》逐日收到许多读者来函，议论纷纷，见仁见智，表现了民众对此案的极大关心。此外，《京话日报》又在政府执法机关之外，派出专人对此案详加调查，摆出了一副引导舆论，辨明是非，监督司法公正的架势：“现在中国改定法律，为自强的转机。外人的眼光都注重在我们的刑法上，故此不嫌麻烦，极力调查这回事，并不是为一人一家的曲直。如果春阿氏实在冤枉，提督衙门的黑暗，也未免太无天理了！还求知道底细的人，再与本馆来信。如有真凭实据，本馆敢担争论的责任。”

在《京话日报》所收到的读者来信中，“替春阿氏声冤的十居八九，替‘盖九城’分辩的，只有一两信”，可见舆论是向着春阿氏的。据有些了解内情的读者来信说，春阿氏承认杀夫有罪，实是法庭上严刑逼供的结果，“熬审阿氏，用的非刑很是残忍，薰硫黄，拧麻辫子，跪锁，死过去三次，并无口供。后来又收拾她母亲，老太太受刑不过，就叫女儿屈招。阿氏说道：‘自己的本意，宁可死在当堂，决不死在法场。如今怕连累母亲，不能不尽这点孝心，只好屈认就是了。’”有三封来信揭露，承审官员这样虐待春阿氏，“屈打成招”，是因为他收受了贿赂。“人人传说，承审官使了四百两银子，所以才这样判断”。就连收受贿赂的承审官员，也是有名有姓的，“一个姓朱，一个姓钟，还有科房的刘某，全都使了钱，是一个窦姓给拉的纤”。据说这“承审官朱、钟二人，都是穷极了的人。钟姓有个外号，叫作‘穷钟’。人命重案，竟敢贪图贿赂，真是大胆！”

由揭露法庭对春阿氏屈打成招的事实，引起了对清政府司法机关刑讯犯人的控诉。六月十四日、十五日两天，《京话日报》连载了题为《刑部虐待

犯人的实情》的来稿：“过堂的时候，只凭司官一人，便能定各犯的死生。人命关天，本不是儿戏事，滥用非刑（即如跪锁，轧合拉）一概不准。请问现在过堂，哪个不用非刑呀？”连那些皂隶们，如果没有钱贿赂的话，也能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比如，过堂的时候，揪头发，拉耳朵，真比阎王殿的小鬼厉害万分；堂上说“打”，这班虎狼恶吏动起刑来，就会尽着力打。相反，如果有银钱到手，堂上说“打”，他们也会拖延着不动手。该文披露，凡是犯罪的人，一交到刑部手里，必须先有该犯的至亲好友托人疏通刑部官吏，贿赂的数额则是双方商定的。从进刑部大门开始讨价还价起，然后二门、栅栏、牢门、所儿里、监里、管铺的、书班皂吏等，都必须一一把价码说定，才敢送人犯到部。只要有一处没有打点周到，就会受到故意刁难，吃尽苦头。例如，监里的牢头如果打点不到，犯人的饮食、大小便一概不得自由，冬天的饭，要先用凉水喷过，结成冰了才准犯人吃；监里管铺的打点不到，他就是一张长一丈、宽六尺的床上给你编上二三十人，根本不管你的死活；堂上管记录的书班打点不到，“居然就能颠倒黑白，动不动有违例案，真是笔头儿一动，人命相连。俗语说，一字值千金，就是指着书班说的”。若是那些无钱无势的苦主，那就更是苦不堪言，“一到监里，百般凌虐，要把犯人虐死，先报犯人有病，然后报死”。如果讲妥价码了，入狱监禁的时候，“哪一处讲妥，哪一处如同走平道一般”。

司法制度的黑暗以外，清朝官员的昏聩无能，简直也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京话日报》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日三天，连载了一篇署名为“疑心子”的文章，逐条列举，批驳了该案的侦查、审讯官员所作判词的不合情理之处。文中愤慨地说：“这样欠通的问官，岂可问这样的重案，不但不能服春阿氏的心，并且不能服众人的心。……但盼着遇见一位明白问官，把这案问的清清楚楚，不怕春阿氏杀夫是真，也得有个真凭实据，内中也必有个大大的因由。不能因为大夫辱骂她两次，就敢动刀杀夫。不把此案问清，人心可就都不舒服了。”七月十日，《京话日报》再次登载文章，要求司法程序的透明与公开，呼吁《请宣布春阿氏的罪状》：“听说刑部已经定了案，春阿氏定成死罪。如果是实，请刑部把她的罪状早早宣布出来。倘若含含糊糊定了罪，不叫旁人知道，中国的讼狱，可算黑暗到家了。”讼狱的黑暗，官吏的无能，正是清末统治阶级病入膏肓、极度腐朽的又一个侧面。据《清稗类钞》记载：面临内忧外困、岌岌可危的险境，清政府赖以维系政权的各级官员们照样文恬武嬉，醉生梦死，“天乐听完听庆乐（戏园），惠丰吃罢吃同丰（酒楼）；街头尽是郎员主（各级官员）；谈助无非白发中（麻将）；除却早衙迟画到，闲来只是逛胡同（妓院）”。这样的官员要为民作主，决无可能；这样的朝廷不尽快灭亡，是无天理！

从春阿氏一案的沸沸扬扬，耸动朝野，反映了清朝末年西学东来、民智渐开的社会现实。此案之审理，旷日持久，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五月案发，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糊里糊涂地结案，前后达两年之久。正是在这一时期，封建统治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打起了“预备立宪”的旗号，标榜要改革君主政体，实行还政于民，并且连连派遣大员出国考察国外宪政实行情况，摆出一副痛下决心、改弦更张的架式。一时间，惹的一些对清政府心存幻想的人将信将疑，一个个拭目以待，等着看此案的公正审理。结果由此案所暴露出来的政治的腐败黑暗、官员的昏聩无能，以及在清政府的司法制度下人们生命财产的毫无保障，这一切，都引起了人们对清政府的极度失

望和极大愤慨。有一个署名“琴心女士”的读者给《京话日报》来信说：“贵刊请刑部宣布罪状，刑部守定了秘密宗旨，始终不肯宣布。现在预备立宪，立宪国民将来都有参与政事的权利，何况春阿氏一案本是民事，官场要治她的罪，本是给民间办事，既给民间办事，为什么不叫民间知道呀？……果真定成死罪，冤枉一人的性命事小，改变了法律，再出这样没天日的事，中国还能改甚么政治呀！我与春阿氏非亲非故，既是中国人，不能不管中国事。但我是一个女子，又没法子管。闷了好几天，写了这封信，告诉您知道就是了。唉，中国的黑暗世界，几时才能放光明呀？”《京话日报》在全文发表时，加上了“总有一天”的编者按语。生动地表明了清政府已经天怨人怒，民心丧尽。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武昌城头一声枪响，貌似巍然大物的清王朝就即刻土崩瓦解了。

有意思的是，春阿氏一案并不像许多哄动一时的事情那样很快成为过去，为人们所遗忘。宣统年间，北方的里巷坊间就开始有《实事小说春阿氏》的钞本流传，很受人们欢迎。到民国2年（1913），有笔名冷佛者，根据春阿氏案的实情，在清末钞本小说的基础上，写出了小说《春阿氏》。该书民国3年5月初版，民国5年二版，民国12年三版，直到30年代，仍不断印行，而且还有标点本出现。前不久，吉林文史出版社编辑出版《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又一次把《春阿氏》列入其中，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了。这本小说利用文学形式，形象地描述了春阿氏一案自始至终的全部过程。“书中之言，一切讯词口供，虽系实事，而编述小说者不能不略加渲染”，淋漓尽致地展示和揭露了封建王朝的腐朽黑暗，以及封建婚姻制度和传统贞节观念给青年男女带来的莫大不幸。从春阿氏一案的审判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自刑部堂官，下至狱卒皂隶，无一不是昏聩凶横，贪赃枉法，残忍狡诈。公堂上动辄非刑，昼夜熬审，牢狱里虐待无休，视同狗彘。清王朝的整个司法制度，实与人间地狱无异。正如《春阿氏》印行本《题辞》开宗明义所说：“黑暗难窥一线天，人间地狱倍堪怜；诬将贞妇为淫妇，孽海谁能度大千！”《春阿氏》以清末冤狱为笔下主要批判对象，与《杨乃武与小白菜》、《杨三姐告状》等构成了清末小说的一种特殊样式——“冤狱小说”，它和揭露政治腐败、抨击时政弊端、讽刺官僚昏聩的“谴责小说”一道，提供了让人们认识这一黑暗社会、而且是这一社会最黑暗的一个方面的生动教材，具有着毋庸置疑的社会意义。

对春阿氏案感兴趣的不仅是文学界，春阿氏的故事甚至还被搬上了戏剧舞台。《前北平国剧学会见于书目》中，记载有京剧演出本《春阿氏》。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冤怨缘》。民国时期，此剧久演不衰，颇受北平市民的欢迎，春阿氏的事情，当时也就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甚至有人说，《春阿氏》一剧，可以名列京剧的“四大悲剧”之一。直到50年代中期，在北京天桥的剧场戏园里，还在时常上演评剧《春阿氏》。可见人们对这个香消玉殒、沉冤不白的柔弱女子，寄予着无尽的同情；也是对那个风雨如磐、暗无天日的时代，进行着痛切的控诉。

阎红生

汪精卫参与刺杀清摄政王事件

辛亥革命前一年，北京发生了一起震动清廷、轰动社会的刺杀清摄政王载沣未遂的事件。这一事件的始末，各种史书的记载不仅零碎而又简略，而且对参与这一事件的人物以及具体的时间、地点，乃至情节的叙述出入很大，真是众说纷坛，莫衷一是。汪精卫由于也参与了这一事件，并在被捕后写了几首气势轩昂的诗，在当时颇获得了一些壮烈的美名。此后他便以此为阶梯，左右逢源，平步青云，官运亨通，令人侧目，蒙骗了很多不明真相的人。

这一事件的始末究竟怎样呢？现根据所见的各种史料，综合记述如下。

辛亥革命前几年，孙中山、黄兴和同盟会领导的许多次武装起义都失败了，不少革命党人都很失望，转而把暗杀作为一种革命的重要手段。1905年在北京前门车站谋炸出洋考察五大臣的吴樾，就留下一篇题为《暗杀时代》的文章，文章说：“夫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1905年以后，这种暗杀活动更为扩大了，黄兴在同盟会内特地组织了一个专门暗杀的部门，由女同盟会员方君瑛主持，吴玉章、黄复生、喻云纪、黎仲实、曾醒（女）共同负责。

1909年夏，一些同盟会员暗杀两江总督端方和水师提督李准没有成功，大家决定集中力量刺杀清朝最高掌权者——摄政王载沣。喻云纪、黄复生根据黄兴的指示，于同年秋到北京谋划，吴玉章在日本负责准备工作。喻云纪、黄复生在北京琉璃厂开了一家守真照相馆，然后回日本东京取炸药。这时，汪精卫与陈璧君正在恋爱，后来也到北京参加刺杀摄政王。喻云纪、黄复生在北京找到一个西瓜般大的铁罐，去一家铁工厂造了一个炸弹壳，然后把炸药装进去，造成了一个有特效的大型炸弹。黄兴也赶到北京看了地形，亲自作了部署。

摄政王府在什刹海的西北，门外不远处有一条水沟，沟上有一名叫银锭桥的石桥，附近还有一个井形石坑。黄兴叫在桥上埋炸弹，在石坑里躲人，水沟安设拉火的电线，摄政王过桥时，人在石坑里一拉电线，就会立即把他炸死，而拉电线的人还可趁机逃跑。

1910年3月31日夜晚，喻云纪、黄复生、汪精卫偷偷来到桥下。他们首先把炸弹安好，然后安设电线，谁知事前目测不准确，临时才发现电线短了几尺。怎么办？不得已只得重来。正在收拾的时候，夜色中发现有人在桥边大便，只好暂时躲开。这时摄政王府门大开，有人打灯笼出来，他们只好再次躲开，炸弹被人取走了。

他们估计若是敌人取走了，一定会满城风雨，但一连几天却没有动静，认为是一般老百姓取走了，便决定由喻云纪、陈璧君回日本取炸药重来。黄兴听了汇报，大吃一惊，叫赶忙通知黄复生、汪精卫离开。然而已经晚了，通知刚发出去，第二天报上就登出了黄复生、汪精卫被捕的消息。

黄复生、汪精卫被捕后，由民政尚书肃亲王善耆亲自审讯。这个善耆是第十代肃亲王，梦想清朝实行君主立宪后，自己能就任总理大臣。所以想暗中联络革命党人，于是没有办他们的死罪，而判永远监禁。汪精卫被审讯时，曾痛斥清廷侈谈立宪，表示准备为革命殉难。并在狱中写了一首激励自己的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颇为脍炙人口。但善耆对汪精卫大施软化手腕，派人在狱中为他另辟裱糊一新并配有家

具的房舍，倍加优待。“复赠以图史百余帙”，并多次找汪密谈，表示倾慕。汪精卫感恩戴德，思想逐渐发生变化，表示忏悔。他在狱中写的《有感》一诗吟道：“忧来如病亦绵绵，一读黄书一泫然。瓜蔓已都无可摘，豆箕何苦更相煎。”在另一首题为《述怀》的长诗中则说：“平生慕慷慨，养气殊未学。哀乐过剧烈，精气潜摧剥”，谴责自己昔日的所作所为，意境情态为之一变。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清王朝摇摇欲坠。清廷一面起用袁世凯，以武力镇压革命；一面释放政治犯，借以麻痹革命人民。汪精卫被关押了一年零七个月后，于同年11月6日以一个变节投降的两面派被释出狱。汪精卫出狱后，立即投靠了袁世凯，组织所谓“国事共济会”，破坏革命，拥袁窃国。

王天庆（第11页图为摄政王载沣）

民国记者入讼第一案

公元 1912 年冬天里的一个夜晚，23 岁的被誉为“剧坛奇才”、《图书剧报》社长兼记者郑正秋，一身黑缎面棉袄，都穿圆了，还戴着皮帽子，很怕冷的样子，伏案聚精会神地赶写一篇关于谭鑫培莅沪演出的文章，准备在下一期的《图书剧报》上刊用。

这时候，门“吱！”的一声打开，阿婆领着夏月润走进屋来。但是郑正秋没有回过头去看，好像压根儿没有听见似的。

“正秋，又入迷啦！”夏月润站在门旁，大声说。

听声音，郑正秋知道来人是谁，立刻转过头去。

“是慧大新官呀！”

夏月润进了屋，往桌旁那张酸枝椅上坐下。

“你给我带来什么好消息了？”

夏月润无限的感慨，说：“唉！这次谭鑫培碰到了厄运。”

郑正秋淡淡地说：“人总是有碰到厄运的时候，不会老是一帆风顺的。就是孔圣人，不是也在陈、蔡之间遇厄绝粮吗？老谭碰到什么厄运？”

于是，夏月润把他所知道的关于谭鑫培遇厄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郑正秋听——

上海滩那位遐迩闻名的大药商黄楚九，忽然热衷于娱乐事业，花了一笔大钱，在九江路浙江路口开设新新舞台，最近落成。为了亮牌子，造声势，将来好赚大钱，就绞尽脑汁，想了个办法，决定把当时北方京朝派名伶谭鑫培请到上海，在新新舞台挂牌演出。于是，由新新舞台后台经理四盏灯介绍，派筱荣祥专程北上，重金聘请谭鑫培。

不久，谭鑫培率领净金秀山、武二花金少山、青衣孙怡云、小生德珺如、老旦文蓉寿、小丑慈瑞金等，带着《空城计》、《琼林宴》、《群英会》、《李陵碑》、《翠屏山》、《乌龙院》等剧目，可谓人强马壮，剧目丰富，兴高采烈地抵达上海。

登岸时，黄楚九和四盏灯都亲自前往码头上恭迎，各伶排队请安。黄楚九还把他们待为上宾，让他们吃好睡好，完全是一派王公大臣的排场。宣传上，更是大张旗鼓，不遗余力。首先，黄楚九想出四个火辣辣的大字：“伶界大王”，冠以谭鑫培。其次，在报上广告：伶界大王谭鑫培莅沪献艺。新新舞台门前和大街上也贴出了海报。气氛浓浓的。

然而，世间的事情常常充满意外。就在谭鑫培要开台演出的时候，凑巧，北方名丑杨四立也到沪，正在法租界吉祥街歌舞台演出，非常走红，剧目是《盗魂铃》。黄楚九看见这情形，极为恼火，就让谭鑫培也贴《盗魂铃》，把杨四立比下去。《盗魂铃》是谭鑫培的拿手好戏，演出时，演到翻四只台子那一场，不想这位时年 65 岁的老生，腿脚身腰都不那么灵活有劲，不能像杨四立那样轻巧自如地去翻四只台子，他只能改换另一种做法，他爬上去，往下看一看，摇摇头，就缘绳而下。他这种做功，这种身段，表现出别样的魅力。这时候二楼有一位观众，是沪江第一台旅馆茶役李本初，啪啪地鼓了一会儿掌，他看过杨四立的戏，对谭鑫培只缘绳而下，不去翻那四只台子，表示不满李本初的倒彩，惊动了场里一个巡场的，是黄楚九的部下。他认为李本初蓄意捣乱，过去就伸手恶狠狠地给了他一记耳光。后来又过来巡场的，一齐打他的耳光。李本初不服气，跟他们吵了起来。这时台下乱了，观众一

个个都往二楼张望，不看台上演出。黄楚九见情况不妙，连忙让巡场的把李本初架走，在一间房子里，把他绑扎起来，又是痛打，又是灌人尿，之后又逼他写反省书。李本初佯装不识字，不写，黄楚九便让秘书给他起草，要他照抄，并按上手印。

夏月润说完这一切之后，对郑正秋央告道：“你给谭鑫培挽回一下面子吧。你知道，他是我的岳父，头一次栽的！这个李本初……”

自谭鑫培来沪演出以来，郑正秋知道，上海一家叫《黄浦潮》的小报，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是以讥讽的口吻，议论谭鑫培的短处，拆他的台的。他自己则是拿出全副的精神和力气，促其成功的。现在月润说的这事，他是初次听到，他为谭鑫培这位自己在《丽丽所伶评》中曾经极赞他腔调“幽雅婉转，娓娓动听，唱‘打棍出箱’，世界殆无其匹”的盖世伶人，现在竟敌不过一个相差千里的丑角杨四立，而深为惋惜，也为黄楚九的聪明误感到可笑。他答应了夏月润的要求。

第二天清早，郑正秋来到报社，刚坐下来，把稿子摊开在桌上，准备办公，就进来一个人，是黄楚九的秘书。

郑正秋只听说过黄楚九其人，不认识他，更不认识他的秘书，但是以礼相待，很客气地请他坐到靠墙边摆着的酸枝椅上。

这秘书口舌伶俐，对郑正秋大加恭维。然后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番黄楚九如何赏识郑正秋。最后，说奉黄楚九之命，请郑正秋帮忙，把李本初关于那天在新新舞台看戏滋事的反省书，刊登在《图书剧报》上。说完，就恭恭敬敬地把稿子递给郑正秋。

写完为谭鑫培挽回面子的文章，郑正秋凝然不动。一个陌生的形象忽然浮现在他的眼前——那位在沪江第一台旅馆里的小人物扰乱了他的计划。这个小人物正在烧水，或者给人端茶，或者顾客来了：“老爷，请这边坐！”“少爷，请往这边走！”顾客走了：“老爷，好走！”这个小人物——千千万万的弱者的代表，是他所需要服务的对象，也是他所需要教化的对象。李本初是一个茶役，他只喝个倒彩，就挨夏月润的责备，受黄楚九部下的殴打和凌辱，太无辜了，太冤枉了！他愤愤不平！茶役，茶役，这是弱者啊！要鸣不平的，是他，而不是谭鑫培，也不是黄楚九！

可是，要替李本初鸣不平，就意味着郑正秋要牺牲或者部分地牺牲他同夏月润的友情，更要得罪黄楚九，树立了一个对头。这天晚上，郑正秋一直处于矛盾的、不安的状态中。夜很深了，他还辗转反侧，无法入睡。

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之后，郑正秋起身下床。俞丽君问：

“干什么？”

“我要写篇东西。”

“都什么时候了？睡吧！”

“真是岂有此理！”郑正秋气冲冲地说。

“我让你睡，也有错了？”俞丽君感到十分委屈。

“来，大姐，给我磨墨。”郑正秋点燃煤油灯，在桌旁坐下，拿起毛笔来。

俞丽君心里不悦，但是服从了丈夫的要求。她起床穿好衣服，又给丈夫披上一件棉袄之后，便开始磨墨了。

不久，那篇替李本初打抱不平，揭发黄楚九霸道打人的文章，在《图书剧报》上刊登了出来。见报那天，郑正秋觉得好像做完了一件要紧的事情似

的，浑身松快。他心想：“这回我给李本初出了气，他该满意了吧？”他让家里的一位佣人给李本初送去了那天的报纸，还有一张条子。他在那条子上亲笔写道：“李先生，你闯祸了！但是请不要从此离开剧场远远的，剧场需要你这样的观众。”

这头痛快，不想有一头却炸开了锅。郑正秋的笔杆打在新新舞台巡场的身上，痛在黄楚九的心里，他大为恼火！这个被时人称为上海滩三大滑头之一的药商，从来没有想到过舆论界会蹦出来一个人，同他唱对台戏。当他最初耳闻这消息的时候，他还不肯相信，说人家跟他开玩笑。后来亲眼看见部属送来的一份《图书剧报》，才相信确有其事。但是，他同郑正秋前世无怨，后世无仇，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不登那个反省书也罢了，为什么要攻击我？他莫名其妙！莫非他跟那个臭茶役有什么关系？莫非是商界哪个王八蛋收买了他，利用李本初事件打击我，拆我的台？……他一切都不明白。他背着手，气恼地在屋里转着圈子。

这时候，他手下的人在旁气冲冲地开了腔：——

一个说：“老爷！把报馆砸掉！”

另一个立刻附和：“我们砸掉他妈的报馆不费吹灰之力。”

第三个说：“老爷！你发话吧！”

但是，黄楚九毕竟是个大滑头，脑子里多了一份“谨慎”的细胞。他不同意部下的鲁莽的做法。他转身向着部下们，压抑着心头的气恼，说道：“我们不是帮会，是商人，不要武治，要文治。”接着向部下面授机宜。

郑正秋在愉快中等待着黄楚九对自己的挑战的反应，但是一天过去了，两天也过去了，一切都很平静。

郑正秋以为黄楚九别的不怕，害怕舆论，觉得自己理亏，不敢理会此事，就埋头写剧评文章，这时候来了一个人，是他的朋友，来请他到外面吃饭。

这位朋友原来是接受黄楚九的恳求，前来调解此事的，他竭力说服郑正秋不要把事态再扩大。饭后临分手时，又往郑正秋那件朴素的竹布长衫口袋里，偷偷地塞进500块钱，想进一步疏通。郑正秋回家后发现这钱，立刻明白这是黄楚九对他的贿赂，更加气愤，于是又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图书剧报》上，揭发此事。他毫不留情地指斥黄楚九行为卑鄙，还说那500块钱是卖假药欺骗百姓得来的，是“造孽钱”，他将把它转送给慈善机关。

得罪一人垒堵墙。郑正秋和黄楚九之间，形成敌对的关系了。但是黄楚九依然采取“文治”的办法。一天早上，他派人给郑正秋送来了一封信。

郑正秋没有立刻看信，只随手把它往桌旁一扔，继续写他的剧评。这时候俞丽君走进屋来，凑到他跟前，关切地问：

“黄楚九送信来干什么？”

郑正秋把他的剧评写完，才轻蔑地笑了笑，说：“他这个大滑头，要干什么？我不用问，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你说他要干什么？”

郑正秋随即答道：“这个大滑头对付我，无非这么几招：一利诱，二恐吓，三捣乱。”

善良的俞丽君，立刻紧张起来：“怎样捣乱？”

郑正秋不慌，笑道：“砸我的报馆。”

“那怎么办？”俞丽君靠到丈夫的肩膀上，“你赶快给想个办法。”

郑正秋微笑着，劝慰妻子：“叫夫人，莫慌张！常言道：‘有理服泰山，

无理踢倒泰山当路行。’理在我们手里，证据在我们手里，怕他什么！”

俞丽君不肯相信：“黄楚九这些人，才不跟你讲理呢！我的上帝！这怎么办好？当初我不让你写那篇东西，你们写，踩屎了吧。”

郑正秋看见妻子这副惊惶不安的模样，心有点乱了。他拍了拍她的肩膀，似乎要给她勇气：“别怕，也别急，我自有办法。”说完，伸手从桌旁拿起黄楚九的信，认真地把它拆开读郑正秋按时来到黄楚九约定的那间高级的茶馆里。还在门口，便被黄楚九的秘书迎接住。接着，又被领到一间没有雅席的屋里。

屋里空荡荡的。只有一个人坐在餐桌旁，身穿一件讲究的奇葩突开的绸袍，脸上堆满笑容，眼里闪射着圆滑的光，郑正秋料定这人准是腰缠万贯的巨商黄楚九。等秘书作了介绍之后，黄楚九笑嘻嘻地开了腔：

“郑先生！久仰大名！请坐！请坐！”

郑正秋提起竹布长袍，毫不客气地坐下来。

“上菜！”黄楚九对秘书吩咐说。

茶役很快把饭菜端进来，摆到桌上。丰盛的午餐开始了。

还没等黄楚九劝饭劝菜，郑正秋就拿起筷子，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黄楚九在旁打量着郑正秋。在这位巨商的心目中，郑正秋一定是个身材魁梧、精力充沛的人，好像江湖侠士一样，完全没有想到，他竟如此身躯瘦小，精神不振，好像用一个指头推一下，就会倒下去似的。嘿！好一介文弱书生！

郑正秋吃完饭，放下筷子，朝黄楚九抬起头来，蔑视地笑了笑，说道：“黄老板有什么话，请说吧！”

“郑先生真是个豪爽的人。”黄楚九那双圆滑的眼睛，依然盯住郑正秋，“好吧，我就直说。关于李某酒后肇事问题，郑先生似乎很有气，连我的面子都不肯给……”

郑正秋想纠正黄楚九颠倒黑白的说法，但是，黄楚九笑笑，掩饰一下，继续说：“郑先生请听我说，李某只是一个茶役，同郑先生一不沾亲，二不带故。郑先生是官商出身，门第高贵，何必去为李某这种人操心呢？况且郑先生肩负办报的重任，日夜操劳，还去为李某花费时间，消耗精力，值得吗？郑先生帮我的忙，才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我不仅是个药商，而且是个热衷于戏剧的人。对于戏，你大概还想不到，我简直是入迷啦！社会上有人说我缺德，变着法子赚钱，中饱私囊。其实这是那些反对我的人对我的侮辱！侮辱！总有一天我要控告他们！不错，我口袋里有很多钱，但是我还要积德。现在先搞点艺术，因为上海人爱看戏。往后，再搞点对像李某那样的贫民有益的事情。”说到这里，黄楚九定睛望着郑正秋，仿佛要从对方的神色里，判断此刻对方的心思。

郑正秋对黄楚九这番长篇大论的自我表白很不以为然，但是他只顺着他的话意，将他一军：“平素只听说黄老板是商界的闻人，不知道黄老板的心里，还跟艺术有这么好的缘份，对弱者这么慈善。这么说，倒是黄老板应该帮我的忙了。”

黄楚九稍一皱眉，接口说：“我们彼此帮忙。我们合作一下，好吗？往后新新舞台演戏，你就写宣传文章，在报上捧场。我知道郑先生一向以义为重，但是我一定要给郑先生报酬的，而且是丰厚的。”

郑正秋明白，大滑头又要耍利诱的手段。一摆手，说道：“这个以后再

谈。若要合作，那么，第一步应该是解决李本初的问题。请黄老板屈尊一下，一公开登报认错，二负担被害者的全部医药费。”

黄楚九一听，脸上立刻收敛了笑容。他瞪大眼睛注视着郑正秋，惊异眼前这位文弱书生，为什么如此固执地护着李本初，而跟他黄楚九过不去。但是他无法找到答案。他愈发觉得郑正秋那微带笑容的脸上，露出一种蔑视和傲气的神情，令人感到他是个难以接近，不识时务的书呆子！

郑正秋见黄楚九被触怒了，放缓口气，笑道：“黄老板，答应吧！我这要求是公道的。”

黄楚九又装出一副笑脸，说：“郑先生这种侠士之风，我非常钦佩！可是郑先生应该知道，这几天郑先生连续写文章攻击新新舞台，使我在声誉上付出的代价，已经够多的了！依我看，郑先生还是到此为止，不再管这件闲事为好！我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对郑先生以前的行为，过去就算了，不再追究。”

郑正秋无法容忍黄楚九的末一句话，一拍桌子：“既然黄老板不肯认错，也不肯认错和改错，那么就别怪我不合作了。”说完就站起来。紧接着，转身向门口快步走去。

黄楚九向秘书使个眼色。但是他按住身旁那捆精心包扎着的、准备谈判成功后送给郑正秋的“艾罗补脑汁”。他现在不敢送了，他总是善于见机行事的。秘书明白了，立刻追上郑正秋，央他说：

“郑先生，我们黄老板心眼不坏，这事就从此了啦！特别是今天我们的谈话，千万不要见报。”

但是郑正秋没有言语，也没有看他一眼，径直出门走了。

过了两天，《图书剧报》上又刊登了郑正秋的文章，披露了关于这次黄楚九请吃饭，拒不认错的情形。

此后一连数天，郑正秋不遗余力，继续执笔作文，登在《图书剧报》上，向不可一世的黄楚九进攻。上次黄楚九同他的谈话，好像得罪了他似的，他的这些文章，措词愈来愈激烈，语气愈来愈强硬了。可以看出，他已经决心要把黄楚九打败，使自己成为一个胜利者，为新闻界争取干预生活、实行舆论监督的权利开辟道路。

这样一来，舆论界都知道了新新舞台事件，把它当作重要的谈话资料，并在报上报道，纷纷扬扬。而郑正秋和黄楚九，更是人们所注目的两个人物！无论舆论界，还是伶界，抑或商界，许多人都怀着又欢欣又崇敬的心情，期待着郑正秋用他那支犀利的笔，把黄楚九批个体无完肤，威风扫地！特别是新舞台的人们，幸灾乐祸！因为他们心里清楚，黄楚九创办新新舞台，开始就心地不善，你夏氏兄弟有个新舞台，我黄楚九来个新新舞台，比你多个“新”字，言下之意就是我黄楚九要比你夏氏兄弟更好，在你头上，分明是欺负人！夏月珊憋在肚子里的窝囊气给出了，夸郑正秋是个勇士！

但是夏月润反对郑正秋。他同谭鑫培见过一面，听他说了一番话后，反对更烈。他这位岳父，从来就是恃才傲物，这回却像个泄气皮球一样，垂头丧气，无限感慨地说：“我老了，大概吃戏饭到头了。”现在，郑正秋在报上对黄楚九大张挞伐，人心是大快，但是他没有想到投鼠忌器，黄楚九栽在他的文章里，他的岳父也栽到他的文章里了。全上海都已经知道：谭鑫培老了，唱不动，也做不动了！这无形中宣告了谭鑫培舞台生涯的结束，为嫉者所快，群起而攻之。这怎能叫月润这做女婿的，忍受得住呢？月润用不容分

辩的口吻对郑正秋说：“小弟！你听我说，新新舞台的事就算了吧！我岳父的老脸都不知道往哪搁了，算了吧！”

人们每天都盼望《图书剧报》快出版，争读郑正秋的文章，以先睹为快。《图书剧报》在读者的期待心理下，空前的行时了，每次一出来，很快便销售一空。

黄楚九比所有的人都更为关心剧报的出版。郑正秋那边出一期，他这边买一期，一期也不漏掉。每当部下把报纸送到他手里，他都不撕掉，而是我到上面的正秋的文章，一句句、一字字地读，看郑正秋是怎样说自己的。他以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郑正秋的文章很短，但是火辣辣的，每个字都好像一颗子弹一样，从他的眼里射入，穿过他的心，剧痛难忍。终于，他决定第二次约郑正秋见面，但是不在茶馆，只在郑正秋家里。那是一天早晨，他的一个部下前来向郑正秋的佣人传达他的口信的。

下午，黄楚九带着他的秘书来到郑正秋家所在的巷子里。郑正秋家的一个佣人在门口迎接住他们。接着，把他们领到一间宽敞的厅里。郑正秋和他的弟弟正栋，以及堂兄弟芳松、芳熙等，已经在这里等候着。张太夫人和俞丽君这婆媳俩，在隔壁的屋里坐着，忧心忡忡地竖起耳朵，捕捉厅里的每一个动静。阿婆、听差和厨子等佣人，都拥在狭窄的过道里，探头探脑地往厅里窥视。这座老式住宅头一次笼罩着紧张的气氛。

“黄老板！请坐！”郑正秋有礼貌地先开了腔。

黄楚九坐了下去，但是没有说话，只抬起那双圆滑的眼睛，朝周围的人们打量了打量。最后，他的目光落到郑正秋的脸上，一动不动地盯着，仿佛要从他的脸上读出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黄老板屈尊光临寒舍，我感到十二分荣幸！”郑正秋一边在黄楚九对面的酸枝椅上坐下，一边又说。

黄楚九终于开言，但是声音不是上次茶馆里那种佯装的亲热，而是粗声粗气的。他说：“正秋小弟！得理也要让人，别得理不让人啊！自从上次谈话以来，你并没有停止对我的攻击，相反越来越猖狂。”停顿片刻，继续说，“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如果还是要让我公开认错，向那个酒后滋事的臭茶役赔医药费，你好抓住这个再大做文章，羞辱我一番，那办不到！如果……如果是想让我在经济上资助你办报的话，那我们可以商量。你说吧！”

“多谢黄老板的慷慨。”郑正秋轻蔑地笑了笑，说道，“我高兴地告诉你，我能够维持我的报纸。特别是新新舞台事件发生后，报纸很卖钱。”

“我再问你一句，你是不是打算永远跟我斗下去？”

“不，谈不上永远。古人曰：‘不平则鸣。’等鸣完了，我心里的气都放了，我的文章也就写不下去了。”

“郑正秋！”黄楚九厉声说，你说了我那么多天，还不够啊！你骑到了我头上，拉屎撒尿！我受到了无辜的侮辱，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抗议！”

屋里的空气，蓦地紧张起来。家人们的心，都提到喉咙上来。但是郑正秋泰然自若，反驳说：

“黄老板！你指使你的部下，侮辱了李本初。他也是无辜的，不能忍受的，又向谁抗议呢？”

黄楚九哑了声。过了好半天，才气急败坏地说：“我警告你！我黄楚九不是好惹的。你既然做了初一，我就做十五。下一步怎样走，那就由不得你了。但是我再说一遍，我黄楚九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你要改变主意，还来得

及，而且我还可以给你钱。”

郑正秋冷冷回答：“黄老板，那就看你的吧！”他第一次说出这么机警而有趣的话。

黄楚九道：“我们私了吧，我给你钱。”

“我们的谈话可以结束了。”

“你同意了？”

“我说你可以走开！”

黄楚九完全想错了。他霍地站起来，气势汹汹地威胁说：“那我只好不客气了，你等着瞧吧！”

一天下午，检察厅给郑正秋送来了一张传票，要他出庭受审。郑正秋一切都明白了，黄楚九已经到检察厅告他的状。他入讼了。

按照检察厅指定的时间，郑正秋来到了检察厅。不久，他就被带到公堂上。这之前，他心里一直发慌，但是这时候他不知道哪来的一股勇气，使他迈出了有力的脚步，“嗵嗵”地走到被告席上。他刚站定，就转着脑袋，向周围环视一遍。台上，那是审判人员，他们正襟危坐。另外还有一个人，后来郑正秋才知道那是黄楚九重金聘请的辩护律师。在原告席上，是黄楚九，他油头粉面，穿着讲究的、崭新的团花绸袍。郑正秋没有聘请辩护律师。这之前，家人曾一再主张，要聘请律师，但是郑正秋坚决反对，以为就他一个人，凭着那三寸不烂之舌，据理力争，就足够了。

审判开始。审判官讲了一番简短的话后，原告黄楚九讲话。他怒不可遏，说他的控词，说郑正秋这篇文章怎样说，那篇文章怎样说，第三篇文章又怎样说，总之，郑正秋是如何如何攻击他。最后指控说：“我要控告郑正秋，他侮辱我！”紧接着，是那个律师的讲话。他明知黄楚九理屈，但是仍然百般地按照黄楚九的控告，有目的地证明郑正秋是犯了侮辱罪。

现在轮到被告辩护了。郑正秋直立着，整个脸部表情都是轻蔑的，整个身子都显示出他的不眼气。他把全副精神都集中到脑子里，把全部语言的力量都集中到舌头上来。但是他没有立刻讲话，先讽刺地向审判官鞠了一躬，再向黄楚九的律师鞠了一躬，最后向黄楚九鞠了一躬，好像在台上演戏似的。随后，用洪亮的声音说道：

“首先，我对审判长受理此案表示感谢！对律师的高论表示钦佩！对黄楚九的控告表示欢迎！”停了停，又说，“可是，我要说，我认为我跟黄楚九两人的位置，应该对换一下，他搁在这里，我搁在那里，只是阴差阳错，或者……或者他营养丰富，比我跑得快，捷足先登了。”

审判长不苟言笑。其他的陪审员，都咬紧嘴唇，免得笑出声来，破坏公堂的庄严。听众们却顾不得庄严不庄严，都不由自主地小声笑了起来。公堂里一片模糊的嗡嗡声。

郑正秋继续辩护。他坚决否定了黄楚九的指控。他用确凿的事实和无可辩驳的道理，对黄楚九的控告，一点一点加以驳斥，越发话多，越发有劲！他整整说了一个钟头，那又雄辩又幽默风趣的语言，好像河水一样，顺畅地从他的喉咙里涌出，又顺畅地顺着舌尖流泻出来，中间没有间断过。他的整个辩词，深深地吸引着听众，也深深地吸引着记者，还深深地吸引着审判人员。他们都听迷了，似乎自己不是在公堂里，听一个被告的辩词，而是在茶园里看一个演员在演一出滑稽的独角戏。他们没有丝毫的疲倦感觉，相反地，十分的愉快。特别是听众们，个个都面带喜色，而当郑正秋说到幽默处，或

者用语双关的时候，都忍俊不禁。

郑正秋说：“谭鑫培在伶界享有盛名，我曾经为他唱过赞歌。但是，我不同意黄先生因此给他戴上‘伶界大王’的高帽子，把天都戳了个窟窿。如果说谭鑫培是伶界大王，那么，我请问黄先生：第一，你是不是已经呈报内务部立案，定为世袭之荣典？第二，你是不是每年都让谭鑫培享受大王的俸金？第三，你是不是已经通告报界承认知照？第四，你是不是已经征得伶界的赞同？再说，谭鑫培是伶界大王的话，那么德艺兼优的程长庚往哪摆？是否应该叫伶界大大王？最后，我要说，如果按黄先生的做法，推而广之，那么黄先生可以称商界大王，猴子也可以称山中大王了。”

笑声四起。听众的情绪达到了高潮，只有黄楚九和他的律师，很是尴尬，头低低地垂到胸脯上。

在郑正秋辩护完毕之后，审判长对郑正秋问道：“你能够拿出实证来，证明你的讲话吗？”

“能够！”

这时听众席上，站起来一个中年男子，他瞧瞧郑正秋，又望望审判长，脸上露出紧张的神色。他是郑正秋请来作证的李本初。

“长官大人！我叫李本初……我作证……郑先生完全是好人，我原先不认识他，他仗义直言，替我伸冤，……他无罪啊！”

听众席上，还坐着郑正栋和他的堂兄弟们。他们对郑正秋单枪匹马赴公堂很不放心，便背着他商量好，一块儿偷偷跟在他后面，来到这里。他们觉得帮郑正秋一把，为他作证，是时候了。于是，哥几个耳语一下后，由郑正栋起来说话。

郑正栋把一份摊开在手里的报纸举到头顶上：“这份《天铎报》可以作证，上面还登了黄楚九的丑行……”说完就把报纸送到审判长的手里。

郑正秋把目光投向审判长，等待判决。

然而，审判长跟他的助手们耳语了几句之后，宣布今天审判暂时结束，以后再找时间续审，原告人和被告人等候传讯。

过了几天，第二次审判开始。但是这时候形势陡变，不少报纸报道了这次郑正秋笔墨惹官司的情形，有的还加以评论，舆论明显地倾向郑正秋，指摘黄楚九。郑正秋深知舆论的重要，把所有谈论这场笔墨官司的报纸，都带到公堂上来，在开审之前就交给了审判长，作为他的辩词的正确性的证据。在他后来的发言中，他又进一步阐明了他在《图书剧报》上所发表的言论是符合事实的，有道理的，不是歪曲和捏造事实，侮辱黄楚九。

证据确凿，理由充分，舆论所向，使善于见机行事的黄楚九，开始感觉到形势对自己不妙，不想把事情再弄大，于是决定退出这场官司。他表现出诚恳的态度，不仅不再坚持要求检察厅给郑正秋判罪，而且表示接受郑正秋的要求：公开登报认错，负担李本初全部医药费。

审判长顺水推舟，以“纯属舆论监督，不触及法律问题，被告未构成犯法的事实”，“黄楚九撤诉”为理由，宣告本案结案。

这场我国报史上首例记者入讼胜诉的笔墨官司，垂下帷幕了。上海乃至全国的伶界、商界和新闻界，许多正义人士都拍手称快，惊叹郑正秋的胆量和口才，称赞他是一位“不畏强御”的剧评家，“伸张正义”的记者。“国人无不知晓”。

有个别的人，认为这场官司实在滑稽。他们对郑正秋说：“这是李本初

的事情，要打官司，就该李本初去跟黄楚九打，你为什么要把别人的事拉到自己身上，招来这讼案呢？”但是郑正秋回答：

“我是为正义而战！一个人是应该为正义而战的！”

谭春发（第 15 页为郑正秋照片）

陆军中将谢汝翼遇刺记

公元 1914 年，云南省会昆明。

这一年的春天，政治气氛有些反常。3 月间，大总统袁世凯电召迤西（云南旧分迤东、迤西、迤南三地区，昆明西外地区称迤西）镇守使谢汝翼入觐，还没有动身。4 月 28 日，又发来了“云南民政长李鸿祥入京觐见”的“大总统令”。北京突然先后召唤云南两位军政大员北上的事，引起民间种种猜测。或说：“大总统正在‘改革’，急需用人材，李、谢两个将才，可能要重用了！”

5 月 3 日，谢汝翼搭乘滇越铁路火车南下，按当时的习惯走法，先到越南海防，转乘海轮到香港，然后北上入京。

谢汝翼被称为“特使”，昆明全城张灯结彩，悬挂五色旗，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他的留日同学、参谋长姜梅龄，还陪伴着他，要一直送出省境。

谢汝翼是云南早期派往日本的留学生，在振武、士官两军校毕业。清宣统元年（1909 年）回滇，先后任炮兵教练官、管带（营长）。1911 年 10 月，他和蔡锷（新军协统，相当于日后的旅长）、李根源（陆军讲武堂总办）等发动武装起义，在攻占清方军械局、五华山（昆明城中制高点）、云贵总督署的苦战中立下功勋。云南光复后不久，奉军都督蔡锷令，担任第一梯团长（李鸿祥为第二梯团长），率部援川，迫使四川总督赵尔丰交出政权，成都军政府得以建立。民国元年（1912 年）5 月回滇，历任讲武学校校长、军都督府参谋厅长。次年，继任云南仅有的两个陆军师之一的第二师师长（李鸿祥为第一师师长），晋衔陆军中将。10 月，蔡锷奉召到北京，他代理军都督。12 月，新督唐继尧由贵州回滇履任，他出任迤西镇守使。

也正是这一个月，有来历不明的郭嘉宾其人，自称奉孙中山、黄兴密令，到滇西大理，组织“同盟军”，由杨春魁任总司令，宣布大理独立，分兵四出掠地。谢汝翼初则派兵西上，本人在昆明运筹帷幄，月底交卸军都督职务后，即率部进击滇西，很快就击溃了冒牌“同盟军”，收复了大理。

1914 年 3 月，谢汝翼回到昆明。5 月 3 日晨间，首途南下转京。

谢汝翼乘坐的是头等车厢。午间，列车经过宜良、阿迷（今开远）两县间的糯租小站时，一个穿便服的青年突然从三等车闯进头等车厢。当时，谢汝翼和姜梅龄正在午盹，车厢内寂无人声。青年从腰间掏出新式七响小手枪，对准谢汝翼的胸部，连发数响，谢氏立即身亡。

凶手得逞后，并没有逃走的企图。姜梅龄闻声惊起，会同及时赶到的法籍列车稽查，夺下他手中的枪，拘捕了他。

刺杀陆军中将这么大的官，云南前所未闻。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昆明。各种谣言不胫而走，有的说谢汝翼和大总统不合，袁世凯故意召他入京，暗中派刺客到滇，乘便予以暗杀。有的说唐继尧和谢汝翼一贯不和，诚恐谢氏入觐后，会出任云南都督，对自己不利，因而布置专人行刺。人言言殊，莫衷一是，人心惶惶。

次日，唐继尧和民政长（相当于日后的省长）李鸿祥，会衔发出了如下四言布告：

谢使北上，途遇狙击。行凶正犯，登时拿获。讯明惩办，水落石出。诚恐不肖，妄相揣测，造作谣言，妄图扇惑。

谕尔四民，勿听勿惧！

凶手当天解回昆明。4、5、6日三天，连续进行了三次预审。

审判结果，颇出一般人意料之外。

凶手名何荣昌，27岁，云南武备学堂毕业生，最后职务是驻守滇南的步兵第三团三营十连连长。据其交代，上年8月，因议论大队长（营长）沈得全克扣军饷、津贴，被沈寻事革职。何荣昌满怀冤屈，到昆明第二师师部找谢汝翼申诉。谁知谢汝翼不问情由，立即派兵把何荣昌送入监狱，关押起来。

何荣昌被关了20多天，获释后，认为无端坐牢，毁了名誉，因而萌生了向谢汝翼报复之念。他向武备学堂同学、在步兵二团任少校团附的何廷栋借得一支七响枪。由于谢代理都督后，每次外出，前后都有卫队，无法下手。

这个时候，何荣昌对刺杀谢汝翼一事，还没有下定决心。由于辛亥革命中他隶属李鸿祥部下，起义中出过力。1914年4月底，他便去谒见李鸿祥，陈述自己的冤屈，要求安排他个职务。李氏此时任民政长，不管军事，因而要他去找参谋处长李伯庚设法。

何荣昌认为，只要重新任职，名誉便挽回了。第一次去，没有找到李伯庚。5月2日下午再去，传达叫他晚间再来。晚上再去时，传达告诉他，民政长第二天一早要到车站欢送谢镇守使，早早睡了。

何荣昌无意中得知谢汝翼的行程，思前想后，这才决心刺杀谢氏。他回到家里，写下绝命书揣在衣袋内，第二天一早，购买三等客票，上了火车。

谢汝翼的警卫和随从分乘三、四等车厢，头等车就只谢、姜两人。列车行进途中，何荣昌到一等车看过，谢、姜两人都在谈话，不便下手。最后一次去，他们都睡着了。于是，他达到了行刺的目的。

案情报到北京，袁世凯十分重视。5月9日，发表了“大总统令”：

前云南边西镇守使、陆军中将谢汝翼，当改革之际，整饬军纪，剿办殷匪，维持地方秩序，卓著勤劳。上年赴迤西镇守使本任，适值大理兵变，连陷城邑。该中将督兵征剿，未及匝月，次第荡平，厥功尤伟。此次奉令入觐，行至阿迷县境，遽遭戕害，曷胜悼惜。谢汝翼着陆军部照陆军上将例议恤，用慰英魂。凶犯何荣昌业已拿获解讯，着唐继尧饬即讯究明确，立正典刑，以申法纪，此令！

5月11日，云南都督府以现任陆军第一师师长顾品珍为审判长，组成包括12名高级将校、检察官在内的军事法庭，对何荣昌进行公审。

何荣昌承认自己行凶是实。判决书中，指出他被沈得全挟嫌撤差回到昆明，“时谢使在二师长任上，当赴师稟揭。谢未与传质，旋被发（送）模范监，看管20余日始释。出狱自思，谢为长官，对于军事诉讼，不查不讯，纯用压力毁我名誉，遂蓄意报复。”因而以“挟忿逞凶，戕杀长官”罪名，拟即枪毙。

受审被告中，还有何廷栋。七响枪（子弹7发）乃上年在毕节土匪傅郭德身上缴获的。他对何荣昌行刺的事虽然毫不知情，但以“隐匿没（收归）公手枪，复敢妄自借给业经撤差人员，致酿重案”，拟处监禁二年，交昆明监狱执行。

唐继尧批准了军事法庭的拟议，5月13日，何荣昌被绑赴刑场，执行枪毙。

万揆一

“二王刺郑”始末

公元1915年11月10日，上午11时许。尽管阳光灿烂，天气晴朗，人们还是感受到了深秋的凉意。上海黄浦滩头，不时踱过三三两两的游客。外白渡桥附近，行人熙来攘往。桥头附近，出现了两个精壮的青年，他们不时看看佩戴的怀表，目光向四处搜寻着，透露出几许焦灼。看来，他们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什么人的到来。突然，远处街口出现一辆黑色轿车，飞快地向桥上驶来，两个青年精神一振，快步迎上前去。黑色轿车开到桥头，也许是上坡的关系，速度降低。人们透过车窗，可以看见车内后排座椅上正端坐着一个身着黑披肩、大礼服的胖子。就在这时，有人大叫一声：“就是那一部车！”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个青年跃身上前，冲过去对准轿车扔出一颗炸弹，可惜用力过猛，未能命中。轿车司机感到不对，慌忙猛踩油门，企图加快车速，急驰而逃，但已来不及了。那个青年又追近一步，再次投出炸弹，正中轿车尾部，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汽车后身被炸坏，车内的人被震得失去知觉。另一个青年迅速跳上车缘，左手握车栏，右手持枪从车窗插进去，对准后座上的胖子头部连发十弹，顿时把胖子的脑袋打的稀烂。此刻，远处传来了警笛的尖啸，两位青年本可从容逃脱，却再次验明死者正身，见目的已达，放声大笑，立桥头演讲一分钟多，方被闻讯赶来的租界巡捕逮捕。

这两位青年是谁？被他们打死的又是什么人？他们是中华革命党人王明山、王晓峰。死于他们枪下的，就是当时赫赫有名的上海镇守使、海军中将郑汝成。尽管郑汝成事前曾经风闻中华革命党将有针对他的暗杀行动，因而极为谨慎小心，“为了避开革命党人盯梢，特别绕道并且乘坐汽艇，然后由汉口路换乘汽车前来”，没想到机关算尽，还是在外白渡桥遭到中华革命党人的狙击，中弹殒命。

中华革命党人为何要暗杀郑汝成？这要从两年前的“二次革命”说起。

郑汝成，是袁世凯的心腹部将，“二次革命”前晋升为海军中将。他曾奉袁世凯之命，以巨款收买了当时的海军总司令李鼎新，争取海军在“二次革命”中唯袁世凯马首是瞻；随后，郑汝成由袁世凯亲自派遣，率部进入上海，驻守江南制造局；又在黄浦江面配置了“海筹”等军舰，对讨袁军事的发展构成很大威胁。结果，上海讨袁军在攻击江南制造局时，遭遇到郑汝成督率海军部队的顽强抵抗，“海筹”等战舰也对讨袁军队猛烈炮击，讨袁军“猝不及防，伤亡惨重”，只得败退。事后，参加过“二次革命”上海讨袁之战的蒋介石曾总结说：“在讨袁军说来，最大的失算，是未能估计到海军的动向”，而在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正是郑汝成。这是郑汝成欠下的第一笔帐。

“二次革命”失败后，郑汝成因镇压讨袁军，防卫上海有功，被袁世凯任为上海镇守使，坐镇东南。他“权谋诡谲，干练多才”，成为袁世凯派驻淞沪地区的忠实鹰犬。袁世凯帝制自为时，郑汝成极力赞助，声称“以一身独当东南各省反对之冲”。为了消除袁氏称帝的障碍，郑汝成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先后有200多名革命党人遭到逮捕杀害，仅在1914年9月的一个月里，就“杀害党人八十七名之多”。孙中山派往上海组织起义的中华革命党员范鸿仙，就是死在郑汝成派遣的刺客的黑枪下。事实证明，郑汝成已经成为革命党人在东南地区最凶恶的敌人，双手沾满了革命志士的鲜血。这是郑汝成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当时，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正积极准备在上海发动反袁起义。负责主持中华革命党东南地区军事行动的陈其美等人认为，上海为东南第一要区，吴淞要害扼长江之口，制造局为后方重地，都是军事上的必争之地，但都掌握在海军手中。他们强调：“控制长江的关键在海军”。要想夺取上海，必先控制海军；要想争取海军，须先诛除郑汝成，“逆酋不杀，则上海与海军二者皆不能急图也”！襄赞陈其美军事工作的蒋介石在《陈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划及事略》中说：“当以时间迫促，如海军不为我助，则海上交通不便，陆上声威不振，干事殊难有济；若从事于海军，又非自沪入手不可，盖当时最有力量之第一舰队、练习舰队，皆泊于淞沪一带……故海军不得，则上海难下；上海不下，则东南难图”。显而易见，中华革命党人要想在东南地区举兵发难，首先必须设法争取驻扎在上海的海军，“而海军当时正在袁世凯的心腹干部上海镇守使郑汝成的统率之下，号称有精兵十万”。如果能将郑汝成除掉，则可以一举解决海军和上海两个问题。于是，“诛除郑汝成”，就成为当时革命党人的“第一目标”。

暗杀计划，立即着手部署。恰巧，当时正有一个绝好的机会到来。11月8日，陈其美获悉日本大正天皇于当月十日举行加冕典礼，驻沪日本总领事署将开会庆祝，官居上海镇守使而又仰日人鼻息的郑汝成，当然非要亲往致贺不可。陈其美等决定利用这一难得的时机，将刺客埋伏在郑汝成的必经之地，进行袭击。9日，陈其美召集革命党人在法租界萨坡赛路14号开会，周密安排了狙击郑汝成的具体方案，决定于11月10日这一天，在郑汝成有可能通过的沿途布置下敢死之士十多人，安徽同志在十六铺，江浙同志在跑马厅、黄浦滩，广东同志在海军码头，分路把守，伺机伏击。

最受到重视的，是位于共同租界的外白渡桥。这里为到达日本领事馆的必经之路，而且马路拐弯，汽车必须减速慢行，最便于乘势狙击，所以外白渡桥被列为执行暗杀计划的重点地区。陈其美考虑再三，挑选了精于射击、枪法极准的王明山、王晓峰二人担此重任，期以必成。由于这次行动事关重大，如果刺郑不成，不仅打草惊蛇，郑汝成从此会更加戒备，使在上海起义增添莫大困难；而且定会招致郑汝成的疯狂报复，给革命党人带来极大危险。行动前夕，陈其美特地会见了王明山、王晓峰，问道：“欲在沪发难，必先杀郑汝成，故杀郑既所以倒袁，亦既所以存民国也，二君之意谓何？”大家心中都很清楚，暗杀郑汝成的行动危险万分，即便侥幸成功，行刺者生还的可能性也是极小的，但王明山、王晓峰却慨然应诺。他们郑重表示：“郑（汝成）不除，袁（世凯）不孤”，“必誓死以奉公命”！决心以生命诛除国贼，救国救民。

接下来，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悲壮的暗杀剧。

王明山、王晓峰被捕后，在法庭上镇定自若，侃侃而谈：“郑汝成助袁世凯叛反民国，余等为民除贼，使天下咸知吾人讨贼之义，且知民贼之不可为。”当法官再三盘问主使人及同党时，二人“坚不吐实”，只是自豪地说：“吾为祖国立一大功，虽死无憾”。慷慨陈辞，以身殉国。这种牺牲精神之难能可贵，这种暗杀行动之英勇悲壮，是不言而喻的。孙中山曾深表敬佩地说：“此等气魄，真是令人生敬，沪去此贼，事大可为。”

王翔

民国史上一个未解之谜——程璧光被刺

公元 1918 年 2 月 26 日。广州海珠。

一个针对着护法舰队统领、海军总长程璧光的阴谋计划，已经到了最后实施的时刻。当天晚上 8 点多钟，随着两声罪恶的枪响，程璧光倒在了血泊中！

程璧光，字恒启，自署玉堂，广东省香山县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海军统帅之一。他 16 岁入马江水师学堂，毕业后充任“扬武”舰见习生，因是广东籍人，广东舰队初建时，调程璧光任“广丙”舰管带。中日甲午战争前夕，程璧光担任领队，率领“广甲”、“广乙”、“广丙”等舰赴北洋会操，尚未返回广东，中日战事已起。程璧光当即上书北洋大臣李鸿章，“请率舰赴前敌”，得到允许。在威海之战中，程璧光在日舰的炮林弹雨之下，“独立‘广丙’舰首应战，自朝起至日中。腹被弹，血染中衣过半，不知也”。最后终因弹尽援绝，北洋舰队被迫向日本舰队投降，程璧光奉命前去与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联络接洽受降事宜，因此甲午战后被撤职离舰，返乡闲居。在此期间，程璧光结识了誓以反清革命为己任的同乡孙中山。孙中山劝他“同任光复事”，他答应了孙中山的要求，并且加入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不久，孙中山策动的广州起义事泄夭折，程璧光为逃避追捕，“亡命海外”，而他的弟弟程奎光则被捕遇害。流亡海外期间，程璧光与革命党人联系渐疏，两年后，又被清政府起用为“监造军舰专员”，赴英、德等国购回“海天”、“海圻”等舰，致力于中国海军的重建。

辛亥革命爆发时，程璧光正受命率“海圻”舰赴英国祝贺女王登基。后又“赴美利坚、墨西哥、古巴慰问侨民。中国军舰至远西自此始”。1912 年，程璧光率“海圻”舰自欧美归国，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想拉拢程璧光为己所用，对之优礼有加，而程璧光觉察到袁的帝制自为野心，便效法三国时代刘备的故事，“阳为柔谨，日以粮鸟灌园自晦”。实际上，他是坚决反对袁世凯葬送民国、帝制自为野心的，但又感到孤掌难鸣，无能为力，陷入深深的忧患之中，“与人书，自恨不速死”，宁死也不愿作帝制帮凶。

洪宪帝制覆灭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黎元洪与程璧光同在晚清海军中共过事，“程尝为‘广丙’管带，黎公以管轮属君，甚相得也”，私人交谊很好。此刻，黎元洪既想依靠程璧光来整顿和掌握海军，又想以程璧光为臂膀来对抗北洋派军人的势力，“以是委任甚专”；程璧光也不负重托，“既视事，尽罢前总统昏制，正身率物，日召诸将以奢情为戒，故是时诸部皆窳败，而海军事独起”，海军重又成为一支独具威慑力量的武装。在其后的“府院之争”中，程璧光坚定地站在黎元洪一边，反对段祺瑞和北洋派督军的专横跋扈。张勋复辟时，他又和全国人民一道声讨张勋和封建余孽的倒行逆施，“与上海护军使卢永祥宣檄以讨张勋”，受到全国舆论的褒扬。

1917 年 7 月，孙中山举起“护法”旗帜，程璧光毅然率领部分海军参加，统领第一舰队“移师粤海”，加入护法阵营。“当是时，刘冠雄及海军上将萨镇冰，数以无线电阻海军南行，凡五、六至，卒不能动”，可见其决心之坚，率领海军参加护法运动，这是程璧光一生事业的顶峰。1918 年 2 月 26 日，就在第一次护法运动面临胜败兴废的关键时刻，程璧光在广州海珠遇刺身亡，年方 60 岁。“护法诸省闻之，知与不知，皆失声恸”。程璧光被刺身死后不久，孙中山就被迫辞去了军政府政务总裁一职，第一次护法运动也就

于此降下了帷幕。

暗杀程璧光的阴谋，事先并非毫无蛛丝马迹。遇刺前三四天，程璧光曾经接连收到匿名信两封，把广东海军水鱼雷局局长周淦被撤换一事，归怨于程璧光。信中要程璧光立即恢复前局长的职务，“限于24小时之内答复，否则就要采取极端措施相对付”。后来，又接到署名地雷队长岑寿樟和自称陈祖寿者的恐吓信，“措辞亦怪诞”。这些匿名或化名信函，“俱用广东水雷局用笺，造语糊涂，意存谩骂”，均有为水鱼雷局局长被撤一事愤愤不平之意。

撤换水鱼雷局局长之事的经过是这样的：护法舰队由上海移师粤海后，驻泊于广州黄埔，舰队将校听说广东海军水鱼雷局局长周淦正患精神病，不免心中惴惴，恐其一时发病，会与护法舰队发生误会，带来麻烦，感到很不放心；又听说黄埔当地学校发生的反对护法舰队驻泊的风潮，周淦也有挑唆煽动的嫌疑，程璧光便与广东督军莫荣新商量，撤了周淦的职。这事本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谁知竟引来了一连串麻烦，程璧光“虽不以为意，然不能无疑”，他接信后，当即致函广东省督军署：“此等无稽之言，本不屑与较，惟该员等身为军人，俱有职守，出言负责，岂宜任意诬人”，要求督军署彻查严究。但是，调查结果，水鱼雷局并无岑寿樟、陈祖寿等人，恐吓信究竟系何人所作？究竟是真为周氏鸣冤叫屈还是借题发挥？查无结果，“莫能辨也”。

督军署的查办不力，使得事情越发变本加厉，被刺前两天，程璧光竟又接到一份匿名刊印传单，其中诬称程璧光有十大罪状，“语皆不堪入目”。程璧光当即将匿名传单之事公布于海军将校，对他们说：“我之所以南下护法，是为了尽一个国民保卫国家之义务，给我的一切薪俸，我一概不受；生活上之所需，丝毫不从公家拿，谁知竟然还有造谣生事之人，世间的事情真难测度呀！”很显然，在程璧光被刺之前，有些人已经发动了一个诋毁他的形象，对之实行人身攻击的风潮。这是不是将要对他下毒手，实行人身消灭的前奏呢？有可能。

接二连三发生反常的事情，程璧光当然不会不起疑心，但他并未真正引起警惕，也未能采取严密的保安措施。有关史料这样记载他疏于防卫的情况：“公（程璧光）性简易，居恒侍从极稀，每见官僚积习，仪卫森严，骑从煊赫，不谓然也。故入粤以来，虽以一身系天下之安危，仍多徒行，间或乘舆，仅一仆从”。他的亲友和僚属常对他说：人心叵测，防人之心不可无。但他并不当一回事，反而时常说：“我平生没有与人结过仇怨，即使如段祺瑞、龙济光等人，政治上是对头，军事上是敌手，但他们和我的私人交谊也是很不错的。再说，如今我兴义师，除暴乱，纯粹是出于公义而非私斗，即使把我打死，也是无济于事的。倘若我遭遇不幸，为国捐躯，这正是我的夙愿，我有什么好害怕的呢？”所以，他并没有听从亲友的劝告，深居简出，戒备森严，而是仍像往常一样，外出时徒步简从。“不意竟以此及于祸也”！

遇刺的当天，程璧光接连收到邀请他赴宴的请柬三张。一张是汇丰银行经理人陈某寄来；一张是省电报局长阮作楨寄来；还有一张是省议会议员苏某送来。由于苏某在船中设宴，泊近海珠，所以程璧光只答应了他。从苏某处饮宴回来，程璧光已经“两颧微赤，似已被酒”，本不打算再外出，但电报局长阮作楨却连连打来电话，一再敦请程璧光赴宴，盛情难却，程璧光虽与陈某素不相识，也只得前往。

程璧光遇刺时的情形，知者寥寥，记载也十分简略，令人难以窥见庐山真面目。现将台湾出版《程璧光殉国记》中的有关记载，摘录如下：

程璧光从议员苏某的酒筵上回家后，曾往返于秘书室三次，叮嘱秘书把适才收到的来电诵读一遍，指示了处理意见，然后整衣匆匆外出，仆人吴某跟随其后。不过 20 分钟，外面陡然响起枪声和人声，仆人吴某飞奔入内，大声叫道：“总长被刺啦！快来人呀！”大家急忙随之奔出户外，吴姓仆人接着说：“我送总长下艇渡河，看到对岸有人向总长发枪。”说话间，渡艇已掉头回到海珠，程璧光正倒卧在艇中。诸人慌忙下艇，把程璧光抬入卧室。

这个仆人吴某，可以说是程璧光遇刺时的隔河目击者。遗憾的是他只看到对岸有人向程璧光放枪，至于凶手的身材、打扮、面容，均未见到。

程璧光遇刺的目击者，还有两个为他摇船的“蛋妇”（广东沿海的一种船家妇女），她们提供的情况稍微详细一些。据说，她们把船摇到对岸后，程璧光踏上水梯，准备登岸，走到最末两级的时候，突然有凶手窜出向程璧光连发两枪。当即听到程璧光高呼：“抓凶手！抓凶手！”转身欲回艇，但是已经力不能支，全身倾倒在木梯上。蛋妇母女把程璧光扶回小船，此时程已奄奄一息了。人们追问凶手作何打扮，蛋妇母女说：当时，天已昏黑，景物已难以辨认。行凶者好像有两个人，都是穿的黑色短衣，一副夜行人打扮，埋伏在木栅栏旁，当小艇靠近时，突然冲出，迎面枪击。附近的行人听到枪声后都狂奔散去，凶手即乘机逃逸，转眼不见踪影。蛋妇母女提供的情况，比吴姓仆人为多，她们看到了行凶者的服饰、人数和埋伏地点，但这点线索，对于查找凶手来说，仍是远远不够的。

程璧光被刺一个小时后，法国军医加沙布博士对其作了详细的尸体检查，并写了如下的验尸报告：“程总长被击时，一弹由其左体之第四肋骨空间穿入胸部，复由其第五肋骨空间穿出，其胸前及复胸之衣，均为大动脉之血淹没。查验时，体尚温暖，未僵硬。综以上之观察，可断定总长被枪击后，当即殒命。其致毙之原因，乃一子弹由右向左斜下，贯其心肺，及心之左下房而出。”从枪伤验证情况来看，不可能是从后面发枪，行刺者必是岸上之人无疑，蛋妇母女当可排除在凶手嫌疑之外。

程璧光被刺后 4 小时，警察在距现场木栅码头数步之远处，拾得 6 响左轮手枪一支，“乃美国警察所常用，而市上所稀见者。枪甚新，似向未经用，中尚留子弹四枚，其为行刺程璧光之凶器无疑”。第二天早晨，清道夫陈某在行刺现场约 20 步外，看见有一个形状酷似牛奶罐的铁东西，不知是什么，就捡起来用手敲击，只听轰隆巨响，清道夫被炸身亡，附近数名行人也被殃及。“此可断定该炸弹亦为谋刺程璧光用者，凶手见枪中，故遗炸弹逃去”。由这些情况看来，当夜为程璧光摇船的蛋妇母女虽说是隐约看见凶手为二人，但此外可能还有数人，埋伏在稍远处配合，如枪击不中，则再投以炸弹，必欲刺杀程璧光方罢休。由此看来，凶手人数众多，组织严密，布置周详，不像是私人寻仇，显然是极有势力者之所为。

凶手到底是谁？首先涉嫌被捕者为水鱼雷局局长周淦。周淦被拘留于督军署数十天，经过数次提审和侦讯。既无周某作案的实据，又找不到他行凶的确证，只好宣布无罪释放。此外又陆续拘捕了其他数名嫌疑犯，然而也是“皆以不得要领置之”。追捕凶手的工作，陷于困境。

程璧光遇刺身死，凶手久捕不到，引起护法军政府的极大震惊。孙中山大元帅府发出了《缉凶训令》：

海军总长程璧光，突于本月 26 日午后 8 时半，在海珠码头，被凶徒狙击，洞中胸脏，创剧遮歿。该凶徒残害元勋，实属罪大恶极，法无可贷。而该管地方军警，事前疏于防范，事后又未能立获正犯，殊难辞责。为此令行该代理内政总长，仰即令饬广东地方检查厅，通令地方军警，一体严缉，务获惩办，以肃法纪，而慰英灵。

广东督军莫荣新，也于案发后发布“悬赏缉凶”布告，文曰：

为悬赏饬缉事，照得海军总长程璧光，遇害身故，显为敌人所忌，主使凶犯，暗行刺杀。省垣重地，竟有此不法举动，言此深堪痛恨。现下凶手在逃，除饬行军警严密查缉外，合行悬赏缉拿，仰诸色人等，一体知照。如有侦悉此起凶犯确实踪迹，报信拿获，一经讯有确实供证者，即赏花红银一万元，以示奖励。赏银现封存库，犯到讯实，即行提取，决不食言。

数月后，赏格增加到 5 万元，本来希望以此收“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之效，但结果却“缉凶案悬数月，未得解决”，行刺凶手依然踪迹渺茫。当然也吸引了不少人踊跃提供线索。据说某军政要员，当晚也应电报局长之邀与程璧光同席，比程璧光约早 10 分钟渡河，在经过码头木栅栏时，好像看见有两个人突然站起，“迎面逼视”，该要员不免心中疑惑，向前走了几步又回顾，见那二人“似有回避意”，他也未再深究，就自管自走了。当地警察局中也有人报称，程璧光被刺前几天路过码头时，就已经有人在一旁窥伺了。然而，“凡此皆扑朔迷离之词耳”，即使确有其事，也只能说明暗杀程璧光的阴谋是早已在策划与进行的，对于缉捕凶手的工作却难有多大帮助。时人感慨道：“真凶未获，鸿飞冥冥，滔天巨案，破获何时？伤哉！”

70 多年过去了，刺杀程璧光的凶手一直未落法网。他究竟是谁？躲到哪里去了？

程璧光被刺的原因，也是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有些论者写道：“1918 年 1 月，两广和滇、黔等省军阀在广州组成‘西南自主各省护法联合会’，同孙中山主持的护法军政府相对抗。他们枪杀了拥护孙中山的海军部长程璧光，并勾结国民党右派议员操纵非常国会。”西南军阀认为海军是当时孙中山所实际能够依靠的军事力量，而孙中山又主要是通过程璧光这个关键人物来联合海军的，除去了程璧光，就等于对孙中山釜底抽薪。显然，这些论者认定程璧光之所以被杀，是因为他“拥护孙中山”，从而成为西南军阀破坏护法运动的障碍，遭到西南军阀的忌恨，中了滇桂军人的黑枪。

但是，征诸史实，这种说法不一定合乎情理。因为程璧光虽是追随孙中山南下护法的，但是到了广州以后，由于握有两广财政的桂系军阀以供给海军军饷为笼络，他便已由拥护孙中山转而依附桂系了。时人说，“因大元帅府款项支绌，海军人员遂琵琶别抱，转视线于莫荣新。”护法阵营内部，主要存在着三种力量：一是西南军阀；二是孙中山系；三是海军。海军的向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护法海军虽由孙中山动员南下，但孙在广东并无可靠的财源，而桂系则握有两广财政。为了孤立孙中山，西南军阀允诺每月拨 10 万洋元为海军饷糈，海军遂因此而转向，“先是依违于桂系和孙中山之间，以后更趑趄倾向桂系”，在一系列问题上站在桂系一边牵制孙中山。程璧光曾提议推荐陆荣廷为西南盟主，“主持大计”；而在“非常国会”已经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后，程璧光竟也迟迟不受孙中山委任的海军总长一职，孙中山亲登“海圻”舰敦请也无济于事。这意味着海军不愿直接

受辖于军政府，而要保持独立性。在公开场合，海军也很少表示拥护孙大元帅，而仍是要求黎元洪复位，提议陆荣廷出任护法首领。

在护法各派的内部冲突中，程璧光采取偏袒西南军阀的立场。西南军阀的一再刁难和阻挠，使孙中山忍无可忍，1917年底决定以武力驱逐桂系督军，命令海军炮轰督军署所在地观音山。但是程璧光唯恐开罪桂系，拒绝执行，并把海军舰艇都调至黄埔，严加看管，以防孙中山直接指挥海军。某次，孙中山侄子孙振兴乘船运送新兵从黄埔经过，海军竟突然开枪射击，孙振兴当场饮弹而亡。本来，在孙中山率海军南下护法之初，西南军阀还因畏惧海军力量面对国民党人“不敢显有异同”，此时海军的表现使桂系顾虑顿消，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地破坏护法，督军莫荣新竟然接连把孙中山派出的招兵人员诬为“土匪”，就地枪决。孙中山忍无可忍，再次于1918年初炮打督军署。鉴于上次海军拒不执行命令，这次孙中山亲率卫队登上军舰，命令海军开炮。谁知第二天程璧光就以擅自行动为由，把执行孙中山命令的“同安”舰长温树德和“豫章”舰长吴志馨撤职，引起护法人士的强烈不满。孙中山把粤军和部分滇军列为尊重军政府的部队，而把海军剔除在外；随后，他又公开批评海军到粤后不肯急进，过于小心，以致使护法运动“以最好之时机，最易之事业，亦不能稍有起色。”

南下海军对护法运动所起的最大不良影响，是积极参与组织“护法各省联合会议”和改组军政府的活动。1917年底，海军附和桂系，联名发表“护法各省联合会议条例”，规定以滇系唐继尧，桂系陆荣廷和海军程璧光为联合军事代表，而孙中山则只居一个政务委员空名。这样，所谓“护法各省联合会议”，实际上成了“拥护实力派以抵触军政府的组织”。护法人士称此为“乞降之兆”，章太炎说：“观其条例行事，干预宪法，则是倪嗣冲第二也；预派议和代表，则是李完用第二也”；主张“早应派遣警兵立时解散”。联合会议搁浅后不久，海军又与滇桂军阀和一些投机政客提出“修正军政府组织案”，要求废除大元帅，设多人总裁，实际上是要剥夺孙中山的领袖地位，使实权掌握在西南军阀手中。军政府改组后，孙中山愤而离穗赴沪，第一次护法运动宣告失败。以往论者多将护法失败的原因归之于西南军阀的破坏，当时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的邵元冲则指出：“桂系即使横暴，若海军能坚持护法南下时之主张，则桂系犹将有所忌惮而不敢恣睢。无如当时之海军惟利是附，一经桂系之利诱，即不能自坚其初心，桂系遂益得而为所欲为矣。”护法运动的失败，使孙中山觉悟到，旧式海军“皆无才而多坏”，理解到革命不能依靠陆上军阀取得成功，同样也不可能依靠海上军阀得到胜利，从而产生出“将全国海军根本改革之决心”。

凡此种种，都表明程璧光在政见上与桂系并无分歧，显然，程璧光与西南军阀搭档得很好，与孙中山则离心离德，既然如此，滇桂军阀有什么必要采取极端手段暗杀他呢？

另一种意见，认为程璧光之所以被刺，是由于他与桂系军阀的权力之争，被时任广东督军的莫荣新买嘱刺客所暗杀。章太炎撰《赠勋一位海军上将前海军总长程璧光碑》文中说：1918年2月，“始议改建军政府，以政务总裁易元帅，孙公尚持重，久亦不能违众议。议未定，广东人欲以君（程璧光）为督，而君由是殒也。”又说：当传闻将由程璧光取代莫荣新为广东督军时，程璧光收到了许多善意的警告书和恶意的恐吓信，但他均付之一笑，不以为然，没有加强戒备，终至遇刺身亡。

这种看法，同样有懈可击。要程璧光担任广东督军的议论，这并非第一次，在此之前就曾经有过一次。1917年8月，广东督军陈炳焜秉承陆荣廷的旨意，逼走了亲近孙中山的广东省长朱庆澜，并处处阻挠军政府的行动，结果护法人士和广东民众强烈要求撤换陈炳焜，陆荣廷迫于众怒，遂建议程璧光继任广东督军，但程璧光却声称无意督军之任，一再推辞不就。据台湾出版《程璧光殉国记》载：陆荣廷曾对程璧光说：“治粤仍以粤人为宜，广东督军的职位，非你程璧光莫属”。陈炳焜和广西督军谭浩明，也都在一旁反复劝说和敦促，但程璧光仍“力谢不敏”，表白道：“我此番率海军南下，是为护法救亡而来，事情如果涉及到个人权位，就不是我所乐意听的了。”一天晚上，程璧光已入睡，谭浩明突然来访，“复以督军事相怂恿”，自称他系诚心推戴，别无他意，希望程璧光千万不要怀疑，但程“仍坚拒，不为所动”。所以才由莫荣新继陈炳焜任广东督军，连孙中山对程璧光的“小谨慎”也大为不满。既然上次由桂系军阀首脑陆荣廷提议程璧光接任粤督，程都始终不为所动，又怎么能断定他这次就一定会破例呢？史料记载：当传闻程璧光将取莫荣新而代之的时候，实际上是“粤人推戴公之意虽殷，惟公始终不允担任”，并一再支持莫荣新留任粤督。考虑程璧光的用心，“一则欲表示自己绝无权利争竞之意，以为同人倡；一则欲以其全力经营西南大局之发展，不欲以粤事分其精神，此其所以对于粤督一席，屡让不逞也。”这里的分析也许有溢美之嫌，但起码当时程璧光已经看出广东督军一职是一颗烫手的栗子，他不敢也不愿去捅桂系这个马蜂窝。对于程璧光的态度，莫荣新当然是清楚的，也就犯不着担心他来抢自己的位置：况且，在桂系和孙中山系相持并峙的局面下，程璧光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两方面都要争取他，恐怕谁都不至于愚蠢到刺杀他而冒与海军为敌的危险吧？

其实，剖析程璧光被刺一案，不能只注意西南军阀的言行，而把北洋军阀完全排除在外。汪精卫在为《程璧光殉国记》作序时说：程璧光率海军舰队南下护法后，北洋政府曾派遣使者来向他“游说万端”，他却坚持说：“如果想要我罢兵息争，并不困难，只要恢复约法、恢复国会就行。”由此可见，程璧光之“与非法者争，为国是而争也。争之不已，而至于与非法者以兵革相见，为国是而兵革相见也。乃至以兵革相见之故，为奸人忌，以至于死，为国是而死也”。程璧光在世，受威胁最大的是北洋系军阀。首先，程璧光与黎元洪关系非同一般。上引《程璧光墓志铭》说：“黎公既践位，锐意完葺海军，知非君无可恃者，又时袁氏余挤犹在，举事数不如意，亦欲倚君为心膂，用以自强，以是委任甚专。君既视事，尽罢前总统昏制”。可见黎元洪起用程璧光，主要目的就是要程掌握海军，结为强援，以与北洋军人相对抗。在黎元洪与北洋军阀的一系列冲突中，程璧光都是旗帜鲜明地率领海军站在黎大总统一边，表现出鲜明的反段（祺瑞）立场。1916年夏，段祺瑞上台伊始，废弃民元《临时约法》，数日后，海军各舰队暨各舰长即联合通电宣告独立，表示“非俟恪遵元年约法，国会开会，正式内阁成立后，北京之命令，概不承受”。1917年5月，段祺瑞故伎重演，指使暴徒包围国会，殴辱议员，时任海军总长的程璧光立即和其他内阁成员共同提出辞职，使段祺瑞成为一个空头总理。同月，总统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祺瑞总理一职，北洋督军蠢蠢欲动，企图举兵谋叛。海军闻讯，当即派遣战舰前往安庆江面，镇慑首先倡乱的安徽督军倪嗣冲。这些都表明，程璧光与北洋军阀不是一条船上的人，海军掌握在他的手里，北洋军阀就如芒刺在背，寝食难安。

其次，程璧光率舰队参加护法后，对当时处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东南沿海省区威胁极大，连北洋巢穴京津也处于海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孙中山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向来革命之成败，视海军之向背。此次率海军主力舰队南来，已操制海权矣”。他自信有了海军的援助，再出动1万陆军，那么只要10天就可以打到武昌，把握中原要冲，从而迫使北洋军“非降即逃而已”。海军的南下，加强了护法阵营的武力，曾经支援护法军队攻占长沙，又曾配合护法军征讨福建，并且平定了两广地区与北洋军阀相勾结的叛乱。事实表明，程璧光可能会与西南军阀拉拉扯扯，但他与北洋军阀则是势不两立的。

由于程璧光率领海军主力舰队参加护法，增强了护法阵营的军事实力，使得北洋军不敢放胆进攻南方，对他，北洋军阀当然是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当时，北洋军阀派遣许多密探在西南地区活动，他们的间谍报告中对程璧光和海军的动向十分重视，这很可能就是在捕捉对程下毒手的时机。刺杀了程璧光，既可以彻底剥夺黎元洪的武力基础；也可以拆孙中山护法军队的台；还可以在护法阵营内部制造矛盾，挑起争端，以坐收渔人之利；又可以利用刘冠雄等人把程璧光带走的海军重新拉回来为己所用。真可谓是一石数鸟之计！程璧光刚刚被刺，段祺瑞的主要助手徐树铮就立即致电新任北京政府海军总长的刘冠雄，认为南下海军失主，势必群龙元首，可能北归，要刘冠雄“务乘此机切实注意，早日下手”。由此可见，刺杀程璧光，正是北洋军阀所迫不及待要做的事。

上述推测，不可谓没有道理。但令人遗憾的是，至今尚未发现确切的证据，而仅凭推理是不能成为历史的。所以，程璧光究竟为什么被刺，可以说还是民国史研究中的一个未解之谜。

王翔

徐树铮谋杀陆建章另有重要原因

公元 1918 年 7 月，北洋炳威将军陆建章被皖系徐树铮谋杀于天津。徐树铮为何敢于“藐视王章，擅杀大吏”？论者多认为，这是因为陆建章“在直系中策划主和”，“反对段祺瑞对南方用兵”。但问题是：当时主和者以及反对段祺瑞对南方护法各省用兵者，不乏其人，而徐树铮却为何单单对陆下此毒手？因此，问题倒应该再深入一层考虑：徐杀陆是不是还另有更重要的直接原因？

翻阅史料，《合肥段执政年谱初稿》（吴廷燮著）有这样的叙述：

（1918 年 6 月）15 日，令陆建章既经奉军副司令徐树铮拿获枪决，著褫夺军官军职勋位勋章。

（附令文）前据张怀芝、倪嗣冲、陈树藩、卢永祥等先后报称：陆建章迭在山东、安徽、陕西等处，勾结土匪，煽惑军队，希图倡乱。近复在沪勾结乱党，当由国务院电飭拿办。兹据国务总理转呈，据奉军副司令徐树铮电称，陆建章由沪到津，复来营煽惑，当经拿获枪决等语。陆建章身为军官，竟敢到处煽惑军队，勾结土匪，按照惩治盗匪条例、陆军刑事条例应立即正法。现既拿获枪决，著褫夺军官军职勋位勋章，以昭法典。

据此看来，徐杀陆其因有二：一条是“煽惑军队，希图倡乱”；一条是“在沪勾结乱党”。第一条显然是指陆为冯国璋总统府高等顾问时出谋划策，搞“和平统一”，鼓动曹锟、李纯、陈光远、王占元等发表主和通电，使段的“武力统一”政策严重受挫；还有策动冯玉祥部在武穴停兵，通电主和。这段历史论述者颇多，不必多说。关键是第二条，即所谓“在沪勾结乱党”，这是怎么回事呢？

张勋失败后，倪嗣冲转舵快，投靠段祺瑞，得以复任安徽省督军兼长江巡阅使。他把张勋的定武军一口吞并，改番号为“新安武军”，一时军力大增，更加飞扬跋扈。尤为猖狂的是，他以缉捕乱党为名，在安徽各地，纵兵大肆屠杀原淮上革命军官兵及其亲属，扬言要“斩草除根，不留后患”。

那时，有不少淮上军的中高级军官被迫亡命上海，他们时有联络，对倪嗣冲祸皖罪行深恶痛绝，表示不能再安居上海一隅，决心回归江淮复兴革命，驱逐倪贼。但苦于茫茫无主，恰巧这时柏文蔚（原革命军第一军长、安徽都督）为奔父丧路过上海，大家就公推他出来主持反倪军事。柏义不容辞，遂派潘赞化赴湖南，与湘粤联帅谭浩明、湘军总司令程潜接洽。谭、程表示支持，决定将粤军张韬部及湘军叶开鑫一部共 4000 余人，拨归柏文蔚指挥。柏文蔚很是兴奋，准备亲自去湖南带兵。这时，他突然得知冯玉祥的部队在武穴停兵、通电主和的消息，经与上海诸同志相商，决定派代表与冯玉祥联络。此事，在他的《五十年大事记》第 26 节中有所透露：

闻冯玉祥之一旅，由滁州移驻武穴，就近派代表一观究竟。据回报，冯为有心人，但深沉不外露，倘我军达到汉口时，彼必表同情而响应，以目下情形揆之，不可操之太急……

就在柏的代表与冯会谈后不久，1918 年 3 月间，陆建章突然由京秘密抵沪，同时来的还有一个鼎鼎大名的人，即刚获特赦的孙毓筠（孙是安徽寿县人，为第一任皖督）。他们抵达上海后，就秘密地与革命党人柏文蔚、王庆云（原淮上军总司令）、袁家声（原淮上军副总司令）、岳相如（原淮上军军统、淮河水警厅长）、管鹏（柏文蔚任皖督时的内务司长）等多次

见面，商讨对付倪嗣冲的办法。经过协商，决定组建“安徽讨倪军”，推举陆建章为总司令，袁家声为中路司令，岳相如为西路司令，王建芳为东路司令，薛宜民、毕靖波、程华亭、廖传铭、李厚生、姚铁铭、陈亚东为团长。后来向全国发出了通电，联名签字的共34人，他们是：陆建章、柏文蔚、孙毓筠、王庆云、常恒芳、管鹏、陈紫枫、王建芳、李雨村、徐书田、崔子修、孔玉堂、韩建堂、张瑞生、张绍武、韩持泉、李悦亭、李卓才、傅让泉、岳相如、袁家声、吴明寿、薛宜民、廖传铭、毕靖波、李厚生、姚铁明、陈亚东、唐麻根、程华亭、常保盈、廖梓英、李小南、张仲掖。

这个消息，1918年3月22日的《申报》是这样记载的：

讨倪军现已组织完备，已推定炳威将军陆建章为讨倪军总司令，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为副司令，其联合兵力约二万人以上。

毫无疑问，讨倪军的出现有力地打击了倪嗣冲的嚣张气焰。那时，安徽各地的讨倪军（有的地方称“护法讨倪军”）忽然揭竿而起，与倪军展开激战。除紫枫、李雨村率领的讨倪军联合含山县团防共约3000人，一举攻占县城，释放囚犯，宣布独立。邻近的和县、合肥、来安、天长等数县城，纷纷告急。据史料记载，倪嗣冲在3、4月间，多次赴京、津面见段祺瑞、徐树铮，请示皖事之处置，开始对讨倪军大举围剿。由于冯玉祥旅未能赴皖参战，讨倪军势单力薄，终于被残酷地镇压下去。

倪嗣冲把讨倪军镇压下去后，余恨未消，决意非铲除讨倪军总司令陆建章不可。程华亭先生的《倪嗣冲攫权祸皖片断》（载《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

“陆建章在天津被害，就是倪嗣冲找徐树铮下毒手的。”

夏侯叙五（第56页图为柏文蔚照片，第57页图为倪嗣冲照片）

刺宋（教仁）案犯洪述祖的结局

洪述祖是民国初年袁世凯政权的内务部秘书，1913年暗杀宋教仁案的指挥者与部署人。

说起此人，原非无名之辈。他原籍江苏常州，是前清乾嘉时代大名士洪亮吉的后人。洪亮吉曾直言上书批评时政，轰动朝野，至今仍传为美谈。可洪述祖却是个不肖子孙。他生于1859年，清朝末年做过直隶候补道，跟袁世凯的亲信唐绍仪拉上了关系。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出山担任清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洪述祖默察时变，为袁世凯出谋划策，曾通过唐绍仪给袁上了一道秘密条陈，建议在清政府与革命军之间玩弄手法，居于调人地位，从中渔利。此说正合当时袁的心意，袁对此条陈虽不便直接表示，却全数采纳了。从此以后，洪述祖就成了袁的谋臣策士。后来袁世凯政权建立，任命洪述祖为内务部秘书，于是洪成为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心腹死党。

1913年初，袁世凯的独裁野心日益膨胀，为了清除革命党人，于3月20日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暗杀宋教仁案。执行袁世凯此次暗杀任务的挂帅人物是内阁总理赵秉钧，而担任部署、组织与直接指挥工作的就是洪述祖。

“宋案”发生后，全国舆论大哗。上海报刊很快就揭露了全案的事实真相，其中包括洪述祖秉承袁世凯、赵秉钧旨意，向上海应桂馨等凶手下达的指示与命令。至此洪述祖及其主子的阴险凶残面目暴露无遗。为了逃避罪责，遮人耳目，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洪述祖从容不迫地逃离北京，来到青岛德国占领区，以避风头。1913年5月3日，他还公然发出通电，吹嘘他在辛亥年“协助唐绍仪建立共和有功”，诬蔑宋教仁“借政党内阁之名，以遂其植党营私之计。”并无耻地为他们的暗杀活动辩护说：“毁宋仅欲毁其名，并无夺其生命之意，何得认为谋杀之证据？”

袁世凯独裁政权垮台后，洪述祖在青岛托庇帝国主义蛰伏了几年后，终于静极思动，于1917年化名张皎安潜赴上海活动。哪知他的行踪早被革命党人侦知，一天在马路被宋教仁的儿子、年仅十五岁的宋振吕和宋教仁的原秘书刘白抓住。宋、刘将洪扭往上海法院，提起公诉。后来按照法律程序，转往北京地方法院审判。

在铁的证据面前，在全国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北京地方法庭不得不装模作样地进行审判，最后只是判处洪述祖无期徒刑。洪述祖认为判刑太重，提起上诉。北京高等法庭于1918年12月12日宣布维持原判。刀笔吏出身的洪述祖却百般狡辩，以为在北洋政府中有亲朋为之说项，因而有恃无恐。他再次向北洋政府的最高法院——大理寺提起上诉。然而狡诈一生的洪述祖这次看错了形势，当时已是1919年初，正是“五四”运动的前夜，全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运动空前高涨。报刊舆论对北洋政府庇护“宋案”杀人犯进行了强烈的谴责。此时，宋教仁的儿子宋振吕也再次向北京高等检察厅提出控告。因此，北洋政府大理寺被迫以终审判决判处洪述祖死刑，于1919年4月5日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分监执行。

北洋政府判洪述祖死刑后，为了让他能保持完整的尸体，决定施用绞刑。行刑的绞机系由法国购进的洋式刑器，监狱当局用狗先作了试验，后又绞决了两名犯人，“均甚得法”。于是在4月5日上午10时45分将洪述祖押上绞机。洪述祖刚套上绞索，绞机的立脚之板即被抽去，因洪的身体过于肥胖，

脖颈支持不住他的全身重量，很快颈断头落，身躯坠地，鲜血直喷。执行官吏与监督人员惊呆了，立即请示司法部。司法总长与典狱长亲到刑场考查洪身首分离之原因，最后只好请来北京医学堂的三名学生，将洪的首级缝合到颈脖上，再贴上硼砂膏，第二天让其家属领回收殓了事。

这就是洪述祖的最后下场，这年洪恰好是 60 岁。

经盛鸿（第 61 页为宋教仁照片）

“沈祖宪案”内情

陶菊隐先生所著《袁世凯演义》是一部历史小说，书中撰述的主要人物和事件都有史实依据。此书第37回写道：“一九一六年一月十八日，京师步军统领江朝宗派人逮捕了内侍勾克明，同时被捕的尚有内史沈祖宪等十余人。”袁世凯为何逮捕沈祖宪，书中语焉不详，只作简要注释：“沈祖宪随袁二十余年，此次无端被捕，释放时坚决不肯出狱，袁世凯派人慰问并伴送回宅”。唐人著《北洋军阀演义》在第17回里，虽用了一定篇幅叙述此案，但细读之，令人生疑。为了弥补信史之阙，笔者于1992年走访了沈祖宪之子沈伯乐。

伯乐生于1907年，曾任《中国围棋》月刊主编。接受采访时，已86岁，思维敏捷，京话流利，谈锋甚健。他坦然地告诉笔者，《袁世凯演义》中提及的“沈案”的“主犯”即是他先父沈祖宪。案发时，他虽年幼，却也亲身经历，尔后又从其父以及族兄的谈述中得知经过。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有些细节渐渐地淡忘了，现在能够记起的只是一些片片断断，或可为研史之助。以下是他提供的史实。

沈祖宪（1852—1932）字吕生，祖籍浙江绍兴，同治年间优贡出身。在袁世凯奉命于天津小站练兵时，沈即在袁所成立的武卫右军总部下的编制中任文案（等于秘书），同僚有阮忠枢（后任秘书长），言敦源（后任内务次长）等。袁世凯任大总统前，沈始终尾随，充当首席秘书。长期住在府内，办理机要事务。《演义》中称沈为内史，是指袁称帝，将秘书厅改称内史监，秘书也就随之改称内史。

1908年，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病于洹上村养寿园，沈亦随同前往，经常与袁以诗唱和，后印有《圭塘唱和诗集》问世。沈还跟吴闳生一起撰写《容庵弟子记》，容庵乃袁的别号。由此可见，沈祖宪和袁世凯的关系非同寻常，但由于袁世凯为人疑忌成性，遂酿成“沈案”的发生。

1916年1月18日，沈祖宪突然被捕，随之其家被查抄。沈家住在羊圈胡同8号，那天，沈伯乐随乳母王氏到前门外买灯，回来走到西华门老爷庙后，一位好心的邻居悄悄地跑过来叫他们暂时不要回去，家中出了事。刚进胡同，就有便衣问他们是哪家的，王氏随机应变地口说是7号贺家的，于是便瞒过了便衣，来到了贺家。贺家主人叫贺子才，他是沈祖宪提拔起来的公府办事员。贺子才告诉他们：不知为了什么事，今天一早来了一批军警，把沈家男口30余人全部逮捕。第二天，贺子才又外出打探消息，据说是为了泄密“二十一条”的事。这时，京师步军统领江朝宗所部的军警，已驻防在沈家门外，监视着家人活动。事发三日后，沈家的仆妇经过允许，可以上街购买食物和生活用品，她们乘机到贺家告诉沈伯乐说：家中客厅、花园以及室内地下墙壁都被挖掘。又过了几天，沈伯乐的族侄沈进美第一个释放回家照料家务。此时，京城新闻媒介谣言纷传，说什么“被捕沈家多人越狱”。

这期间还因此而发生军政执法处长雷震春（袁世凯的儿女亲家）打江朝宗耳光一事，朝野上下传闻甚广。事情是这样的：沈祖宪被捕不久，雷曾问江为什么无真凭实据擅捕高级官员？江吱吱唔唔，不予正面回答，双方发生争执，雷出自一时气愤，打了江的一记耳光。这是当时社会上一种流行的说法。另外一种议论是：有关“谋逆案件”的处置，应由军政执法处管，而江的所为显有越俎之嫌，雷打江是发泄不满情绪，平白为“沈案”添了一段笑

话。

同年二月初三，驻在沈家的军警开始撤离，第二天上午，沈祖宪由袁的特派人员伴送回府，接着，随之被株连的族人也都被释放。一桩轰动京城朝野的“沈案”不了了之。

对此，当时《亚细亚报》的报道可作佐证：“沈句系有人诬指其有嫌疑情事，遂行传询，并非被捕，现已讯无他，故即于昨日释出”。

沈祖宪回府后非常生气地向家人叙述：1月18日上午9时许，他正在家中，家人崔喜稟告，江朝宗派人来请，他预感有什么事要发生。因平常总是江来见他，这次请他前去必有事故，所以他走出院门又回来加穿一件狐皮袍子，由来人伴随坐上了汽车。车驶进步军统领衙门，被让进一间小屋，江朝宗始终未露面，事实上他被幽禁起来。第二天有人来，他问为什么把自己弄到这里来，来说沈泄露“二十一条”，私通孙中山。他内心惊诧之余，毫不迟疑地回答说一概不知。

沈伯乐族兄沈叔甄释放归来向家人叙述他们被捕入狱。曾提堂审问多次，反复追问结社谋反之事，他们同样是无从回答。

所谓沈祖宪盗卖“二十一条”给外国使馆，纯属袁氏猜忌。与日方商订条约的会谈记录，确由沈保存，但沈根本没向外界透露实情，更没盗卖。沈祖宪私通孙中山阴谋杀袁，也纯属子虚乌有。据雷震春和傅增湘谈及，沈素喜每周与同僚在沈家小花园举行“蝴蝶会”，每人在会期携带七样食品，置于七格盒内，状如蝶，故名。于是以讹传讹，竟将“蝴蝶会”变成了“无敌会”，为革命党的一个秘密组织。沈祖宪被捕前，尚不知有此事，何乃瓜葛之有！袁氏大搞复辟帝制活动，广遭民众反对，草木皆兵，故加强特务统治；而步军统领江朝宗，邀功心切，秉承主子意旨，强化京师治安，一时捕风捉影，毫无实据，遽而发难，遂出现“沈案”事件。

沈祖宪回府次日，接到袁克文（袁的第二个儿子）的一封慰问信，此信沈伯乐保存多年，40年代末于镇海失落。信中大致说：“先生（沈祖宪）在我家幕中多年，手无缚鸡之力，岂能拔手枪而掷烈弹乎？言之不答，几误高贤……”。信中还赋诗道：“……岂将蕙苒误明珠，……周侯肖相冤终洗，……”此信曾于1935年登载在上海的《社会日报》上。

不久，袁世凯大封官爵，准备登基。下敕封沈祖宪为“上大夫少卿衙奏事处总管大臣”。沈的朝服都做好了，只差帽子未制成功。旋即袁氏倒台，沈祖宪也宦海沉船，闲居家园。

桑盛庭（第65页图为穿着祭天礼服的江朝宗）

一双碧玉镯累及一位实业家——蒋范卿之死

公元 1920 年前后，云南省会昆明，枪决了一个从香港引渡回滇的犯人。罪名为“投匪入伙，为害闾里”。

枪响人倒，曾在云南近代史上创造过几个“第一”、对省内电影、戏曲以至水上航运等事业起过一定促进作用的这位前实业家，由于一念之差，过早地结束了他曲折而富有传奇意味的一生。遗憾的是，由于文献资料仅片断存留，当事人确切的生卒年月和犯罪详细内情，都已经无法查清了。

死者蒋范卿，名植，生于清光绪初年，是滇南建水县曲江驿的富室子弟。他的死，与一双价值连城的碧玉手镯有一定关系。

在叙述这段旧事之前，有必要略提一下蒋范卿在民国建立前的经历。

新兴事业的开创人蒋范卿自幼喜爱美术。照相机刚传到云南，他就学会了摄影和冲晒技术。光绪三十年（公元 1904 年）以前，他从家乡来到省城，在风光旖旎的“海心亭”（翠湖公园旧称），买下一块地皮，建盖楼房，开起了“水月轩”——云南第一家照相馆，兼带替顾客画炭精像。他头脑灵活，信息感强，留声机（唱机）外传入滇后，水月轩中就增加了发售唱机、唱片的业务；清廷改良学制，废书院设学堂、增加新学科，他又采购一些教学学习用品，兼带售卖。于是，水月轩成为云南第一家文化用品综合商店。

在远赴沪、港办货之际，蒋范卿看过作为新兴事物的电影，认为和摄影相关，因而购买了一部放映机和 10 几卷拷贝。

最初，他和弟弟蒋朴，晚间放电影欣赏。不久就对外营业，把供照相顾客休息的大厅作为放映场。观众付钱后进场看电影。后来，又购来包括 1904—1905 年日俄战争纪录片在内的几十部拷贝，在正对水月轩的湖滨，创办了云南第一家凭票入场的正规电影院。

且看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二日（1907 年 1 月 16 日）蒋范卿在《滇南钞报》刊登的广告（连续刊登了半个月）：

滇南水月轩启事本轩在滇照相多年，屡蒙官商赏识，无待喋喋。近又在上海购到各种照相大小机器、药料、嘹亮留音机、镀金“山埃”镗水、学校用品、测量绘图仪器等物发售。诸尊光临，请到海心亭对门本轩面议，价值格外从廉。

又：本轩现放之“奇巧活动电影”，今又由西洋添办更奇数十场。其中火车、轮船、人物、鸟兽，生动活泼。又有日俄战景，枪炮轰击、烟雾腾天，恍如身入战场，令人惊心动魄。本轩不惜重价，购运来滇。拟待明年新春（按指春节，1907 年 2 月 13 日为正月初一），在本轩对门起盖场院开演，每位收银三角。凡欲赏识，请先期购票入场，幸勿自误，特此预白。主人谨启。

宣统二年（1910）6 月，云南劝业道道员刘孝祚发起，由招商委员胡绍章出面，在省城筹办戏院（最初称茶园）。蒋范卿首创放映电影获得成功，因而被邀参加筹办。戏院定名云华茶园，是为云南第一座戏园。茶园采股份有限公司制。总理一职，股东一致拥戴胡绍章兼任。蒋范卿则被推举担任具体主持业务的协理。他决定，戏院演出，以省内犹未公演过的京戏为主，附设茶室，则用鼓书、杂耍来助兴。且亲自到上海、天津等地邀角。

次年 4 月，云华茶园开业。初十日（1911 年 5 月 8 日），首批到滇的京角登台献艺，大鼓、杂耍也分别表演。揭开了“京剧入滇”、“鼓书入滇”

历史的首页。

蒋范卿精力充沛，在主持戏院的同时，又开始筹办滇池航运事业。这个时候，距云南武装起义——“重九光复”，只有4个多月了。

民国初官办工厂的总理清末，云南劝业道为发展地方实业，投资买来一批机器、车床，开办了云南劝工局，尝试着进行五金、化学等各类生产。

劝工局总理王昌不善经营，办厂毫无成绩。民国建立后，共和政府接收该局，仅有搬不定的机器、车床，和大量堆放在仓库中的滞销产品，流动资金一文莫名。实业司长吴琨，急于物色人才，来主持全局工作。民国元年（1912）4月，他想到了已经成为实业界名人的蒋范卿。

蒋范卿到劝工商看了几次，答应为共和政府效力，建议由政府拨给龙圆1万元，到上海添购机器，聘请各科技师来滇，另外令行省内各县，派人前来学习，学成后返回原籍，开办实业。一面设法推销存货，收回积压资金。

此时，蒋范卿已从越南买来小火轮一艘，积极创办水上客货运输。既然要到劝工局工作，就不能分身再搞航运。因此要求政府投资，兴办官商合股的轮船公司。经吴琨同意，拨给2000元。于是，民国纪年后云南第一家官商合办的滇济轮船公司成立，昆明到昆阳（今晋宁）的水上航线开拓出来了。不过，蒋范卿不再具体负责经营，而是出省替劝工局采办机器、原料去了。

1913年8月，劝工局改名云南模范工艺厂，蒋范卿成为该厂的总理。在他领导下，业务蒸蒸日上。厂内设金工、化工、电镀、陶瓷、织染、缝纫、竹木、藤器八科，分科生产，模范工艺厂成为云南第一家规模最大的官办综合工厂。

蒋范卿把接收下来的积压产品，写明用途、价格，编成目录，分送各处，借以推销存货。还在社会上公开发售彩票（奖券），定期抽签开彩，用降低价格的滞销货，来充抵彩金，结果真的收回了一部分积压资金。云南政府部门第一次发售彩票，又是他的首创！

当上工艺厂总理后，水月轩的照相、画像（还从上海请来了牙科医生，代客镶牙）业务，蒋范卿交给蒋朴经管，对影剧也不再插手。1914年初，他由滇赴沪不久，忽然急电蒋朴，要求把抽得出的资金，全部迅速汇往上海，他有急用。

原来，蒋范卿在黄浦江畔，又开创了一项新事业。1914年4月11日，昆明《共和滇报》刊出了《滇南水月轩主人在沪上创设座庄商号启事》。《启事》说：他在上海四马路书锦里口，拥有“阅报室、会客室、寝室数十间”，办起了个小停云馆。欢迎家乡父老经商或游历途中经过时，下榻馆内。他代报关、上税、运存货物、代购车船票。

蒋范卿此时，已经萌生了在上海谋求发展的心意。同年初夏，小停云馆开业不久，他让聘请的帐房先生照料店务，带着为工艺厂采购的一批原料，返回昆明。

在昆明，蒋范卿碰到一桩意外的事，完全改变了他此后的生活道路！

碧玉镯招来的后患 1914年6月，巴拿马出品协会云南分会，和云南省第一次物产品评会，在昆明南城外公园联合举办展览。其中的古玩馆，专向省会绅商，征借珠宝玉器、字画古币，作为非卖品同时展出。云南实业司为主办单位之一。作为司属工艺厂总理，蒋范卿奉命选送厂制精品，实业司也要求他把家藏古玩，酌送一两件到会，参加展览。

蒋范卿义不容辞，立即吩咐工艺厂选送产品，还把家中的一双碧玉手镯，

借给展览会陈列。

这副镯头，通体碧绿，滑润欲滴。内行一致赞为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品。它乃清宫之物，原由慈禧太后赏给大学士李鸿章，后来归李氏侄儿李经羲所有。宣统三年九月初九日夜，革命军炮轰云贵总督署。时任总督的李经羲，携眷仓惶出走，忙乱中失落了碧玉镯和一副翡翠帐钩。镯子不久被蒋范卿重金买下，收藏起来。

展览会上，碧玉镯引起了广泛注意。云南督军唐继尧有个族人，当时担任司令要职，闻讯后亲临古玩馆，一看之后，爱不释手。当即派出副官，前往工艺厂找蒋范卿，表示愿出1万银元，购买他的镯子。

蒋范卿得知唐司令要买碧玉镯，大吃一惊，深悔不该把镯子借去展览，惹来麻烦。他为人正派，不会趋炎附势，更不想飞黄腾达，于是婉言回绝。谁知此后10来天中，司令部天天来人，要求蒋总理务必割爱“价让”，但连续碰鼻而去。

展览会刚一结束，蒋范卿就索回玉镯，借口赴港购料，动身离滇。起程前，还向实业司递上了辞呈，请求辞去工艺厂总理，并委托厂庶务员办理交代。他决心回到上海，全力经营他的小停云馆。认为一了百了，不干公家的事，人又远在沪滨，唐司令纵有权势，毕竟鞭长莫及，其奈我何！

然而，蒋范卿想错了。

祸从天降回到上海还不到一个月，蒋范卿收到蒋朴一封快信。弟弟告诉他，辞职已经获准。可是，继任者却指控他亏欠了6000多元的公款，必须追赔。蒋朴要求哥哥，短时期内别回云南。

事隔不久，蒋朴又托一位赴沪游览的同乡，到书锦里找到蒋范卿。告诉他：唐司令派人来过水月轩，说是只要交出那双碧玉镯，亏欠公款的事就一笔勾销。还可以等待机会，将来保他当上实业司长。蒋朴问哥哥，交不交出镯子？

这一来，蒋范卿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当时就告诉来人，玉镯让他妻子收好，决不交出。等冷静下来后，立即给蒋朴写信，指出云南旧势力很强，唐某得不到镯子，恐怕不会甘休！要防止对方仗势压人，借故前来抄家。他建议弟弟，分一部分资金出去，另起炉灶，免受牵累。蒋朴依言，很快就另购房屋，开起二我轩照相馆，表示和哥哥分家了。

事态继续扩大。云南审计分处、财政厅、高等审判厅，都认定亏欠公款是真事。蒋范卿在上海多次函呈云南巡按使公署（按为省长公署的前称），力辩并无其事，但毫无作用。他一气之下，病倒了。

1915年8月17日，《共和滇报》发表了题为《又亏八千余元》的消息：“模范工艺厂前总理蒋范卿，月前具稟巡署：该总理‘赴港、沪采办机器，甚为清白。所有帐目，均具报有案。请委员彻算’等语。经巡署饬前财政厅长委员核算。嗣闻前财政厅长详复巡署称：‘前审计分处指驳有案之六千余元，应由该总理赔缴。’当经巡署饬高等审判厅传票追缴。兹又闻，清查该厂帐目委员王懋昭君详报巡署称：该总理任内亏折银，约在八千余元云。”

高审厅处理过程中，传讯蒋范卿到案。他请求由弟弟蒋朴出庭申述，没有获准。高审厅接着把全案发交地方审判厅执行。结果，水月轩房屋设备实行假扣押，同时函请建水县公署，查封蒋家财产，“准备折抵”！

水月轩被“假扣押”后不久，1915年12月25日，云南首义护国讨袁。不久，昆明地审厅撤销，积案移交昆明县公署处理。这件事也就搁置下来了。

1916年4月，云南司法厅查出蒋范卿的旧案，指令昆明县追缴欠款，“按律详办”。结果，水月轩正式没收充公。其时，人事沧桑，唐司令已调职另有高就。传说执行“假扣押”进行搜检，从蒋范卿妻子身上搜到了碧玉镯，此镯最后还是归于觊觎者手中。没有了“幕后原告”，本案也就收场了。

1917年初夏，一直病在上海的蒋范卿，结束了小停云馆业务，重返昆明。当他不只一次路过水月轩，看到旧日的发迹地，已经成为“云南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办事处”的时候，心头产生了异样的感觉。他憎恨诬陷他、使他倾家荡产的人，他要报复！

投入绿林蒋范卿在昆深居简出，性格变得沉郁起来。旧友们得知，他并未住在弟弟家中。他的行踪，连蒋朴都不清楚。1918年初，省会警察厅破获了一件伪钞案。传说在逃主犯，就是当年放电影和开戏院的蒋老板。旧友们虽然知道蒋范卿研究过印刷，可却不敢相信他会那么干。

云南当局不断滥发钞票，地方纸币信誉一落千丈。官方诚恐发布破获伪钞一案的详情，会使一般百姓更不信任钞票，因而讳莫如深。

1919年1月19日，昆明《滇声报》，登出了一则夸大的消息，使得人们大吃一惊：

……水月轩主蒋范卿，在模范工艺厂总理任内，挪亏公款甚巨。后经官府追缴，家事逐渐零落。去年，伪造纸币之案事发，逃回曲江，勾结匪类，自为首领，由通海、河西一带，分途劫掠，党已千人，附近各县受扰。日前，由省派军队一连，前往剿办。

蒋范卿为匪的实情，后来是在他被枪决后，由全省警务处的“内部人士”透露外传的。原来，他从昆明去到曲江北方近百里的通海县，投奔在该县县郊安营扎寨的大土匪吴学显。吴学显和他有同乡之谊，也知道这是个有用的人，欢迎他入伙，把他当成个“谋士”对待。

过了短时期打家劫舍的绿林生涯，吴学显筹集了一笔资金，请蒋范卿到香港制造伪钞。他说，把伪钞运到滇南，购买大烟，贩往沪、港，售卖后蜚回越南，向法国购买军火来充实军力，这样，就可以加速搞垮唐继尧。

蒋范卿听说能加速搞垮唐家，欣然应命，离滇经越转港。

富滇银行年头发行了新的五元大钞，不到半年，市面上就流通着新的五元伪钞。而吴学显匪部，枪多弹足，西犯河西、南掠石屏。滇南许多县、镇，被他扰得鸡犬不宁。

不断发现伪钞的事，使唐继尧感到十分恼火，责成省会警察厅，火速缉拿伪钞制造犯。

警厅和银行会同对伪钞进行了研究，那精美乱真的印刷技术，决非云南本地能有。他们肯定，印制地点不在上海，就在香港！

引渡归案省警务处决定，先就近去香港探查。警方派专员余冠群，带着年轻侦探柳遇春，会同银行行员刘青黎，一道动身赴港。

滇越铁路沿线，蒋范卿帮同吴学显制造伪钞的风声早已外露。柳遇春在边境河口，还从一个回家的曲江老乡处，探得蒋范卿在香港的住址。但等他们在香港住定、按址往寻时，却没有这个人。

半个多月间，余冠群等三人天天四出，找云南同乡打听。终于获知，蒋范卿在香港，没有忘记水月轩，因而改名为江月轩。这一来，果然把蒋范卿找到了。

余冠群办事老练，先化装拜访“江先生”，和他交上朋友。很快就弄到

几张五元伪钞。经刘青藜仔细鉴定，确和昆明所发现者一模一样。在这段时间内，柳遇春也探悉了印伪钞的秘密地点。

唐继尧得到报告，亲自过问此案。指示银行，让刘青藜留港工作，继续监视蒋范卿；余冠群和柳遇春即刻回昆，面呈侦察详情。另由“特派交涉员”徐之琛和英国领事接头，要求不日协助缉拿蒋范卿并引渡归案。

在英方协助下，蒋范卿就逮，连同大批伪钞成品或半成品，引渡回滇，没有多久便定讞了。

云南当局出于前述原因，惧怕全案真相公布后，会动摇人心。因此，仅以“投匪入伙，为害闾里”的罪名，处以极刑。

云南自来水公司正式成立后，迁出水月轩。这个地方，接着成为军人俱乐部性质的陆军偕行社社址。蒋范卿伏法后不久，他有位身在军界的旧友，一次登上水月轩二楼。面对湖光山色、景物依旧、人事全非的自然环境，联系蒋范卿的遭遇，感慨万端，从而写出一首古体诗。但为了避免引起麻烦，又改为一首看来像是单纯咏景的七律，署笔名发表于1920年4月20日的《滇声报》，题为《庚申春日水月轩楼上闲咏》。诗曰：

三棵五棵倚墙柳，一枝两枝隔院花。北山南向当轩立，东水西流绕屋斜。时见翠湖飞白鹭，偶看绿树宿乌鸦。

赏心只到无心处，风在林梢月在沙。

万揆一

六十年前刺杀邓铿的凶手是谁

广州血案公元 1922 年 3 月 21 日傍晚 7 时许，一列从九龙开广州的火车缓缓驶进广州车站，一位身穿戎装，年纪 30 开外的军官，昂首阔步和旅客一起步出车站大门。正准备登上前来迎接他的一辆黑色轿车时，突然从旁边闪出一个帽檐遮脸的大汉，向他举起手枪连发两枪后，迅速混入混乱的人群中逃跑了。他立即倒在血泊中，车站内外顷刻大乱。这位被刺的军官是谁？他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

邓铿没有死，他挣扎着爬了起来，走到汽车房，命令司机迅速送他到粤军总司令部去。车到总司令部里，一时大乱，人人惊愕万分。邓铿尚且清醒，但已预料到难以救治，对他的夫人李慎逸说：我虽然学识和才能不如朱执信，但是我和他是同样坚信革命；朱执信先我被人暗杀，我现在也遭人暗杀，真是天不能容好人啊！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也立即出来，表示大惊失色，命人用汽车送往法国人开的韬美医院抢救。经检查，邓铿身中两弹，一颗子弹中下腹部，未及要害，一颗子弹中上腹，射穿胃部，腹内大量淤血，并已感染。经抢救无效，于 23 日清晨 5 时不幸身亡，年仅 38 岁。

当时凶手并未抓获，而且并无蛛丝马迹可寻，一时新闻界发出一连串可疑的消息，并进行种种的猜测和传闻，终无一个可靠的头绪。那么这次刺杀邓铿的凶手是谁？他们为什么要刺杀邓铿？

邓铿为何被刺邓铿曾是陈炯明部下。辛亥武昌起义后，邓曾在广州的副都督陈炯明手下任陆军司长，负责收编各地分散的军队。邓把军队扩充到三个师，建立了粤军。陈炯明怕邓铿权力过大，不久将他调到海南岛去任琼崖镇守使。后来桂系陆荣廷的势力伸到广东，邓因不满桂系军阀在广东的胡作非为，被迫出走上海，以后又到过日本。

邓铿于 1913 年讨伐袁世凯的斗争中认识了孙中山并追随他革命。1918 年孙中山到广州成立护法政府，被推选为陆海军大元帅。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第一军总司令，出兵福建。邓铿率粤军主力第一师首先攻取了福建漳州，并成为粤军的根据地。不久，由于桂系和滇系军阀的捣乱，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1920 年孙中山再次联合陈炯明，以驻闽粤军为主力，对付桂系军阀陆荣廷，桂军组织三路军队企图先发制人，向福建进攻，均被粤军击败。粤军反攻入粤，很快攻占了广州。孙中山再次回到广州后，组织军政府，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邓铿为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1921 年孙中山亲自指挥粤军西征，彻底打垮旧桂系陆荣廷势力，邓铿把自己第一师的一个团交给孙中山作为卫队，让第一师中最可靠的团长陈可珪当孙中山的卫队长。这时陈炯明曾随军到广西，邓铿留守广州，广州的一切军事大权曾由邓铿负责，孙中山在广西十分放心。西征军的一切粮饷、弹药供给，也靠邓铿支持。他是孙中山先生的积极追随者、拥护者和支持者。邓铿被刺的时候，孙中山正设北伐大本营于桂林，并准备出兵湖南。消息传来，孙中山万分惊愕，不胜哀悼，立即发唁电到广州曰：“仲元遽以创死，伤哉！平时忠于国事，勇于奋斗，前途之望，正复无量！壮年遽殒，不止粤中惜此人才也！”孙中山感到邓铿遇刺，影响到当时的北伐大计和整个的革命事业，于是决定停止设北伐大本营于桂林，回师广州，以扭转危局。

邓铿被刺后，广州曾有谣言说是“孙中山派人来干的”，目的是“为搞垮粤军”。邓铿是孙中山先生的积极支持者，孙中山为何要刺杀他，“自毁

长城”呢！实际上刺邓的人恰恰就是放出谣言的陈炯明及其一伙。

陈炯明是打着孙中山革命的旗号起家的，他又依靠了邓铿的参赞襄助，才得青云直上。陈是个野心家和军阀。当孙中山讨伐旧桂系取得胜利后，两广的军政大权落到了陈炯明的手中，于他不但支持孙中山北伐，而且还处处阻挠、事事作梗，暗中与北洋吴佩孚联络，和湖南的赵恒惕共同鼓吹“联省自治”，从而孙陈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早在粤军刚驱除桂系出广州时，陈炯明就有过“自立”的打算。当时邓铿劝陈炯明迎接孙中山来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却有人对陈说：依照广东形势，没有请孙先生回来的必要。如果真的要请他老人家回来，就等于请个爸爸回来。试问老总能受得了吗？陈炯明听后不语，心中若有所思，因而迟迟不作行动。后经邓铿多次催促，陈炯明才派人去上海迎孙中山到广州。孙中山回到广州后，陈怨言百出，与孙中山经常发生矛盾，邓铿自认为他是孙陈磨盘中的谷子，他的使命便是阻止孙陈之间的彻底破裂。而因邓是一直追随孙中山、协助孙中山的，故自然为陈炯明所不容。邓铿为人勤勉，经常不回家，在司令部的会客室后面小屋里搁一小铺，借以午睡或晚间休息。在休息时常听到陈炯明和人说一些不满孙中山的话，认为陈“越来越和革命相去甚远”。胡汉民曾劝他不要在这间小屋里休息，以免遭人暗算。但邓却置之一笑说：“怕死则不作革命事业，大丈夫宁玉碎，何虑也！”

陈炯明是广东海丰县人，他提拔用人总要选海丰人。陈炯明任广东都督后，很多海丰人跑到广州来要官当，凡是要求者，陈都一一答应，于是广州都督府几乎成了海丰人的天下。1920年后陈炯明当了广东省省长，他在省政府里安插的亲信更多，比较有名的有马育杭、钟寿南、陈炯光、陈觉民、陈修爵、陈达生等。钟寿南当了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后，又把许多海丰人安插在财政厅和税收机关内。邓铿为人正直清廉，对这班不会办好事，专意贪污勒索的人，十分鄙视。尤其是对他们常插手一些军政要事，十分反感，曾多次向陈炯明陈述那些不良现象，要求加以约束。陈炯明不但不听，相反进一步纵容他的亲信。邓的进言没有起到作用，反而引起陈的心腹对邓的不满。1919年，在漳州时，陈的族人曾买通为邓铿做饭的仆人放毒药在饭菜内，企图毒死邓铿，因这个仆人见邓铿为人正直清廉，不忍加害而罢。陈炯明当广东都督时曾发行过一批兑换券，广东人称它为“陈炯明票”。老百姓对此种兑换券很不放心，不愿使用，兑换券很快就大幅度贬值。陈炯明的侄儿陈达生和陈觉民利用时机操纵票价，大发横财。邓铿对此非常恼火，把他们叫到面前加以训斥，因此陈炯明的那些亲属爪牙对邓铿更为不满，多次阴谋暗杀邓铿。由于邓铿地位较高，他们一时难以下手。孙中山率粤军平定了桂系陆荣廷，陈炯明和孙中山的矛盾日益激化的时候，他们谋害邓铿的阴谋活动也步步加强。这年初，孙中山下令免除陈炯明粤军总司令的职务，陈炯明即把邓铿看作是孙中山埋在他身边的一颗钉子，认为要公开武力反对孙中山，必先除掉邓铿。于是纵容他的那些亲信爪牙去除邓。

凶手是谁刺杀邓铿得到陈炯明的默许已是事实，那么这次刺邓的直接凶手究竟是谁呢？由于当时行凶暴徒没有抓到，没有真凭实据，故邓案始终是个疑案。但是广东军政府对这次刺杀案是十分重视的，作了大量的调查和侦缉工作，认为这次案件是有内线联络和指使的。

那天邓铿去香港，是为见一位从北京来的多年未见的老同学，只有粤军司令部里少数几个人知道，其他人是不知道的。因为当时北京政府中发生了

直皖两派军阀间的矛盾，国务院总理段祺瑞被直系军阀打败，解除了职务，段祺瑞极全力组织力量反扑，到处派人游说拉拢人支持他，也派了一些人到广州活动。段祺瑞知道邓铿在广州握有兵权，周培善是邓铿的同学，于是派周去香港约邓劝说。邓铿接到周培善约他香港见面的电报后，决定去香港一次，并把情况告诉了陈炯明。他于20日上午和谢持两人一起搭广九火车去香港，临行时陈炯明还特意送他到楼梯口。但陈炯明对邓铿此行很不高兴，因为陈这时正同北洋的吴佩孚等暗中联络，怕邓铿和周培善说得投机，使孙中山和段祺瑞联合起来，打乱了自己的如意算盘。因而把邓铿去香港的行踪告诉了陈达生。

陈达生是最痛恨邓铿的。除为操纵兑换券的事被邓铿训斥外，还因为曾要求担任广东盐运使、主持广三铁路和主持省立银行遭邓铿拒绝，故对邓仇恨根深。1921年，总司令部侦探黄福芝依靠陈达生和第一师的团长陈修爵的势力，从事武装贩运鸦片走私活动，在伶仃洋海面被盐务缉私舰截获，走私鸦片价值达100万元，案情重大。事发后，陈达生和陈修爵求之于陈炯明，陈因兼任禁烟局长，不便说话，推给邓铿去处理。邓铿接案后，坚持严办，没收全部走私财物。陈达生见无可挽回，纵黄福芝逃往香港潜居。这次陈达生得知邓铿单人出行香港，认为刺杀邓铿时机已到，立即秘密与在香港的黄福芝联系。黄福芝即在香港出巨额钞票买通一个黑社会歹徒，守候在广州的广九火车站伺机刺杀。邓铿到了香港后，和周培善只以同学之情交往了一天，即于次日一个人先返回广州。从车站出来时，天已将黑，人潮流涌，未及防范。当他步出大门临近汽车的一刹那，被歹徒迎面拦住击倒在地。由于身边并无警卫，无人追捕凶手，使凶手逃之夭夭。事后报纸上传出新闻，说歹徒是陈达生出钱所买，陈达生也感到害怕而逃到香港匿居。当时广东革命政府政务厅厅长古应芬认为，歹徒仍匿居香港，如果不早翦除，必有大患，曾派夏仲民带一班人马去香港暗中察访，探得这次暗杀确系陈达生和黄福芝两人买通黑社会歹徒所为，要求港英当局协同将凶犯逮捕归案，引渡广州处置。但港英当局慑于陈炯明的势力而不予答应，终使凶手逍遥法外。后来，陈达生一次在戏院看完戏出来，密探将其击毙于戏院门口，为邓铿报了仇。

邓铿遗体遵照他生前遗愿，原葬于广州麓园，与朱执信墓相邻，后来迁入黄花岗。廖仲恺先生曾有悼词曰：“仲元遽遭惨害，吾党继者，又弱一个。吾侪与仲元相处逾十年，道义之交，海内有几，诉及良友，辄多潸然出泪！”

陆仰渊（第82页图为陈炯明照片）

施从滨是被枪杀的吗？

在 1925 年爆发的浙（孙传芳）奉战争中，山东军务帮办、奉系军阀张宗昌的前敌总指挥施从滨，在皖北固镇一线迎击孙传芳的直军，结果兵败被俘，遭到杀害。对于他是怎样被杀的这一情节，许多史料都语焉不详，只提“被枪杀”；中华书局《民国人物传·孙传芳》文中，则说是“把施处决”。一些电影电视片在反映这一历史事件时，也都依此，说是把施从滨“枪毙”了。

实际上，施从滨是在蚌埠被斩首的。关于这件事，久居蚌埠的老人多是知道的。蚌埠市第十一中学退休教师仲灵生先生曾亲眼目睹施被杀的过程，他说：“一天上午，我和几个小伙伴在火车站南边的乱茔地玩，突然看见从东边开过来一辆铁甲车，我们赶忙趴下来，躲在坟头后边偷看。铁甲车‘咣’一声停下来，只见铁甲车屁股后面的铁门打开，跳下几个当兵的，有端着枪的，有拿大刀片的，凶恶的站在铁道两旁。跟着，走下来一个胖子，光头，身穿一件黄布衬衫，脚上穿一双马靴，身上被五花大绑着。他仰起脸，看看天空，这时，一个军官走近他身旁叽咕了几句话，被绑着的人跨过铁轨向西边一条水沟走去。当他走到沟坎上时，背后一个拿大刀的士兵猛然一脚，把他踢倒跪在地上，那士兵抡起大刀片砍下去，我们吓得赶忙捂起脸……”

“过了几天，就听大人们传说，张宗昌的一个师长在老坟地被砍了，收尸的人只收到尸身而头已不见了。

“又过了多少年，有人到西边沟里挖土（水已枯），忽然挖出来一个死人头骷髅，嘴里还有两颗金牙。老人们说，这可能就是那个姓施的师长的头。”

据此，施从滨是在蚌埠被斩首无疑了，所谓“枪杀”一说不应该再相沿讹传下去。

侯鸿绪（第 87 页为施从滨照片）

蒋介石广州遇刺

公元 1925 年 8 月 20 日，广州发生了国民党右派刺死廖仲恺的重大案件，全国为之震惊。在这之前一段时间，广州还曾连续发生过两起国民党右派刺杀蒋介石的行动，对这两桩未遂刺杀案，知者恐还不多。

原来在这一年 3 月 12 日孙中山先生病逝后，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与斗争日益明显与激烈。右派仇视与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廖仲恺、汪精卫与蒋介石。廖仲恺是旗帜鲜明的左派；而汪精卫与蒋介石当时本质尚未暴露，时时高唱联俄容共的高调，处处表现左倾，且又大权在握，自然引起右派头目们的不满。特别是蒋介石，在广州国民党阵营中，原仅是粤军许崇智部参谋长，地位不高，权势不大，又是个所谓“革命晚辈”，并不引人注目。但是在 1924 年他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后，势力大增，建立与控制了以黄埔军校师生为核心的新型军事集团，地位日形重要，构成了对国民党右派及以许崇智为首的粤军将领的重大威胁。1925 年 7 月国民政府建立，蒋介石又成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与国民革命军的第一军军长。这时，许崇智任国民政府军事部长与财政监督。蒋介石为着彻底夺取许崇智的军权与财权，扫除自己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与汪精卫结成联盟，并以军委委员的身份向军委会提出六大建议，要求统一军事，统一财政，将矛头指向许崇智与粤军将领。这些事不能不引起粤军将领的反感与疑惧。于是，一个暗杀蒋介石的阴谋在秘密酝酿之中。

第一次是东坡楼事件。约是在 1925 年 7 月中的一天，蒋介石像平日一样，准备乘小汽车从广州城外北校场黄埔军校入伍生总队部回到城内军校办事处。当时蒋乘的专车，车头上插有一面青天白日旗，作为他官阶的标志；另有一辆卫士们乘坐的小汽车，车头上没有青天白日旗。这天，蒋的专车发动时，发动机突然发生故障，司机便下车进行修理。蒋介石不耐久等，改乘卫士们乘坐的那辆车先行出发，而令卫士们修理好他的专车后乘专车进城。蒋乘的车顺利地开到了目的地；而卫士们乘坐的蒋介石专车驶经东坡楼附近时，却突然遭到当地驻军的一阵猛烈射击，汽车打翻，油箱破裂，车上的卫士们死的死，伤的伤。一位侥幸死里逃生的卫士排长回去报告，蒋介石闻之，先大惊失色，后遂大发雷霆，立即调派亲信部队前往出事地点进行调查，拘捕了当地驻防粤军的两名连长。经审问，那两名连长说，是他们的旅长命令他们，在这天如发现插有青天白日旗的汽车，即集中火力把它打翻，把里面所有的人都打死，他们是按这命令行事的。蒋介石立即命令扣押该旅旅长，调走当地驻防粤军。蒋介石这次因汽车故障侥幸逃得一命。从此，他更加强了自己的防卫，处处小心谨慎。

东坡楼事件后没有几天，又发生了第二起刺杀蒋介石的城门口事件。那时，蒋介石由于其如夫人陈洁如来到广州，两人一同住在广州东城门外的东山别墅里，每天进城办公，必经东城门。这一带距离闹市区比较远，很清静，来往人等容易注意。自从东坡楼事件发生以后，蒋介石的卫士们都很警惕。一天，卫士队长宓熙接到便衣卫士的侦察报告：最近有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一个穿长衫，一个穿短装，不像商人，也不像工人，鬼头鬼脑，在蒋介石住地东山别墅附近转来转去，东张西望，窥视蒋住地的动静。卫士队长立即与当地警察派出所取得联系，派出所说他们也发现了这两个人。于是卫士队长加强了警戒。

一天，蒋介石乘汽车从城内回东山别墅，其卫士队长宓熙与一个卫士坐在汽车前排司机旁，担任护卫。另有一辆卫士车随后。当蒋的乘车快近东城门口时，卫士长突然发现那两个形迹可疑的人正在前面路边向汽车注视。卫士长立即转脸轻声地向蒋介石报告说：“发现两个形迹可疑的人，我已作警戒准备。”同时，他迅速地把汽车门上层的玻璃板摇下来，把 20 发的快慢机盒子枪作好射击准备。当汽车开进城门洞约 30 步的时候，卫士长看见那个穿长衫的人对着汽车举起手来，就迅速而敏捷地先发制人，将盒子枪伸出玻璃门外，对准那穿长衫的连续发射，将其打倒地下；同时，他令汽车加快速度冲出城门，风驰电掣地开回东山别墅。后面车上的卫士们听到枪声，马上停车，蜂拥而上捉拿刺客。那穿短衣的刺客正举枪欲射，被一个卫士踢翻在地，另两个卫士一把抓住他的手臂，将其抓获，速同那个负伤的长衫刺客，一同拖上汽车，送回东山。据初步审讯，此二人是原广州商团陈廉伯等人派来行刺的。蒋介石命令将此二人押交军法处查究。蒋介石夫人陈洁如嘉奖卫士们卫护有功，发给卫士们数百银元。

后来调查表明，当时在右派与反动势力策划的暗杀名单上，排在最前边的就是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由于汪、蒋戒备森严，刺客们无从下手。而廖仲恺却在 1925 年 8 月 20 日遇刺身死。那天蒋介石正在广州城中军校办事处，准备到中央党校开会，因迟行一步，再次脱险。他在电话中得知廖仲恺遇刺，摔下电话机，面色苍白，急急乘上汽车赶往出事地点。事后，蒋介石利用“廖案”，拘捕、赶走一些右派头目，后来又向左派开刀，进一步掌握了国民政府军政大权。

经盛鸿（第 89 页图为蒋介石与陈洁如 1924 年在广州所摄）

孙殿英敲诈高世读一幕

这件案子发生在徐州。

1927年初，北伐军节节逼近安徽皖南境内，时任安徽省长的高世读惶惶不安，遂派副官护送妻妾及子女10多人从安庆乘轮船到浦口，然后转乘火车去天津定居。过后，他便亲自到蚌埠面见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表示自己无力维持安徽的行政事务，恳请辞职。孙与高早年是北洋陆军速成学堂的同学，所以并没有过多的为难，便允辞放高世读走了。

1927年2月的一天，高世读从蚌埠火车站上车去天津。深夜，车抵达徐州站，突然一队手持短枪的士兵冲上高乘坐的那节包厢内，为首的一个军官走到高的面前彬彬有礼地问道：“请问大人是不是安徽的高省长？”

高世读蓦然一惊，反问：“你们是哪部分的？”

那个军官回答：“直鲁联军第十四军。我们军长请高省长去见见面。”

高世读双眉一皱，他知道直鲁联军第十四军的军长是孙殿英，便说：“请转知孙军长，我不便下车，以后有机会一定登门拜访。”

那个军官一变脸，说：“还是请高省长下车吧，否则我们弟兄们不好去交差。”

高世读不高兴地说：“我不去！”

那个军官发出威胁的口气：“高省长，请，免得弟兄们重手重脚伤了省长。”

高世读知道事不可违，横下一条心，决定当面去见见孙殿英也好，看他能奈何于我！

孙殿英为何要扣押高世读？他又是怎么知道高所乘火车的时刻和具体车厢的？

事情要从1925年的冬天说起。这一年冬天，孙殿英与暗中勾结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的安徽第五旅旅长华毓庵相约，在亳州会商，然后一同转移山东。孙如期抵达，可是华旅却久等不见；孙十分生气，以为华在玩弄他，一时性起，便在亳州城内大肆劫掠，作恶9天。当时任皖北镇守使的高世读闻讯率部前去围剿，华毓庵旅也奉命参战，他们的部队将亳州城团团围住。孙殿英气急败坏，命人将高的大女儿高承玲抓来（高世读是亳州人），叫她站在东门楼上喊话：“赶快退兵，不然他们就要杀了我！”于是高迟迟没有攻城。当天夜里，孙殿英买通守卫西门的华毓庵，“突围”而去。

高世读率部开进城后，只见片片瓦砾，死尸盈野，惨不忍睹。后来经过查访，获知孙匪兵从西门的所谓“突围”，实为买通了华毓庵，遂即密报在蚌埠的安徽联军总司令陈调元，陈复电立即处死。高接密电后，即以皖北镇守使的名义，在姜家祠堂召开军事会议，将华毓庵捕杀。接着，又把勾结孙匪的流氓头子白芳泰、汤云龙抓获处死。孙殿英闻讯，暴跳如雷，从此便与高世读结下了仇恨。

高世读从安庆到蚌埠向孙传芳辞职一事，很快传播出来，引起隐居蚌埠的华毓庵亲属的注意，当他们得知高要乘火车去天津，便暗地里探访高的行车时间和车厢位置，向驻防徐州的孙殿英密报。

孙殿英抓到仇人高世读，本想一杀为快。但他顾虑到高的部属门生遍及华北各地，今后仇仇相报对自己也极其不利，加之这时又有许多商绅名人为高求情，便网开一面，将高送到泰安，以贵宾招待，但提出以40万元为交换条

件，妄图敲诈一笔。

高世读叹了一口气，说：“我虽居官多年，拙于理财，哪来这笔巨款呢？”
于是，高被软禁起来。

孙殿英的参谋长赵某，也是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出身，高求救于他，赵表示慢慢地来吧。

一天，赵参谋长向孙报告军务以后，随便提起亳州杀华毓庵的事，说：“军长追念华旅长之牺牲，‘我虽未杀伯仁，伯仁实为我而死’，这样的义气高风，令人敬佩不已！不过……”他停顿了一下，看看孙的脸色，说：“关于高的事情，还是结束为好。”

孙殿英一副流氓相：“好说，借给我40万，一了百了！”

赵说：“高跟我说，他在天津正金银行有一笔存款，但非他本人面提不可，只要回天津，一定凑足款子奉献，并要我在军长面前担保。”

孙殿英沉思良久，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然后答应了高的请求，派一名副官“护送”高去天津了。

高世读的寓所在天津日租界永和里20号。他一到天津，便把那个副官安排到一家旅馆里去住，从此，闭门谢客，绝不露面；同时，叫人写文章投寄报馆，披露脱险真相。一时间，天津报刊争出号外，备加渲染，高世读成为新闻人物了。

那个“护送”高到天津的副官，顾虑高身居租界内，初不敢对高动手，后来干脆就再也见不着高的影子了。经报纸一宣扬，他害怕自己日后会陷在天津，就急忙溜回徐州报告去了。

孙殿英受了骗，便拿“担保人”赵参谋长出气，说：“高世读不愧是个阴谋家，到底比我们高明。参谋长也可算是古道热肠了！”说得赵参谋长自惭不安。一天深夜，赵参谋长陪孙殿英打完牌回家，行至中途突被一群暴徒拦截，被乱刀戳死。

赵死后孙下令盛殓，并带领全军文武前往吊唁致祭；对赵的家眷备加安慰，并把赵的长子、次子安置在军部当参谋。其实，这不过是孙殿英欺世盗名的卑劣手段而已。

夏侯绪五

对宋子文的几次未遂暗杀

上海北站刺宋案的发生及侦破——宋子文为何“命途多难”，迭遇险情——他如何躲避杀手公元 1927 年蒋介石建立南京政权以后，他的专制统治和消灭异己的政策激起了众怒，国民党内的各反蒋派系抱着不同的目的，纷纷起来反对他。并且一些反蒋派系开始酝酿如何干掉蒋。其中尤以广州反蒋派主张最烈。广州反蒋派与分布在南京、上海一带暗杀集团的头目王亚樵取得联系，为他提供了 20 万元经费，让他组织暗杀蒋介石的行动。广州反蒋派在与王亚樵商议刺蒋的过程中，同时考虑了第二个方案，即万一刺蒋不中，就采取断绝蒋介石财源的办法，把“筹款有方”的宋子文干掉。于是在一次刺蒋未遂的情况下，开始谋划行刺宋子文。

王亚樵等人利用宋子文经常往来于宁、沪之间的机会，埋伏于上海北火车站，待宋子文一下火车，就开枪向他射击。王亚樵暗杀团体中的一个行动小组事先潜伏在南京，了解宋子文的行踪，然后用暗语及时电告上海。王亚樵接到电报，连夜布置行动。由孙凤鸣、萧佩伟、许志远、张玉华等组成第一战斗组，在月台上行动；龚春蒲、刘刚、龙林、唐明等为第二组，在候车室行动；谢文达等五人在火车站外马路接应。7 月 23 日晨，三个战斗组各就各位。王亚樵在天目路沿街的一家旅馆租借了一间房子，坐观战斗情况。早晨 7 点，宋子文乘坐的专车抵达北火车站，站台上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前来欢迎宋子文的上海各界要人拥向车厢门口。宋子文由秘书唐腴庐陪同缓步下车，然后由众人簇拥走出站台。第一战斗组原打算待宋子文下车后开枪，见此情景，无法下手，便急向第二战斗组发出暗号。这一天，宋子文与秘书唐腴庐都穿一身白哗叽西服，戴白色拿破仑式帽子。

只是宋空手而唐拿着公文包。当他们走出车站门口时，刺客刘刚突然向唐开枪，他误认此人就是宋子文，其他人也集中向唐射击。宋子文的卫士立即进行反击，并掩护宋子文躲在一根柱子后边。一时间，站台上警笛鸣叫，军警们向候车室冲击。龚春蒲以为大功告成，便投了两颗烟幕弹，趁乱逃走。当晚，王亚樵从晚报上看到一则消息：“歹徒今晨在北站行刺宋财长未遂，秘书唐腴庐当场毙命。”

7 月 24 日的《上海报》上登载消息说，宋子文乘车抵达上海北火车站后，“突有暴徒数人，意欲行刺，抛掷炸弹开放手枪，约数分钟，一时炸弹手枪之声不绝于耳。车站乘客仓惶逃奔。炸死客人数名及随宋氏卫士二名，而暴徒亦伤二人。幸宋部长先下车至站长室，未遭毒手，可谓吉人自有天相。所有站房玻璃，均已炸碎，死伤三人，血流满地，惨不忍睹。车站两侧，原有第三师某营驻扎兵士，闻声赶至，时凶徒业已逃逸，即将受伤暴徒抬回营部，再转道警备司令部严讯。……”

宋子文在上海遇刺的消息传到南京后，蒋介石又惊又怕，他训斥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失职，要戴笠不惜一切代价抓获刺宋凶手。于是戴笠亲自指挥特别行动组到上海捕捉凶手。与此同时，上海各报登出“悬赏缉拿凶犯”的通告。最初赏格是 1000 元，并说“如有人知凶犯而藏匿不报，一经查出，与该犯一律严惩治罪之。”在这以后，各大报纸都先后刊出捉拿凶犯的赏格，且一次比一次高，有 2000、5000、1 万、2 万等等。上海的三大亨之一杜月笙积极配合戴笠的行动，把各路“弟兄”和打手聚集一道，扬言非把“刺宋”一案查个水落石出不可。杜月笙的帮徒们与上海治安局和军统特务们三管齐

下，逮捕了许多嫌疑犯。其中有参与刺宋的刘刚、龙林、萧佩伟，还有王亚樵的弟弟、上海小有名气的律师王述樵，以及与王亚樵暗杀集团沾边或不沾边的人若干，这一行人统统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逐个加以逼审。

刺宋案的发生，也使南京政府的其他官员们惊恐万状，特别是那些高级官员们在这一段日子里，不敢轻易露面。宋子文险些被刺，唐腴庐当了替死鬼，谁知此类事何时也会降临他们头上呢！为了搜捕案犯和防止刺杀事件的再次发生，南京、上海火车站一连数日对每个旅客进行搜查，连旅客所带的爪子和罐头食品也不放过，唯恐里面藏有炸弹什么的。然而事隔三年，又接连发生了刺蒋案，也该着汪精卫“倒霉”，子弹偏偏打在了汪精卫身上，虽然未致命，也够他受的，若干年后，他还是死在这伤口上。

1937年4月12日，南京法院公审刺宋、刺汪案。在审理这个案件的过程中，有人提出刺宋是王亚樵主使，而行刺者旨在杀宋而误杀了宋的秘书，属于打击错误，应负杀人未遂及过失致人死之责任。又说犯罪日期是民国21年（1932年）3月5日以前（国民党政府曾颁布了一个所谓特赦令，民国21年3月5日以前的一些犯人部分特赦——笔者注），刺宋又出于预谋，因此不能因大赦减免其刑。还有人说既然是过失致人死，最重刑为两年以下有期徒刑。南京政府和法院最高负责人认为：此种为犯人开脱“罪责”之行为是置“党国利益”于不顾，王亚樵等人多次企图“谋杀党国要人”，且已造成严重后果，非处极刑不可。结果，余立奎、张玉华、贺坡光等人经南京法院公审后，处以死刑。在上海刺宋的刘刚、龙林、萧佩伟、唐明等人已先于他们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杀。

宋子文大难不死多亏了他的秘书唐腴庐。宋子文的家人为宋子文庆幸，说是不幸中之万幸。宋子文自己也说由于他的身量高过唐秘书，竟能幸免。对于唐的死，宋子文自然是深感“悲痛”和“内疚”，他亲自过问唐的丧事，对唐的家属进行慰问和表示“歉疚”，并且把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塞给了唐家属。

自宋子文遇刺未遂后，他有如惊弓之鸟，不敢出头露面。恰在这时，宋子文的母亲倪太夫人去世了。宋子文一向讲孝道，可是母亲死的不是时候，要大事操办吧，怕有危险；办的一般吧，又太说不过去。宋子文是个很要面子的人，考虑结果还是要大办。南京政府颁给宋母“教忠报国”四字匾额。为了安全起见，从为宋母守灵到宋母出殡，宋子文周围都是严严实实的保安措施。1931年8月18日宋母出殡，送葬的党国要人车水马龙。宋子文为自身安全起见，演了场“空城计”，先以三辆空车为幌子，引走了记者，然后再登车急驰而去，待记者再回过头来找宋子文时，他早已不见了。

办完宋母的丧事，宋子文仍是惊魂不定。实际上宋子文的危险也确实没有过去。1932年11月28日，宋子文在南京的公馆突然起火。这座公馆靠近南京的北极阁附近。当时的报纸上说，宋子文为给自己豪华的公馆添上一点儿野趣，硬是在房顶的瓦楞上铺些个茅草。火势冲天，房顶上的茅草一烧连成一片。后因扑救及时，损失不大，只烧了两间房子。这事发生后不到一个月，即12月12日上午，位于南京铁汤池的财政部又起火，不到一小时就焚烧楼房五幢，损失达一万余元。当时宋子文正在上海养病。南京政府对上述两起火灾原因一直没有公布。有人说纵火者的目标就是冲着宋子文的，却让他躲过去了。在这以后，宋子文仍不断接到警告信和恐吓信。1932年1月2日，宋子文在上海法租界的住宅里又发现了炸弹，因发现早，未造成任何伤

亡。1933年8月，宋子文乘船由美返华途经日本横滨，一法西斯党徒曾企图利用宋子文登岸时刺杀他，结果未能得手。

在宋子文的一生中，除上述五次遇险外，还有一次，即是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自国民政府由广州迁部武汉后，武汉外国租界居住的外国人极度恐慌。一部分白俄充当英、法租界的巡捕或探子，专门搜集苏联在华人员的活动情况，与国民政府作对。1927年3月，一名白俄分子怀揣武器窜进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被卫兵抓获，问其用意，他说要杀宋子文。宋子文一生之中所遇到的险情也许不止上述几次。

上海北站遇刺是对宋子文震动最大的一次危险。人们对这次事件也众说纷纭。除了广东反蒋派要断蒋介石的财源、干掉宋子文这种说法外，还有如下几种说法：一、粤系反蒋派认为江浙人排挤广东人，故广东人要联合一致对付江浙人，凡站在蒋介石一边的广东人都要拉过来。宋子文是广东海南人，应该算粤系，因此要把宋拉到粤系方面来。第一步是以理劝告；第二步是警告；第三步是惩戒。例如马超俊本是徘徊不决者，接连对其劝告和警告，迫使他不得不离开江浙派。刘芦隐与胡汉民是深交，刘以维护大局为由，在南京政府谋职。粤系对刘屡加劝告和警告，终迫使他解职。粤系对宋子文也采取了同样的手法，先是劝告，宋子文不听；接着是警告信，宋子文不理；尔后是最后通牒，声言宋子文蔑视同乡意见，“孤行己志，助纣为虐，限其立即停止公债票发出，并于最短期间离开职守。”宋子文对最后通牒仍未理睬，于是粤系采取了刺宋行动。二、粤系对宋子文采取行动并不是要真的杀死他，而是吓唬吓唬他，所以才故意杀了他的秘书，以敦促宋子文站到粤系方面来。三、上海北站刺宋案乃上海帮会头目之一杜月笙所为。上海是毒品集散中心，贩毒买卖是杜月笙等上海流氓的重要收入之一。当时宋子文力主禁烟。为了给宋子文点颜色看看，杜月笙派人在北火车站打死宋的秘书，以教训宋子文。用他们的话说就是：“给宋子文看看颜色，叫伊认得阿拉。”至于后来在捉拿刺宋凶犯的过程中，杜月笙积极配合戴笠破案，是要掩盖他刺宋的事实，故意作出一副姿态，以表白自己“清白无辜”。四、刺杀宋子文乃日本人的预谋。日本对宋子文亲英美，一直嫉恨在心，因此指使上海“青红帮”组织除掉宋子文。以上诸说，何者为是，有待进一步探究。

连若雪（第97页图为宋子文与夫人张乐怡）

清东陵古剑被盗记

古剑被盗

公元 1928 年 6 月的一天深夜，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包围了位于河北省遵化县马兰峪的清皇陵——东陵。随着一声巨响，东陵地下宫殿的石门被炸开了，一群士兵举着火把涌进了阴森森的地下宫殿，将一柄古剑连同无数国宝洗劫一空。

此剑非同寻常，它乃弘历——乾隆皇帝的宠物，为清乾隆二十八年（公元 1763 年）春新疆爱乌罕、巴达克山、霍罕、哈萨克各部所进贡品。此剑剑柄特长，上雕九条紫金龙，蟠身翘首，栩栩如生，象征“九九归一”，表示“真龙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威。剑身用镔铁打成，不锈不污，锋利无比，吹毛可过，削铁如泥。剑鞘用鲨鱼皮制成，嵌满红蓝宝石及金刚钻，太阳之下，华光灿然。当时，弘历皇帝佩带此剑登上“龙位”时，金銮生辉，犹如坐在万朵彩云之间，于是，他“龙颜”大悦，特以“龙泉”赐名。从此，弘历皇帝对此剑爱不释手，朝夕相伴。1799 年这皇帝“晏驾”于养心殿，下葬时特将他生前最宠爱的龙泉剑陪葬，本意要他水享“九九之尊”，殊不知仅在一百年后便遭到了劫盗。

指使盗陵的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一军军长、流氓军阀孙殿英。他将所盗来的古剑及一些价值连城的珍宝独吞，并严密封锁消息。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事终于败露，引起舆论大哗。总司令蒋介石扬言要“抓人法办”。孙殿英做贼心虚，先是将一批赃品托人疏通上去，还把慈禧凤冠上的大颗珍珠镶在高跟鞋上送给了宋美龄。但这并没能平息舆论，孙殿英便厚着麻皮脸去托私交较深的戴笠“通天”，想以龙泉剑“孝敬”蒋介石，求得开脱。想不到，紧接着中原大战不久便是“九·一八”事变，时光荏苒，风云变幻，此事也就搁了下来。

古剑“失踪”

“七·七”事变后，孙殿英率部西进，停驻于山西五台山。戴笠奉蒋介石之命去该部“校阅”，并打算趁此机会讨取孙殿英早已答应了的古剑。

戴笠在五台山上“校阅”既毕，孙殿英便大摆宴席招待。酒足饭饱之后，戴笠露出话来，重提东陵盗宝事，孙殿英心领神会，一面忙不迭地请罪，一面立即交出龙泉剑，叩托戴笠代为疏通。

戴笠得剑，喜笑颜开，连拍孙殿英肩头说：“孙老弟，有了此剑，我包你后半生平安无事”。他视古剑如性命，生怕带它去巡视部队会有闪失，便电召军统局陕坝工作组（专门负责对内蒙一带的特务活动）组长马汉三，托他视陆路保险时，将此剑带交何应钦，由他转献于蒋介石。而他本人，则去河南，再转重庆。

戴笠回到重庆后，迟迟未见马汉三派人将古剑送来，发电催问，马汉三回答说，风云突变，为安全计，古剑仍留孙军长处，容日后再做议计。戴笠再去电问孙殿英，则查无音信。此剑就这样神秘地“失踪”了。

蓝旗计划 1940 年初，在华北开设走私公司的日军特务田中隆吉在张家口结识了一个自称是商人的“龙文先生”，田中隆吉决定同他做一笔走私生意，事前他对“龙文先生”做了一番侦查，不禁使他大吃一惊。原来这个龙文并不是商人，而是军统局的马汉三。田中隆吉立即会同张家口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新一秘密逮捕了这个“龙文”，并且进行了突击审讯。“龙文”被捕后，

吓得魂飞魄散，没等用刑便招了供：原来日本关东军蒙疆兵团入侵内蒙后，在成立傀儡政权问题上，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与日军意见有出入，再加上与云王（云端汪楚克）有矛盾，就计划离开日方，便秘密与军统局发生了联系，双方拟定了一个“蓝旗计划”。按这个计划，由军统局派人帮助德王自内蒙出逃，取道包头，过黄河，然后由国民政府派部队接应去重庆，参加抗战阵营。为保证出逃顺利，他们还商定了秘密电台的呼号，规定了通讯时间和密码，以及秘密联系、会见的地点。军统局方面的代表为马汉三，他每次来到张家口，都化名“龙文”，以“看病”为名在华北医院与巴彦喀拉盟公署官房主任贺云章、梁芝祥等人联系，然后与德王秘密会见。

马汉三不仅供出了“蓝旗计划”，出卖了有关人员，而且，为了讨得活命，他还献出了自己截留下来的那柄五尺龙泉剑。原来，马汉三自知在军统局混不长，想将此剑带往国外，换得荣华富贵，于是他将古剑私吞又向戴笠报了谎。

田中隆吉见剑大喜，自然答允“龙文”的请求，便将他释放，而把“蓝旗计划”的有关人员杀的杀，关的关。马汉三呢，被释放后装出“逃”出了“虎口”，来到北平，向军统局电告了自己“九死一生”的脱险经过，骗得了信任，翌年，调任第八战区调查室主任。

古剑换主 1940年12月，田中隆吉因指挥山西作战失利，被调回国。日本陆军当局已经对他不怀好感，这点他很清楚，所以在回国之前路过北京时将这柄龙泉古剑交给金壁辉（川岛芳子）妥为保管，以防止回国后受到宪兵的“整肃”和红眼伙伴的追查。他当然设想有朝一日重来北平取回宝剑，殊不知这一去便没有再回来，直到日本投降。

1945年10月11日夜，一队便衣特务包围了北平东四牌楼九条胡同34号金壁辉的住宅，特务们破门而入，将金壁辉捆起来，并用黑布袋套住了金壁辉的头。为首的便是那个曾经化名“龙文”的马汉三。这时候，他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平津肃奸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北平行营（后改为行辕）军警督察处的处长；秘密身份则是军统局平津办事处的主任，已经是身兼三职的华北要员了。他执掌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专横跋扈，一手遮天，外号人称“华北王”、“马王爷”。他经过多方调查，得知那柄龙泉剑藏在金壁辉处，便亲率特务以逮捕汉奸为名，对金宅进行“大搜查”，足足用了两个小时，在金宅地窖中搜到了这柄举世无双的古剑。于是，宝剑又换了主人。

古剑的归宿 1946年春节前，军统局长戴笠携人事处长龚仙舫去北平搜罗汉奸，组织内蒙反共特务队。行前，蒋介石授意他们借用日本人的力量，特别关照可以起用金壁辉。戴笠、龚仙舫衔命飞北平，在弓弦胡同14号戴笠住处秘密“提审”了金壁辉，并且如实地向她交了底。金壁辉摸到戴笠此行的底细之后，即向他告密，径自道出了马汉三一心想置她于死地的内蕴。他说马汉三亲自带人从她家中搜去了那柄古龙泉宝剑，自然会知道她已掌握了他投敌的内幕，因此，想杀死她以灭口。

金壁辉的话，引起了戴笠的特别注意，当说到马汉三曾经搜去那柄古龙泉宝剑时，便问得非常详细，从剑体的长度到剑柄、剑鞘的金龙和宝石都没有放过，当他确认这剑就是当初孙殿英从东陵盗去的乾隆御剑时，便显得非常激动：多年的悬案终于有了下文，心中无比愤恨，决定选择恰当时机剪除这个“异类”。当时的北平还是李宗仁桂系的天下，为防止马汉三倒戈，老谋深算的戴笠决计不去打草惊蛇，只要龚仙舫透过话去，索要“从金壁辉家

中搜出的古剑”，其他一律压下不提。

再说，马汉三得知戴笠亲自提审金壁辉后，知道自己投敌的内情败露，便和自己最贴心的秘书刘玉珠商量对策，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干掉戴笠。所以，当龚仙舫提出古剑一事时，马汉三表现得极其“识相”，不仅立即献出剑来，并做了许多掩饰，说他如何“脱险”，又是如何“保护”了古剑，同时还另外馈赠了许多搜刮来的财宝，足足十大箱，亲自押往弓弦胡同。

戴笠财迷心窍，对于马汉三贡献上来的财宝照收不误。3月16日，戴笠心满意足地带着古剑和10大箱珍宝乘专机从北平经青岛飞往上海。殊不知马汉三已派刘玉珠巧妙地在木箱中安放了定时炸弹。飞机到了上海上空，正值降雨，机场拒绝着陆，只好改飞南京，及至江宁县上空，木箱中定时炸弹爆炸起火，飞机便一头栽在并不高的戴山上。

戴笠座机“撞山”后，大火三日，将10箱国宝级书画烧得干干净净，独留一只宋雕羊脂白玉九龙杯，再就是那柄弘历——乾隆皇帝的五尺龙泉剑。那剑虽遭大火烧烤，鞘柄俱毁，但剑体依然寒光闪闪，锋利无比。后来据说，它被葬入戴笠棺内，再次陪同“帝王”殉入地下了。

张士杰

樊耀南勇刺新疆土皇帝杨增新

这是 1928 年 7 月的一个深夜，新疆外交公署后花园中寂无人声，风静静地吹拂着草木，月色朦胧，一切都沉浸在酣梦之中。万籁俱寂，唯有西厢房窗户上的灯光仍然亮着，灯下，新疆交涉署署长兼军务厅长樊耀南正与北梁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教务主任张纯熙等研究着一项计划，每人都处在激动、兴奋的情绪中。当最后拟定省政府委员及厅长名单时，樊轻轻嘘出一口气，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此时，新疆正处在非常时刻，一场刺杀省主席杨增新的政变就要开幕了。

7 月 7 日是极不平凡的一天，这天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举行第一期学生毕业典礼。清晨，当东方吐白、旭日初升的时候，迪化（今乌鲁木齐）城中大街小巷已经活跃起来了，只见车马穿梭，川流不息，省主席杨增新、各厅道文武官员纷纷赴校庆贺，全城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

正午时分，毕业典礼圆满结束，军务厅长樊耀南以学堂监督的资格大宴来宾。酒席一共 3 桌，设在后堂，杨增新以省主席身份居中坐下；樊耀南陪伴苏联驻迪化领事乌尔夫夫妇坐在西边的桌子上。杨增新心情特别愉快，不断回头催着侍者，让他们赶快上菜。

头道菜鱼翅刚刚上过，教务主任张纯熙欠起身准备敬酒，他微笑着抓起一只酒瓶，不知是高兴过度，还是粗心失手，只听“砰”的一声，酒瓶落在桌上，把大家都吓了一跳。樊耀南回头瞄了一眼，随口问道：“酒菜都齐备了么？”张纯熙点点头：“备齐了。”樊耀南欣然起身与苏联领事碰杯。此时，一个身穿蓝色长衫的侍者手端酒菜匆匆而入，他径自朝杨增新走去，说时迟那时快，一声枪响，震撼大厅，杨增新胸部顿时涌出一股血柱，他大吃一惊，抚胸问道：“干什么？”“砰砰砰……”又是 7 枪，昔日荣耀全疆的独裁者应声倒在血泊之中。

霎时，大厅一片混乱，赴宴者没命地向外逃，蓝衫侍者一拥而进，杨增新的卫士正在吃抓饭，听见枪声，也向里间猛扑，双方打作一团。几分钟后，蓝衫侍者控制了局面，他们纷纷团聚在樊耀南周围，听候他的指示。樊看了看地上的杨增新，咬牙朝尸体又开两枪，接着，挥手率众朝督军公署直扑而去。

督军公署是前清新疆巡抚的衙门，平日里，杨增新在三堂上房办公，堂前加了一道 3 尺多高的木栅门，栅门闭关加锁，白天也有士兵守卫。樊耀南率队冲入督署时，卫士见军务厅长大驾光临，不敢怠慢，急忙开栅让进。此时政务厅长金树仁正在二堂西厅办公，他见樊耀南与士兵匆匆进入，十分吃惊。正在狐疑间，军界首脑杜发荣的儿子杜国治闯了进来，杜匆匆告知事变真相，于是，金、杜联兵将督军公署围得水泄不通。

战斗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樊耀南寡不敌众力竭被捕。晚上，金树仁开堂审讯，他以叛乱罪残酷宰杀了政变者，一场风波悄然平息。

樊耀南刺杀杨增新构成了新疆历史上著名的“七·七”政变，它来得快，走得也快，原因则必追寻到樊、扬长达 10 年之久的权利、政见纠纷之上。

樊耀南，字早襄，湖北公安人，是游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清朝末年，新疆追随内地厉行新政的时候，樊耀南来到边陲担任了地方检察厅厅长兼政务学堂教员的职务。辛亥革命后，他回到内地，进入北洋政府国务院，当了秘书。1917 年，新疆阿克苏道出缺，因内务部长张国淦推

荐，二次赴新，受任阿克苏道尹。 樊耀南属于思想新颖、不同凡俗的人物。1918年，他到达迪化，当时，新疆正处在省主席杨增新的摆布之下。杨增新是云南蒙自人，伊犁革命后当上新疆都督。他统治新疆多年，有一套不同常人的控制办法。在政治理想上，杨增新追求“小国寡民”、“鸡犬相闻”的儒道哲学；政治态度上，对中央“认庙不认人”，不管谁做总统，一概通电承认。他憎恶一切新思想，对内地来新谋生的知识分子一概抵制，拒之门外。至于对北京派来的新派人物，更是心存猜忌，极不欢迎。樊耀南到达新疆以后，杨增新不让他到鞭长莫及的阿克苏去，不仅如此，还把他软禁起来。一个月后，樊耀南资遣随从，杨增新这才呈请北京，就近给了他迪化道尹的职务。

樊耀南在杨增新的夹缝中生存，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受着牢笼：优越的地位，丰厚的薪金，不时而来的奖励，只是不能自己行事，更不能发表新思想、新见解。他感到苦恼，因为自己不是除了升官发财，别无所思的人，他还有政治抱负。他认为新疆太黑暗了，贪官污吏遍布，同时文化教育落后，民族关系复杂。但他无处用武。1924年，杨增新在中学毕业生基础上办了一个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樊耀南以学校为突破口，暗自将湖北籍的北京俄文专修馆学生张纯熙调进新疆，当了教务主任。这样，轻而易举，夺得了杨增新培养人才的基地。樊耀南持有中央特派员这张王牌，本人精明强干，久而久之周围竟也聚起了一批两湖同乡，一些攀龙附凤、趋炎附势的人也自动投上门来。

1928年，关内风雷激荡，国民革命将北洋政府冲得四分五裂。6月12日，奉军退出北京，中国成了国民党的天下。北伐袭来之时，杨增新惯伎重演，对中央认庙不认人。他看到张作霖被炸死，中央搬到南京去了，急忙通电承认国民党政府。他重新拟定了一份政府委员名单。这份名单继续保持个人专制的局面，各厅道委员除樊耀南外一律照旧录用。樊耀南感到，一旦新政府组成，杨增新必然拿自己祭旗，而北伐革命正是铲除祸害、施展宏图的好机会，于是，十年仇恨一旦爆发，刺杀杨增新的计划终于制订出来。

樊耀南在刺杀杨增新后被杀身亡。在紧接而来的金树仁统治时期，新疆依然如故。

张凝（第110页图为杨增新照片，第111页图为金树仁照片）

银行家朱成章命殒杨树浦

民国初年，上海静安寺路一带还属郊外，但到了 20 年代末期，一幢幢高楼兴起，商业贸易日趋繁荣，居民日渐密集，南京路的黄金地段迅速由东向西延伸了。可是静安寺附近还有一片附属于寺院的空地尚未开发。这片空地被上海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章看中。朱成章是一位有远见的企业家、银行家，他料想在此买地造屋，将来必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于是携同国货银行的庶务、亲信周子斌与寺院的方丈洽谈承租事宜，顺利地签订了协议书。这片空地约有 10 多亩（即现在的大发南货店周围），朱成章计划建造多幢楼房，然后出租。据朱估计，可获巨额利润。

正当朱成章筹备大兴土木之时，不料祸从天降。上海青帮三大亨之一的张啸林也看上了这片空地，张派遣其儿女亲家、同乡、亲信俞叶封到静安寺我方丈谈判购买这片空地的事宜。方丈回答俞叶封说，寺院土地不可出卖，俞提出要租几十年。方丈告诉俞说已租给了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章，并拿出和朱办理的租地契约给俞看。俞略看了一下，愤然离去。

两天后，张啸林带着随从，耀武扬威地来到愚园路的朱成章公馆。进入客厅一坐下就大大咧咧地说：“无事不登三宝殿！今朝来谈一桩事体，静安寺的那块地皮，你租下来派不了多大用场，要够朋友的话，把它让给我，我有用场！”朱成章回答说：“我已经和老方丈签了约，我租下这块地已经安排了开发、使用计划。”为了避免与张啸林正面冲突，朱成章竭力缓和谈话气氛，接着说：“张先生，目前这一带地区还另有空地，我可以帮助您另外找一块，……”张啸林不等朱成章把话说完即打断了朱的话，直截了当地说：“不必！不必！我就喜欢静安寺地段！”朱成章为了打破僵局，认为只有作出些利益上的让步，才能息事宁人，于是提出：“我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租的一块地尚未动工，这里离静安寺不远，看在张先生面子上，我愿意把爱文义路那块地让给张先生！”朱成章以为通过这一交换条件，可求得破财免灾。不料，盛气凌人的张啸林不给朱成章任何余地，他听了朱的话很不耐烦，把衔着的大半支香烟，噗地一声吐出去，落在厅内二米开外的地板上，按照流氓的习惯动作，把衣袖一卷，胸前纽扣解开，高声骂了句：“娘的个×！谁要你爱文义路的鸟地！老子就是看上了静安寺的这块！”

金融、工商界人士一贯把高额利润看得很重，这是朱成章不肯将已租到手的未来黄金地段的地皮转让给张啸林的基本原因。但除此之外，朱认为，不应当屈服于张的横行霸道，于是，他用半抗拒半求情的语气说：“张先生，请原谅，这也是实在难以从命的事，请原谅！”张啸林把桌子一拍，忽地站起身，恶狠狠地说：“不要敬酒不吃！”迈大步“蹬、蹬、蹬”走出去，临上车时，又歪着头斜视了朱成章一眼，说了声：“那就走着瞧吧！”

朱成章送走张啸林后，朱太太和朱的亲信周子斌都感到张啸林最后的话中含有杀机，劝告朱成章在各种场合都要小心。

自从朱府中张朱“谈判”破裂后，朱成章起初处处提防，警惕张啸林的“暗箭”，但过了个把月，未见动静，朱成章的警惕性渐渐松懈，认为流氓的手法之一正是恐吓，张啸林不过是耍耍恐吓的手段而已。朱很少夜间出门，即使夜间出门也有保镖，而白天外出活动却不再顾忌，认为光天化日之下，张啸林能如之奈何。

一个风和日朗的早晨，朱成章带着爱女和护士邓小姐，乘坐自备汽车准

备赴龙华游览。汽车刚开出弄堂口左转进入愚园路，突然从马路旁窜出四个绑匪，向朱成章的汽车猛开数枪。朱成章小腹中弹，血流如注，邓小姐手掌被射穿，血流不止，又哭又叫。朱小姐吓得昏倒在车上。汽车被迫停下来。两个蒙面绑匪打开车门，把朱成章拖入绑匪的汽车，向东急驶而去。朱成章的汽车司机，连忙驱车回到朱府向朱太太报告。朱太太又惊又急，不知所措，连忙找到周子斌等亲信人员商议办法，经分析，认为肯定是张啸林所为，张跟法院、警方有勾结，包揽诉讼，因而通过官方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只能通过“黑道”疏通。于是大家商定由周子斌带上厚礼前去拜见上海青帮三大亨，请求指点赎票办法。

周子斌先到八仙桥钩培里黄公馆求黄金荣帮助，黄拒绝调解这一案件。周子斌又到华格桌路（今宁海路）杜公馆拜见杜月笙，杜月笙虽然热情接待，表示关切，但没有提出解决方案，上海青帮三大亨这时已产生一定的矛盾，各成派系，自己的活动不愿让别人插手，见面时彼此心照不宣。周子斌不得已，只好硬着头皮来到杜公馆隔壁的张公馆，张啸林傲气凌人，闭门拒客。

朱太太从自家汽车上和马路上留下的血迹分析，朱成章的伤势相当严重，她派人到上海各医院查询，都没有朱成章就医的线索。时间耽误久了，朱太太心急如焚，唯恐朱成章的伤势恶化，得不到及时救护。朱太太在万分焦急的中与好友亲朋共同商议出又一方案，即请中国与交通两大银行的常务董事钱新之帮助，因为钱也是帮会界上层人物，与政界、金融界都有来往，称得上是上海滩的头面人物，并且钱新之与朱成章也较熟悉。果然，钱新之为朱太太指点出了一条门路，即请青帮“大”字辈的张仁奎帮助，此案也只有请张仁奎出面为官。

张仁奎字镜湖，山东滕县人。清末投身军旅，加入同盟会，曾任江苏通海镇守使，驻守南通，后升为北洋军杰威将军，1927年兵败去职。

张早年参加青帮，追随过帮会武人徐宝山（徐老虎），去职后寓居上海，以青帮“大”字辈身份，广招门徒，在上海青帮界有“祖师爷”身份。以至连蒋介石接见他时也称之为“张老太爷”。

原来朱成章早年曾帮助过张仁奎。张早年在南通时是靠了朱成章的引荐才成了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弟子，从此为其步入上流社会奠定了基础。张仁奎不忘朱成章当年的恩情，一听说朱成章有难，一口答应负责营救。

不久张仁奎即以电话通知朱太太，朱成章已有下落。那边传话来说，同意赎票。并将赎票金额和办法告诉了朱太太。并约定，见到朱成章时，将一麻袋钱扔在朱身边的地上，然后直接把朱成章送到海格路红十字医院（今华山路华山医院），朱太太可在红十字医院等候。

朱太太马上取出准备好的大堆钞票装进麻袋，又亲自将麻袋用火漆封好，然后托周子斌火速乘汽车赴杨树浦办理赎票。

从朱公馆到杨树浦路途遥远，周子斌到达杨树浦约定地点时，已是黄昏时分。当时杨树浦一带还是荒野一片，水塘、河汉、芦荡纵横，农田中夹杂着一片片荒坟野冢，人迹罕见。周子斌走出汽车，扛着沉重的一麻袋钞票，在暮色苍茫中沿着坎坷的田埂，一步步摇摇晃晃地向前探索，四周寂静的有几分恐怖气氛。周子斌一面艰难地往前走，一面不断地压低嗓音呼唤着：“朱先生，朱先生……”突然，他听到前面似有一点微弱的呻吟声，走上前去凝神一看，只见田垅靠墓地边沿上躺着一人，仔细一看正是朱成章。只见朱成章浑身血迹，已是气息奄奄。周子斌连忙放下麻袋，抱起朱成章往回走，上

了汽车，直驶海格路红十字医院。

朱太太早已心如火燎般地守候在红十字医院门前了，见到浑身血迹的朱成章，泣不成声地喊了几声，朱成章勉强睁开双眼向朱太太望了望，随即闭上了双眼。因流血过多，未得及时救护，一句话未说即溘然长逝了。

朱成章惨案惊动了上海银行界、工商界、新闻界，然而新闻界当时未敢揭露张啸林罪恶，只简略报道了被绑架的朱成章已有下落，其他话一概未说。朱的家属也未敢向法院诉讼。

郭绪印（第 117 页图为张啸林照片）

张绍曾被刺内幕

公元 1929 年 3 月 21 日晚 8 时许，坐落在天津日租界地旭街利津里的彩凤班楼上客厅里，突然传出了“嘭！嘭嘭！”三声沉闷的枪声。紧接着，一个仆役打扮的彪形大汉，提着带有硝烟味的手枪从容下楼，出大门向南拐，钻进一辆早已停候在那里的汽车里，扬长而去。

这时，彩凤班里乱作一团。那些被枪声惊扰了歌迷酒梦的妓女和嫖客们，三五成群地聚拢在楼上楼下，互相询问、窃窃议论着。在二楼客厅中央，一个年约 50 岁左右，身穿古铜色缎皮袍的人，奄奄一息地躺在血泊之中。屋里的人个个丧魂失魄。只有直隶督办公署总参议赵景云忙得团团转。他一面虚张声势地叫喊捉拿凶手，一面声嘶力竭地给各处打电话；时而通知医院来人抢救，时而报告检察厅派员检验，直到一辆汽车把受伤者拉走，一场惊乱才告平息。

第二天，天津《大公报》二版以醒目标题登载了“张绍曾昨夜遇刺殒命”的新闻。详细报道了现场情况，而对于行刺原因却讳莫如深。一时间，各种猜测纷坛，有的说是仇杀，有的认为张绍曾既然死于青楼，多半是争风吃醋的桃色事件。稍明底里的人则认定这是一起政治谋杀案。

张绍曾被害究属何因，谁人指使？这要从头说起。

1923 年 6 月，张绍曾从国务总理任上被逐下台后，虽息影津门，仍关心着国家的和平统一。由于他对北方军阀已经失去信心，便把希望寄托于广州国民政府。1926 年 9 月，冯玉祥誓师五原、宣布脱离北洋军阀后，于 1927 年率部进入河南，配合北伐军与直系军阀作战，势力逐渐扩大。冯玉祥后来又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北伐，直指山东、河北，对张作霖奉军形成严重威胁。在此期间，张绍曾与冯始终保持信使往来，他利用其特殊地位与身份，在天津组织薛笃弼、丁春膏、刘之龙、刘治洲等人，积极收集奉军的军事动态和部署。为了及时把得到的情报提供给冯玉祥，张绍曾不惜重金买了一部电台由丁春膏负责，每天与冯部联系。有时一日数电。他自己也常写信给冯玉祥，询问战况，为冯出谋划策。张绍曾知道，他的这一行动一旦暴露，必然会引起张作霖的忌恨。所以与冯的联系非常秘密，自己的社交言谈也格外谨慎。尽管如此，还是也一件事上被张作霖看出了破绽。1927 年，他的胞弟张绍程（字敬纯），从法国留学回来，想在政界或军界谋个差事，要求哥哥为之引荐。张绍曾认为，当时北方军政界被军阀政客所把持，整个北洋政权在摇摇欲坠。在他们手下没有前程可言。于是，便劝弟弟暂时在家中复习学业，以后有机会再谋职业。张绍程知道哥哥与冯玉祥友谊素深，便要求介绍他去河南投奔冯的北伐军。绍曾不便明言，劝阻说：“你要替为兄着想，暂时不可去冯部。”绍程见哥哥这也不允，那也不同意，产生了误解，顶撞说：“你已功成名遂就不管弟弟了。好吧，我去闯自己的路，请哥哥不要妨碍我。”张绍曾见弟弟不理解自己的苦衷。只好嘱咐：“凡事谨慎，千万别让人抓住把柄。”于是，张绍程去河南，冯玉祥为他在军中安排了个职务。此事被张作霖探知，对张绍曾与冯玉祥的关系引起了注意。

这时，原属直系的军阀孙传芳被北伐军打败后投靠了张作霖。孙在 1925 年任浙江督军时，经张绍曾派人从中联络，曾与冯玉祥约定共同起兵攻打奉张。但浙奉战争在南方打响后，冯在北方却按兵不动。为此，孙传芳以为是张绍曾与冯玉祥合谋欺骗他，想坐观成败，借刀杀人，因而对张、冯深为不

满。他投靠张作霖后，经常在张面前挑唆，说张绍曾代冯玉祥运筹帷幄，而且和冯系一班人秘密往来，策划反奉。这就使张作霖对张绍曾更加怀疑起来。

张作霖为了试探张绍曾，派邢士廉到天津，假意请张绍曾出面调停他与冯玉祥的关系，以息争修好。邢见到张绍曾说明来意后，张听了气愤地说：“你告诉大帅，叫他先把军队都带出关外，再来和我商量。”邢士廉碰了钉子，回北京如实汇报。张作霖对张绍曾更加怀恨，遂生杀心。张绍曾也知道张作霖必不肯善罢干休。一些朋友劝他离津南下暂避，张绍曾却认为：冯玉祥所率北伐军已打到山东，很快将进入河北境内，急需自己提供奉军方面的情报，在此时刻自己不能抽身他去；况且假若奉张有杀人之心，必然早有部署，走出津门必不容易；加之家人也阻拦他离津，所以未能成行。不过，为了防止意外，他格外加强了戒备。他在英租界44号路公馆里，深居简出，闭门谢客，不再参加应酬活动。

随着北伐战事的顺利进展，京津形势日趋紧张。张作霖在部署军事总撤退的同时，也加紧了阴谋杀害张绍曾的策划。张作霖经与直隶督办褚玉璞密谋后，于1928年3月派亲信王琦到天津，由直隶督办公署总参议赵景云出面，在3月21日在天和玉饭庄宴请住津朝野名流。他们怕张绍曾不来参加，事先安排谢玉田、刘茂正两人找到张绍曾的门婿吴道时（吴佩孚继子），由他带领前往张公馆送请柬。届时，赵景云又让绍曾的同乡族叔张觉五（字会卿）亲到公馆邀张一同赴宴，并答应事成之后保荐他为道尹。张觉五曾任江北道尹，赋闲已久，多次投奔赵景云想谋差事。这次见赵当面许愿，自然竭力效命，21日下午5点便到张公馆，催促绍曾同往。绍曾当时因身体欠爽本不想参加，但碍于族叔情面，只好吩咐备车。不料汽车刚开出车库，前轮胎坏了一个，张就嘱咐差役打电话辞谢，表示不能赴宴。张觉五着急他说：“瑶蕴（赵景云字）叫我代他诚意奉请，你不去，我怎对得起瑶蕴！”绍曾无奈，只得命司机王以达换上备胎，与觉五同车前往，另有卫兵苏以行、刘富友二人随车护卫。宴后，赵景云又约靳云鹏、张绍曾、张文生、李厚基等十几人，到彩凤班名妓花玉宝（湘阁老六）处喝茶小坐。随从卫士们都被引开去。

这时，有个仆役打扮的人手持信件径上楼，说有要函面交张总理，急候回信。张绍曾闻报从屋内来到客厅，一面问哪里的信，一面伸手去接。那人迎面就是一枪，张绍曾用左手一挡，子弹穿透手掌。接着又是两枪，一枪由左耳穿入头颅，一枪打进肺部。张绍曾当即昏倒在地，在送回家中后第二天凌晨死去，时年49岁。

张绍曾被杀后，官府大肆张扬，要缉拿凶手。事发第二天，天津县知事兼督署军法官王士申下令把彩凤班的老鸨、妓女、杂役人员一齐逮捕，逐个审问，关押多日。直隶督办公署也通牒日租界警察署协助缉捕凶犯。但这套欲盖弥彰的把戏是无法欺惑世人的。日租界警察署侦探长刘寿岩一句话揭穿了他们贼喊捉贼的真相。他说：“他们杀人却叫我们缉凶，假戏做得跟真的一样，亏他们装得像。凶手下落我们倒知道，是从北京来的，叫他们到大帅府里缉拿去吧。”张绍曾家人也知道是张作霖派人所为，因惧怕祸及余亲，不敢认真追究。

顾恒敬

上海阔佬魏廷荣被绑案

上海青帮“大亨”势力遮天，以至操纵司法诉讼。这类事件比较著名的有：30年代《锡报》记者宋痴萍在《杂谈》一文中，涉及到杜月笙的私生活，该报主要负责人吴观鑫被杜抓去毒打，经人调解，罚吴请了20桌酒筵，宋痴萍被杜指使手下流氓打得遍体鳞伤，此后卧床不起，不久丧命，年仅30多岁。吴与宋的家属、亲友都知道杜操纵司法诉讼，无处申诉。20年代末上海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章，被青帮大流氓张啸林绑票时受枪伤，因未得到及时抢救而丧生。朱氏家属明知是张啸林所为，但始终未敢起诉。上海布业巨头曹启明于30年代为了供老父颐养天年，在漕河泾附近建造一座曹家花园（今漕溪公园），只因该园在布局雅致和气派宏伟等方面都超过了黄金荣的黄家花园，引起黄金荣的忌妒。黄指使门徒王文奎将曹绑票，虽侥幸逃出魔窟，却仍被黄的门徒勒索了20根金条。事后曹迫于黄的黑社会势力，不敢向司法当局起诉。由于上海帮会流氓“大亨”的势力在很大程度上操纵了司法诉讼，所以不管是工商巨富，还是银行巨头，一旦遭到帮会势力欺压，大都忍气吞声，即使财破人亡，也不敢诉诸法庭。

一、魏廷荣遭绑票巧脱险魏廷荣在上海法租界的权势和财力非同一般，他是唯一能与青帮“大亨”杜月笙抗衡的人物。魏是位天主教徒，精通法语，曾留学法国，与法租界当局关系密切。早年经营地产，在徐家汇一带拥有大量地产，上海人传说徐家汇2/3的土地属于魏廷荣所有。他的岳父朱葆三，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法租界第一条以中国人命名的马路就是朱葆三路。魏廷荣靠着精通法语，到过法国，又靠着岳父的牌头，成为特别受宠于法租界当局的人物。黄金荣曾和魏廷荣争夺美女吕美玉，结果迫于魏的权势，向魏让步。魏廷荣不仅担任中法银公司经理，兼营地产、古董业，还担任法租界公董局的华董兼法租界华人商团司令（又称法租界义勇队总司令），并与驻沪法国领事及其所属各机构上层人物关系密切，是个“兜得转”的头面人物。

1929年7月24日上午10时50分左右，魏廷荣携同三个幼年子女乘自备汽车从设在朱葆三路（今溪口路）、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口的中法银公司向西行驶。突然遭遇到持枪绑匪拦截。绑匪将司机和两个孩子赶下车去，然后跳进车内，把车向南开去。车到民国路（今人民路）口时，绑匪又将第三个孩子赶下车，只押着魏廷荣急驰而去。

途中，绑匪用浸了蒙汗药的手帕蒙倒了魏廷荣，剥去魏的衣裤。车到南码头，绑匪们将魏抬上小船。经二、三小时行程，126 来到南汇县六灶村樊庭玉家中。六灶村位于浦东远郊，河流纵横形成水网，除小船之外，无任何交通工具与外界相通。樊庭玉是地保，没有人敢来寻他的麻烦。魏廷荣在樊家被藏匿50天，居然没有一点风声透到上海。偶尔有邻人到樊家串门看到魏时，樊庭玉说是自家亲戚在此养病，邻居们也就信以为真。樊庭玉是位农民，秉性善良，对魏廷荣十分友好。

魏廷荣被绑架的消息使全上海受到震动，法、英两租界巡捕房及华界的警察局十分紧张地部署侦破任务。各车站、码头、关口、要隘都被封锁，严密检查，同时又利用流氓帮会从黑社会内部突破。但都未获结果。

魏廷荣被绑3天后，魏的原配夫人即朱葆三的长女朱二小姐收到绑匪一信，约定她夜间去杭州碰头并警告其不许向警方报案”。绑匪向其面交了魏廷荣亲笔写的纸条，说明魏活着，要家中人准备赎票款项，并出示了魏随身

佩带的金壳怀表作为信物。还向朱敲诈了“见面礼”1000元，却未宣告勒索金额。

魏廷荣被绑票后，新闻界大肆渲染，更加引起各方注意。朱二小姐和魏的爱妾吕美玉不断收到各种来信和报告，巡捕房疲于奔命，但毫无进展。8月24日，一封署名“大侦探密告”的信邮寄到贝勒路（今黄陂南路）天祥花园魏宅，信中说：“廷荣被绑去至今无信，侦探捉强盗只捉外人，所以自己人做绑匪，侦探天大本领也捉不住。何况这个人是拜山人作者头子，而又是商团教操官，是自己人，只是手里没有钱，所以他就横了良心做绑匪，绑自己连襟。”

吕美玉接信后，大为吃惊，连忙找朱二小姐商量，决定将此信交给巡捕房。

“大侦探密告”中所说的那位魏廷荣的连襟是赵慰先。赵早年留学法国，经赵的舅舅朱竹坪介绍认识了魏廷荣，魏将其安排在中法银公司当职员，以后又请他在法租界义勇团当教操官。因住在魏家，认识了朱葆三的小女儿“朱九小姐”，最终和朱九小姐恋爱、成婚。

赵慰先住在魏家时，伪装得非常老实、正派，不仅穿着打扮很朴素，而且说自己不会抽烟、喝酒、赌博。可是当他和朱九小姐结婚后，真面目便暴露出来了，不仅吸烟、喝酒，而且经常到杜月笙在姓吉里所开设的赌场里赌博。不到二、三年，就把朱九小姐陪送的数万元家产输得精光，于是就在魏廷荣头上打主意了。

9月15日上午，康脑脱路（今康定路）304号发生凶杀案，巡捕们在现场捉到凶犯一名。该犯恰巧也是魏廷荣被绑案中的一名绑匪，他交代出魏被藏在六灶村樊庭玉家中。公共租界捕房急忙把这一信息报告法租界捕房。法捕房当即派出西捕头目鲍尔第和华捕探长金九龄等人赶往六灶村。

当中西探警突然闯入樊庭玉家中时，樊家却空无一人。巡捕们唤醒村民询问，将魏廷荣的照片拿给村民辨认，村民说曾在樊家看到过此人，但谁也说不出现在到哪里去了。

原来，9月15日傍晚，樊庭玉的叔父、绑匪樊仁根突然来到樊庭玉家，说是康脑脱路有人被捕，巡捕房已经得知魏廷荣藏在这里，最迟明天就会赶来，樊仁根对樊庭玉说准备“撕票”灭迹。但秉性善良的樊庭玉执意不肯“撕票”，两人争吵得几乎打起来。魏廷荣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樊庭玉救他一命。樊说，如他救了魏，同伙们不会放过他。魏廷荣恳切保证，如能得到搭救，将负责养活樊庭玉终生。樊庭玉动了恻隐之心，终于决定救魏廷荣出险。两人商定，先一起赴苏州，到魏廷荣娘舅家避避风头，后来魏经其母舅王晋康联系，在上海法租界义勇团的保护下，回到上海家中住了3天，又启程赴北京避风头。魏实践诺言，报答了樊庭玉的救命之恩。

二、诉讼案曲折变幻黑手幕后隐藏黑手有关魏廷荣遭绑架案的侦缉事宜，上海法租界捕房先后查获有关人犯朱竟成、陈仲衡、唐士良三人。1929年10月4日，法捕房将朱、陈、唐三犯解往会审公廨受审，审讯结果，宣布该三犯各押西牢五年，期满后驱逐出境送内地官厅按律究办，另赔偿被害人纹银一两，由三犯共同负担（属于规定的象征性赔偿）。在案件审理的第一阶段中，除了魏家接到的具名“大侦探密告”的信件外，未发现赵慰先与魏案有关系的证据。赵仍逍遥法外。

1931年6月，公共租界在处理别的案件中，案犯蔡维才供出曾参与绑架

魏廷荣。法捕房闻讯，于6月6日要求公共租界法院把蔡移提到法租界，就魏案重行侦讯。蔡供认魏案的教唆者是徐忠清、吕若望、樊仁根及一刘姓等人，真正教唆者是赵慰先。会审公廨对赵慰先、吕若望等发出缉捕文票。吕若望被押沪后于7月2日受审，据供，赵慰先要绑架魏是由在逃的邹惧恩透露给他的，绑魏案是邹托徐忠清帮忙邀人进行的。

这期间，会审公廨正在撤销，直到8月7日吕若望、蔡维才被解到新成立的法院开审。蔡维才却翻了口供，说在捕房的口供被外国翻译译错了。这显然在幕后另有原因。同时，由魏廷荣委托为代理人的徐延年律师向法庭请求对被指为主谋犯的赵慰先拘案法办。但是赵在1931年以前已离开上海，就任财政部税警独立第六营营长，驻在苏州。法捕房请魏廷荣状请法院补办到内地捕人的手续，并要魏派其长子魏元生伴同捕房探目，携公文赴苏州。于8月21日投请吴县公安局侦缉队协助，在赵慰先乘坐自用包车驶过三多桥附近时，由魏元生拦车指认，逮捕了赵慰先，次日押赴上海，于24日解到法庭归案审讯。当天，由捕头鲍尔弟及译员王均把吕若望及已判刑的陈仲衡押到法庭与赵对质。吕若望、陈仲衡均供认此人为赵慰先，并说听到赵慰先谈过魏廷荣为富不仁故要将其绑架。但是赵慰先坚不承认指证他的人与他相识。法院又两次开庭，提讯陈、吕，口供都没有变化。可是同案犯朱竟成，不仅没有说赵参与此案，反而说魏廷荣曾指使180号巡捕和魏自己先后到押所三次，唆使他要报出赵慰先来，被他拒绝。魏和主持追诉的法捕房都驳斥了朱的供述是反诬。

赵慰先通过他的辩护律师，提出了财政部税警总团的公文，辩称不论赵是否犯了罪，因为他有现任军官身份，都不应受通常法院审判。1931年11月28日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宣告判决，对吕、蔡两犯以共同掳人勒索罪，分别判无期徒刑及20年有期徒刑。而对赵慰先彼诉却宣告不予受理，认定赵被捕时系军人身份。1933年5月30日，设在法租界内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把一直在押的赵慰先提庭，宣布移送淞沪警备司令部归军法审判。

不料，这时法捕房却突然撤回了对赵的控诉。这一幕后的背景也十分复杂。

赵慰先被捕后，朱藻三家的兄弟都气愤万分，主张严办，唯有朱九小姐、赵班斧（赵慰先之胞弟）等不断地向魏廷荣求情，朱九小姐多次跪在魏妻朱二小姐面前哀求，当时任上海社会局局长的赵班斧更是“断指写血书”，促使魏廷荣“做了感情的俘虏”，“请求捕房把对赵的控诉撤回”。法捕房宣告撤回控诉后却仍把赵移解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赵慰先很顺利地通过了军法会审，于1933年6月15日由淞沪警备司令部和军法处当局判决宣布赵慰先无罪，显然赵慰先背后有得力靠山帮助他打通了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部门的关节。

赵慰先获释后，不顾赵班斧在法捕房所具的书面声明中提出的“保证慰先决不对于魏君有所误会”的诺言，在上海各报上以大字标题，登载启事，说他被逮捕幽禁是由于魏廷荣唆使已判刑的罪犯诬扳他赵慰先“及上海名人某公”所致。这里的名人某公，系指上海青帮首领，被称为“海上闻人”的杜月笙。其实在上述案件过程中谁也没有提到过杜月笙，赵却主动把后台人物暴露出来了。

之后，赵慰先向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反诉魏廷荣教唆诬告，请治以应得之罪。魏廷荣不是军人，赵慰先不应向军法部门反诉魏，而军法部门也不应当

受理赵的控告，奇怪的是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却徇从赵的要求，连续两次签发传票，甚至直接派出便衣士兵进入法租界魏的寓所传唤魏。不料法捕房自魏遭绑架后，常派探捕在魏宅周围警卫。军法处第二次派人到魏宅传 131 唤魏时，被巡逻的探捕扭进了捕房。军法处随即以魏“托庇租界妨碍公务”的口实，对魏下达了通缉令。但华界军方不得进入租界捕人，赵只得请警备司令部把他提出的反诉移送到法租界的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核办。同时，他又向该法院提了自诉状，控告魏和魏子元生分别犯有诬告等罪行，要求法院从严惩处。但法租界当局派出顾问律师到法庭上要求参加诉讼，其出发点在于保护魏氏父子。

当时有位上海帮会界首领徐朗西，出面劝魏廷荣“烧点锡箔灰退鬼了祸”，劝魏拿出 3 万元交给赵慰先去安排警备司令部里的人，另一方面他又请朱竹坪去劝赵慰先。在双方同意后，徐朗西出面请客，魏廷荣、王晋康、朱竹坪、赵慰先一齐到场。魏当场打开一只装着 3 万元现钞的箱子，由王晋康点交朱竹坪，朱竹坪转交赵慰先。从此，泄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就不再对魏通缉了。赵慰先也避不到案，至此这一案件永远“延期审理”了事。赵慰先终于从魏廷荣手中获取了一定的赌博本钱。

这一案件经过曲折变幻的过程，最后不了了之。在案件变幻过程中，很显然有人幕后操纵。从被绑架者魏廷荣提供的材料和其他多方面的迹象来看，幕后的操纵者是杜月笙。杜在青帮辈分虽不高，但和法租界当局关系密切，和魏廷荣在法租界的势力不相上下，但他所掌握的帮会势力却远超过魏的义勇团的势力，他在租界之外和国民党当局军警各界都有关系，金融、工商界也有他的势力。魏廷荣的经济力量虽然不在杜以下，而其政治势力，尤其是社会势力远不如杜。

绑匪朱竟成在法庭上受审时，曾供述绑架魏廷荣的动机：这次绑魏“并非完全为金钱问题，实缘原告魏廷荣，身为教友，卫腮不应娶伶人吕美玉为妾，又将吕之照相刊印于美丽牌香烟上卖钱，又将义勇团名义在法国公园内捐募所得之款，匿不报销，又开中法银公司及交易所，紊乱金融等种种不良行为，故此起意绑架，惟民人等实际上确有强暴行为，违反法权，而对于主义上，并不为罪，实寓有警惕原告之意思。”朱竟成的这番话，暴露出绑魏主要为了两点：一是魏娶吕美玉为妾；二是魏在法租界金融等方面势力大而狂妄。绑魏不仅是为了勒索赎金，也是为了打击魏的势力。说明绑魏案不是一般绑匪为金钱目的策划的，而是有与魏争雄的“大亨”在幕后操纵。被绑者魏廷荣自己也意识到这个幕后人物非同一般。他在事后写的材料中称：“我和杜月笙之间向有矛盾，古语说‘两雄不并立’，那时在法租界我和杜月笙各有一部分势力，而法国领事比较信任我，在杜月笙看来，我不能成为他的心腹，就必然会成为他的敌人。事实上我是不肯和他同流合污的，在某些方面还和他对立。”杜月笙在经营烟土方面、赌场方面，组织“自卫团”武装方面，都遭到过魂的反，双方矛盾很尖锐。“四·一二”事变前，杜等组织“中华共进会”拉魏入伙，遭拒绝。杜对黄金荣、张啸林说魏“自以为是上等人”，看不起他们帮会界。杜曾向魏表示要换帖，结为异姓兄弟，受到魏的冷落。当杜氏家祠落成典礼时，英、法租界当局、国民党一些党国要人都前去祝贺，蒋介石送了亲手题写的匾额和亲笔道贺信，而魏廷荣却仅随份送礼，没有前去道贺。这些情况，正如魏廷荣所说：杜月笙“势必要拿点颜色给我看看”，“适逢赵慰先有绑架我的企图，经过一些绑匪的串连，于是

杜月笙就成为这一案件的幕后人物了”。

魏廷荣对于自己当时在法租界的地位有着较切实的估量，在他亲自写的“杜月笙与绑案的关系”的材料中指出：“凭着我当时在法租界的地位，一般的匪徒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人撑腰，怎敢动我的手。”“赵慰先和杜月笙原非素识，但是赵从淞沪警备司令部释放出来后，就和他的妻子朱九小姐经常在杜家出入，杜还介绍他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当副官长。”“赵慰先被释后，登报指责我要绑匪朱竟成诬扳赵慰先和‘名人某公’。朱竟成在法庭上只说我要他扳举赵慰先，并没有说我要他扳举‘名人某公’。在声明中，赵慰先却把杜月笙扯上，若果没有杜的授意，赵敢这样做吗？”

显然，赵慰先在报纸上的声明有杜的授意，在案件变幻过程中赵班斧断指写血书使魏撤回起诉、然后赵再来个反诉，而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随便插手军法之外的诉讼而又明显地偏向赵。这一系列问题，都暴露了杜在幕后的操纵。早在魏廷荣脱险后，赵慰先被捕之前，杜月笙曾登报声明他与此绑案无关，这是由于杜对魏脱险的背景，特别是魏与警方对这一绑案的内幕所掌握的情况心中还没有底。这确实是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声明。

赵慰先及其胞弟赵班斧都是杜的门徒，赵被捕后为其辩护的是秦联奎和章士钊两位大律师。这是当时已赌得倾家荡产的赵慰先请也请不动的，而这两位大律师都与杜有密切的关系。“很可能是杜月笙为赵请出来的”。

其实，魏廷荣被绑案幕后不仅有杜月笙的背景，还有黄金荣的背景。自从魏廷荣从黄金荣手中夺去美女伶人吕美玉之后，黄金荣一直耿耿于怀，伺机报复。黄金荣曾与杜月笙、张啸林等策划过绑架魏廷荣，杜月笙也曾布置过对魏的绑架行动，但由于魏周围有义勇团保镖，又受到法租界巡捕房保护，绑票未成。1929年赵慰先对魏绑票是前一次未遂行动的继续。杜月笙利用魏的连襟赵慰先绑架魏，实现了他打击魏的威风、削弱以至打垮魏的势力的目的；又通过在诉讼方面的幕后活动，不仅使魏对赵慰先的诉讼夭折，反而通过赵对魏的反诉迫使魏拿出3万元。

通过这一曲折的案件，魏廷荣从此屈服于杜月笙的势力，“才39岁就辞去一切职务，蛰伏在家里，深居简出，偶然出门，总是提心吊胆，瞻前顾后”。

郭绪印（第127页图为杜月笙照片）

马鸿逵泰安盗宝

马鸿逵，甘肃临夏人，自幼随其父马福祥在军旅中生活，13岁时就捐了一个“兰领知县”的虚缺，甘肃陆军学堂毕业后，当过黎元洪的侍从武官。1924年投靠冯玉祥，1929年与韩复榘、石友三一起叛冯投蒋，被任命为第十五路军总指挥，驻守在山东泰安。马鸿逵虽得高官，但并非蒋的嫡系，仍属杂牌军之列，军饷往往要就地自筹。当时战祸频仍，民不聊生，筹饷极为困难。于是马鸿逵就想效法孙殿英，盗墓寻宝。

马鸿逵的总指挥部设在铁路宾馆，对面就是嵩里山，此山虽然不高，但气势雄伟，他打听到这一地区地下确实埋有宝物，于是派兵封锁了路口，命传令班长马子周带人去挖，因没有明确地点，胡乱挖了三天，除了层层黄土，结果毫无所见。

马鸿逵仍不死心，命令副官处长马如龙继续寻挖，他对马如龙说：“根据可靠消息，山下肯定有宝，你务必完成任务。”马如龙认为人少不好办，最少需要一个团。马鸿逵作贼心虚，唯恐人多目标大，容易走露风声，万一传扬出去，名声不好。马如龙献计说：“这件事干的越快越好，结束的越早越好。至于说目标大，这不要紧，我们干脆故意放出风声，假借为十五路军阵亡将士修建纪念碑的名义，堂堂正正地开工，看谁敢说个不字。”马鸿逵点头称妙，并叮嘱他千万不可走露半点风声。

马如龙带着一团人，日以继夜地连挖了8天，几乎把嵩里山挖平，果然发现了碾盘那么大的石板，上面还钉有10几个铁把子。马鸿逵亲自来到现场，揭开石板后，露出一个石槽，槽内刻有一行篆字，石槽下面埋有一黑色小木匣，长约一尺有余，宽有数寸。马鸿逵仔细看了看，故作姿态地说：“我为什么宝贝东西，原来是个木匣匣，我不看了，马如龙你拿去吧！”

匣子是用紫檀木做的，盖子上刻有朱红篆字，匣子用3缕金丝捆紧，四周还有24颗金钉。

匣子打开后，内装8根长1尺，宽1寸的绿色翡翠，上面也刻有朱红篆字。为了弄清宝物来历，他们私访了当地一位老学究，请他鉴定。老先生认出匣盖上的篆文是“天子臣李隆基诚惶诚恐顿首”。证明这是唐玄宗封禅泰山的玉牒，翡翠上刻的是祭天文告，《唐书》上有记载。两个月后，马鸿逵又从北平请来两个古董商人，对宝物进行了鉴定和估价。

马鸿逵盗宝的消息，被《大公报》一位记者听到，动员他将此宝献给国家。马鸿逵谎称绝无此事，纯属谣传。后宝物被马鸿逵私吞了。

王光远（第137页图为马鸿逵照片）

六国饭店特别行动

公元 1933 年 5 月 7 日清晨,古老的北平城渐渐地从夜暗与晨雾中苏醒过来了,路灯还没有熄灭,大街小巷里有了早起的人影。地处城中心东交民巷里的著名的六国饭店在喧闹了一夜以后。这时才显得沉寂起来。目下虽时局紧张,日本侵略军正从东北向华北紧逼,在长城沿线燃起了战火,中国军队正进行紧张的长城抗战,但北平城里依然游人如织。腰缠万贯的达官贵人与富人贾们游兴不减,要来领略故都暮春时节的迷人景色。中外游客们住满了这六国饭店大大小小的房间。

六国饭店坐落在东交民巷使馆区。从东交民巷西口进去,过御河桥,在十字路口的东南角,就可见到六国饭店宏大华美的楼宇,其规模仅次于北京饭店。该饭店不仅设施讲究,服务周到,而且由外国人开办经营,又坐落在中国军队不能进入的使馆区,因此备受中国显要人物的青睐。在北洋军阀时代,北京政局一有风吹草动,总有一批达官贵人将此作为逃避灾祸的世外桃源。即使在这里楼梯边摆把椅子坐一夜,也要交多少元现大洋。到了 30 年代,这里依然繁华热闹不减当年。

这天清晨,饭店里住宿的中外游客们在灯红酒绿中度过了一夜难忘的夜生活以后,此时都进入了梦乡。

就在这豪华奢靡的六国饭店的楼宇里,突然响起了几声清脆的枪响。整个六国饭店立即被枪声惊醒了。惊叫声、呼救声、脚步声响成一片。人们看到:几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持枪夺门冲出六国饭店的大门,跳上一辆小汽车,飞一般地驶去。待持枪人与小汽车消失后很久,附近的警察才闻讯赶来查勘。惊奇的人们从警察与饭店茶房嘴里获得了一个更加惊奇的消息:在六国饭店被枪击倒在血泊中的一个中年壮汉,不是别人,而是闻名一时的前北洋军阀的大将、曾任过湖南督军的张敬尧。

人们奇怪:张敬尧怎么会悄悄地住进了六国饭店?怎么会突然遇刺身亡?刺客是谁?刺客们又怎么能潜入这门卫森严的六国饭店?

张敬尧,字勋臣,安徽霍丘人,生于 1880 年 9 月 21 日(清光绪六年八月十七日),自祖辈起迁居颖上县南照集。父张文奎,号益轩,是县里包揽诉讼的刀笔吏。张敬尧少时“事游荡,嗜烟赌”,是个浪荡子。当过粮店学徒,因偷盗被乡人驱逐出境,流落到山东为盗。又因杀人逃到京津地区。1896 年投入小站北洋新军,后被袁世凯选入随营学堂受训。不久又入保定军官学堂,毕业后,先后充任北洋军团长、旅长、师长,成为袁世凯的忠实爪牙。曾参与镇压辛亥武昌起义、江西“二次革命”,以及民初白朗起义。袁世凯死后,张敬尧成为以段祺瑞为头子的“皖系”中的大将。1918 年率军攻占长沙,被北洋政府任命为湖南督军兼省长,治湘两年多,横征暴敛,纵兵殃民,湖南人民称之为“张毒”。1920 年 6 月张敬尧兵败被逐出湖南,惶惶如丧家之犬,先后投奔直系与奉系军阀。1932 年日本制造的伪“满洲国”出笼,张敬尧又投靠伪满政权,充当暗探。1933 年日寇从东北向华北进逼,在攻占热河后,向长城各口进攻,威胁平津。一时间长城沿线战火纷飞。在这时,日寇找来张敬尧,委任他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并借给他 700 万元活动经费,要他秘密潜入北平城内,收集旧部,勾结流氓,策动驻军,重新拉起队伍,在日军进攻平津时作内应,张敬尧受命后,即带着大量金钱与几个亲信,悄悄来到北平城中,住进了这外国人开设的豪华而又安全的六国饭店。

开了三个大的房间，每天加紧活动，四出联络各色人等。

张敬尧在北平的猖狂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注目。但碍于当时的形势，对张敬尧又不便公开缉拿。于是在1933年4月间，蒋介石下达指示给戴笠，要求戴笠迅速暗杀张敬尧。

当时国民党军统还没有正式成立。戴笠当时的任职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特务处处长，对内则是复兴社特务处的处长。复兴社特务处副处长兼华北特区区长郑介民，常驻北平。戴笠接到蒋介石命令后，立即电令郑介民赶回南京总部共同研究暗杀张敬尧的方法。经过几天策划，最后决定由郑介民化装为南洋华侨巨商，回国做人参生意，也住进北平六国饭店，先侦察张敬尧行止，再伺机下手。因为郑介民是广东海南岛人，早期曾在马来亚吉隆坡做过生意，讲得一口广东官话，也能说几句英语与马来亚土话，化装南洋华侨巨商非常适合，不会被人怀疑。

于是，在1933年4月底或5月初的一天，郑介民打扮得西装笔挺，满身洋气，随身携带十多只沉甸甸的皮箱，气宇轩昂地住进了北平六国饭店。六国饭店的侍役茶房们帮着将那十多只皮箱抬进郑介民包下的豪华房间时，还以为那里面装的都是金币与银元呢！其实，里面装的都是石头砖块。郑介民住进饭店后，神态随和，出手大方，经常借机与茶房聊天，很快就了解到张敬尧住的房间号数与位置。郑又常常以散步与工作为由，到张住处周围进行秘密侦查，弄清张敬尧与其亲信住在三个大房间里，每日活动频繁，来往的客人很多。而且张行踪诡秘，夜间睡觉经常变换房间。郑介民想，暗杀如果定在白天，人多难以下手，而且刺客不易走脱。若在夜间进行暗杀，又不知张敬尧当夜睡在哪个房间。而且张敬尧是行伍出身，枪法极准，武功又很厉害，弄不好就会赔了夫人又折兵。郑介民左右为难，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原来郑介民侦察到张敬尧每天起身很早，洗脸，修容花的时间很长。这时一来人少，二来张定疏于防备，故正是下手的极好时机。郑介民指定年轻力壮的白式维为执行人，并研究了刺客动手后的逃走路线。另外派人在楼梯口、饭店门口守候，以掩护刺客撤退。还预先弄来三辆小包车停在饭店附近。

1933年5月7日清晨，张敬尧象往常一样早早起身。正当他洗脸修面梳妆打扮时，白式维在同伴的掩护下，突然飞速地冲进房间，手提枪响，子弹准确地射进了张敬尧的头部，张立即倒地毙命。当六国饭店的茶房与房客们被枪声惊醒时，白式维等人早飞奔下楼，跳上小包车，飞驰而去。郑介民也丢下“皮箱”不知去向。

事后，国民党北平机关报报道说：张敬尧是汉奸，潜入北平阴谋策动叛乱，被“锄奸救国团”击毙。

经盛鸿

日人藏本失踪案始末

藏本失踪

平地惊雷公元 1933 年 6 月 9 日清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正式通知国民政府外交部，日本驻南京副领事藏本英明，于 8 日晚往下关车站送有吉之后失踪，请帮助查访下落。藏本的失踪，给当时紧张的中日关系蒙上了一层不安的迷雾，一时间成了舆论的中心。

警宪齐出 悬赏查找南京政府得到消息，立即下令警察宪兵一齐出动，尽力查找。警察厅长陈焯赶紧派督察长陈独真往日本领事馆访问，并多方调查，了解藏本平时的个性、嗜好、身材、服饰等问题，同时向日本领事馆索取藏本照片，翻印多张，分别向藏本平日来往各处及城关站埠四出查访，又将从日本领事馆至阴阳营藏本寓所及自领事馆至下关一带沿路岗警，逐一查问，没有找到线索。

同日，陈焯召集各局、队、所负责人，研究扩大调查办法，明确各部责任。

11 日，警察厅又在督察处召集各主管人员报告连日查访经过，研究继续侦查办法，命令各警，不分昼夜，努力查找，以便尽快找出线索，寻得藏本下落。

同日，警察厅与警备司令部在南京各报登出广告：无论何人，如能将藏本直接找到，赏钱 1 万元，能知道藏本的下落，报告警察厅或警备司令部，因而找到者，赏钱 5000 元。

晚上，警察厅与警备司令部召开联席会议，议决几项紧急方案：南京四郊的搜查，由宪兵警察联合编成九组，共同搜寻；实行户口总检查；派便衣队携带照片四出查访；请江宁县政府协助查找；派人分别向苏州、无锡、镇江等处搜寻。

12 日，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对藏本案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并下令督促警备司令部和警察厅严密搜查。在江西前线指挥剿共的蒋介石也致电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详细询问了藏本案的情况，并下令军警严查。外交部、警备司令部和警察厅三机关为了便于查找，决定各派一人组成联络组，交换情报并决定第二天的行动计划。

真相未明 日方进逼南京政府连日努力，竟然找不到一丝线索，在真相未明的情况下，日方妄加揣测，步步进迫，通过各种手段，向南京政府施加压力。

11 日早晨，日本外相广田认为南京政府对于藏本事件的调查缺乏诚意，致电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训示与南京政府交涉的三条原则：在中国首都发生的外国使馆人员失踪事件，在经过数小时后，仍然未能判明事件的真相与责任之所在，这是近代国家从来没有过的事件；南京政府如果确实没有调查事件真相的能力，那么日本政府就很难相信它的警察力，而不得不为保护公使馆员生命财产的安全而加以“重大考虑”；向南京政府要求迅速解决此案，如果有故意拖延放松调查的情况，日本政府将提出“重大抗议”。

同日，日舰“苇”号驶向南京。12 日晨，日本又增派“对马”号军舰驶向南京，进行威胁。日使馆参赞有野及日第三舰队参谋长高须冈野也从上海来到南京。

下午 3 点，须磨、有野与汪精卫会谈，会谈后须磨声称：要求迅速查明

藏本行止，藏本行止不明及因此发生的一切后果，当然由中方担负；这一要求只是第一步方案，倘若中方仍然没有诚意，那么将实施第二、第三步方案。

同日，日本外相广田与外务省高级官员协议，决定命令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向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汪精卫通告：日本政府要求国民政府竭诚调查事件真相，速谋解决方法；国民政府如果对此事件处理失当，因而发生不测事件，责任必须由中方负担；日本政府保留其在事件判明后，要求国民政府道歉、处罚责任者、赔偿损失等权利。

当天，日本舆论界也发起了猛烈的舆论攻势。

东京新联社通电说，日本政府认为藏本失踪案是义和拳运动中杉山书记官被杀以来的又一个重大事件，对南京政府应绝对采取强硬态度。

《朝日新闻》社论说，藏本失踪事件的原因是有人企图破坏中日关系的好转，因此采取了这一行动；南京政府对此难辞其责任，南京报纸所作的自杀等类的推测，不过是为了混淆视听。

日日新闻社社论认为，藏本失踪不可能是遭受匪贼，例如实际上成为国家机关的某社，也似乎与这一案件不无关系。

南京电通社电：对于藏本案，中方只以否认这一事件为目的，仅仅作表面上的调查，因此，用外交手段没法解决这一事件，应该采取实际有效的手段。

此外，驻留南京的日本人也集会，扬言如果这一事件不能迅速解决，那么全体日本人将退出南京。

日方的威逼恐吓，使南京政府压力倍增，南京政府一面要求日方保持镇静，一面下令严密查访，“如有怠忽，定当从严惩处，决不宽贷”。

藏本寻获 真相大白正当南京政府被藏本案弄得焦头烂额的时候，13日上午9点，警察厅接到陵园负责人张燕亮的电话。据张燕亮讲，早晨有一个人来喝水，年纪约四十几岁，中等身材，留小胡子，穿半新半旧的西装，喝完水后就一个人慢慢上山去了。警察按照这一线索，向山中寻找，11点左右，终于在紫金山下明孝陵后面，找到了藏本。起初藏本不肯下山，经过再三劝说，才乘车回城，到城里时已是下午2点多了。

在警察厅里，藏本讲了这几天的情况，本来他想去送有吉的，因为人多汽车坐不下，所以没有送，而是一个人坐黄包车出中山门，在中山陵附近上山，意欲自杀。起初想喂狼而死，后想绝食而亡，继而想掘坑自埋，但终于没有死成；至于自杀的原因，则不愿告诉别人。

总计从8日晚11时失踪到13日中午11时寻获，共108小时。

藏本找到后，日方气焰顿消。14日下午，须磨拜访汪精卫，代表日本政府向国民政府道谢；藏本本人也于20日从上海乘船回国，藏本事件就此结束。

就这样，一度被认为是“中村事件第二”或“杉山事件第二”的严重事件，因藏本自杀未遂而真相大白于世，使这一事件的结果染上了喜剧色彩，避免了中日之间的一场不必要的冲突，时人戏称为“朱太祖”和“孙总理”在天之灵的保佑。

然而，藏本案虽然结束了，藏本自杀的原因却终成难解之谜，据日方声称，这是由于藏本精神衰弱症的重犯，毫无其他原因，显然，这一说法很难令人信服。

樊伯欢

神秘女郎行动——张苇村被刺案

公元 1935 年春节，“山东王”韩复榘声称要“与民同乐”和大家一起欢度春节，便下令济南市地方上组织各种民间文艺活动，放假三天，组织提灯会。一时，高跷、龙灯、狮舞、旱船等各种民间歌舞及杂耍沿着繁华的街道上一路耍来，街两旁都挤满了观看的人群，各种小贩也到处叫卖，好不热闹。

这天是年初二的晚上，韩复榘正在小纬二路的一幢小楼里和几个省府委员和高级参谋在叉麻将。他正和了一副筒子“清一色”，拍着一张刚刚摸进的嵌八筒在哈哈大笑。突然，门帘一掀，闯进一个人来。此人瘦长个子，穿着一件灰布长袍，上身罩了件青布坎肩，一顶黑色西瓜小帽顶在头上，打扮是个二爷。他神色慌张，快步走到韩复榘身边，结结巴巴地报告道：“主席，不好了！”

韩复榘定睛一看，是自己的亲随张富贵，将手里八筒一甩，忙问：“什么不好了！”

“张委员，他，他被人杀了！”张富贵道。

“哪个张委员？”韩复榘将面前的牌一推，“嚯”地站了起来问。

原来，当时山东省政府里，有两个姓张的委员，一个是省党部部长张苇村，一个是张鸿烈。

“是张书记长！”张富贵道。

韩复榘双眉一竖，继续问道：“在哪里？”

“在进德会。”张富贵道。

进德会是当时济南最大的一个游乐场所，又是高官们进行政治活动的地方。

韩复榘两眼一瞪：“凶手抓住了吗？”

“没，没有，”张富贵说，“不过，有人看见是两个穿灰布衫的人！”

韩复榘左手托着尖下巴，在房内踱了几步，猛然在桌上击了一拳，命令道：“立即把进德会大门关闭，所有人不得再出入；马上派省府卫队去进行严密搜查；同时把当时的情况弄清楚，及时向我报告！”说完穿上大衣，带了随从副官和卫士们回省府去了。

自然，一场牌战也只好停下，那些委员、高参怀着种种疑虑各自回府。

再说进德会，这里有电影院、京剧院、地方剧院、杂耍场、花园、茶室，游人如云，热闹非凡。韩复榘一声令下，身背大刀，手持快枪的省府卫队如虎似狼地冲了进来把守了各道关口，整个欢腾的进德会，顿时成了鬼哭狼嚎的活狱。各个戏院停演，杂技焰火收场，几万游人拥在大门口听从卫队的搜查。

先是把一些妇女小孩放出去；再是把穿制服有徽章的公务员放行；再放一般的居民和商人。扰攘到了下半夜，抓了几个穿灰布大褂的倒霉蛋，才算结束了这场搜索。可第二天一审问，这几个人都是有名有姓，有确切职业的店铺伙计，那几家店东也都纷纷来保，又无任何凭据，也只得取保释放。

韩复榘见抓不到凶手，大发雷霆。一个堂堂的省党部部长，在省府所在地被杀，怎么向南京交待？更何况，他还有自己说不出的隐痛。

第二天下午，张苇村被杀经过的调查报告送上来了，材料主要是同时被伤但未丧命的张苇村的卫兵提供的。韩复榘看着看着脸上有了笑容，一个破案的方案在他腹中形成了。

原来，这一天，省府公务员的提灯会轮到张苇村带队。集合地点在城内皇亭。春节期间，家家户户都有些应酬，公务员们吃过晚饭，提着灯赶到皇亭比较晚了。张苇村去得较早，见队伍总集合不起来，很是恼火，当场对迟到的人大发脾气，指责他们不守纪律。兴匆匆赶来提灯的人被骂得个个垂头丧气。7点钟提灯会出发，沿着西大街、普利门大街、筐市大街、二大马路、纬二路走了一圈。因为开始触了霉头，大家情绪不高，走得很快，都想尽早结束这场无趣的把戏，所以8点钟就到了进德会。提灯会的队伍在电影院门口就解散了。大家各自去看电影、看戏、看杂耍去了。

张苇村对这些都不感兴趣，想回家去叉麻将。这时，他突然眼睛一亮，只见一位身穿豹皮大衣，烫了长波浪秀发，足登高跟皮鞋的妙龄女郎从他身边闪过，还向他回眸一笑，两个深深的酒窝和一副洁白的皓齿，使他浑身都酥了。张苇村是个有名的贪财好色之徒，遇此良机如何肯轻易放过？豹皮女郎向他一笑之后，就径直向东南方向走去。张苇村就紧紧地跟在她后面，他的卫兵只好自认倒霉跟在他的后面。

那豹皮女郎象条鱼似地在人群中游来游去，张苇村也紧跟不放，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女郎慢慢地离开了人多喧闹的地方，进入了柏墙甬道，由北而南，往东南角的古玩店走去。跟在后面的张苇村这时四顾无人，只有自己的卫兵跟在后面，就没有顾忌了，加快了步伐，想上去和那女郎攀谈。他刚刚靠近女郎身旁，在柏墙东面突然跳出来两个身穿灰布大褂的人，都拿着左轮枪向他逼来。跟在后面的卫兵刚想拔枪，“砰！”一个高个子的长衫客举手一枪就将卫兵打倒了。另一个稍矮一点的人举枪就向张苇村射击。张苇村见势不妙，纵身想跨过柏树墙向西边人多的地方逃命。但是，说时迟，那时快，一声枪响，一颗子弹早已命中，张苇村倒在孔雀亭的西南附近的墙脚下。那两人还赶过来又补了一枪，走到他身旁验明张苇村确已死去，然后才从容地向进德会大门方向扬长而去。那位身穿豹皮大衣的女郎也神秘地不知去向了。

当时，鞭炮放得震天响，三声枪声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不过，张的卫兵并未被打死，他目睹了这幕活剧，咬咬牙，在上衣上撕下了一块布，包扎了自己的伤口，在地上爬了半个多小时，才爬到了进德会军警分驻所，报告了这场事故的经过。

那么，刺张的凶手究竟是谁呢？一时，社会上议论纷纷。但韩复榘心里有一本帐，他决定亲自来抓这个案件的审理。

他先找了那卫兵详细地审问了一次。又秘密地找省党部行动队副队长和几个队员询问了几次。在张被刺的第3天，突然下令，逮捕国民党山东省党部行动队队长谯俊臣。前去逮捕的省府执法队，几乎没有遭到反抗，就把这个中统骨干分子抓了起来。

当晚，韩复榘就坐堂审问。12个彪形大汉站立两旁，各种刑具都摆在大堂上。平日里作威作福的谯俊臣如今蜷缩地跪在地上。

“你们是怎么杀张书记长的？谁主使你干的？”韩复榘瞪大了虎目，威严地问道。

“冤枉呀！主席！”谯俊臣哭丧着脸，大声叫屈，“他是党部书记长，我们怎么会杀他呢！”

“你们为什么杀他，你自己心里明白！”韩复榘冷冷一笑，“我只问你怎样杀的，主使人是谁？”

谔俊臣还是大叫冤枉。

韩复榘用眼向张富贵一瞟，张富贵拿出一个包裹来，扔下堂去。韩复榘大喝一声：“你自己看！”

谔俊臣抖抖索索地去解开那包裹，只见里面是一件豹皮大衣。他一见这大衣眼直愣愣地瞪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这件豹皮大衣，怎么会到了韩复榘的手里呢？

原来第2天对进德会进行了一次全面搜查。在柏墙的西南角发现了这件大衣。可见是引诱张苇村的那个女郎已“金蝉脱壳”弃衣脱身了。传说中，往往把韩复榘说得是个鲁莽的草包，其实，他是很有心计的。他立即派人在全济南的皮货店作了调查，查到了这件豹皮大衣是“乾泰恒”卖出来的。他立即密审了“乾泰恒”的老板，那老板起初还不敢说实话。后来，韩复榘恩威并施，桌上放了100块大洋和1支枪，说道：“你说实话，拿了100大洋走路，我一定替你保密；你要不说实话，就一枪崩了你！”那老板只得据实报告，那件豹皮大衣是省党部行动队一个兄弟来买的。……

“你还有什么说的！”韩复榘一拍桌子，怒火冲天地问道。

谔俊臣起初是吓呆了，但他毕竟是阅历根深的，心想那个去买豹皮大衣的队员，在当天，就命他到南京去了。更何况天下豹皮大衣何止一件，他就一口咬定“不知道！”

“上刑！”韩复榘怒不可遏地喊。

上老虎凳，灌辣子水，插竹签……谔俊臣实在有点受不住。他想招，但一个严厉的声音在耳边吼叫着：“你若说了出来，也是没命！”他又咬住了牙关，幻想着：他的上级知道了一定会来救他的。

3个月过去了，刺张一案还未了结。

确实的，中央党部曾过问过此事，要保谔俊臣出来。但是，韩复榘就是不放，而且他的理由十分堂皇：堂堂一个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被刺身亡怎么可以马虎了事；嫌疑犯如何可轻易放出。何况，人在韩的执法队手里，谁敢怎么样？！

有一天，又开审了，照例又是僵局。

韩复榘实在气得忍无可忍了。“唰”的一下，他从腰间拔出手枪来，将子弹推上了膛，走下公案，将枪口对准谔俊臣胸口吼叫道：“你到底说不说！？”谔俊臣眼里闪过了一丝恐惧的目光，头微微地低了下去。但他很快地清醒过来，如果说了，也难免被“组织”制裁，倒不如硬到底，也许还有一丝希望。他又把头一摇：“不知道！”

韩复榘象头暴怒的狮子似的，对着站在两旁的执法队大吼一声：“拉下去打！打死他！”

谔俊臣就在执法队的军棍下，被活活地打死了。

不久，刺张内幕披露：张苇村确实是被谔俊臣策划组织人暗杀的。

一个国民党省党部的行动队长，为什么要去暗杀一个国民党省党部的书记长呢？

原先张苇村是CC系统的一员干将。1933年，CC系为了将势力扩充到山东，陈果夫就将张苇村推荐给韩复榘，当上了省党部执行委员。这时韩表面上虽服从中央，但骨子里却事事闹独立，尤其怕中央势力渗入山东。这次张苇村到山东，临行前陈果夫曾找他密谈：要他此行表面上是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际上是监视韩复榘，并要将韩的一举一动及时汇报。而韩复榘对

CC 头子的用心并不是一无所知。他事先已对张的为人作了一番调查，知道张只是个爱财喜色之徒，并不难对付。

于是，张苇村一到济南，韩复榘就盛宴款待，而且还委任为省府委员的重任。以后，他又按月送上巨额津贴，一味在“财”与“色”上，逞其所欲。从此，张苇村就投入了韩复榘的怀抱。他非但不将韩复榘的真实情况向 CC 汇报，反而把 CC 及蒋介石对韩的种种意图，统统告诉韩。张为韩用，他不但不再是“中央”派往山东的耳目，反而成了山东韩复榘在“中央”的耳目了。

“没有不透风的墙”。陈果夫已得密报，张苇村确已投韩。他把张苇村召回南京，大加痛斥，但又为了韩的面子，不至使山东分裂出去，仍叫张苇村返回山东。但在临行时，他把张叫到小书房，阴沉地对张说：“你的事，是叛党行为，中央本来有权随时处置你的！这次给你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你回山东后，好自为之吧！”

张苇村战战兢兢地擦着汗，退出了小书房。

不久，另一个人蹑手蹑脚地走进了小书房，他就是山东省党部行动队队长谌俊臣。他是受了陈果夫密电召来的。

“今后，你要注意张书记长的行动！”陈果夫吩咐道。

“是！”谌俊臣头点得象鸡啄米。他俩之间本来就有矛盾，如今见主子这样吩咐，心里有着一种莫名的快意。

“要将他的一举一动用密电报来！”陈果夫将象牙烟嘴上的三炮台香烟烟灰弹了一弹。

“是！”谌俊臣又忙点头道。

陈果夫抹了一下眼镜镜框，从牙缝里又挤出了一句话：“到了必要的时候，你可以对他严加处置！到时，你会有好处的！”

“谢谢部长的栽培！”谌俊臣感恩戴德地道。

张苇村一回济南，立即将这次南京之行的情况向韩复榘作了汇报。韩复榘听了，发出了会心的笑，他拍拍张苇村的肩膀，大大咧咧地道：“我为你作主，你不要怕他们！”

“谢谢主席！”张苇村恭敬地鞠了个躬。

而这一切，马上被谌俊臣知道了。立即用密电向陈果夫报告。陈指示他“密切观察，及时报告”。

张苇村回济南得到了韩复榘的保证后，更加死心塌地的投靠韩了。对于“中央”的指示阳奉阴违；对韩复榘的指示，奉若神明。谌俊臣一次又一次地密报。他极希望早日除掉这个死对头，以便自己好取而代之。

不久，陈果夫的密电来了，命令谌俊臣除掉张苇村。但电文中又命令：要暗除，不能使韩知道，如果事泄也不能暴露，否则将以“组织制裁”！

谌俊臣通过了半年多的调查研究，一个谋杀张苇村的行动计划策划好了。他抓住了春节提灯会这个良好时机，又选在一个万人游览的进德会。他又从广东重金聘来了两个枪法高明的刺客，再由南京选派了一位美貌女郎来作诱饵。定名为：“神秘女郎的行动”。果然，张苇村这个色鬼入港成了黄泉之鬼；而制定这计划的谌俊臣非但没有得利，而且也成了棍下之鬼。

李炎辑

三十年代上海发生的一桩外国艺人强奸案

公元 1935 年 4 月底,上海发生了一桩轰动一时的英国伊索古马戏班团员诱拐强奸一名 13 岁中国幼女的恶性暴力事件,引起强烈社会反响。案发后,社会各界纷纷出面,谴责肇事者,积极声援、救济受害者及其家属。此案前后持续近一月之久,最后不了了之。

伊索古马戏班是由英国商人开办的艺术团体,当时颇负盛名,经常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1935 年 4 月首次来华,在上海法租界爱多亚路大世界对面的大华公司附近空地上设场表演,前往观看之人络绎不绝,生意空前兴隆。

4 月 30 日晚,在上海天蟾舞台从事编剧兼演员工作的扬州人尹声涛,让 13 岁的养女尹阿佩出去买日用杂物。当阿佩路过伊索古马戏班剧场时,场内一个中年外国人以带她入场观看马戏为由,将其诱骗至团内,非法羁留。到 5 月 2 日,在该团所雇华人苦力王根本的帮助下,该外国人将阿佩强行奸污。

尹声涛自女儿失踪后,心急如焚,苦干无处寻找,报告法租界巡捕房求助。而阿佩在被污后,当日就由王根本带到圣母路大千世界游乐场内游玩,企图在人丛中甩掉了事,不料被在该游乐场工作的阿佩的舅父章皓月的一位同事撞见,章得知后立刻赶至寻找。王根本发现事已败露,情急之下,匆匆带阿佩逃离大千世界。章皓月紧追不舍,终于在福熙路九星大戏院门前将二人截住,报警后由巡捕带到芦家湾法捕房审问。尹声涛闻讯赶往,向女儿讯问了被污经过,捕房当即派探员与被害人一起来到马戏场内,找到了作案者及作案现场,搜出了污纸等物证,被告荷兰籍团员(捕房一直未予公布姓名)对犯罪行为供认不讳,被带到捕房拘留。捕房风化科主任通知尹声涛 3 日上午再来捕房,分别向荷兰领事馆及上海第二特区法院办理起诉手续。

5 月 3 日,尹声涛如约前往,法捕房却忽然改变态度,以证据不足为理由而不予受理,并将在押的要犯王根本当场释放。尹声涛万分愤慨,分别致函扬州旅沪同乡会和伶界联合会,请求援助,以伸雪耻辱。

5 月 6 日晚,伶界联合会召集会议,一致表决予以援助,并分别上书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市党部等机关,请求据理交涉。

旅沪扬州同乡会也于当晚在可可食品公司召集紧急会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1)推派二人根据尹声涛来函所述进行进一步调查。(2)将被害人送医院进行检查。(3)以同乡会名义致函法捕房,交出案犯。(4)致函荷领事馆。

经过细致调查核实后,同乡会于 9 日致函法租界芦家湾巡捕房,要求将罪犯的姓名抄示,以便依法进行究办,同时致 159 函上海第二特区市民联合会、公共租界华人纳税会等各公团,请予一致援助,并推定鄂森、宋士骧二人为义务律师,依法提起诉讼。

5 月 15 日,鄂、宋两位律师赴法捕房交涉,要求对罪犯依法根究,捕房方面声称此案已由法领事馆移送荷兰领事馆核办而不予帮助。

案情传出后,群情激愤,各界人士对法捕房玩忽职守,肆意庇护,私放该案要犯,无视华人人身安全等表示强烈抗议,纷纷谴责洋人之不法行为。受此恶性事件影响,伊索古马戏班的生意也随之一落千丈。11 日晚,场内连续发生两起火警,观众四散奔逃,生意难以为继。

5 月 16 日,尹声涛以法定监护人的身份偕其女延请鄂森律师代理,具状第二特区法院刑事法庭,对帮助洋人作案的王根本提起刑事、妨害风化的自

诉，请求法庭严办。特二法院根据起诉，派孙彭銜推事承办此案。孙当即签发传票，于 17 日派人传送双方当事人，并通知代理律师，于 20 日下午 1 时在第二法庭审理。其时被告人王根本自经法捕房释放后早日潜逃，根本无法到案。但奇怪的是，20 日下午的庭审中，自诉人父女与代理律师也均未到庭，法官只得宣布改日再审。旁听者莫不感到万分惊讶。后有传闻说，该案件已经有人出面向双方调解，被害人已有息事宁人之意，故未出庭。对此，此案代理人鄂森律师声明：“自承办此案后，一再向法捕房交涉，经法总监允许，转荷兰领事馆究办。20 日庭讯，只是因为与其他案件审理时间相冲突，故没有出庭。至于和解之说，本人并未参与，当事人亦未声明。”

5 月 26 日，第二特区法院裁定，此案已经和解，不再予以受理。个中原委，当然无人得知。此案轰动一时，但就此不了了之，成为 30 年代上海滩的一桩疑案。

王存奎

佛堂喋血记

惊人号外公元 1935 年 11 月 13 日下午 2 时 30 分，天津市南马路佛教居士林（佛家称在家修行的佛教徒为居士，居士林是男女居士听经学道的场所）的大殿里，接连三声枪响，正在跪地诵经的智圆居士应声立仆于佛案之旁，鲜血溅满了经卷。

这血淋淋的消息随着可怕的枪声，随着被枪声惊散了的人群，猛烈扩散开来。街头巷尾，商店剧院，到处都有人沸沸扬扬地议论：

“真作孽呀，一个听经念佛的人跟谁结下了冤仇，落得个脑袋开花！”

“听说凶手是个飞檐走壁的女侠呢，她在大殿前的院子里朝佛堂上开枪，子弹从人缝里穿过去，一打一个准，啧啧，神枪手！”

“依我看，女人当凶手，八成是情杀。去年不就发生过刘景桂刺杀亲夫的情杀案？”

“那智圆求福得祸，居士林倒成了凶杀之地，这年头，连佛法也失灵了。”

人们一方面不厌其烦地传播着这些愈传愈奇的马路新闻，一面又焦灼地期待着确实消息。

下午 6 时许，天津的大街小巷突然传来一阵接一阵的呼喊声：“号外，号外，请看惊人的消息！”《新天津报》的号外标题赫然是：

“孙传芳被刺死，施小姐报父仇”

次日，《天津益世报》的大字标题更令人怵目惊心：

“居士林内昨日骇人惨案施从滨有女复仇孙传芳佛堂毙命”

于是，弱女子手刃太军阀的新闻很快传遍全城，传遍全国。此案与轰动一时的孙美瑶临城劫车案、孙殿英东陵盗宝案，以及集毒、杀、烧一身的永和金号惨案，被后人并称为“民国四大奇案”。

息影津门若非发生这件奇案，孙传芳已经几乎被人们遗忘了。天津的老百姓大约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位当年的“联帅”是何时潜入这座城市的。

那是 1931 年深秋的一个夜晚，他是举家从沈阳经大连迁来的，不，是逃来的……

没有欢迎的人群夹道于前，没有荷枪的卫队警戒于后，孤身影影，冷雨凄凄。斯情斯景，使刚刚踏上天津这块土地的孙传芳，不禁涌起一种凄枪悲凉之感。想当年，他从日本东京士官学校学成回国，仗着吴佩孚的赏拔，定福建，下浙江，纵横苏皖，于 1925 年在南京建立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五省将帅，悉秉号令，声威远播，那是何等得意呵。不期次年与北伐军战于九江，溃不成军。此后又失守于南京，复败于龙潭，只得领些残兵败将，退缩到冀东滦州一带，由阎锡山派人收编，孙只身逃往沈阳，投奔张学良去了。谁知张学良不但不听他的劝告投靠日本，反而宣布东北“易帜”，接受南京国民政府领导，并密杀与孙勾结一气的奉系将领杨宇霆于老虎厅内。孙闻讯大惊失色，仓皇携家南逃，息影津门，以避其祸。终日与下野军阀、政客为伍，饮酒作乐，日子倒也容易打发，不觉大半年过去，孙传芳那颗惴惴不安的心才稍安下来。

一日午后，孙传芳正斜倚在沙发上闭目小憩，忽听副官进来轻声说道：

“大帅，我刚刚听到一个消息：张宗昌被暗杀了。”

“怎么回事？”孙传芳霍地挺直了身子，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于是，副官一五一十讲出了事情的原委：革命军北伐时，身为直鲁联军

总司令的奉系将领张宗昌，杀害了西北军将领郑金声，其侄郑继成为了报杀叔之仇，便在济南车站将已经下野的张宗昌击毙。

孙传芳长叹一声，半晌说不出话来。当初他当五省“联帅”的当儿，与张宗昌一会儿好了，一会儿恼了，才结金兰之好，转眼又兵戎相见。原是军阀之间出于各自的利害考虑，本无交情可言。所以，张宗昌的死，对于孙传芳来说并不是什么噩耗。令他心惊胆战的是：张宗昌的被刺，乃是由于郑继成的复仇。他孙传芳戎马半生，杀人如麻，结冤可谓多矣。如果有人效法郑继成，他就是第二个张宗昌了！想到这里，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从此，孙传芳又多了一块心病。睡梦里，醒来时，他头脑里总是浮现出当年一幕幕杀人的场面：由闽入浙，纵师奸淫劫掠；龙潭败绩，溃兵沿途烧杀……尤其清晰的是这样一幅血淋淋的画面：1925年10月初，野心勃勃的孙传芳企图扩大地盘，率兵北犯，与山东督办张宗昌的前敌总指挥施从滨部大战于皖北一带。施从滨由于孤军深入，后援不继，在皖北固镇为孙部包围俘虏，解往蚌埠孙传芳联军的总司令部。时值深夜，孙传芳正斜卧在烟榻上，俘虏进来的时候，向他行了个军礼，他身子动都没动一下，只是从青烟缭绕中往下瞥了一眼：那是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着上将军服，挺胸直立着。直待身边的大烟泡全变成烟雾，孙传芳才伸了伸懒腰，慢腾腾地转过身来。

“施老，施老，我几次三番致电与你，并派人与你联络，要你同我合作，你为何理也不理？莫不是想当安徽督办吧？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好吧，你这就上任去吧。”

孙传芳说完，当即决定将施从滨斩决。倒是在他身边出谋划策的杨文悄劝了他一句：“我们打内战，对待俘虏不宜杀戮，不如押送南京监禁。”孙不听，还是命李宝璋在蚌埠车站南边的旷野将施斩决，且割头示众，暴尸多日……

按理说，往事如烟，当年得势时如儿戏一般的不经意之事，在孙传芳的记忆中似乎早已消逝了。如今，张宗昌被刺的消息，却把记忆的堆积层一下子掀翻开来，埋藏在记忆深处的印象活化了，如此鲜明生动，却又变幻无常：呵，那无头死尸从地上跳起来了，一步步逼近烟榻，对他狞笑，向他索命。蓦地，又化作举着手枪的青年男子，那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他，高喊“为父报仇”……孙传芳差点叫出声来，他竭力睁开眼睛，方知刚才的一切全是幻觉，那黑洞洞的枪口，不过是烟榻上大烟枪的枪嘴。

孙传芳心中的余悸未消，额上的冷汗犹在，猛然间又想起一件往事，他早就听说，施从滨被他斩首之后，施的遗孀便将全家迁居天津，就是说，此刻正跟他同住在这个海滨城市呢。那么，施家的子女中会不会出一个郑继成？这可怕的念头苦苦纠缠着他，搅得他的灵魂不得片刻的安宁。

虔诚教徒得意时愈是姿意妄为，失意时愈是心虚胆怯。孙传芳在精神折磨中打发着时光。

“馨远兄，看你神情恍惚，气色不佳，想是贵体欠安，或是心绪不宁吧？”孙传芳与段祺瑞政府时的内阁总理靳云鹏邂逅相逢，靳云鹏问道。

孙传芳见说着他的心病，不禁长叹一声。靳云鹏见此模样，已猜着八九，接着劝道：“我们下野之人，只图个精神快乐，心境平和，别的还求什么？你也跟我一样，皈依佛门，专心忏悔吧。”

孙传芳这才注意到，眼前这位曾经显赫一时的内阁总理，如今竟身着青色道袍，一副出家人模样，便忙问道：“念经诵佛，有灵验不？”

“看你要什么灵验。佛门之人，与世相忘。非分之福难求，无形之祸可避，贵在心诚而已。”

仿佛是得到仙人指点迷途，仿佛是求得医治不治之症的灵丹妙药，孙传芳决意从此一心向佛了。1934年4月1日，他与靳云鹏合力出资，在天津市南马路草厂庵办了一座居士林。靳云鹏任林长，孙传芳任理事长，法号智圆。每星期三、六都请和尚聚众讲经，孙届期必至，并且常常带着家眷前来。听经的时候，他在太师椅上闭目晃头，那模样十分虔诚。此外，他在家作功夫更勤。每日必3次拜佛，每次必行大拜24拜。可谓手不释经卷，口不离诵佛。孙传芳本来就机敏过人，几个月的木鱼敲下来，那金刚经、大悲咒什么的，也就能记住十之五六，还好几次到法租界仁昌广播电台在无线电里讲经呢。

寒来暑往，秋去冬来，日历翻到公元1935年11月13日这一天。午后，孙传芳刚过了烟瘾，又点起了茄南香。只见那香烟缭绕，绕成一个小圈儿，慢慢大，慢慢往上绕，一直绕到屋顶上去。孙传芳目送着烟圈儿升腾，心头忽然涌起了一种近几年来少有的宁静之感。

电话铃响了。原来是居士林的富明和尚提醒他，今天是星期三，为居士林诵经之期，询问他能否按时前往。

妻子张氏望着外面凄风冷雨，劝他道：“今天你就别去了。只要心诚，在哪里诵佛都一样。”

“下点小雨就不去，怎见得你的心诚？佛祖是要怪罪的。”

于是，孙传芳迅捷地换上了去佛堂诵经的装束：外着黑海青道袍一件，腰束白布带，脚穿白洋袜、青缎鞋，钻进那辆深豆寇色的挂着蓝色车篷的汽车，向居上林驶去。

他看了看表：午后两点整。

复仇女神天津先后有两个佛教居士林，一个是洋行买办陈锡舟所创办，地点在英租界广东路，1932年陈病故后停办；另一个即靳云鹏与孙传芳所创办，地点在东南城角草厂庵。

孙传芳的汽车驶进城东南一个幽静去处，在一座粉墙包裹的院落前停住。院墙中间向阳两扇八字墙门，上面高挂一金字匾额，写着“草厂庵”3个字。孙传芳下了汽车，整顿衣冠，由院门进去。转西一条鹅卵石小径，两边竹林影映，甚觉清幽。行不多步，又进一重墙门，就是3间大殿，乃为居士林讲经的佛堂了。

大殿的佛龛前放了一张大供桌。讲经的和尚居中而坐，身后的几排条凳是女居士的座席，面对的台下则为男居士座席。供桌东西两侧各摆一把太师椅，一把是靳云鹏的座位，一把是孙传芳的座位。是日，孙传芳步入佛堂的时候，因为下雨的缘故，只有男女居士20余人，稀稀落落地坐在各自的条凳上。孙传芳象往常一样，不急不忙在自己座位上坐定。

孙传芳怎么也没有想到，在他身后的男女居士中，竟有施从滨的长女施谷兰。

施从滨共有子女5人。本来长女施谷兰随夫住在太原；幼女施纫兰远在山东济南齐鲁大学读书；长子施中凡在南京军队里做事；还有两个儿子在日本读书。住在天津的，只有施从滨的寡妻，孤老太婆一人而已。哪知施谷兰最近悄悄来到天津，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

10年前，当父亲被孙传芳杀害的噩耗传来时，年仅20岁的施谷兰悲痛欲绝，便决心报杀父之仇，还学着越王勾践的样子，每天临睡前，都要大声

质问自己：

“施谷兰，你知道不共戴天的仇人是谁吗？”

“施谷兰，杀父之仇你忘了吗？”

然而，她毕竟是一女子，弟妹们又年幼，只好把复仇希望寄托在叔兄施中诚身上。中诚早年丧父，由谷兰父母所教养，已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他曾在施从滨遗像前宣誓，坚决为伯父报仇。3年后他荣升烟台警备司令，重权在握，施谷兰满以为报仇之期已到，岂料她这位堂兄抵不住旧军队的腐蚀，一心沉湎于吃喝玩乐，早把复仇之事置诸脑后。对于堂妹的催促，他只是用这样一些话来搪塞，什么“大丈夫立世，当报效国家，服务社会，报仇时机未到，怎可轻抛生命”呀，什么“孙逆传芳，涂炭生灵，鱼肉百姓，恶贯满盈，定不得善终”呀。施谷兰从这些信中看到的，是通篇的虚伪和狡辩，她痛苦地发现，堂兄一直在欺骗自己，蒙混自己。悔恨之余，她写了一封长信责骂他“升官忘义，自食其言”。并表示：“父亲的血海深仇，没有你，他的女儿也照样能报，你等着看吧！”从此，23岁的施谷兰就与堂兄断绝了兄妹关系。

1928年旧历9月17日，是施从滨遇难三周年的忌日。面对父亲的灵牌，施谷兰只觉得无边的哀思撞击着她那就要破碎的心，不禁在后花园失声痛哭起来。哭着哭着，忽听有人在她身边呼唤“大小姐”。原来是一位身着戎装的青年军官施靖公。他是施中诚保定军校的同学，在阎锡山处当中校参谋，由山西赴济南工作，路过施家借住。见施谷兰哭得悲伤，便低声劝解道：“大小姐，对你和你的家庭的不幸，我十分同情，更愿意为大小姐尽一点心力。我是个军人，也读过圣贤诗书，所以对大小姐的为人和抱负，真是万分敬佩。我有决心扶助大小姐，给施老伯洗雪冤仇。大小姐若是信得着我，靖公可指天发誓……”谷兰听了他一番豪言壮语之后，又把报仇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断然决定同他结婚。

新婚之夜，小两口有这样一段对话：

“靖公，你说有决心为父报仇，可是君子之言？”

“当然！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凭着对你的爱，刀山火海我也要闯过去。”

婚后，谷兰带着幸福与希望，随丈夫来到太原。谁知由于时局的变化，施靖公升迁无望，情绪一落千丈，心灰意懒，抽烟，喝酒，赌钱，吃喝玩乐，夜半不归，复仇之事绝口不提，甚至不让谷兰提起。结婚与报仇，这两股扭结在一起的绳子，渐渐地松开了，两人各拉一股，距离越拉越大，不可避免的绝裂终于到来了。

一天，谷兰于苦闷之中，打开了平日最爱看的一本书《聊斋志异》，书中《商三官》的故事强烈地吸引了她。商三官是个16岁的少女，父亲被富豪打死，三官为报父仇，潜逃出家，女扮男装，混入戏班子，乘富豪生辰之日唱戏的机会，杀死了仇人，随即自缢身死。商三官也是一弱女之身，她能做到的事，我施谷兰为什么不能做到！婚后的7年，是被骗的7年，这种生活一天也不能拖延下去了。她思潮澎湃，奋笔疾书四行诗以明其志：

一再牺牲为父仇，年年不报使人愁；

痴心愿望求人助，结果仍须自出头。

在依赖别人报仇经历两度失败之后，施谷兰决定“自出头”了。她典当了陪嫁的金镯，买了回津的车票，带着两个孩子，决然离去。

冤家路窄当一个女人，为某种崇高的，或自以为崇高的目的所驱使的时候，其勇毅，其智慧，其果敢，其不达目的决不止息的执着，其牺牲精神，虽血性男儿，亦难以与其比拟。

1935年6月，施谷兰回到天津时，第一步任务就是要弄清孙传芳的下落。她曾听说过，孙传芳下野后隐居天津。但是否确实？住在哪里？这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于是，她开始大海捞针了。

她找来了近一年的报纸，一张一张仔细地读着，在报纸的每个角落里寻找她要找的名字。但报纸翻了一遍又一遍，丝毫不见孙传芳的踪影。

她跑遍天津市内的书店，常常买回一大包一大包过时的照片，但却一无所获。

有一次，在一个算卦的小摊上，她看到一张桌子的破玻璃板下压着10几张小照片，立刻发生强烈的兴趣。她请算命先生挪开玻璃板，把那些发黄的小照片拿了出来，翻看背面，都写着名字：吴佩孚、倪嗣冲、张勋……忽然，三个模模糊糊的字映入眼帘：孙传芳。谷兰连忙翻到正面，只见照片上是一个40来岁的军人，瘦长脸，高颧骨，细长眼，大嘴……这就是她踏破铁鞋要找的仇人！谷兰花高价把这张照片买下了。但是，仅凭这张数年前的照片，怎么能在成千上万的人群中把他辨认出来呢？施谷兰又茫然了。

她暮地想起，天津有名望的大人物大部住在租界区，他们的孩子都集中在几个学校里读书。她的大儿子大利曾上过租界的培才幼稚园，孙传芳会不会也有孩子在那里上学？她马上从儿子嘴里打听到，跟大利同班的，确有一个姓孙的女孩儿，叫孙家敏，并且老坐一辆小汽车来来去去的。这孙家敏会不会是孙传芳的女儿？施谷兰怀着一线希望来到培才幼稚园。

“老师，我是施大利的母亲。前年大利在这儿上学，结识了一个小朋友叫孙家敏。这次我们全家回天津，大利想去看看孙家敏，跟您打听打听，孙家敏家住在哪里？家长是谁？”

“您还不知道，孙家敏的父亲就是孙传芳呀！”值班老师不假思索地回答。又查出了地址，告诉谷兰：法租界32号路西头。

施谷兰迫不及待地赶到孙传芳的住处，一看，门前冷冷清清，大门上挂着“招租”的牌子。既是“招租”，房主人肯定迁往新居。糟糕，眼看抓到手的线索又要中断了！施谷兰灵机一动，便装做要租房子的样子，敲门进去，不到半小时，就从看房子的赵副官那里把情况打听清楚：原来，“孙大帅”在英租界20号路还有一处宅子，装修得相当高级，孙传芳现在就住在那边。

一不做，二不休，施谷兰又马不停蹄地赶到英租界20号路孙传芳的寓所。那是一座壁垒森严的高层大院。灰色的围墙上，布满了铁蒺藜拉成的电网。大铁门两旁直挺挺地立着两名荷枪实弹的卫兵。凡有客人和汽车进去，卫兵都要先查验证件，才开门放行。其戒备之森严，直如铜墙铁壁一般。

施谷兰不看犹可，一看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她原先曾打算混到孙家当佣人，或是家庭教师；或者在他门口缝缝破烂，摆个小摊之类，以图慢慢接近，这些打算全落空了。后来又打听到8月17日是孙的岳母80寿辰，想送点礼物混进去，又考虑到人多混杂，不易下手。

怎么办？怎么办？施谷兰在弄清了孙传芳的踪迹之后，又陷入了极度的焦急和苦闷之中。这时，她一边让她的弟弟则凡把母亲接到南京去住，一边寻求接近孙传芳的机会。

1935年阴历9月17日，是谷兰父亲遇难十周年的祭日。这天上午，谷兰备了些纸钱，独自去日租界观音寺为父亲烧纸念经。望着那跳跃不定的火苗，飘飘扬扬的纸灰，谷兰不由得想起10年前父亲被肢解的身体，想起仇人近在咫尺自己却无能为力。想起一则传闻说，孙传芳正在加紧活动，妄图做日本人卵翼下的“华北王”，家仇国恨，一齐涌上心头，不禁悲从中来，放声痛哭。主事的和尚怕这位妇人过于伤心，便走过来劝慰她。谷兰叹息道：

“烧纸念经不过尽子女的一点孝心罢了，其实不都是迷信吗？”

和尚不以为然地说：“善女有所不知，佛学如果是迷信，也不会延传一千多年呀。你再看，当今靳云鹏、孙传芳这些有名的人物，别看他们年轻时盛极一时，到了老年，不是也放下屠刀，皈依佛法了吗？”

听得“孙传芳”3个字，施谷兰即时止住了泪，同老和尚攀谈起来，把孙传芳如何崇佛、如何讲经之事，了解个详详细细。连当天晚上，孙传芳要在电台讲经的消息她也预先知道了。当晚，她特地到法租界仁昌广播电台去等候，果然在那里看到了那辆深豆蔻色的汽车和由卫士陪同的孙传芳，她清清楚楚地和仇人打了个照面。

第二天下午，施谷兰就赶到了居士林。接待她的是一位姓张的女士，听说施谷兰愿意听经诵佛，离苦得乐，张居士高兴地说：“来此入林的居士，已有3千多人。男子入林，需有人介绍，女子入林，登记填表就行。”说着，拿出一张登记表来。谷兰提起笔，填上“董慧”2字，递到张居士手中，还领到一枚林友的证章。

入夜，万籁俱寂，施谷兰凭窗而立，听着小儿子甜美的鼾声，仰望太空银盘似的明月，一联五言对偶句跃现脑际：

“翘首望明月，拔剑向青天！”

“从今而后，谷兰易名为剑翘了，让我手把利剑杀向仇人吧！”

血溅佛堂 1935年11月13日晨，施剑翘打开窗户，一阵秋风卷着秋雨扑面而来。

这样的天气，孙传芳会到居士林来吗？

10年磨一剑，霜刃今日试呵！今天，是她几天前在南京与则凡弟商定行事的日子。几天来，她全力以赴地做着各种准备工作：刻印传单，准备在刺杀现场散发；写下遗书，以备万一在现场被打死对后事有所安排；按时去居士林听经，以选择开枪的最佳角度；昨天，她还抽空到照像馆留了个影，准备给家人留下最后的纪念……诸事齐备，不期碰着雨天，万一孙传芳不来怎么办？施剑翘的心绪比那纷乱的雨丝更加纷乱。

然而，施剑翘早非那种不谙世事的女子了。她懂得，在这样的时刻怎样使自己的心情镇定下来。她寻思一切，看看有什么准备不周的地方，眼光又不由地落在书桌上的那把勃朗宁手枪上。

施剑翘虽军门之女，但至今从未开过一枪。只是父亲在日，曾将手枪的各种零件及性能告诉过她。后来她立志报仇，曾经为得不到一支手枪而苦恼过。事有凑巧，则凡的同学朱其平去年路过天津时，将他在南京军政部买的一支崭新的勃朗宁手枪和两盒子弹寄放在施家。剑翘得此如获至宝，即用它来作为刺杀仇人的利器。然而，她毕竟是一颗子弹没打过呵，对此，她的弟弟十分担心。

“大姐，平时一定要关上保险，才能保证安全。但使用时，您千万不要忘记打开保险再扣扳机。不然的话，枪可就不响了。”弟弟再三叮嘱。

“你放心，枪要是不响，我就用这枪把子砸烂孙传芳的脑袋！”

多少次呵，每当室内无人的时候，她关起门来摆弄那支手枪：在弹夹里压上6粒子弹，把子弹推上膛，关上保险，做了个瞄准射击的动作，然后退出子弹，卸下弹夹。这套程序她已训练得相当熟练了。

但是，她没有条件哪怕作一次实弹射击的训练，此举能否成功，她实在没有绝对把握。想到这里，她拿起那把手枪，准备作最后一次训练：举起，瞄准，放下……

午后，雨仍然滴滴嗒嗒下个不停。不管怎么说，还是得先去看看情况。她把手枪在家里藏好，打了一把伞，向居士林走去。进了殿门，一眼望见孙传芳的位子果然空着，心中暗暗叫苦，只得随便找个位子坐下听经。

约摸过了10分钟，大殿的门悄悄打开了。一个工友匆匆忙忙进来在孙传芳的座椅上放了一本经书。紧跟着，一件黑海青道袍出现在施剑翘的面前。不错，是他，他来了。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可是，天哪，手枪没带。改天再说？不行。今天下雨人少，不至误伤别人。再说与弟弟约好今日动手，怎可惜过眼前良机？

想到这里，施剑翘当机立断，悄悄溜出了大殿，招呼了一辆出租汽车，旋风般地回到家里。她箭步冲出卧室，披上大衣，藏好手枪和传单，返身就往外跑。其时，6岁的大利正在吃面包，保姆正在喂不到两岁的小儿子吃饭。孩子们见娘刚回来就走，赶忙从后面追上来喊：“娘——娘——”

她狠了狠心，强咽下涌进眼眶的泪水，头也不回，上车就回到居士林，一眼又捉住了那件黑海青。她的手猛地插进藏有手枪的暗兜里，心“怦怦”直跳，两腿直哆嗦，脸也变了颜色。霎那间，她猛然醒悟到，这样的精神状态对于她是多么危险！她捏紧拳头，咬紧牙关，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缓步走到先前的座位上，冷静地环顾四周，觉得现在的位子离孙传芳还稍远些，但在那安静的场合，突然地站起走动又会惹人注目，便灵机一动，故意提高声音对身边的张居士说：

“后面的炉火太旺，烤得我难受。”

张居士随口答道：“你不会坐到前一排去吗？”

施剑翘答应一声“好”，上前一步，就到了孙传芳的右后方。

正在摇头晃脑地听经的孙传芳尚未察觉情况异常，枪声就响了。

孙传芳应声仆倒在太师椅的右扶手上。

“砰，砰”，又是两枪。

孙脑浆迸裂，血染经卷。

施剑翘乘势掏出早已准备好的传单，哗啦一下抛到半空，又纷纷飘落在被枪声惊得呆若木鸡的人群中。

突然，不知是谁尖叫一声，提醒了尚未反应过来的人群。刹那间，呼喊声，哭叫声乱成一团，人们拚命地互相推着、挤着，夺路而去。

“大家不要害怕，我是施剑翘，为父报仇，打死孙传芳，一人做事一人当，决不牵连任何人，你们可以带着我到警察局去自首！”剑翘大声呼喊。

骚乱的人群，哪里听得见她的话，片刻间，大殿里和庭院内就走得空空荡荡，只剩下她和那个仆倒在太师椅上的仇人。

寂静。死一般的寂静。只有那点点滴滴的细雨，洒落在殿前空地的传单上，发出如泣如诉的低声絮语，仿佛是上天代一个女子渲泄她的心声。

“凶手”遇赦孙传芳佛堂毙命的次日，天津《大公报》以特大字体在醒

目地位，刊出孙传芳的“讣闻”：“……孙公馨远于国历十一月十三日下午四时在天津英租界二十号路寓邸病故。择于十四日午后四时大殓……”明明是被刺身死，却说是“寓邸病故”，一时传为笑柄。治丧期间，何应钦、曹汝霖一班新旧权贵或则踵门叩灵，或则电函吊唁，还举行了颇具规模的记者招待会，可谓“身后哀荣”了。然而热闹几天之后，便永远为世人所忘却。

倒是“凶手”施剑翘的命运，却长久地牵动着千万人的心。

当天事成之后，施剑翘坦然自首。她对前来的两个警察说，孙传芳是她打死的。并掏出手枪和剩余的3颗子弹交给警察。两名警察押着她来到警察局，第3天转到法院。天津地方法院判处施剑翘有期徒刑10年。施提出上诉。河北省高等法院于同年12月28日复审，重要证人王化南等因初审时讲了关于施剑翘主动自首的实话，复审时都不让出庭。施剑翘在法庭上把法官痛斥了一顿。有家报纸次日报道说：“施（剑翘）对此颇多牢骚，谓凡有力的证人俱离津不知下落，孙家有钱有势，其情可疑。”河北省高等法院于1936年2月6日再次开庭，不得不把证人之一的王化南传到。21日，河北高等法院宣布撤销原判决，处施剑翘有期徒刑7年。施剑翘对二审判决不服，向南京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而孙传芳之子孙家震则对二审减刑表示不满，要求检察官提出上诉。最高法庭驳回施剑翘上诉，维持河北高等法院原判。

法院判决一公布，全国舆论界顿时大哗。各界人士声援施剑翘、抨击法院的文章陆续见报，造成强大声势。与此同时，各地报纸连续登载了声讨孙传芳的文章：《孙传芳生前无恶不作》、《孙传芳死有应得》……

强大的舆论潮流，惊动了当时正住在南京中山陵的冯玉祥老将军。他从报上读到孙传芳被刺的消息，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后来陆续从报上了解到，剑翘竟是那样一位非凡的女子，而且又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判决，不禁拍案而起：此女不赦，公理何存！便联络了李烈钧、张继等几位国民党元老公开上书请求特赦。并亲笔致函河北高等法院院长邓哲熙，请他设法营救。

1936年10月15日清晨，法院的一位芮科长匆匆走进牢房，满面春风地告诉剑翘：

“恭喜你，你已经得到国家的特赦啦！法院方面已接到南京的命令。”

这突如其来的喜讯使施剑翘泪如泉涌。为期344天的牢狱生活结束了。她一步跨出牢门，奔向那自由的天地。

附记后施剑翘在徐特立、周恩来、邓颖超等人的指引下，奔向了革命的前程。全国解放后，她被选为苏州市妇联副主席、市人民代表。1952年，施剑翘因病移居北京。1957年，她被补选为政协北京市委员会特邀委员。1979年病逝。

吴雨（第163页图为施剑翘照片，第164页图为孙传芳照片）

杨永泰之死

公元 1936 年 10 月底，萧瑟秋风将一条爆炸性新闻从武汉迅速传遍国中：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曾经炙手可热、担任过蒋介石武汉—南昌行营秘书长的“新政学系”头子杨永泰，被两名不明身份的刺客暗杀于江汉关码头。消息传来，国民党政界即引发一场极大的骚动，各种猜疑争相鹊起，可谓纷纷扰扰而又沸沸扬扬，搅得不少头面人物一时坐卧不宁，惊恐莫名。而远在大洋彼岸的东京方面竟也大凑热闹而频传唁电，且在长达近一年的时间里，不断向蒋介石表示对此事的震怒和关注之意，甚至非要向其讨出一个明确说法不可。据说杨永泰于 10 月 25 日下午 5 时在江汉关码头遭伏击而临终之前，曾费力地说过这么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我早就知道必然有今天……只是身已许国，为国而死，又有什么可恨的呢？……只可惜我志向没有实现，国祸却正长着哩！”说完，便遽然合上双眼，撒手归天了。

杨永泰此语从何谈起呢？他究竟算是何种角色？又和谁结下了如此深仇大怨？暗杀者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势力呢？半个世纪以来，政治家们和历史学家们一直众说纷纭，各执一端。或说杨永泰是被共产党处决的，或说是被“CC”系暗杀的，或说是被蓝衣社谋害的，或说是被刘庐隐指使刺客了结的，或说是被一个叫做“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的爱国秘密组织镇压的……而欲解此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大奇谜，还须得从杨永泰的为人处事及政治立场入手探析才是。

“卧龙”出山杨永泰，字畅卿，广东茂名人，1880 年生，先后毕业于广东高等学堂与北京法政专门学校。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任临时众议院议员，并参加国民党。1914 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张耀曾、谷钟秀、李根源等国民党右翼则以研究欧事为名另组欧事研究会，后改名政学会，同孙中山分道扬镳。杨永泰时为政学会成员。1917 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杨永泰又追随张耀曾等来到广东，同滇桂军阀相勾结，对孙中山动辄掣肘，称为政学系。这时，杨永泰靠着同政学系首领岑春煊（1918 年 7 月排挤孙中山后任护法军政府总裁主席）及桂系军阀的关系，先后出任军政府财政厅厅长与广东省长等要职。1921 年桂系军阀在广东的统治垮台后，杨永泰遂逃往上海赋闲。1927 年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南京建立起国民政府，气势日炽。杨永泰则经过多年的韬光晦迹，选定了蒋介石作为新靠山。于是，他在上海南京东路东亚酒店包租了一组三套头的房间（包括卧室、会客室、浴室各一间），招待来自南京的达官贵人，一切吃喝玩乐均由他供应。其中，尤其是对国民政府的交通部长王伯群招待甚殷。王伯群每来沪上，多被杨永泰接至东亚酒店供养，酒肉女色，一应俱全。这样，大致在 1929 年，杨永泰终于当上了交通部“顾问”。接着，他又抓紧研究蒋介石的思想作风及其生活习惯，经常向王伯群、李仲公（时任交通部次长）等打听蒋介石的“起居注”。蒋对王阳明的学说颇有兴趣，又喜好曾国藩的家书。杨永泰闻知便将《王阳明集》与《曾文正公全集》买回来细细捧读，揣摩不辍……

1930 年秋，杨永泰经张群、熊式辉引见，得以晋见蒋介石，一经交谈，蒋氏大喜过望，以为杨是当今“卧龙先生”，当即委派他为鄂豫皖三省“剿总”参议，并让他随行到汉口“参赞戎机”。

由于杨永泰熟悉中国近数十年官僚政治的“暗盘”与“底帐”，且能“善体圣意”，将蒋介石的政治心理揣摩得八九不离十，他“向蒋条陈时事意见，往往‘报可’”。很讨蒋介石欢心，很快就由“剿总”参议兼秘书擢升为秘书长（1932年），随侍蒋介石左右，成为蒋介石在“十年内战”中的重要帮手。

杨永泰政治生涯中最为得意的“绝好文章”（周佛海语）乃是1932年他的那份上蒋介石“万言书”。其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红色政权。分布在鄂豫皖湘赣五省边界，成了蒋介石的心腹之患。蒋介石坐镇武汉正准备组织第四次“围剿”而心里无底。杨永泰则抓住时机，在这份“万言书”里提出将与革命根据地接壤的区域划为五省“剿匪总部”直辖的军事区域，建议在这些区域内建立行政督察专员的制度，不受各该省政府节制。“万言书”还提议在五省试行保甲制度、保安制度，建立地方民团，并逐步推向全国。“万言书”的核心是阐述“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提出“硬干、实干、快干”的“平匪”“三干政策”以及“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共政治纲领。很快，蒋介石就采纳了杨永泰的主张，把南昌行营简化为两个厅（原来为七个厅），这就是以参谋长贺国光兼任厅长的军事厅（第一厅）和以秘书长杨永泰兼任厅长的政治厅（第二厅）。当时即有人恶作剧地将第一厅称为“三分厅”，叫第二厅为“七分厅”。

“万言书”因此成为蒋介石在“十年内战”期间反共反红军的政治—军事理论核心与基本策略。原“新政学系”骨干成员、南昌行营第二厅第一组组长王又庸称：杨永泰的“政治剿匪论”“对蒋介石第五次‘围剿’方略上的某些转变，起了一定的作用。”而1934年中共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除了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指挥外，从蒋介石这方面来说，则是由于采用了杨永泰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论以及“新政学系”另一骨干分子柳维垣提出的“碉堡推进”政策，“使国民党军队能够比较适合于同红军作战”。

俨然“行政院总理”

杨永泰的“万言书”也应看做是当时所谓“新政学系”的政治宣言和根本大纲。据当事者王又庸及冯若飞、张潜华等回忆，“新政学系”从未正式成立过，也无正规组织，只是大约在1932年或1933年，因为蒋介石突然下了一道解散党内一切小组织的命令，“CC”系首脑陈果夫为了打击杨永泰和熊式辉等势力，于是便出来揭发他俩以原旧政学会成员为骨干，“搞了一个小组织”，这样，“新政学系”作为一个派系的名称才得以第一次出现于国民党内及当时中国政坛。但是，王又庸承认：因为“杨永泰是政学会成员；南昌行营第二厅第二组组长文群和第一组副组长李为伦也都是政学会成员；还有第一组组长王又庸则是政学会成员王有兰的胞弟；而杨永泰的主任秘书卢铸又是政学会首脑李根源关系极深的旧部。这批人物，相当长久而固定地集结在杨永泰和熊式辉手下做官，逐渐成为臭味相投、声气相通、互相关怀、休戚与共的一个反动的官僚集团，这是客观的存在，无可否认……根据它的代表人物的历史面貌，称之为‘新政学系’，或单称‘政学系’，都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据王又庸回忆，直至1936年秋杨永泰被暗杀于汉口、珞珈山大出殡之日，“新政学系”的基本成员大致有40人左右。在这之前，杨永泰和熊式辉及后台支持者张群，“被称为新政学系的三巨头”。冯若飞还具体指出了“新

政学系三巨头”之下的一些骨干分子的名单，其中有黄郛、吴铁城、黄绍竑、陈仪、沈鸿烈、翁文灏、吴鼎昌、张嘉璈、魏道明、蒋廷黻、何廉、文群、王又庸、李文纶等人。在整个三四十年代，“新政学系”在国民党内都是足以与“CC”系（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黄埔系（以黄埔军人出身者组成）、元老派（以李石曾、张静江为头目）、英美派（以王宠惠、顾维钧为代表）以及太子派（以孙科为首）等相抗衡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大派系。张潜华甚至回忆说：“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政学系的政治比重，远远超过‘CC’系和复兴社各派系之上。”

1933—1935年，在南昌行营期间，蒋介石还听从杨永泰建议，将南京行政院的大部分职权划归到南昌行营行使。其时国民党统治势力仅能达到的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陕西10个省的用人行政都直接听命于南昌行营，而南昌行营第二厅则俨然成了国民政府实际上的行政院，作为南昌行营第二厅的厅长杨永泰当然便是事实上的行政院“总理”了，这叫“CC”系等其他派别的头领们如何咽得下这口气？

杨永泰30年代的旧友陶菊隐曾在《我所知道的张季鸾和杨永泰》一文里回忆当时杨永泰得宠时的情形说：

同年（指1933年），我由南京回长沙扫墓，便道到南昌去看他（指杨永泰）。当我到行营二楼秘书长室时，看见对面一间就是委员长（1932年，蒋介石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室；同时得悉，在行营内，秘书长的名次仅居委员长之下，而居参谋长之上。像这种排列法，在军事机关中是无前例的。因此可以说，这时蒋对杨是信任有加，几乎达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另据有关资料介绍，杨永泰在南昌行营期间，甚至还将床铺也搬到了蒋介石卧室门口，蒋介石睡里屋，他睡外室。蒋介石常睡中起身，绕室而行；杨永泰则随时半睡半醒，侧耳细听，一闻隔壁有动静，即忙不迭推门而入，问长问短，与蒋介石分享忧乐。那蒋介石也乐得向他倾吐衷曲，将党政军大事甚至于家庭、家族琐事咨询于他。这杨永泰则善于察言观色，每每提出中肯的建议或意见去为蒋介石排忧解难。

杨永泰还有一个特长，即是处理公文的快刀手。在杨永泰未来之前，蒋介石颇不放心他人而事必躬亲；无奈每日里从国内外飞来的急电要件如雪片一般积落如山，弄得蒋介石晕头转向，连呼“总司令”这碗饭不好吃。幸而杨永泰及时来到蒋介石身边，这才将他从繁冗忙碌中解救出来。杨永泰阅读公文具有一目十行及过目不忘的能力。他能在每日送到案头的数十、数百件长短不一的公文中择其要者用数十或百把字另纸概述一遍，使其言简意赅，一目了然。然后，又在上面有针对性地拟出上、中、下三种解决对策，连同原文，一并及时送至蒋介石手中，让他再作选择。他提供的对策，可以说从没有使蒋介石不满意的。由此一来，杨永泰便俨然成了蒋介石身边的首席军机大臣，而使众文臣武将特别是“CC”系头目陈果夫、陈立夫妒忌死了。

同“享”“亲日派”骂名众所周知，在30年代的中国政坛上，“CC”系陈果夫、陈立夫同宋子文、孔祥熙等一样，在政治上都是著名的亲英美派，尤其是1933年5月日本胁迫中国政府签订《塘沽协定》，对美英在华利益构成直接威胁后。可是，以杨永泰、张群、黄郛等为首的“新政学系”则是著名的亲日派，时与汪精卫、何应钦、唐有王一样，在社会上“享有”同样骂名，这自然会在政治上与“CC”系发生根本冲突。当时在老百姓中间即传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给张学良所下的“不抵抗”命令，就是

杨永泰出的主意。另据王又庸回忆，1934年二三月间，杨永泰在南昌行营召开的一次十省高级行政人员会议上，就曾公然指出：“有人责问政府为什么对日本不抵抗？这问题很简单——抵抗要有力量。拿鸡蛋碰石头，不是抵抗是自杀。”

由此可以看出，杨永泰的亲日与“CC”系等的亲美英，是二者水火不容的一个基本点。因而杨永泰也随时被置于“CC”系及复兴社等庞大而严密的特务网的监视之下。迄杨永泰1935年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二陈还派他们的得力干将、国民党组织部调查科科长徐恩曾跟踪到武汉，日夜监视杨永泰的举动。就在杨永泰遇刺前几天，蒋介石还收到二陈拦截的日本汉口领事馆拍回国内的电报。电文说，他们宴请了杨永泰，杨在席间表示，日本在中国的一切事情，他可以完全负责。据说蒋介石看完电报后，只是冷冷他说了一句：“知道了！”并未作进一步的反应。大致蒋介石对杨永泰与二陈之间的争风吃醋已经厌倦，并未将这电报当真；或者是当时尚须对日委屈求全，而且连他自己也在窥测风向，因而对一切亲日派的活动，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也正是由于杨永泰同汪精卫、黄郛、张群、唐有王一样，是著名的亲日派，所以当他于1936年秋被暗杀于湖北省主席任上时，便立时有舆论怀疑系共产党所为。不过此种说法就连蒋介石也不信，因为审视过去以来所发生的国民党诸多大员遇刺事件，并没有哪一桩系共产党所为。以后，有人提出系当时一个名叫“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的爱国秘密组织所为。又有人据此线索提出乃复兴社所为。因为“除奸团”首领陈有光先前参加过复兴社的外围组织“中华革命青年同志会”和“西南复兴社”。不过，世间一般舆论则大多推测为“CC”系所为。因为“新政学系”是“CC”系的第一大政敌。他们彼此之间的斗争曾闹到剑拔弯张而近白热化的地步。

“CC”系发动“护党运动”

据刘不同在《国民党的魔影——“CC”团》一文里的回忆，“CC”系同“新政学系”都有针对对方的斗争口号，前者是“融政于党”，后者是“融党于军政”。

1932年，当蒋介石在汉口组织“鄂豫皖三省剿匪总部”之际，时任秘书长的杨永泰借机大肆强调集中党、政、军力量于“剿匪总部”，刘不同说，这“实际上是集中于以他为首的一伙人的集团手中”。杨永泰通过“剿匪总部”把鄂、豫、皖等省、市国民党组织予以变更，在省、市党部设主任委员，由该地军政大员兼任。在河南，杨永泰让河南绥靖主任刘峙兼任河南省党部主任委员。主任委员之下设书记长，书记长多系主任委员私人。原来的执行委员与监察委员则一并被送进冷宫。杨永泰还在各县设书记长，同样把原来的执行委员与监察委员送走。不论省或县都由书记长负全责，工作报告径送到“剿匪总部”党政处。经费也减少，并由“剿匪总部”发给。从此这些省份的国民党省、市组织便由“CC”手中转到“新政学系”手中，而且其政治地位也一落千丈，成为当地军政头子的附庸。实际上省各级党部已变成为无香火的土地庙，书记长不过是守破庙的道士罢了。对此打击，当时“CC”系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为杨永泰的这种偷天换日之计，乃是以蒋介石名义实行之，并由蒋介石命令国民党中常会追认为合法办法。不过，二陈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随即想出“融政于党”的办法来抵抗。陈氏兄弟借词“政治部门我们无人”为理由，从纵到横、由上到下，从横到纵，由下到上

地设法把他们认为“CC”的骨干打进行政部门和教育部门；暗中发动部属们掀起所谓“护党运动”，实际就是护“CC”集团运动，叫各级党部向国民党中常会告状，称政学系正在进行毁党的活动。张道藩、余并塘、张厉生等人又奔走于张继、邹鲁这些所谓元老之门，求他们向蒋介石泣求，把党还给“CC”。他们经过许多曲折的斗争，总算获得胜利，把三省党部的领导权夺回手了。不过，其组织则仍维持杨永泰时的原貌，并且还推行到其他省、市，都一律改为书记长负责制。因此此次斗争，“CC”系从大体上讲，政治地位已大大削弱，锐气大减，同时对蒋介石亦起了离心。“CC”分子每提起此事，不仅痛恨杨永泰、张群辈的政学系分子，且对蒋介石也不满。张道藩曾对刘不同言：“我现在才明白狡兔死，走狗烹的滋味。”

刘不同还回忆说，1932年冬，他有一次和胡汉民谈话，胡曾这样讲：“杨永泰是政学系的首脑，和国民党势不两立。总理在世时受他们的气很大。今天蒋介石把他引为亲信，简直是认贼作父。对付共产党，他们还不如我们呢！寻求外国援助，他们也不如我们有门路。可是蒋介石就喜欢这些谗佞之徒。”1933年1月间，陈果夫、陈立夫、张道藩和刘不同共话“新政学系”时，他们三人的说法与胡的说法也很一致。

“秉公”调查南昌机场失火案 1933年夏，发生了南昌机场失火案，这起案件的调查结果，不啻为已日趋激烈的CC同“新政学系”的斗争火上浇油。南昌机场的这场大火，将国内数一数二的一个大机场及多架飞机烧个精光。时国内抗战呼声日高。而蒋介石则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军事“围剿”，亟需军火后援的输进、供应。可是却屋漏偏遭连夜雨。蒋介石大为光火，他叫来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时任行营调查科科长邓文仪，吩咐一定要将飞机场失火案调查个水落石出。邓文仪首先调查的对象当然是航空署署长徐培根了。但这徐培根却是陈果夫、陈立夫的最受宠爱的亲信。而邓文仪也跟二陈打得火热，同徐培根也是称兄道弟的“哥俩好”。再者，对邓文仪的调查科若硬要排队划线的话，也是该归入二陈的“CC”系统的，所以，可以想见，这调查便自然是虚应故事了。邓文仪到徐培根的办公室去走了一遭后，回来便向蒋介石报告：“飞机场失火的原因已经查清，那是因为飞机汽油太多，有的储藏便疏于不周，结果因天热蒸发而引起大火。”

如此拙劣的搪塞怎能使蒋介石释疑？尔后便又叫来杨永泰，要他再去查个水落石出；而这杨永泰却趁机推荐复兴社特务处长戴笠一同前往。这杨永泰何以要推举戴笠？因为戴笠同邓文仪同属“十三太保”，但资历却比邓浅。邓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1927年初又先后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科长、副主任、代理主任；翌年即开始担任蒋介石的侍从参谋、侍从书记；并曾任国防部新闻局长，其主要工作就有情报特务一项。戴却是黄埔军校六期毕业，1928年始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联络参谋，开始搞情报工作。

1930年戴笠创立调查通讯小组（又称十人团）后，即将邓文仪分管的那部分情报特务工作连同邓文仪的这部分人马都吞并过去。这就使得邓文仪对如日中天的戴笠更加怀恨在心，不时在特务圈内、圈外以老大身份使坏，力图遏制戴笠进一步上升的势头。这些，戴笠也是暗记在心而伺机反击，且要一举制之死地而后快的，只是苦于一时尚未有一个堂堂正正的借口而已。

南昌机场失火案，使戴笠终于获得了一次打击邓文仪的机会，也使戴笠与杨永泰暂时形成了一条“统一战线”。两人这次当然是“秉公”办理而铁面无私的。调查的结果，果然如外面谣传的一样：徐培根将机场公款挪用了

近 300 万元去交易所套购黄金搞投机，不料运气不佳，不断亏本。看看挪用款项是难以归还了，于是便在一个褥暑难挨之夜，支开了德国技术顾问及机场有关人员，从从容容地放起大火来，把当时国内数一数二的南昌机场烧了个片甲不留，以便来一个“死无对证”。这徐培根的技法本属“小儿科”，被前往调查的邓文仪一揭就穿。但是，因为两个本是一条绳子上拴着的蚂蚱，加之徐培根苦苦哀求，又塞给邓文仪 8 万块钱，因而邓文仪便替徐培根在蒋介石面前遮挡。

不过徐培根未料到过了神煞关还有鬼门关，而且是连邓文仪也一齐捎带了进去。邓、徐二人做的手脚哪经得戴笠“十人团”的调查？也就是一两天后，杨永泰、戴笠将徐培根纵火销赃及邓文仪受贿欺君内幕向着“老头子”一一揭出。蒋介石嚷嚷着要枪毙邓文仪与徐培根。幸得二陈及“十三太保”中的其他人死死相谏，这才保住了二人之命。徐培根被撤职丢入大牢，直至一年多后才释放出来。邓文仪则丢掉调查科长的乌纱帽，原先拟议中的南昌市长一职也化为乌有。那调查科长的职务以及全部人马自然也就并入戴笠名下。杨永泰与戴笠的这次联合行动，狠狠地挖了二陈的一次墙脚；以后戴笠以此为基础发展成“军统”，成为与二陈“中统”（即“CC”系）相颞抗的国民党的两大特务系统之一。

机关算局太聪明据王又庸在《关于“新政学系”》一文里的介绍，杨永泰的“新政学系”与“CC”系的最后一次重大交锋乃表现于 1935 年中央势力入川问题上。这年 1 月，蒋介石在杨永泰的建议下，搞了一个“军事委员会驻四川参谋团”，以南昌行营参谋长贺国光为主任，下设两处：第一处为军事处，以南昌行营高级参谋刘倚仁为处长；第二处为政治处，以南昌行营第二厅第一组组长王又庸为处长，副组长李为伦为副处长。同时，蒋介石还把驻湖北的两师“中央军”开进四川，在重庆设置了“委员长行营”，目的就是要实现杨永泰的计策。这样，四川维持 10 年的“防区制”终于得以打破。刘湘的省政府推进到成都，他的命令可以达到四川全省的各县了。刘湘实现了他的“四川王”的夙愿，但却引进了一个“太上皇”蒋介石。蒋介石势力入川后，即迅速在全川推行杨永泰设计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专员由重庆行营任命，其人选也大抵由杨永泰提出。1935 年 11 月，蒋介石更进一步要求刘湘局部改组四川省政府。当时刘湘政府的秘书长邓汉祥和财政厅长刘航琛已与杨永泰勾结很深，所谓改组就是要更换民政、教育和建设三厅的厅长。蒋介石授意刘湘以卢作孚为建设厅长。另由“CC”系介绍罗贡华为民政厅长、蒋志澄为教育厅长。卢作孚是四川人，又是蒋介石自己提出的，刘湘只得同意；但对罗、蒋二人则不愿接受，另请调王又庸为民政厅长、李为伦为教育厅长。刘湘这一手法，明显是拉拢政学系来抵抗“CC”团。可是杨永泰却故作姿态，向蒋介石建议，同意李为伦而不同意王又庸，理由是王又庸刚于四个月前（1935 年 7 月）调回江西省政府当民政厅长，不应更调频繁，蒋亦以为然，但刘湘则执意坚持非如此不可，蒋不得已，勉强同意。于是“新政学系”的骨干王又庸与李为伦、卢作孚均于 1936 年 1 月到成都接事。从此“CC”团与杨永泰的关系更趋恶化。

在陶菊隐的笔下，杨永泰是一个城府根深、工于心计而又纵横捭阖的大政客。他在前述《团结报》上的回忆录中还介绍了这么一件事情——

蒋、杨二人有一天在讨论各省“剿匪”形势之际，杨若有所思地说：“现值国家多事之秋，像刘经扶（即刘峙，时任湖南省主席）、夏灵炳（即夏斗

寅，时任湖北省主席）之流，岂足以当一省重任？”接着又说：“岳军（即张群，时任南昌行营总参议）长于吏治，何不让他一展所长！”当天，蒋就下了一个张、夏对调的手令。

1935年，张群内调为外交部长，由杨永泰继任湖北省主席。事后闻悉，杨在南昌虽然位高权大，总觉得与其寄人篱下，终不如独当一面。他早就有再当一省之长的野心，但又不便毛遂自荐。他之所以推张群为省主席，就是为自身预留地步，以便有朝一日由张群过渡交自己。……

1936年秋，杨永泰终于难逃一劫，暴毙于湖北省政府主席任上。对于杨永泰之死，社会各界颇多猜测，但其破案内情却一直未得其详。而据官方所言，乃系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长的刘庐隐所为。而这刘庐隐乃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手下的一员大将。那胡汉民则同老蒋势不两立，一再策动两广人员反蒋。所以有舆论认为关于杨永泰遇刺案的调查结果乃是蒋介石的一种嫁祸于人。

舟楫芳琳（第181页图为杨永泰照片）

李宗仁为何杀死心腹干将王公度

公元1937年9月14日，正当国民党新桂系即将北上抗日之时，李宗仁下令逮捕并枪决了自己的心腹干将、少将军官王公度，同时被杀的还有桂系南宁军校政训处副主任谢苍生、政治教官区渭文、中尉指导员韦干、教员陶保桓和崔真吾。其中陶为中共党员，崔是进步人士。一时搞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

王公度一案，历来众说纷坛，莫衷一是，特别是有关当事人更是说法不一，真伪难辨。1937年10月，广西省警察局长周炳南被部下问到时说，王公度是“一个大名鼎鼎的政客……搞托派活动，阴谋造反，所以老总（指李宗仁）下令秘密处决他。”李宗仁总部办公厅上校秘书谢天生认为：“王公度平日太专横独断，出风头太多，树敌太多，引起别人的嫉妒和憎恨，因而树大招风，最后招来杀身之祸。”1950年桂系特务头子梁学基在香港谈到，“王公度虽然在苏联留过学，但他并不是真正的托派，说他托派不过是一个烟幕弹。王公度之死实在是死在九叔（指黄旭初）手上。”程思远在《政坛回忆》里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

“王公度的问题，肯定是蒋介石对白崇禧提出的”，“似乎桂系炮制王公度案，中了南京政府的反间计了”，“王案的确是一桩错案。”1966年8月，程思远和刘仲容陪同李宗仁在北戴河海滨避暑，有一天，刘问李宗仁：“当年德公为什么杀王公度？”对此，李宗仁始终不吭一声。

李宗仁究竟为什么要杀掉为其效忠多年的干将王公度，王公度又是怎么引来杀身之祸的呢？

王公度，广西永福人。1920年广西法专毕业后寄居上海，通过同乡韦永成的介绍，与李宗仁的三弟李宗义认识（李妻是韦永成的姐姐），从此，二人过从甚密。1926年王与韦、李三人得到李宗仁的资助，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回国后，1930年春在桂系总部做秘书。据程思远回忆，王公度生得中等圆胖身材，配着一张蛋形的脸，带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沉默寡言，喜怒不形于色，是一个具有军师素质的典型人物。

1930年9月，桂系组织“革命同志会”，任命王公度为书记，程思远为助理书记；1932年桂系南宁军校复校后，王公度兼任军校政训处主任。他在军校学员中秘密组织读书会、同乡会等，等会员毕业后，把他们散布在桂系军队中和广西全省中等以上学校的军训队里，这样，会员随时向王公度报告机关及军队内部的一些情况，由他再向白崇禧密报。王的这些作法深得白的赏识和欢心。一次桂系两个军长廖磊和夏威的部队中出了问题，廖磊和夏威自己还不知道，白崇禧却早已知道了。当他们来见白的时候，有些事情被白崇禧问到，弄得他俩目瞪口呆。廖、夏军中也有些军官因王公度的活动有脱离军长掌握的危险，因此，后来廖、夏二人对王恨之入骨。

当年桂系势力鼎盛的时候，从广西至武汉直至京津唐，都有桂系的军队，可是在蒋桂战争、中原大战中桂系军队顷刻间不战而败，分崩瓦解，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蒋介石利用自己的特务组织收买、利诱了桂系将领。李、白虽有将兵之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军队，因此，李、白猛醒，始觉有建立秘密组织之必要，以控制内部，监视异己。恰于此时，王公度也建议搞特务组织，使军政骨干效忠领袖。李宗仁对此非常赞赏。

蒋介石将胡汉民软禁在汤山后，李宗仁曾派王公度前往广州商讨两广联

合反蒋事宜，其后王公度又分别在沪、港设置情报机构，收集南京方面的情报，供李、白参考。白崇禧为此特支大批款项供王使用，足见其对王的信任。王公度工作得很出色，军统要角王新衡曾说：“中央特工人员一直把他当作眼中钉，去之而后快！”

另外，王公度还延揽了很多留俄同学到南宁军校工作。其中谢苍生是政训处副主任，李一尘、曾希颖、陆一逊、张威遐、区渭文等担任政治教官。王公度以留俄同学为核心，吸收一批军校、广西师专的学生和部队的青年军官，参加他领导的秘密特务组织，广布党羽，培植私人势力，成为桂系内部一个派别——留俄派。无怪乎当时有人说：“广西是李、白的天下、王公度的党了！”

这时候的王公度一身兼任第四集团军总政治训练处处长，南宁军校政训处主任、广西省党部执委会常务委员、广西省府委员、党政研究所训育主任，同时还任广西童子军训练处教育长，集组织、党务、青训大权于一身，占据要津，显赫一时，甚至连省主席黄旭初也不放在眼里，使人感觉到王公度的重要性除李、白之外，无人可与比拟。由此也种下了他和黄旭初不共之仇的种子。

1933年下半年，白崇禧一次对程思远说：“王公度主管单位太多，他的精神兼顾不来。……你去对他说，他今后只能专做军校政治工作，将总部政训处长一职让给潘宜之担任。”这说明白深感王公度权力过大，会成尾大不掉之势，所以及早实行分权。

程思远把白的意见向王公度传达时，王面色大变，满头大汗，显然这事对他太突然了，事前没有精神准备，他听完脱口道：“我亲自去见白老总。”说着匆匆而去。第二天，王公度对程思远说：“我已经对白老总说清楚了，总政训处仍由我负责。”显然，他舍不得丢掉这块肥肉。事后证明，他犯了致命的错误，没有自知之明，贪得无厌。

1934年，李宗仁、白崇禧将“同志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实行分工制：以王公度为组织训练主任，黄旭初为政治委员会主任，潘宜之为宣传主任，邱昌渭为秘书部主任，陆续将王的职权分别派人替代。1935年王公度终于被迫辞去总政训处长职位，由潘宜之继任。1936年春，连他亲手创办起来的桂系特务工作，也被白崇禧宣布“交由蒋伯仑接替。”最后只留给他“同志会”组训主任和军校政训主任的职位。不言而喻，王公度失宠了，李、白对他的信任动摇了。

王公度的失势是桂系内部派系之间明争暗斗的结果。桂系外表看起来很团结，其实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按出身可分为元老派、实力派、少壮派、留俄派、外宾派等。由于王公度权倾一时，他很快成为“众矢之的”。桂系实力派人物廖磊、夏威，早年跟随李、白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军功，岂容一介书生王公度高居其上？且这个王公度把触角伸进军队，操纵军官，老虎屁股岂能摸得？桂军总参谋长李品仙与王公度的留俄派也是水火不相容。王公度以总政训处长职位，总揽全部特务机构与情报工作，遇事直接报告李、白，不通过总参谋长，把李品仙架空，有很多事常常是已办完了，或正在办理中，总参谋长尚未知之，这使李品仙深为不满。桂系第三号人物黄旭初也感觉到来自王公度的威胁。外宾派头目潘宜之、邱昌渭等，新来广西，没有适当补缺，需要向王公度开刀，把他兼职较多的职位夺过来。于是，他们常在李、白面前说王公度的坏话，攻击“王公度心胸狭隘、阻碍接纳各方人士”，“王

公度兼职过多、工作搞不好”、“王公度搞秘密小组，别有用心……”少壮派人物梁家奇还引白崇禧的话说：“白老总也说公度太狭隘了。”元老派如黄钟岳、王逊志、陈雄等人，也以王公度专权自用，目中无人，在派系争斗中不给王公度以支持。甚至留俄派内部如张威遐、李文钊、赵可任等，也攻击王公度狭隘，不给他们在李、白面前进言的机会，妨碍了他们担任较高职务，压制自己人。张威遐在留俄同学中，常发牢骚：“妈的！公度只给我们于一个少校，几时才到上校？我们连上海六君子都不如，人家一来就是上校！公度这样压制自己人，局面怎么打得开？！”

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上，王公度也常和黄旭初、潘宜之等人有明显分歧。早在1934年“革命尚志会”改组的时候，王公度与黄旭初、潘宜之对这个组织的《政治纲领》就有过争论。潘宜之、邱昌渭等认为：“我们组织起来是复兴中国国民党，恢复国民党的革命精神。国民党原有政纲，就是我们的政纲，毋须再有什么政治纲领。”王公度及其留俄派则宣称：“李、白组党是为了中国革命，完成倒蒋救国，建设新中国的大业，必须有自己的政治纲领，方足以昭大义于天下，否则与蒋介石搞糟了的南京国民党有什么分别，又怎么打垮蓝衣社的进攻？”并且提出了《政治纲领》草案，内容分中国社会性质、革命基础、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部分。经过多次较长时间的争论，尤其是“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基础”两部分尤不易解决。潘、邱两人批评王公度不过想作共产党的尾巴，主张《政治纲领》中不列入这两部分。当时王公度还主张《政治纲领》应公开，以资号召人心。潘、邱等人认为：“在西南政务委员会领导下的广西，怎好公开公布政治纲领，直接与蒋中央分庭抗礼呢？”李、白认为双方都有理由，作了“政治纲领应公布，但不宜公开与蒋中央分庭抗礼”的指示。

1936年6月“两广事变”发生的时候，王公度是主张打的，他不同意与蒋讲和。1936年8月24日，在南宁总部召开的各党派各团体代表的联席会议上，王公度和胡鄂公一样，主张在两广公开反蒋。9月3日晚上，李宗仁召集白崇禧、黄旭初、王公度、潘宜之、李任仁等在广西省政府大楼再次举行会议，讨论和战问题。会上王公度极力主张团结进步党派在南宁开创新局，直到深夜，未有结论。4日上午继续讨论。李宗仁最终决定“应以和为上策”，蒋桂对立遂以妥协告终。显然，蒋桂妥协是王公度极不愿意出现的一种局面。

1937年张云逸的广西之行，是由刘仲容居中联系、王公度周密安排的，这说明这时候的王公度对共产党的看法有了转变。张云逸访桂，引起桂系内部一场争论。李宗仁曾约白崇禧、黄旭初、李任仁、李品仙、王公度、甘介侯、黄同伍、潘宜之等人举行会议，商量对策。讨论至深夜，“未得具体结论”。次日继续商讨，争论颇为激烈。以王公度、李任仁为一方，认为广西与中共均主张抗日、民主政治及社会主义，应当加强联系，通力合作；但黄旭初、潘宜之等人则认为广西应建立自己的政治思想，不能抄袭共产党的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这是政治家应有的态度，倘以学者态度来搞政治，必然失败。

1937年，抗日军兴，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都应团结一致，以抗战为第一。李、白遂下令撤销其“革命同志会”，凡各小组支部文件，命令到达之日，集合全体人员共同监视焚毁呈报。命令下达后，各单位都遵办了，唯有王公度领导的军校同学会、干校同学会，以为非政治组织，没有取消。当时白崇禧已入京做副总参谋长，李宗仁则率廖磊、夏威两军于桂北待命北

上。王公度不知何事流连京、沪之间。时李品仙主持后方军政，在实力派、少壮派的协助下，屡电王公度回桂，但王迟迟不归。少壮派核心人物韦贇唐所主持的特务工作，发现省内各地尚有名目不同的秘密小组织，皆为王公度所为。于是各派与王公度的矛盾成了桂系内部矛盾的一个焦点，非去王不可！

黄旭初、夏威在庐山训练团受训完毕后到南京去见白崇禧，白与他们密商处理王公度的问题。据黄8月22日日记记载：“健公对余云：思想纠纷问题，囑回报德公早日处置。特使王公度随同回桂，免其他适。今日德公约予及鹤灵（李品仙）、煦苍（夏威）讨论此事，经年悬案，现在始获初步决定。”

8月30日，李宗仁下令逮捕王公度。

9月2日，李宗仁召集“讨论党案会议”，会议决定成立王案审判委员会，以李品仙为审判长。“判极刑十三人，李德邻逡巡不忍，逾旬无执行意。”

9月6日，李宗仁在总部省府联合纪念周中，“宣布王公度破坏团体，夺取政权之阴谋。”

直到这个时候，李宗仁还没有下定决心杀掉王公度。时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率军北上抗日，扬言道：“公度不死，即顿兵不前。”黄旭初也认为，非斩草除根不可，以免留下祸根，万一王公度幸免一死，将来东山再起，于他实在不利。所以，黄一再在李、白面前坚持，非杀王公度不可。李宗仁不得已，乃于9月14日下令将王公度等6人处决。

王公度死后，曾有人把他的名字和谢苍生联成一句：“公度一死谢苍生”，所谓“苍生”者是指黄旭初、廖磊、夏威、潘宜之等人。

随王案同时被捕的有不少共产党人和主张抗日救亡的进步青年，如陶保桓、崔真吾、陈大文等人。

陶、崔二人均被杀害。陶保桓是中共柳江县委委员，是广西抗日反法西斯同盟的主要领导人。崔真吾是鲁迅的学生，和鲁迅办过刊物，参加过左翼作家联盟，但他和地下党没有关系。

当时黄旭初等人主张利用王公度案“作根本之肃清，对西大教授思想不正确者彻底去之”，但后来李宗仁没有同意，只把广西大学文法学院文学系、社会学系停办，将思想左倾之教授如陈望道等“优礼厚市而遣之”。

由此观之，桂系对王案的处理有着一箭双雕的目的。有徐亮之《亮斋随笔》可证：“桂林有王公度、谢苍生之狱，其时皆以王谢归‘托派’，欲因抗日酿桂乱，实非也。王谢之死，其远因，‘开罪军人、排摈外客’二语足以尽之；其近因，则坐诉所谓的《政治纲领》，有‘前方争取地位，后方联络中共’二语故。”黄旭初在王公度被杀后扬扬自得地说：“此为本省第二次清党，距第一次清党竟适为十年。”他把王案与“四·一二”政变等量齐观。

关于王公度是不是托派，徐亮之曾郑重地告诉程思远：“所谓王公度是‘托派’，完全是假的，当王公度处死后，立刻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对外要怎样解释呢？就是说要加给他什么罪名呢？对此；李宗仁绕室彷徨，一筹莫展，我因建议道：‘何不给王公度扣上托派的帽子？’德公纳议遂定案。”

曾巍（第196页图为李宗仁照片，第202页图为黄旭初照片）

暗杀大汉奸陈篆的前前后后

公元 1938 年除夕，沦为孤岛的大上海比以往任何一年都显得阴冷、凄凉。在日本人统治的铁蹄下，人人心头都笼罩着乌云，谁还有心思过年？谁还有心思走亲访友？行人极少的大街小巷里全然没有往年那种浓烈的节日气氛，只有刺骨的寒风挟持着纷纷扬扬的雨雪，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

然而，这时在茫茫都市里也有着一个人气氛异的角落。居住在沪西愚园新村 25 号花园洋房内的大汉奸陈篆家可非同寻常。花园里鞭炮声声、银花飞溅，一片欢声笑语；厨房内，热路气腾腾，溜、炒、烹、炸，忙得不亦乐乎；客厅内，更是张灯结彩，宾朋满座，谈笑风生。此时，陈篆正坐在客厅中央、供桌对面的沙发上。他看上去已年过花甲，身着一袭玄色暗团花长袍，正得意地捋着下巴，与几个前来探望的朋友及家眷谈笑，并不时指点一下正在摆着祖宗牌位的供桌旁上供品、摆弄蜡烛和烛台的女仆。祭祖，是他每年除夕，吃年夜饭前必须履行的一件大事。至于他的列祖列宗是否愿意接受他这个不肖子孙的膜拜，那他就不管了。

反正他要通过这种仪式来自欺欺人。

突然，客厅旁门外闪进两个持手枪、穿门卫制服的年轻人。陈篆刚要张嘴问话，只见其中一年轻人甩手就给了他一枪，子弹从他耳边飞过，他迅速地抱起沙发上的绣花靠垫护住脑袋，顺势滚到沙发一旁的地下。就在这一瞬间，另一个持枪的年轻人又飞奔过来照准他的头部又是两枪。陈篆头部、颈部各中一枪，当场毙命。那年轻人上前看了一眼，对客厅里吓得缩成一团浑身颤栗的人们说：“别害怕，我们是杀汉奸！”说着他把事先准备好的标语似的纸条扔在死者身上，即夺路而逃……

第二天一早，上海各大报纸均用赫然醒目的大标题刊载着《汉奸陈篆夜登鬼录》的消息。上海市民无不拍手称快。人们都知道，陈篆是汉奸梁鸿志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同时与北平王克敏敌伪组织关系颇深，故被任命为南北总长，是沟通联络南北敌伪组织的重要人物。陈篆的死无疑是给日本侵略者和敌伪汉奸政府沉重的一击；同时又是奉献给上海市民最好的节日礼物。然而，谁是刺杀陈篆的勇士呢？他们怎么可能撞进警备森严的陈家花园？他们行刺后是否平安脱险？这些疑问报纸自然是无法解答的。在当时真正了解这桩暗杀案前因后果的人确实微乎其微。说起来，这桩案件的经过，的确曲折离奇，甚至是很荒诞可笑。谁能想到刺杀陈篆的起因，竟会是上海区军统特务的内江呢？

特务争宠

1938 年冬，军统局特务头子戴笠派大特务王天木到上海沦陷区接替黄埔一期毕业生周伟龙上海区区长职务。戴笠自以为王天木任上海区区长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早年就是一个有名的职业杀手，后来被戴笠收入复兴社特务处，成为最早的特务组织“十人团”成员之一。1933 年，他在北平任北平区区长时，曾成功地协助黄埔学生白世维暗杀过大汉奸张敬尧，在暗杀方面颇有经验。当时军统潜伏在上海的任务主要是收集敌伪情报和暗杀汉奸卖国贼，所以需要这方面懂行的人。但戴笠万万没想到，正因为王天木的到来，才引起一连串的风波，最后导致上海区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原来，上海区专门负责行动的组长赵理君亦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他毕业于杭州浙江警官学校特训班，是戴笠最得意的学生和助手。当年他暗杀过

杨杏佛、史量才，深碍戴笠宠信。他亦居功自傲，平素根本不把同事和部下放在眼里。他原以为周伟龙一调走，上海区区长之职定将落在自己头上，没想到戴笠又调来个王天木，而且资格老又是以专搞暗杀著名的，这样一来，以后自己干的成绩，不是很容易被对方攫为己有？越想，他越觉得王天本是阻拦自己发展的绊脚石，是竞争抢功的对手。所以他总是处处与王天木作对，言语上时相顶撞，工作上从不配合，以致王天木上任数月一无所成。为此王天木非常恼火，总想找个能直接听命于他的人，干出一番成绩来，压压赵理君的气焰。无奈，他新来乍到，人地生疏，一筹莫展。就在这时，平时饱受赵理君欺压的人事组长陈明楚早已看出王天木的尴尬处境，出于同病相怜之故，他主动推荐年轻的组员刘戈青给王天木。他对王天木介绍说：“你别看戈青只 28 岁，人可是又机灵，又有胆略，而且他与日本人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是最合适的人选。”

原来刘戈青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台湾云林县。甲午战争失败后，日本人占据台湾。刘父与乡民奋起反抗，不幸被日本人刺了 6 刀，险些送命。幸亏乡亲们鼎力相救，他才得以活命。后来，他为逃避日本人的追捕，方离乡背井漂泊到福建厦门、漳州一带。他在漳州成家立业、娶妻生子后，依然念念不忘国恨家仇，常常告诫刘戈青，让他牢记这刻骨铭心的仇恨。所以，刘戈青 1938 年从临澄训练班毕业后，主动要求回到上海沦陷区工作。由于他不满赵理君的骄横跋扈，所以一直不被赵理君重视，不免有些心灰意冷。

王天木听了关于刘戈青的介绍后，非常高兴，立即让陈明楚带他登门探望。过去周伟龙、赵理君等人根本不把刘戈青这些刚从特训班毕业的学生放在眼里，平时见面时，总是趾高气扬，摆出一副上级的架子。这次区长王天木突然亲自登门拜访，真让他有些受宠若惊。不久，他即成为王天木的心腹，彼此以兄弟相称。一天，王天木突然接到戴笠的来电，约他前往香港汇报工作。他一见就不由得心里直发毛。上任之后，他还未于成一件事，赵理君又在暗地里不断说自己的坏话，这次去港述职，必定凶多吉少。他本来就是是个疑心极重的人，这下他更认为是赵理君在有意陷害他。目前唯一挽救自己的办法就是让刘戈青尽快地干掉一两个大汉奸，他才好过戴笠那一关。

当天晚上，王天木特备一桌酒菜，专邀刘戈青来话别。席间，他神情沮丧地说：“老弟，我这次去港述职，说不定你我弟兄就再难见面喽！”

“大哥说得大严重了吧？”刘戈青不以为然。

“老弟，你太年轻了，你不知道赵理君在背后怎么败坏我！他想坐我这把交椅，所以不肯跟我配合，搞得我一事无成。唉！我们真是让他欺负扁啦！”王天木想让刘戈青去为自己干一两件漂亮事，却又不肯自己说出，而是想让刘戈青主动提出。刘戈青倒是很仗义，他一听王天木的话，就毫不犹豫地拍着胸脯说：“大哥，你放心！我一定替你干一两件漂亮的工作，为你壮壮色，也好向戴先生作个交代。”

“老弟，此话当真？你能替我争这口气？”刘戈青的话正中下怀。王天木兴奋地握住他的双肩，连连摇晃着，仿佛怕他反悔似的。

“当然！干是不成问题，只是枪支太少，我们埋在地下的那三支恐怕锈得不能用了。”刘戈青认真地思考着。

“这不成问题，我让林之江给你们准备枪。如果能干掉陈篆，必定大振民心士气。”王天木说着即举起酒杯，要给刘戈青敬酒。

刘戈青双手捧杯，信誓旦旦地对王天木说：“大哥放心！我定尽全力去

完成任务。”

俩人碰杯后，一饮而尽，然后无言地双手紧握良久。

王天木第二天即离沪去港，刘戈青亦积极地着手谋划暗杀陈篆的工作。

汉奸毙命想要暗杀陈篆决非容易之事，平时陈篆出门时，总有 20 多个保镖和警卫开道护卫，根本无法下手。而他的住宅上海愚园新村 25 号又是一个上了双保险的住处。它的一边是意大利兵营，另一边是日本人的某保密机关，斜对面则是公共租界的巡捕房。这段弄堂平时一般老百姓轻易不往里去，有时误入其间很快就会被那些宪兵、门卫赶出来。要想持枪闯入陈宅，真是太难了。

不过，刘戈青是个说一不二的人。他既然在王天木面前夸下了海口，他就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首先，他找了几个原在临澧特训班的同学，共同密谋策划。大家认为在外面除掉陈篆的可能性太小。不如利用人们以为陈宅是上了双保险的麻痹思想，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直接潜入陈家，把陈干掉。于是，刘戈青通过东北朋友刘海山找到一个可靠的保镖，让他绘制了一张陈宅的平面图，同时从他口中得知陈篆年三十晚上一定在家。因为每年吃团圆饭前，他一定要领着全家祭祖。

得到这一消息之后，刘戈青决定年三十晚上，陈篆祭祖之前赶往陈家，动手暗杀。除夕这天下午，刘戈青让其他人员前往沧州饭店集中，自己和特训班同学朱山猿赶到管理枪弹的林之江家取枪。孰知，林之江此时已有心想投靠敌伪特工总部李士群，根本没有按王天木的吩咐准备枪支。刘戈青赶往他家时，他早已躲了出去，只留下他老婆在家敷衍他们。刘戈青见事到临头竟找不到林之江，找不到枪支，非常恼火。他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硬催着林妻设法找到林之江，拿出枪支来。林妻无奈，想起床下还埋了 14 粒子弹，让他们挖出来取走。眼看天色已晚，刘戈青只好带着子弹返回家中，把自己收藏的 3 支生了锈的手枪取出，即赶往沧州饭店会合。

总算老天有眼。当夜幕刚刚降临时，天上就纷纷扬扬地飘起了毛毛细雨和雪花，沿途的巡捕、门卫和宪兵都缩进了岗楼或住房。刘戈青一行 5 人乘出租汽车来到愚园新村弄堂口。他们留下一人守在车内，其他 4 人沿着墙根顺利地来到陈篆家大门口。门外站岗的 3 个门卫此时正躲在岗楼内抽烟聊天。刘戈青等一个箭步冲进岗楼，用那三支生锈的枪顶住门卫的后腰，把他们的手枪和制服全都摘下换好，这才留下 1 人看守已五花大绑捆在岗楼内的门卫，其他的人随着刘戈青直奔院内，绕过花园内点花放炮的孩童，从洋楼的左侧到后门撞进陈家的厨房。

厨房内两个胖胖的厨娘正在炉台前忙碌着。刘戈青等人一闯入，厨娘吓得目瞪口呆，刘戈青让朱山猿持枪看住她们，就带着另一个同伙从过道撞进前厅。刘戈青计划是用绳子或刀将陈篆杀死，免得枪声惊动左邻右舍。可是他的同伙一见客厅那么多人，就慌慌张张地冲沙发上的陈篆开了一枪。这枪没打中陈篆，陈篆已抱起锦缎靠垫滚到了沙发下。刘戈青只好奔过去再冲其头部连开两枪，并把写有“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共除奸伪，永保华夏”的标语扔在尸体上。

此时，陈篆之子在楼上听到枪响，立即奔到楼梯口探头大声询问：“怎么回事？”当他一眼看清楼下客厅的情况时，不由大喊保镖并反手把楼口新装的铁栅栏门关上、防止行刺者冲上楼去。

刘戈青一见情况危急，就虚张声势地冲楼上打了 3 枪，然后夺路而逃。

陈篆之子不知来人底细，不敢贸然下楼，带着两个保镖在楼上冲弄堂出口射击，想封锁其退路。同时亦是想让枪声唤出左邻右舍和院内的其他保镖让他们出来救援。谁知，他这一招收效不大。原来，日本某机关和意大利兵营的宪兵、警卫听到枪声后，还以为是陈家在放除旧迎新的鞭炮，谁也懒得伸头往外看上一眼；院内其他的保镖正围在桌边喝酒打牌，个个晕头胀脑，枪声一响，他们就象没头的苍蝇到处乱窜，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刘戈青等人趁此机会贴着陈家的院墙根，溜到弄堂口，登上出租车，扬长而去……

叛徒出卖陈篆一死，上海大小汉奸吓得魂不附体。日本特务机关和敌伪特工总部象发了疯似的到处捉拿凶手，把上海一个叫中国铁血青年团的帮会成员抓去不少。但刘戈青等早已到香港领赏去了。谁知，事隔不久，王天木突然给刘戈青来了封急信：“兄于15日被赵理君暗杀未中，查系老板命令。此乃太无天理是非，遂于翌日开始自由行动。弟见信速返。”

刘戈青见信，知道事情不妙。信中所谓“自由行动”就是指投靠敌伪特工总部76号的敌伪特务头子李士群。刘戈青立即向戴笠作了汇报。戴笠非常焦急，他知道若王天木一投敌，那上海区的军统潜伏人员都将暴露，上海的工作将陷于瘫痪状态。他立即派人带着他的亲笔信赶往上海去见王天木。信中这样写道：……余遇君素厚，因念多年患难相从，凡事皆曲予优容。人或为之不平，余则未尝改易颜色，有负于君。乃竟背余事逆，天理何在？良心何在？……

王天木见信后，仍一口咬定说戴笠曾命赵理君暗杀于他，他在陈明楚处看到过那封电令，故不肯回头。

刘戈青见王天木未被说服，就再一次要求前往上海，亲自去劝说王天木。他认为凭着自己与王天木的交情，说服王天木将计就计，利用他现在投敌后的身份去设法接近汪精卫，趁机将其暗杀，阻止南京敌伪汉奸政府的建立。

戴笠听说，觉得刘戈青的话很有道理。他曾派人去河内暗杀汪精卫未遂。如今汪精卫已到南京，并正在积极筹建汉奸政府，势必防范更严，要想暗杀他，必须利用打入内部的人。王天木若能回心转意，自然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于是，戴笠终于答应了刘戈青的要求，并又写一亲笔信给王天木，交刘戈青带去。信中这样写道：“汝一人投敌，或为一时失足，尚有可谅解处。今复函诱戈青附逆，是汝甘心作贼，自绝于国人矣！本应按团体纪律制裁，但念你我多年情谊，还望戴罪图功，此其时也，望勿负余意……”

刘戈青见到王天木之后，亦好言相劝道：“戴先生说，你们打进敌伪组织正合乎他的要求，所以让我回来，让你协助我制裁汪逆，好阻止他的伪政府成立。对你们投敌之事，绝不追究。”

“我现在走这一步，完全是赵理君逼出来的。你老弟既然回来了，一切问题慢慢商量吧。”王天木嘴里说得好听，但实际上并不想按戴笠的话行事。一见面，二话不说，就向他发了顿牢骚：“我是戴先生的学生，怎么会背叛他？我们是被赵理君逼得走投无路，才行此下策。我们也并不是真想投敌。可是重庆方面不调查真相，听了一面之词就把我在老家的父母姐妹都关了起来，我当汉奸我负责，关他们什么事？”

“我不与你争辩，我只想用事实来证明你所说的不是事实。”刘戈青以为王天木、陈明楚都是听信了谣言才动摇投敌的，所以想用事实来说服他们。

不久，刘戈青电请戴笠，将陈明楚之妹陈燕飞送到了上海。刘戈青安排其兄妹在沧州饭店相见。陈燕飞双膝跪在其兄面前，哭求其不要再当汉奸，

同时把老父劝其改邪归正的亲笔信交给他，兄妹俩抱头痛哭。陈明楚当时发誓不再当汉奸了。

他领着妹妹走后，刘戈青以为他真的会改过自新，非常高兴，一直等着他提供刺汪的线索。孰知等了很长时间陈明楚那里却音讯全无。他到处打听他的住所，亦无结果。他哪里知道，陈明楚已是死心塌地地当了汉奸。当初就是他利用赵理君和王天木的矛盾，伪造了一份戴笠电令，并导演了一场刺王未遂的假戏。其目的就是要拉着王天木一同投敌。如今，王天木已将英、法两个租界的军统潜伏组和成员出卖给了李士群，戴笠无论如何也不会轻饶他的，所以，他索性一臭到底，总是躲着，不肯与刘戈青见面。

有一天，曾与刘戈青、朱山猿同住一室的特务尤品三被巡捕房拘捕。严刑逼供之下，他供出了他们在沪西大旅店的房间号。巡捕得知刘戈青即是半年前杀死陈篆的主犯后，立即带人前去拘捕。幸亏巡捕赶到时，刘戈青刚好下楼打电话，被拦在楼口询问。刘戈青当时身着工人服，巡捕们没想到他就是凶犯，被他两句话就哄骗过去了。

这次刘戈青虽然没有被捕，但把王天木、陈明楚吓了一跳。他们担心的是，万一刘戈青被捕后，反咬他们一口，说是戴笠派他来协助他们刺杀汪精卫的，那他们不仅前功尽弃，而且还会招来杀身之祸。他们想劝刘戈青离沪去港，又明知很难办到。刘戈青这个人办事总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既然戴笠让他来杀汪精卫，他就会一直干到底。所以刘戈青的存在对他们来说，是个极大的威胁。何况，刘戈青一旦发现他们是死心塌地地投向敌伪，将来势必成为他们的煞星，为自身安全计，王天木决定让陈明楚带人干掉刘戈青。他们商定了一个暗杀刘戈青的方案，即打电话约他到兆丰公园附近的凡尔登舞厅见面。

乍一接到陈明楚约其见面的通知后，刘戈青觉得很突然。他的好友及同学力劝他不要去赴约，免遭不测。但刘戈青仍对陈、王抱一线希望，他担心这次不去，以后无法接头，就坚持要去。正相持不下之际，他的女友陆缔来看他，听说他要去舞厅，就主动要求同去。朱山猿觉得这样可能会安全一些，就不再坚持己见，而让他们走了。

不久，陈明楚自己驾着汽车，带着他的妹妹来了。一进门，刘戈青就发现陈明楚已喝了不少酒。他不仅满嘴的酒臭，而且神色反常，好象心事重重，很痛苦的样子。刘戈青把他们兄妹让到桌边，刚把其妹介绍给女友，就见一个中年男子向他们桌边走过来，而且边走边伸手到裤兜去掏什么。刘戈青以为是陈派来暗杀自己的。他不由瞪了陈明楚一眼。可是他发现陈明楚正双眼恐惧地盯着来人，身子不由自主地直往座位下缩。刘戈青见状，即毫不思索地扑过去，一把将来人摔倒在地，并迅速地去掏他的裤兜。结果，他掏出一看，发现裤兜里装的根本不是什么武器，而是一盒香烟。刘戈青知道误会了，连忙向他道歉，并帮他点着香烟。

这时，陈明楚的酒劲亦消除了一大半。他想到自己是来诱杀刘戈青的。而刘戈青反而挺身来保护他。他觉得十分羞愧。但事情已走到了这一步，他已是骑虎难下。杀手们已在门外等候，只要他陈明楚一离去，他们就随时会向刘戈青下毒手。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他不由伏案痛哭起来。其妹陈燕飞还以为他仍是喝醉了，就劝他回去，别再喝了。陈明楚索性装得醉醺醺的样子，让刘戈青架着他走出舞厅，并一同上了他的汽车。埋伏在舞厅外的特务一见他俩一同出来，怕误伤陈明楚，不敢开枪。刘戈青因此而躲过了一场杀

身之祸。但陈明楚上车之后，又有些茫然了。他拿刘戈青怎么办呢？让他死于自己之手。又有些不忍，但不除掉他，自己和王天木的安全均受到威胁。陈明楚接过刘戈青手中的方向盘，漫无目的的在大街上转来转去，一直转到深夜，突然莫名其妙地把车开到了敌伪特工总部 76 号会客室门前，让刘戈青及女友进会客室稍候，说他马上就回来。结果，他带着其妹一去就未再露面，76 号的警卫队长又不让他们离去。刘戈青就这样被莫名其妙地关进了虎口。

虎口冒险第二天一早，敌伪特工头子李士群方得到警卫队长的报告，说陈明楚把暗杀陈策的主犯刘戈青送来了。他觉得这事太离奇了。自己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没抓到的凶犯，竟然送上门来了，而且王天木和陈明楚事先根本未向他谈过此事。这到底是为什么？李士群百思不得其解，他打电话找王天木，王天木家根本无人接电话。他更加觉得奇怪，他哪里知道，陈明楚把送刘戈青到 76 号的事告诉王天木后，王天木吓得连夜躲了起来。他怕的就是刘戈青落在李士群手中，反咬他们一口，才要除掉他的。孰知陈明楚竟把他送上门去。这真是让他啼笑皆非，为谨慎起见，他先躲了起来。

李士群找不到王天木，就决定亲自审问刘戈青。可是，他一见刘戈青立即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刘戈青看似文弱书生，但眉宇间却有股刚毅英武之气。在李士群这个人谈虎色变的敌伪特务头子面前，他依然镇静自若，毫无惧色。当李士群问到陈策被刺之事时，他亦毫不隐讳，而且理直气壮地历数陈策种种该杀之理由。他越是这样镇定、从容，李士群越是觉得他是个难得的人才，越是想将其拉过来为己所用。因此，他在刘戈青面前显出了从未有过的耐心和热情。他特意为刘戈青准备了一桌佳肴美酒，并极耐心地用他自己那一套汉奸理论来开导他。他说：“我知道你是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其实，我们又何尝不爱国？只不过，我们爱国的方式不同罢了。如今重庆政府把上海和大部分国土都丢掉了，我们只不过是在这片被他们丢掉的土地上为中国人讨回一部分权益罢了……”

他边吃边说边劝酒，目的就是想说服刘戈青，让他投靠在他的门下。刘戈青听后，不慌不忙地说：“李先生待我这样好，我心里明白。如果李先生你去做土匪强盗，我刘戈青一定跟你干，但给日本人工作，我不能。你不知道，我父亲以前被日本人刺过 6 刀，险些送命。我虽不能去杀日本人为父报仇，但我也不能去帮助有杀父之仇的日本人吧？”

“你不用去帮日本人，帮我总行吧？你只要告诉我戴雨农派你回上海的目的就行啦。”李士群依然耐心地诱导。

刘戈青不加思索地答道：“这次返沪不是戴先生派我来的。是王天木写信让我回来的，他要骗戴先生的钱。钱骗到了，却叫陈明楚把我送到了这里。他们鬼鬼祟祟的，真不够朋友。”到了这个时候，他仍不准备反咬王天木、陈明楚。

李士群见他回答得滴水不漏，仍不肯就此罢休。他把刘戈青关在 76 号院内，每天让人好酒好饭招待，想慢慢软化他。后来，日本特务机关知道杀陈策的主犯已被李士群拘捕，几次派人来要提走他。李士群总是设法搪塞过去。不久，南京汪伪政府成立，李士群即把刘戈青转到了南京宁海路 25 号敌伪特务监狱。本想关他一段时间，再观后效。就在这段时期，陈明楚及与他一同投敌的林之江等两名特务被军统其他潜伏人员所杀，只有王天木侥幸活命。李士群以为这是刘戈青的同伙为刘报仇，所以想把刘戈青送到日本去，一方面可以造谣说刘戈青已投靠了日本人，另一方面刘戈青在日本参观受训后，

或许他能投身到自己怀抱。他正准备去监狱说服刘戈青赴日参观之际，突然传来刘戈青在监狱险些被打死、已经奄奄一息的消息。他立即驱车前往监狱了解情况。

原来，敌伪监狱的看守待犯人如凶神一般，平时开口就骂，动手就打。一次放风时，刘戈青随着犯人们往外走，因为人多门窄，走得很慢，正巧看守所所长想急着出去，就狠狠地推了一把走在前面的刘戈青，并催着说：“快走，怎么慢得象死猪似的。”

“前面走不快，我怎么走快？”刘戈青不服地顶了一句。孰知这句话竟惹恼了看守所所长。“嗨！你小子还敢顶嘴？来！把他带到办公室去。”所长气恼地让其他两名看守把他拉下去。

一进办公室，看守所所长就怒不可遏地抡胳膊、挽袖子地骂着走了过来：“你这个重庆政府的走狗！老子让你知道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刘戈青当然清楚他要干什么，等他一走近，还未来得及出手，他就照准所长的鼻子猛地一拳打去，并破口大骂：“你这个汉奸王八蛋！”

那所长冷不防被他打得登登往后退出老远，顿时鼻血直流。这还了得，他气得跺脚大叫，其他的看守一拥而上，拳打脚踢，把刘戈青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

李士群听后，大发雷霆，责骂所长不懂得配合他做感化工作，并命令所长把刘戈青送进优待监房，请医生为其治伤。待刘戈青伤势稍有好转，李士群即亲往探视，并对他说：“我实在是喜欢你。不过这样下去怎么行？我想送你去日本看看，这对你也许有好处，就看你愿不愿意。”

刘戈青一想，这正是个逃走的好机会，于是他欣然允诺。李士群亦很高兴，一方面叮嘱看守好好待他，另一方面积极为他去日本办理申请。

刘戈青要去日本“镀金”的消息在监狱中不胫而走。看守所里那帮势利小人们认为刘戈青如此得到李士群的赏识，去日本“镀金”回来后，一定会成为李士群的红人。所以，看守们一反过去的凶神佯，竭尽奉承之能事。他们把刘戈青从牢房转到福利社，并常常邀他一起外出洗澡、下馆子，上舞厅。每次外出刘戈青都主动掏钱付账，看守们更是乐得沾光。后来看守们玩上了瘾，索性把刘戈青邀出去后，就各玩各的，最后约定一个地方会集，对刘戈青已无丝毫防范。更有意思的是，他们担心刘戈青在外面玩耍时，遇见宪兵、军警查身份证，会惹出麻烦，就主动为其弄了张身份证，只不过叮嘱一句说：“这身份证只能在城里有效，出了城就不管用了。”

这张身份证对刘戈青来说，正是如虎添翼，如蛟得水。他利用外出机会把火车时刻表和关卡检查情况全部摸清了，遂于1940年6月20日借外出之机，登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

待看守发现刘戈青外出未归，开始追查时，他已经到了上海，并登上了去香港的客轮……

沈美娟（第205页图为陈策照片）

蒋介石何以要杀韩复榘

公元1938年1月24日，蒋介石下令将韩复榘处决。韩当时任山东省主席兼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枪毙这样一个显赫的人物，毫无疑问，蒋介石必定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下了决心的。那末，他的决心来源是什么呢？

中华书局《民国人物传》第一卷“韩复榘”一文中认为：“刘（湘）、韩、宋（哲元）联合倒蒋，蒋介石接到了这一策划的密报，遂决心杀韩。”确实，那时韩的举动事关大局，如果韩向北倒，和宋哲元连成一片，就会扩大“华北自治”的区域，加之刘湘拒蒋入川，南京政府就会处于危难的困境。这一点，蒋介石是十分担心的。毫无疑问，这是韩遭到杀身之祸的一个重要起因。

然而据我所知，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重要因素，促成蒋杀韩的决心，那就是冯玉祥告发韩复榘“叛国降敌”的一封密信。

1937年9月，冯玉祥出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赴津浦线北段指挥抗战。在紧急关头，冯接连三次打电话给韩复榘，要他速派兵增援前线，但韩都阳奉阴违，按兵不动，使冯非常恼火。后来接到闻承烈的报告，说韩与日本武官石野等密谈，冯更是怒火中烧，大骂韩复榘脑后有反骨，据当时在场的随从副官李平一说：“冯先生说，1926年，当反对奉、吴军阀的战争失败后，韩复榘投降了一个人（指阎锡山）。1929年，部队向潼关以西作战略撤退时，他又投降了一个人（指蒋介石）。今天是什么时候？时代不同了，战争不同了，今天是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是为了抵抗外寇亡我中国、灭我民族的战争。在这种战争面前，只要是一个稍有血性的中国人，谁能不奋起抗战！何况是一个军人！可是我下了三次命令，他就是按兵不动。韩复榘正在作着充当华北自治头子的梦，他决没有好下场！”（《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

就在这天深夜，冯玉祥亲自书写了一封给蒋介石的密信，传随从副官冯纪法火速去南京面交白崇禧转呈。此事，据纪法先生亲口对我说：“当天晚上我便乘上一辆火车到了济南，然后又跳上一列南去的火车，第二天傍黑到了南京。为了保守行动机密，我换乘了几辆马车，悄悄地去了陵园四方城冯先生的家里，冯夫人看到我一身灰土，大吃一惊，说：‘纪法，出了什么事啦？’我小声地说：‘先生叫我来送信，是给蒋先生的，’她点点头，叫我先洗洗，吃了饭再说。”

“第二天早晨，我要通了白崇禧的电话，他在电话中说。‘好，你等着，车子马上去接你。’就把电话挂断了。果然不到一个时辰，白崇禧派来的车子就把我接走了。我见到白，把冯先生的亲笔信交给他。白要我坐下谈谈前线的情况，他一边听一边认真地记在一个小本子上，随后对我说：‘我很快就会向委座报告，就不给冯先生写回信了。现在他已离开桑园，你赶快回去吧。’”

不久，冯玉祥愤然返回南京，山东地区遂划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但桀骜不驯的韩复榘更是处处刁难，弄得李宗仁十分难堪，大发脾气，也屡屡向蒋电告韩“不听号令”，“无法指挥”。

我认为，这两起告状，非同小可，是促成蒋逮捕韩的重要一节。

但此时，蒋尚未定下杀韩的决心，所以当韩的部属孙桐萱向蒋请求宽容

韩的过错，提出：“无论如何留他的性命，不叫他指挥部队，叫他休息休息也好，留在钧座身边，教他力改前非，以观后效，或叫他出国。”蒋介石说：“好，好。考虑考虑，考虑考虑。”（《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可是孙桐萱返回山东曹县驻地后，又召集韩部几个师长密商救韩办法，主张打电报要求将韩释放，“如果不行，即集结兵力在黄河边，作强烈的抗争。”（同上）机密为蒋伯诚获悉，据以转报蒋介石，引起蒋的震惊。而恰在这时，李宗仁、白崇禧乃至沈鸿烈等，都对韩的叛逆不轨行为愤愤不满，特别是冯玉祥当时曾书写了“违抗命令，叛国降敌，军法从事，决不姑息”16个字（《文史资料选辑》第109辑），交给来访的张治中，请他转呈蒋介石。

这样，蒋杀韩的决心才最后定下来。

由此可见，蒋逮捕乃至处决韩复榘，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

夏侯绪五（第221页图为蒋介石与韩复榘）

戴笠设计诱捕韩复榘

公元 1938 年初，蒋介石逮捕并处决了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这在当时是轰动一时的大事。而逮捕韩复榘的行动，是由戴笠负责执行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手握重兵的韩复榘，对抗战持消极态度。日军侵占平津后，沿津浦路南下，在津浦路北段指挥作战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令韩复榘增援，韩却抗命不前，以致德州沦陷。日军继续向南进犯，他弃土不守，节节败退。当津浦路南段受到重大威胁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令其开往沂蒙山区策应，韩担心受日军南北夹击，拒不执行，擅自将部队开往鲁西南一带。蒋介石与韩复榘本来矛盾极深，遂下密令“拿交军法执行总监惩办”。

戴笠奉到缉拿韩复榘的命令，深感难办。当时韩手握重兵，处在敌我交错的地带，极可能投敌，蒋介石的命令是依法惩办，戴笠又不可能用他惯用的暗杀手段，于是他策划了一套诱捕的方法。

事前，戴笠故意散布一些烟幕，意在麻痹韩复榘，松弛其戒心，而在暗中却做了周密的布置。1938 年 1 月初，蒋介石接受戴笠的建议，以军委会名义致电韩复榘，请其出席开封军事会议，并以沿途不靖，嘱多带卫队，善加防护。韩接电后，没有多想，即率卫队一团，及随身警卫数十人，至柳河车站乘陇海路局准备的专车，匆匆赶往开封。而戴笠率王兆槐等已先行到达。当韩复榘的专车抵达时，即由戴安排的“接待”人员以卫队的住所正在清扫为由，将韩的卫队暂留车上。因会议即将开始，韩带随身卫士数十人匆匆赴会。

会议开始不久，戴笠命发出空袭紧急警报。韩身不由己随同与会各将领进入防空洞。这时戴笠将隔在会场外面的韩随身警卫解除武装。守在车站的人员，也以躲避空袭为名，强行将载有韩卫队的专车开往汤恩伯部队的包围圈内，韩卫队未经抵抗，即被解除武装。当这一切顺利进行完毕后，戴命令解除警报。韩走出防空洞，正步向休息室时，由王兆槐带领特工迎上，一边一个挟持韩迅速离开，登上事先准备好的专车，开往武汉。韩被捕后，军事会议继续进行，这时才宣布逮捕韩复榘交军法执行总监部依法严惩的命令。同时宣布韩所部交孙桐萱率领。

王兆槐将韩复榘押解武汉，禁闭在戴笠事先备好的一幢两层楼房内。1 月 29 日由何应钦、徐源泉、秦德纯等人组成军事法庭，由何应钦担任审判长，对韩进行会审，随之宣判处以死刑。1 月 24 日晚 7 时，王兆槐以何应钦请谈话为名，诱韩复榘下楼，当韩走到楼梯半腰时，由特务开枪击毙。

孙铮

从军统局情报看唐绍仪被杀原因

唐绍仪在中华民国建立后，任首届内阁总理，后又被举为护法军政府财政总长和七政务总裁之一兼外交总长。1932年被选任力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广东省政府委员并屈就中山县长。两次“南北议和”均为全权代表，可谓风云一时之人物。

1938年9月30日，唐绍仪突然遇刺身亡。

象唐绍仪这样一个显赫人物，是怎么被刺杀的呢？为谁所杀？这是一个多年来鲜为人知的问题，即使偶有提及，也是说法不一。

有人说，蒋介石曾请唐绍仪出面，借美国之力，调停中日战事。唐绍仪提出须数百万美金作为交际费用，蒋嫌唐胃口太大，所索过巨，而怒罢此事。南京失陷后；蒋又要唐绍仪跟日方秘密和谈。唐让其女婿诸昌年与日人商谈，日人认为蒋介石不可靠，要蒋下野而由唐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唐未答应。唐绍仪的女婿背着唐私自答应日人所提条件，为蒋特务所闻，遂急报蒋，蒋于是决心除掉唐绍仪。

有人说，唐绍仪曾劝蒋介石退位，为蒋误会，因而灾祸临头。

又有人说，日人土肥原在华“游说唐绍仪”之阴谋完全失败，“乃以毒手置唐于死地”。

照前两说，唐绍仪为蒋介石所杀，按第三说，则唐绍仪死于日人之手。以上诸说都不能认为是公允的结论。现根据有关档案和资料，略述一二，以飨读者。

关于唐绍仪为谁所杀及杀死经过，国民党特务在其1938年10月2日的情报中报告说，刺杀唐绍仪的谢志磐，系苏浙行动委员会委员，即蓝衣社骨干分子，广东人。寓大东旅馆51号，最近数月来不时访谒唐绍仪。因此，唐宅仆役均以谢为唐绍仪往来之熟人。在一个月前，唐的一位朋友告诉过唐，谢志磐的胞兄弟任国民党军委会特务工作，嘱其小心。唐则认为谢志磐兄弟感情极不和睦，主张亦各异，因而未起疑心，不加防范。

9月30日9时许，谢志磐乘汽车拜访唐绍仪时，有两名伪装古董商的特务同往，携古物8件，向唐兜售。唐宅仆役持谢名片向唐绍仪通报，唐吩咐在楼下客厅会客。会晤时，谢与“古董商”将所携古玩出示唐绍仪，时仅有唐一仆役在旁。唐绍仪看过古玩，面有不悦之色，说只买两件，嘱在旁仆役上楼取钱，等其回到客厅时，谢及“古董商”已不知去向，而唐绍仪却仰卧沙发，血流满面，额嵌一斧。急送广慈医院抢救，因流血过多，于是日下午4时许死去。

事后，法租界当局发出悬赏缉捕令，凡能揭发、检举、抓住刺客谢志磐、王竹轩的，各给赏金3千元。但始终没能破案。

当时，上海许多家报纸同时报道了这一消息：唐绍仪在9月30日9时许遇刺于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18号自宅内，下午4时许死于广慈医院。有的报纸字里行间还多少流露了对唐被刺原因的猜测之词。社会上也传说纷纷。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又是研究唐绍仪这个重要人物必须弄清的问题。

当时国民党和日本军部对唐绍仪被刺事件都非常重视，各自利用在上海控制的舆论工具，进行有利于自己的宣传。据军统特务第56号情报称，在唐被刺的当天晚上，军统特务即用电话嘱令《新闻报》、《译报》、《导报》、《华美晨报》等报馆，在发表唐绍仪被刺消息时，应说明刺唐责任在日方、

汉奸。上述报纸 10 月 1 日的新闻就是以军统局的口径写的。唯《文汇》、《大美》等报同日所载刺唐新闻，语句间仍以为有蒋方主动杀唐之意。

唐绍仪为军统所杀，看来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军统为何要除掉唐绍仪呢？这就要从唐绍仪跟日本人的接触谈起。

1938 年 1 月 16 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对华声明，公开声称要在中国建立与之合作的“新政权”。并有意让中国“第一流的人物”唐绍仪、吴佩孚出马，这就是所谓的“南唐北吴”计划。想以此搞垮中国的抗日力量，倒蒋反共，以华制华，尽早结束战争。对唐的拉拢劝降活动也就在此时急急开始了。日本先后派日田宽三、船津、土肥原等人游说唐绍仪出任伪职，唐始终未答应。梁鸿志的傀儡政府 3 月份在南京被扶植起来后，日本也未放弃对唐绍仪的劝降，意欲合南北两伪政权为一，由唐主持。最后一次土肥原与唐接触是在 9 月下旬，也就是唐被刺的前几天。

日本人对唐绍仪的拉拢劝降并有意让其出任伪职的情况，军统也是有所探知的。在刺唐的第二天，军统特务在第 55 号情报中即报告说，日本多次欲利用唐绍仪组织伪统一政府均被唐拒绝，但日本始终未放弃利用唐绍仪的企图。故我等正好利用日本此种心理，借唐绍仪作为缓冲。日本所期望之“统一政府”，数月来所以不能成立，原因即在于唐绍仪没有接受日本要求。国民党特务 207 报告日本土肥原在华活动方针电，也说得很清楚：日本欲利用军人及跟国民党有关系之人，以资号召；伪组织须在统一指挥下发展。为此，土肥原在华北游说吴佩孚失败后，又携刘永谦南来游说唐绍仪，由高凌蔚从中介绍。游说结果，亦无成效。

但军统还有另一份情报。1938 年 1 月 28 日第 98 号情报云：“相传唐同意一俟军事上（指中方——笔者注）达到相当败绩程度，即进行与日议和。”而刺唐的时候，地处华中的武汉重镇已在日军的三面包围之中，武汉会战的失败，已势在必然。这种“败绩”与“相传议和”的情报结合，军统不得不以防万一了，即防止唐绍仪出任伪统一政府总统，维持日军占领区统治的情况万一发生。因为这个“万一”一旦成为事实，其责任，包括戴笠在内是谁也担当不起的。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这恐怕就是军统杀唐的原因之一。

唐绍仪死后，军统在前面所提到的第 55 号情报中建议：“院座于唐逝世后，如能专电慰问唐氏家族，或由中央明令褒恤，此亦怀柔反侧安慰唐氏家属之至意。是否有当，尚希核酌后转呈院座裁夺。”10 月 5 日，国民政府即下令褒扬唐绍仪，拨给治丧费 5 千元，并将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以表示“政府笃念勋耆之至意”。

夏茂粹（第 227 页图为唐绍仪与其夫人）

蒋汪南京特工战

公元 1940 年 8 月 7 日夜，雷鸣电闪挟带急风骤雨袭击着汪伪统治的中心南京城，被酷暑炎热煎熬了一天而疲惫不堪的人们刚刚进入梦乡，两辆黑色小汽车悄然无声地开到了大油坊巷汪伪南京市党部书记长兼调查科科长陈觉吾的住宅前，从车上下来的四五个手持短枪者迅速地包围了这所房子。

一个身着黑拷绸短衫、戴着墨镜的人拚命地敲着大门。“谁呀？”睡眼惺松的女佣边问边来开门。“市党部的，有急事找陈书记长！”睡在里屋的陈觉吾闻声翻身下床，来到客厅。门一打开，立刻冲进三四个人，黑洞洞的枪口齐对着陈觉吾。“放肆！我是市党部书记长，你们是什么人，胆敢深夜持枪闯入！”陈觉吾指着戴墨镜的人大声喝问。那人把手枪往空中轻轻一抛，又接在掌心，皮笑肉不笑地说：“陈书记长，别生气，兄弟是 21 号的（宁海路 21 号、25 号俱为汪伪特工总部南京区看守所），奉命有请。”陈觉吾脸色刷的一下变得象纸一样苍白。“怎么样，有话见了我们马区长（汪伪特工南京区区长马啸天）再说。”戴墨镜的人嘴角闪过一丝冷笑，又对其他人喝道：“闪开，请陈书记长和我们走一趟。”陈觉吾被簇拥着上了汽车，两辆小汽车开足马力，消逝在漫漫黑夜中。

紧接着，在珠江路、长乐路、下江考棚、半边营、蚌壁巷、玉带巷等地方都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被惊醒的市民瞪着恐惧的眼睛看着一辆又一辆尖声怪叫的囚车急驰而去。

8 月 20 日，汪伪各主要报纸兴高采烈地宣布：8 月 7 日夜，一举破获重庆方面在南京的间谍组织，主要成员陆玄南、陈觉吾、邓怡、刘少华、朱菊人、张至仁、李瑞芝、徐广仁、刘文彬、韩慕周、胡培德、彭上举等 20 余人全部落网。接连几个晚上，马啸天家里灯红酒绿，觥筹交错，在南京的汪伪特工头目频频举杯，庆祝他们继 7 月份在上海抓获重庆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主任委员马元放、委员石顺渊、崔步武、掌牧民之后，又一次取得的“重大胜利”。

陆玄南、陈觉吾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他们是怎样打进汪伪组织的？又是怎样被抓获的？要回答这些问题，还得从头说起。

1937 年 11 月 11 日，日军占领上海后即大举进攻南京。11 月 20 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并决定由军统、中统派人潜伏南京，开展对日伪的斗争，南京市的党务则由江苏省党部兼办。军统局派出南京特工区区长钱新民、忠义救国军前进部总指挥黄征夫，负责搜集军事情报，策动暗杀、爆破等恐怖活动，骚扰社会秩序。中统则派出徐崇文、宋建中等 18 人或以商号行庄为掩护，或打入伪组织，着重搜集经济情报。至于恢复国民党地下组织、开展政治宣传，江苏省党部则无暇顾及。

1939 年，汪精卫与王克敏、梁鸿志密谋合流组府，南京逐渐成为汉奸政权的中心。在南京的国民党员推派章兆直、陆玄南密赴重庆，要求恢复国民党南京市党部。蒋介石在呈文上批下“勇赴国难，情实可钦，饬即筹组南京市党部”几个大字，并委章兆直、陆玄南、夏恩临为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委员。章、陆、夏 3 人先后参加了中央训练团的短期训练，于 8 月潜至上海。3 人中章兆直为市党部主任委员、陆玄南为书记长、夏恩临负责组织发展工作。

当时，原唐生智卫戍司令部的股长陈觉吾因不满日本侵略者和维新政府的统治，以教书为掩护，到处磕头拜把兄弟，在南京组织了一个秘密小团体，

夏思临便约请其上海碰头。10月，陈到了上海。见面寒暄了几句，夏思临开门见山地说：“兄弟此次来京，奉总裁手谕筹建南京市党部。中央对党吾兄在沦陷区的工作极表满意，特命思临予以宣慰，并望今后能精诚团结，共赴国难。”陈党吾则拍着胸脯保证他的人个个“尽忠党国”，暂与汪逆周旋到底，决不辜负“蒋总裁”厚望。两人商议乘汪精卫派唐惠民、苏成德筹划建立汪伪南京市党部的机会，设法打进去，开展策反工作。

陈党吾回南京不久，就寄了一张南京市民证，催促夏思临尽早赶到南京。本来按照国民党地下工作的规定，夏思临只能与陈党吾单线接头，避免横向联系。谁知夏思临到南京去找陈党吾，正好碰上他在家中召开秘密会议，参加的人有石超、买国民、邓怡、朱菊人、张至仁、李瑞芝、刘少华等12人。夏思临欲退不能，只得含含糊糊地敷衍几句，虽未说明身份，但到会的人都已明白他是重庆派来的人。会后，夏、陈两人又制定了打入汪伪市党部的具体行动方案。回到上海后，即用密码报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很快得到回电，同意他们的方案，并指令陆玄南也设法取得汪伪市党部委员资格，以便照料指挥。鉴于夏思临的身份已为众人所知，陆玄南和夏思临便于1940年1月14日在南京长乐路召开了国民党南京市地下党部的第一次干部会议，除将各人搜集到的情报综合整理、向重庆报告外，对各人的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陈党吾主管组织事项，石超、张至仁负责青年工作，邓怡专在下级党部中开展活动，刘少华在乡区恢复国民党组织，冯鲁瞻、买国民从事社会宣传，李瑞芝任机要交通，徐广仁负责经济。会后，这些人访亲拜友，竭力发展外围组织，利用各种关系拉拢汪伪头目，并在各种场合发表赞成汪精卫“和平建国”主张的言论，很快取得了汪伪的信任。3月，汪伪市党部成立，陈党吾任书记长兼调查科科长（主任委员为汪派刘云），陆玄南、买国民任党部委员，邓怡、刘少华、胡培德、张至仁、石超、韩慕周、刘文彬、朱菊人任干事或助理干事。汪记市党部实际上已操纵于陈党吾等人之手。

汪精卫定于3月30日“还都”南京，陈党吾、陆玄南等人事前侦察了伪国民政府大礼堂（即今南京市政府大礼堂）内部设施及四周地理情况，策划了刺杀汪精卫的计划：准备在汪伪举行“还都盛典”时，将发给陈党吾、陆玄南的记者出入证让给杀手，等汪精卫发表讲话时，向主席台上扔炸弹，将汪及伪头目炸死。30日早晨，一切就绪，只等从上海购买的炸弹。会已经开了，还不见买炸弹的人影，陈党吾急得直跳脚。直到下午，买炸弹的人才气喘吁吁地赶到，原来在上海买炸弹颇费周折，加之下车后盘查很紧，因此误了时间，刺汪计划没有实现。

7月，章兆直由上海赶到南京，组织了向汪精卫发起总攻击宣传周活动，由韩慕周起草，其他的人深夜加班印刷了汪精卫投敌叛国罪行、警告汪伪要人的羞耻信及宣传品，26日通过各邮局散发。汪精卫、周佛海接到这些警告函后勃然大怒，把在南京的特工头目叫去臭骂一通，限令即刻破案。此时，夏思临接到重庆密函，要他即去上海，与已被委任为上海国民党地下党部主任委员的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接头。行前，夏思临将继续散发宣传品的任务交给了以石超为核心的南京市青年廉耻委员会。

就在汪伪特工组织派出大批密探在车站、码头、邮局、要道侦察的时候，陈党吾和买国民、石超的矛盾尖锐起来。买国民平时贪图小利，吝啬异常，经常去陈党吾家打扰，索要活动经费，陈十分讨厌，常以恶言讥之，两人心存芥蒂。石超与陈党吾相识较早，1938年陈党吾在南京市立二中任总务主

任，石超是该校教员，后石随陈参加了国民党地下党部活动。一次，石超冒领陈觉吾朋友的房租，为陈所知，从此见了石超不给好脸色。石超见陈觉吾在伪市党部指手划脚，颐指气使，也很不服气，遂以侦察汪伪要人住址、行踪、汽车、电话号码为由，擅自去伪铁道部任职，陈觉吾气得几次要开革他。夏思临见势头不对，力劝陈息事宁人，以免小不忍乱大谋。在去上海前，夏带着石超去陈觉吾家道歉，欲使两人重归于好。谁知陈见了石超仍然坐在太师椅上纹丝不动，不理不睬。石超刚要说话，陈拂袖进里屋，石超也气得朝地上吐了一口痰，掉头就走。陈、买、石 3 人的活动及微妙关系早已被汪伪市党部的另一个委员丁伯常看在眼里，见 3 人矛盾激化，遂挑唆买国民、石超去汪伪特工组织自首。8 月 7 日夜，买国民亲自带着 21 号的便衣去抓陈觉吾。陈被押出门，一眼就看见蜷缩在暗处的买国民，买国民连忙把责任推给石超：“是石超出卖了我们，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呀。”陈狠狠地盯了他一眼，没有说话，被押上汽车。此时，石超正在敲打着洪武路 121 号胡培德家的大门。胡培德开门出来问：“夜深雨大有什么事？”石超说：“陆玄南马上就要去上海，现在松鹤饭店等你。”胡培德见石超神色慌乱，心知有异，转身想往里走，石超赶上一步挡住去路：“老兄，放漂亮些，案子已经破了。”守候在门外的特工人员一拥而入，把胡培德抓走。石超又带着人敲响了张至仁、韩慕周……家的大门。一夜功夫，除夏恩临、章兆直等少数人外，重庆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成员大多被抓进宁海路 21 号。

第二天，陈觉吾、陆玄南等移押到宁海路 25 号。邓怡第一个受审，两个看守押着他来到一幢三层楼的房子前，先到审讯室，只见一个瘦骨嶙峋的人被吊在半空中，两个壮汉手里拿着一指宽的牛皮带，蘸着水轮流抽打着。皮鞭下去，血肉飞溅。邓怡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双腿发软，几乎站立不住。“说不说？”行刑的人大声地吼着。那个被打的人一声不吭，眼皮抬都不抬。也许被这无言的轻蔑所激怒，一个壮汉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从煤炉里抽出一个烧红的通条，恶狠狠地逼过去。那邓怡早已吓得闭起眼睛。“走吧，陆科长在等你”，那个看守把他带到二楼的一间办公室。一张硕大的黑色写字台后面的转椅上坐着汪伪特工南京区侦讯科长陆怡然，见邓怡进来，显得出乎意外的亲热，忙叫人搬座倒水，然后拍着邓怡的肩膀：“你我是一家人，都是国民党员。蒋先生是国民党总裁，汪先生是副总裁，他们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在演双簧戏。以内心而言，蒋先生何尝不想走和平建国这一条路？不过目下为共党所挟制罢了。重庆、南京殊途同归，终究会合二而一的。我们的共同敌人是共产党，你刚才看到的那个人就是一个死不开口的共党分子。

我们不愿用这样的方法对待自己人，希望你能与我们好好合作。”接着又递给他一张报纸说：“你好好看看，识时务者为俊杰。”那是一张 7 月 16 日的《中华日报》，登着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石顺渊、崔步武、掌牧民的悔过声明。“怎么样，也写一张吧？”“我可是什么也没有干呀，你们为什么把我弄到这里来？”邓怡嗫嚅着。“哈哈！”陆怡然笑得前仰后倒，“为什么抓你，问得好！你看这是什么？”他从厚厚的卷宗里抽出两张纸扬了扬，洋洋得意地说：“这是你们的同志买国民、石超写给丁默邨先生的。你们干的事我们全知道，我们知道你不过是个小角色，不想太为难你，只要你悔改自新。兄弟，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呀，21 号大门的门槛不是随便可以跨进跨出的。”陆怡然射出的两道阴冷的目光使邓怡胆颤心惊，瘫倒在椅子上。

恍惚中见陆怡然使了一个眼色，只觉得背后有人扑过来，连忙抖抖嗦嗦地掏着钢笔说：“我写、我写……”在威胁利诱下，被捕的人大多写了“拥护汪主席和平救国主张，重新为党国效力，以赎前愆”的悔过书，只有陈觉吾、陆玄南两人虽受尽酷刑，却始终不肯顺从。陈觉吾的好友、伪感化院院长黄凯到处奔走图谋营救，但汪伪特工则坚持一定要交出其他的同伙方可“赦免”，遭到两人拒绝。1940年11月20日汪伪报纸刊登了伪政治警察署的布告：“渝方间谍犯陈逆觉吾、陆逆庆顾（即陆玄南）……藉参加和运党务工作之便，引诱和运同志，积极从事反间活动，并向各机关职员投寄恐吓信件，企图扰乱人心，取媚独夫……经呈准于本月19日上午10时，特派童科长国忠为监刑官，验明该逆正身，押赴雨花台执行枪决。”

抗战胜利，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为陈、陆二人举行了追悼会，陈立夫为陈觉吾写了挽联：“孟曰取义，孔曰成仁，从容就死，大志以伸；六朝金粉，过眼如云，惟我烈士，姓字常新。”为陆玄南所写的挽联则是：“疾风劲草，不挠不屈，慷慨捐躯，气吞胡羯；蒋山长青，秦淮常碧，烈士之名，千古不灭。”这是后话。

重庆国民政府对江苏省、南京市党部接连遭到破坏极为震怒，下令组织反击。章兆直、夏思临再次秘潜南京，重组市党部。军统特务邵某打入伪首都警察厅任督察长，在明瓦廊的家中架设了电台，除与上海军统人员取得联系外，还直接向重庆密报南京城内日伪活动的情况。汪伪特工人员多方侦察，终于在1940年年底将邵某抓获枪决，电台工作人员范星照叛变附汪。1941年3月，军统又派出忠义救国军南京行动总队处长兼督察主任王愈、行动员朱培生先后在南京大戏院、丽都花园投掷炸弹，炸死、炸伤多人。一时间，汪伪头目胆战心惊，南京全城岗哨密布、宪警到处搜捕，被株连者达数百人之多。汪伪特工在瞻园路富春祥客栈搜出炸弹，逮捕了王愈、朱培生、赵某及王、朱的房主宣德友、宣之岳母张宝泰5人，严刑拷打后全部处死，宣德友之妻张氏在被铁条烧穿阴户后自尽。此时，潜伏在汪伪财政部的军统特务彭盛木因精通日语，得以出席各种重要会议，将日伪秘密签订的各项条约、协定及会议记录全部密报重庆。……六朝古都的南京处处蕴藏着阴谋和杀机，蒋汪特工明枪暗箭，你来我往，斗法戏演了一场又一场，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始告结束。

林林

保镖林怀部为何刺杀张啸林

香港影片《大上海 1937 年》把张啸林与日本特务勾结，被保镖林怀部刺杀的经过搬上银幕，情节离奇曲折，险象环生。但这是艺术作品，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

1940 年 8 月 14 日下午一时许。上海法租界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214 号张啸林私邸天井里张的保镖林怀部同张的汽车司机王文亮（又名阿四）发生吵闹。林说，这几天他身体不适，浑身发燥，发了寒热，要求请假。王不准，叫他同保镖领班说。林火气上来，骂王不帮忙。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吵得不可开交。正在二楼接待杭州锡箔局局长吴静观的张啸林听到吵闹声，不禁探身窗口看个究竟。

“妈特个××！一天到晚吃饱了饭没事做，还要在我这里吵吵闹闹，简直是毫无体统！触那，老子好多叫点东洋宪兵来了，用不着你们哉，些快（要死了），一个个的把枪给我缴下，统统滚蛋！”张啸林向楼下的林怀部和王文亮厉声骂道。

林怀部向张诉说：“我来时米价 15 元一担，现时涨至 70 元，我每月工资 20 元，实在无法养家活口！”

张啸林一听大为光火，命令王文亮立即把他的枪缴下。

林怀部一面拔出手枪，一面抬头骂道：“他妈妈的，不干就不干！张啸林，你要当汉奸，待我送你上西天！”

骂声未停，枪声已响。只见张啸林身子向前一仆。林怀部几个箭步，早已登上二楼。张啸林倒在血泊之中。吴静观正在打电话报告巡捕，见林怀部上楼，急忙丢掉电话筒，前来抱住林怀部。林见状，一不作，二不休，扳动手枪扣机，“砰砰”二声，吴静观便一命呜呼！

林怀部打死了张啸林和他的“学生”吴静观，知道事情闹大了，匆匆下楼夺门而出，但终究还是被张啸林的保镖逮住，立即被送到法捕房。

法捕房接到张啸林被杀的电话，火速派出一批中西探捕来到张啸林私邸，但见张已直挺挺躺倒在地上，子弹是从喉部进眼部出的。眼珠被射了出来，甚是吓人。

张啸林私邸的枪声、喊声早已惊动了仅隔一扇月洞门的杜月笙私邸的留守人员，他们过去探视“张家伯伯”，一个个目瞪口呆，胆颤心惊。远在香港的杜月笙闻讯眼泪横流，悲痛万分，这毕竟是他多年来同甘共苦的把兄弟！

张啸林，浙江慈溪人。原名小林，乳名阿虎。张 20 岁那年，因在乡下混不下去，便举家迁至杭州府拱宸桥。拱宸桥一带是流氓地痞出没之地，张啸林原是游手好闲之徒，一到拱宸桥，便同这里的流氓地痞打得火热，专以寻衅打架、豪赌敲诈为生，后因打死人，举家迁往上海。

张啸林一踏进上海滩，即与上海滩的流氓臭气相投，称兄道弟，专干勾嫖串赌、贩卖人口、逼良为娼的勾当。后又拜了青帮“大”字辈樊瑾成为师，成为“通”字辈成员，在沪、杭一带广收门徒，发展黑势力。张身材魁梧，颇有力气，凶险毒辣，曾自比为奉系军阀张作霖。他的门徒凑趣捧场称他为“张大帅”。不久，张啸林又与黄金荣、杜月笙勾搭上，结为把兄弟，进而合伙贩运鸦片，大发横财。1924 年，黄金荣把法租界华格臬路两亩地基分赠张、杜，造了两幢洋房，张住东宅，杜住西宅，两家亲如一家。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张啸林伙同流氓、地痞组织了所

谓“中华共进会”，充当蒋介石屠杀工人纠察队的急先锋，于是成为蒋介石在上海滩的大红人。为了与蒋介石勾得更紧，他又与黄金荣、杜月笙、王柏龄、孙祥夫、陈希曾以及杨虎、陈群八人结为兄弟，这就是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老八股党”。

30年代后，杜月笙在上海的势力超过了黄、张，于是张对杜便产生嫉妒之心。1935年，蒋介石施行“法币”政策，杜月笙事前得到了消息，没有告诉张，自己趁机狠狠地捞一把，张对此深为不满。张是个武夫，脾气暴躁，行为粗鲁，动辄训人。而杜有时还能假装斯文，善于笼络人心，玩弄小恩小惠。因此，张的门徒纷纷改换门庭，投拜到杜门下。张的儿子张法尧从法国留学回来，张曾托杜向蒋介石引荐，一直未能得到蒋的重用，张以为杜不帮忙。如此等等，张、杜之间便产生了裂痕，张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也逐渐疏远。

上海沦陷前夕，蒋介石吩咐杜月笙拉黄金荣、张啸林去香港。黄金荣以年老多病为由，留居上海，闭门谢客。张认为这是他独霸上海的大好时机，不听杜月笙劝告，决定留在上海。“八·一三”上海军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张却躲到莫干山他的公馆避暑。此时，日本特务机关派人潜往莫干山与张密谈。不久，张返回上海，同日本侵略者相互勾结，组织了一个“新亚和平促进会”，派其门徒四出活动，为日本侵略者收购急需的煤炭、大米、棉花等重要物资，心甘情愿当日本侵略者的鹰犬，大发国难财。1939年冬，张取得日本特务机关支持，准备建立伪浙江省政府，自任省长。国民党“军统”特务探听到这个消息，决定除奸杀张。

抗战爆发后，军统局在上海建立“上海区”，特务多至千余人，除了干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勾当外，对为虎作伥的汉奸卖国贼也进行恐怖暗杀活动。

就在张啸林被枪杀之前，上海孤岛已有几个汉奸先后毙命，如伪上海市民协会委员杨福源、伪上海市民协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顾馨一、“黄道会”会长周树人、伪上海市政督办公署检查处处长范耆生，等等。而张啸林因与日本特务打得火热，早已引起军统的注意，戴笠曾经提示杜月笙要“大义灭亲”。只因他与张毕竟还有兄弟之情，不忍心亲自对张下毒手。杜几次劝张远离上海到香港，无奈张不仅不听劝告，反而继续同日本特务狼狈为奸，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其实，早在1939年，军统“上海区”的头目陈恭谢已经接到戴笠指令，要他们干掉张啸林。其后，军统局又多次发出同样的对张制裁令。

此时，杜月笙的门人纷纷加入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阵营，大搞“铁血除奸”恐怖活动。张啸林已成为他们狙击的重要目标。有一天，杜月笙的学生、军统特务于松乔奉军统之命，来到福熙路（今延安西路）、同学路（今石门一路）附近，守候了一阵子，只见前面开来一辆汽车，于松乔接到指示，马上走近向车后座射击。当他开枪的时候，一看原来车后座坐的是张啸林。等他看清，子弹早已飞射出去，他不禁思想一震，手忙脚乱。张啸林坐的是保险车子，车身护有钢板，车窗玻璃也是子弹打不穿的，因此没有被打死。但他却看清了开枪的是于松乔。回到家里，惊魂未定，破口大骂杜月笙不讲交情。于是，张、杜两人的结冤日深。

张啸林不遗余力为日军采购急需物资。他与儿女亲家俞叶封一搭一档。俞原是一个缉私营统领，同张攀上亲后有恃无恐，为张四出奔波，搜刮民脂民膏。他的活动也早已为军统特务所掌握。军统局决定先干掉俞叶封。那一

夜，俞叶封照例到更新舞台，为某女名伶捧场。俞正聚精会神地听她唱戏，听到开心处，情不自禁地击节拍手。蓦地包厢里响起机关枪声。俞急忙向前一仆，趴在地上。枪声过去，睁开眼睛，自己安然无恙，可是陪同他来的“久记社”名学友吴某身上已中数弹，当场气绝身死。俞如丧家之犬，急急匆匆逃回张公馆。张见状，劈头便骂：“×××，天底下女人多的是，你热昏了呀，连×××这种白虎星，你也要去×！”

俞叶封被杀未遂，这不能不引起张啸林的深思，他何尝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也会被军统制裁！但此时的张啸林已利令智昏，他同日本特务的勾结越来越紧，采购范围越来越广，生意越做越大。1939年夏天，他又借避暑为名，躲到莫于山张公馆。一回到上海就大肆招兵买马，发展黑势力，并把他的保镖增加到20多个。林怀部就是在这时招进来的。

林怀部何许人也？他原是法捕房的一名华捕，其父曾为北洋军队的团长，与张啸林颇有交情。张曾出资赎过一名妓女，她后在林怀部家当婢女（原以为是林的姐姐）。张60岁时，林母曾备丰厚的礼物向张祝贺，林即拜张的司机王文亮为老头子，并恳求王推荐其到张家干活。张念林父生前与之交情不薄，就安排林在门口看门，月薪20元。七八个月后，张有一保镖缺职，林就向张“毛遂自荐”，说他在当华捕时，射击屡得当局奖状，对使用手枪颇有经验，要求填补保镖职司。张见其枪法不凡，即允其请。

俞叶封不思悔改，他早恋上了那个女伶，照样每天去为她喝彩捧场。1940年年初一天晚上，俞叶封兴致勃勃地来到更新舞台，坐在楼上第一排听她唱戏。这晚她唱的是《玉堂春》，清脆婉转的唱腔使全场鸦雀无声。俞叶封更是眯起眼睛在听他心爱的人一曲绕梁。没有想到就在他的邻座，军统特务却悄悄地拔出了藏在腋间的手枪，对准他的心脏部位，“砰”的一枪。台上台下一听到枪声，顿时秩序大乱。在场的巡捕、包打听却依然袖手旁观。军统特务执行任务完毕，混杂在乱哄哄的人群中撤退了，留在座椅上的是俞叶封的那具尸体。

俞叶封在大庭广众中被杀，震动了上海滩。张啸林兔死狐悲，惊慌万状，他已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将至。从此足不出户，加强戒备。但是，流氓成性的张啸林实在熬不住这种寂寞的日子，每天晚上还是要到大新公司五楼俱乐部里去消遣、赌钱。出门回家，总是有10多名保镖分坐三部汽车，首尾相衔，为他开路。有一天晚上，当张啸林的车队开到善钟路（今常熟路）、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交叉处，突然亮起了红灯，张的车队不得不停下。就在这一刹那，埋伏在街角的军统特务手提机枪猛烈射击。张的汽车司机王文亮见状，吓破了胆，但他又异常机警，立即猛踩油门闯红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汽车飞驰而去，张啸林才得以免于乱枪之下。

虽然，张啸林逃过了这次鬼门关，每天闭门在家，连晚上也不敢再出门，可是，他终究逃不出厄运。就在这一年的8月14日，他的保镖林怀部一声枪响，结束了他的生命！

林怀部为什么要杀张啸林呢？对于这个问题，从目前的情况看来还没有弄清楚，但笔者以为同军统特务是有关系的。

据林怀部被捉拿归案的自供，他仅仅是为了每月20元工资太低，难以维持生计，又加上其时请假不准，遭到张啸林的辱骂，因而出于一时的义愤而开枪打死张啸林的。从林的自供看来，似乎没有什么特殊的政治背景。

杜月笙的姑表兄弟、杜宅的总管家万墨林在70年代撰写的《沪上往事》

（台湾中外图书出版社出版）书中说：“林怀部和我毫无渊源，而且彼此并不认识，可以说连泛泛的点头交情都没有。”“他（林怀部）杀张大帅和吴金桂（即吴静观），纯粹出于发泄私忿，并未接受任何方面的命令或嘱托，充其量只能说‘汉奸国贼，人人可以诛之’。一时激于义愤锄奸报国而已。”章君毅著的《杜月笙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说，杜月笙听到张啸林的死讯曾经叹息地说：“张先生要当汉奸，他之死当然是罪有应得。不过，我心里明白，这一定是陈默（杜月笙“学生”、军统特务）他们交代林怀部干的，由我的徒弟杀了我老拜兄弟，论江湖义气，我实在站不住道理。”无论万墨林，还是章君毅都矢口否认林怀部枪杀张啸林与杜月笙有直接关系。当时“上海区”的军统特务头目陈恭澍在80年代著的《上海抗日敌后行动》（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更是列出种种理由，否认林怀部与军统特务的关系。他说当时军统“上海区”“所属的八个行动大队中，无论是真名、化名，从来没有林怀部这个人”。

然而，在陈恭澍的这本书中却另外披露一些事实，如他说1940年五六月间，曾经接到“行动第二大队”的报告，说“已经在张某（张啸林）家里布置了一条内线，也提到就是张某众多保镖中的一个，什么条件都没有，也不需要支援，一待遇有机会，便可相机行事。”张被杀后，陈恭澍又接到“第二大队”的书面报告：“由该队所布置的内线，已经发挥作用，完成了任务。”

这些材料可以说明，林怀部是由军统特务安插在张啸林身边的，林枪杀张也是由军统特务布置的。尽管作为“上海区”大头目的陈恭澍不知其详，但他手下的特务却是与林怀部有联系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军统特务杀张除奸的计划已定，至于由何人执行，特务人员可以自己找出合适的人选，陈恭澍未必十分清楚。林怀部自供否定枪杀张啸林与军统特务有联系，在于不敢得罪国民党政府。同时，还以为这样一来，可以得到军统特务系统的保释。

林怀部与军统特务的联系，还可以从《魔窟——汪伪特工总部76号》书中得到进一步证实。这本书是根据杜月笙的“学生”、汉奸汪曼云等在上海一监狱服刑期间所写的供词编撰的，1986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书中说：“张啸林的死，还是逃不了杜月笙，因为有万墨林轧脚在内。打张的刺客，就是张身边的保镖，这个保镖是由万墨林通过张的汽车司机介绍给张的。他打张决不是偶然的，而是经过精心布置的特务行动。”“不必说自然是得到杜的同意的，甚至是杜的指示。”杜月笙去香港后，仍然同戴笠有密切的联系，杜的许多学生也成为军统特务“上海区”的成员。而杜宅的总管家万墨林则亲自多次参加“上海区”的“铁血除奸”活动。就在张啸林死后不久，他被汪伪特务诱捕了，在一次同汉奸汪曼云的秘密交谈中，万墨林透露了真情，他说：“他们（指汪伪特工总部76号）问我两件事：一是傅筱庵；一是隔壁（指张啸林，因张住在杜月笙住室东隔壁）的事。傅的事（1940年10月11日，被军统暗杀），我承认的；隔壁的事，我没有讲（张啸林的被杀，万系奉杜命在暗中主持的）。”汪曼云说：“那好，隔壁的事你是千万不能讲的，因为关系到‘先生’的做人问题。关于这件事，如再问你，你还要咬紧牙关，不能讲的。”万墨林说：“这我知道了，曼兄，我自杀好不好？”汪曼云说：“为啥？”万墨林说：“杜先生叫人关照我的。”这些情况是万墨林当时亲口对汪曼云讲的。七十年代万墨林撰写的《沪上往事》一书中居然回避了这一事实，分明这件事关系到杜月笙的“做人问题”。杜有恩于刀，万隐瞒这段事实乃在情理之中！

施宣圆（第 246 页图为杜月笙（右）与张啸林合影）

一件牵动汪伪众头目的人命案

案情本来并不复杂：西药业巨富徐翔荪的次子为钱财手起斧落，杀死亲兄。国有各报记者的卷入，一批巡捕、特务的插手，一个比一个更有权势的汪伪汉奸的介入，案子变得头绪纷繁，轰动沪上。

华美药房地处上海福州路、山西路口，外观规模并不宏大，但店主人徐翔苏却是新药同业公会的主任委员，西药业中数一数二的巨擘。徐翔苏家住蒲石路（今长乐路），生有二女二子。长女为人较忠厚，没有出嫁，在家替父亲掌管家务。次女徐济华，留学德国学医，得博士学位，在其父的支持下，于巨籁达路（今巨鹿路）开了一家济华医院。长子徐济鸣，毕业于中法药学院专科学校，已经结婚，在药房里帮助其父管理业务，颇能谨守店业。次子徐济皋，年方二十，尚在南洋中学读书。徐济皋未婚而又染有富家子弟的纨绔习气，沉而于舞榭，与新华舞厅的舞女陈某打得火热，并想与之结婚，以图永好。陈某知道徐是华美药房的小开，家产巨万，买这买那，向徐需索甚频。徐济皋尚在求学，经济须依赖家庭，但为博取陈某的欢心，以践婚娶之约，不得不屡向家里要钱。徐翔荪时已年近花甲，虽然药房还是由他亲自主持，而款项的出入，均交他长子管理。徐济皋要钱总向管理经济的长兄伸手，为此兄弟之间不免时有龃龉。

1941年10月21日傍晚，徐济皋又向长兄要钱。徐济鸣因他近来要钱的次数越来越多，数额越来越大，就盘问其用途。徐济皋不得已如实相告，希望能得到长兄的同情。不料徐济鸣听了大怒，说要结婚也不能娶个舞女，有损徐家体面，于是兄弟之间大起冲突。徐济皋一时兴起，看到墙角有一把小斧头，也不及考虑后果，拿起来便对准长兄脑壳砍去。徐济鸣受伤倒地，血流如注，不省人事。徐家的人见状，急将徐济鸣送到巨籁达路济华医院。

徐济鸣终于死去。按理应将徐济鸣尸体送殡仪馆，但他伤痕显著，殡仪馆向由警察局管理，如发现尸体情节可疑，必须呈报，这必然会引来麻烦。徐家经与亲朋商量，决定将尸体送往法租界的同仁辅元堂验尸所。那是一个民间慈善团体，而由法租界当局监督，经常收殓路毙的乞丐，给棺埋葬，有意外事情发生，则报官检验。

徐家把徐济鸣尸体送去之后，又怕被验出因伤致命，凶手难逃罪责。于是用钱买通了同仁辅元堂的职员，把一个病死乞丐的尸体，拿来顶替，法医检验的结果，自然是“委系因病致死，并无别情”，尸体且已由家属具领棺殓。

此事徐家虽严加保密，除较接近的亲友外，谁也不知道有此伦常惨变的事发生，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事还是被徐家的一个厨师把它透露给法租界巡捕房包打听的狗腿子三光麻子。包打听认为这是个敲诈勒索的好机会，大有油水可捞，为了要抓到徐家的证据，先将寄放于殡仪馆里的徐济鸣棺材提出，再把徐济来抓进捕房，随后连徐济华也带进去。徐翔荪着了慌，就找抗战前上海特别市政府秘书，此时已落水做汉奸的耿嘉基（字绩之），请他去走法租界巡捕房法籍总办乔士办的门路。耿嘉基留学法国出身，吴铁城当上海市长时，他常代表市政府与法租界工董局打交道。但乔士办是个老狐狸，怕人命关天，将来事情闹大了，自己脱不了身，仅同意保释徐济华，凶手徐济皋仍在押。乔士办因不愿多承担责任，便把从殡仪馆提来的徐济鸣的棺材，送到台拉斯脱路（今太原路）验尸所，经法医检验证明明确是因伤致

死，于是把验尸单连同徐济皋向上海第二特区法院一送，撒手不管了。

徐翔苏不得不拚命花钱，想把徐济皋保下来，以延续徐家香火，于是又去走上海第二特区法院的门路。

就在这时，一些报纸记者的手也插进来了。徐翔苏是西药业的富户，家里出了这样的乱子，且关系到他一生的命运，对一些专干借机敲诈勾当的记者来说，真是求之不得的对象。这些记者，平时与巡捕房的包打听，以及包打听手下的那个三光麻子，是声息相通的，因而不但后来去找徐翔苏的人越来越多，且胃口也越来越大，甚至过去钱拿得少的，还去要求补足。徐翔苏被这些来来往往、大大小小的新闻记者弄得不可开交，怎能再办别的事？他便委托《申报》的一个记者总其成，包办此事。这个记者既敢包办，当然有些来头，他受托之后，自己先吃个饱，再来掰蟹脚——分赃。得人钱财为人消灾，开始时各报一字未登。

不久，有人给上海《平报》写了一封匿名信：“华美药房发生了胞弟杀兄巨案，如此伦信，责常巨变，何以报上一字不登？是否在华美药房的银弹攻势下，你们也被收买了？你们得到多少钱？”报社怀疑负责社会新闻的记者也受贿。这个记者声辩自己既未受贿，也不知有此事实，他为了证明自己清白，花了几几天时间调查，居然把案情经过写了出来，向报社交卷，并于第二天以本埠头条新闻披露，顿时轰动了整个上海。事情一经捅出，便弄得上海各报天天都有华美药房小开杀兄案的新闻，要是哪家报纸不登这项新闻，反像是告诉人家：“此地无银三百两”——已拿了徐家的钱了。

此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上海法租界隶属于法奸贝当的维希政府，与汪伪政府可谓“朋同类也”。且法租界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与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已先于公共租界的法院改隶了汪伪的司法行政部了。当时伪司法行政部的部长是赵毓松，政务次长是汪曼云，常务次长是李守黑。

华美药房杀兄案移交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后，司法部怕法院为承办这件案子出纰漏，使汪伪政府受舆论攻击，下不了台。所以伪政务次长汪曼云来上海的时候，曾把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院长孙绍康召去，要他对这件案子格外留神，千万不可给人话柄。孙说：“我为慎重起见，已决定把这案子交给刑庭庭长袁孝根去办。”汪听了很高兴，因为袁是自己的同学，平日办案还算谨慎。汪还不放心，又把袁找来，说：“敏人（孙绍康的号）把这杀兄案交你办，是为了慎重，部里对你寄以殷望，希望你好自为之，使我们法政同学脸上添光。”其实，这时孙绍康、袁孝根早已受贿，对如何办理此案，成竹在胸。

戏是要经过搭配才能上演的。徐家所聘请的律师，实在也欠高明，先是教被告徐济皋装疯入疯人医院，后又教他到法庭上装傻卖颠，无论法庭怎样盘诘，他总是一声不吭。法庭装模作样地开了几庭，便草草判决有期徒刑十年。判决之前，行贿受贿已传遍全市，现在此案判得如此之轻，更是舆论哗然，一致认为其中定有隐情。其实就案情而论，如被告徐济皋当庭承认，是长兄动手在前，因防御过当，一时失手，并非有意杀人，这误杀罪充其量也不过判个无期徒刑，社会上也不至于发生那么大的反响，况且以后还有出狱的机会。而结果乃爱之适所以害之，被告当庭不答不辩，判决后又不上诉，反而显得情虚。

汪伪司法部为舆论所迫，急忙派一个司长来上海彻查。他一到上海，就有人送他一笔万元的厚礼，他往口袋里一塞，便悄然回南京复命，结论自

然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其实，伪司法行政部的部长、次长之间，正为接收上海公共租界的法院勾心斗角，属于汪记国民党的政务次长汪曼云，便抓住这件事攻讦属于投伪的青年党的部长赵毓松，说青年党受贿。赵毓松为了撇清自己，也想藉此“祸移东江”，便对汪说：“上海的情况你比较熟悉，我看这件事还是你派人去查一查吧！”赵的意思是：你派的人，也决不是不偷腥的猫，让你也陷进去，看你怎么办？汪曼云无奈，只好硬着头皮派部里的参事彭荣到上海彻查。彭荣是司法界的前辈，汪曼云的老师，20年代轰动上海的浦东林塘张欣生弑父案就是他经办的，据说在操守方面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汪就派了他去。汪曼云还怕彭控制不住自己，告以就里，郑重嘱咐千万别出岔子，随后自己也到了上海。

汪曼云到上海的第二天，耿嘉基就从汪伪特工总部负责法院同仁会的夏仲明处知道了，立即打电话约汪到自己家里吃晚饭“他们两人本是拜把兄弟，所以一见面耿嘉基就开门见山地对汪曼云说：“华美药房这件案子是我经手的，现在虽然弄得很糟，可是无论如何，你应看在自己兄弟的面上，非帮忙不可！至于徐家，当然会格外感激你。”说着，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张5万元的支票，并说：“这一点意思，是徐家要我转的，请你接受下来。”汪看了便拦着说：“老兄，这个钱我不能收。你插手这件事，很难讨好。我看你能推掉还是推掉的好，主要是给原判判坏了。要是当时认定徐济皋不是预谋杀人，把他判为无期，法律上也还讲得过去，人将来照样可以出来，事情也就不是目前的情况了。可是他们这样毫无顾忌地判了十年，犯人与检察官都不上诉，谁都会怀疑此中有鬼，无怪要哄起来了。如果重新判决，反使谁都不敢不判死刑，这岂不是弄巧成拙，你也轧扁头。这支票我收了，只会增加你的困难；于事无补，请你原谅。不过法院方面能不顾一切，只判了十年，胆子确也不小。”耿说：“当然他们是有所恃的。”汪问：“是你在支持他们？”耿说：“我哪够格！”

是士群，实际是夏仲明在替他办。”至此汪才恍然大悟，有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当后台，怪不得法院胆子那么大。汪说：“这件事既然你与士群都轧脚在内，我决不为已甚，这点我想你是会信得过我的。可是就案子本身来说，是没有希望的，你要留个退步的余地，士群那里你别说我知道底细，我也不会告诉他，免得大家兜不转。”

徐翔苏救子心切，单在法院方面就花了20万元。这笔钱，院长、庭长、推事、检察官以及书记官之间怎么分不得而知，可是所有的书记官，却没有掰着蟹脚，分到一个大钱，内部闹了起来。所有的书记官，以法院同仁会书记官伪名义，开了一个会，决议要彻查此案，目的是胁迫院长拿些脏款出来，使所有的书记官也能沾点袖水，否则就把它揭露出来，宁愿敲破狗食盘，大家吃不成，也算出了一口气。后来，审判记录簿落到彭荣的手里，使司法部要推翻这个案子的判决，有了根据。汪曼云知道这案子有李士群参与操纵，他与李既是结拜兄弟，又是李的副手（李兼伪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汪兼副秘书长），急想置身事外，便与彭荣拿了记录簿回到南京，向部里交差。

赵毓松根据这本审判记录，命令上海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首席检察官乔万选提出上诉。可上海第二特区法院院长孙绍康，因有李士群的撑腰，便有恃无恐，说乔是违法干涉审判，竟然出拘票要捕乔万选。乔这时也探知孙绍康的背景是李士群，知道这凶神恶煞是惹不得的，吓得逃到南京，躲在粮食部长顾宝衡的家里。短兵相接的阵势既已摆开，司法部只好硬着头皮

应战，将有关办案的院长、庭长、推事、检察官等，一律撤职拘案法办。这一下居然把孙绍康、袁孝根等人吓跑，逃到杭州一个特务训练班里当教员，在李士群的庇护下免遭逮捕。

这一个回合，李士群算是吃了败仗，为了报复，他便使出特务手段，制造假情报给汪精卫，说青年党由司法行政部常务次长李守黑主持，也在上海办特务，其矛头显然是对着我们国民党的。并搜集了许多青年党攻击国民党的小册子，一并送上。汪精卫组织伪政府所以要搜罗青年党这批党棍子，无非是用以作为多党政治的点缀，装装门面而已。汪的排他性是很强的，于是在 1942 年 3 月把赵毓松调到冷衙门伪考试院铨叙部当部长，坐冷板凳。

为了华美药房杀兄案，李士群用尽力气将青年党的赵毓松赶出伪司法行政部。这样，汪曼云不仅出了一口气，而且还想乘机取赵毓松而代之。汪精卫为了这件事对汪曼云说：“曼云，你来干司法，我很放心，但我为把住行政院这个舵，有一个方针，即凡是部长、次长之间同意而部长离职的，我不主张由次长来继任部长，否则每一个部都有次长，那部长、次长间的不协调势将有增无减，行政院这个舵我就无法把了。现在为了兼顾双方，最好由你推荐一个人来当部长，由他过渡一段时间，再由你来干，这样就不致乱了我的方针。”汪曼云根据这个指示，找到了一个替身，就是自己的亲家公、维新与汪伪两朝汉奸政府的最高法院院长张韬。

汪曼云为求事在必成，深怕自己向汪精卫推荐没有把握，还陪同张韬去找李士群（时为军委会调查统计部长兼江苏省主席），托他推荐。没有料到，汪精卫对张韬印象不好，结果横里杀出一个程咬金，由周佛海推荐罗君强接替赵毓松。

罗君强好沽名钓誉，自命为“青天大老爷”，他出任伪司法行政部长，为迎合社会舆论，即与李士群达成协议：把被告徐济皋改判为死刑，其他一概不究。他以伪司法行政长官干预审判，命令检察官以原判处刑太轻为由，提起上诉，以证明自己的“廉明公正”。由于此时罗君强与李士群对此案的处理已达成协议，阻力也就消失了。此案的上诉法院为上海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承办人员仰承意旨，重新审判，判决由十年徒刑一变而为死刑。至此，被告徐济皋最后只有寄希望于最高法院的一线生机。案子在最高法院还未判决时，罗君强在一次“行政院会议”上，以传闻向最高法院院长张韬提出质问，说外面有最高法院受贿，已决定将华美药房杀兄案的被告改判为无期徒刑的传说，到底有无其事？张韬当然极力否认。此后这案子如不维持原判，张韬就有受贿的嫌疑，这种政坛人事上的詹擦，最后造成本来罪不至死的被告非死不可的结局。

最高法院的判决是最后的判决，接着就是执行的问题。罗君强深怕有意外，执行地点不在原来羁押的监狱，而把犯人移到南市监狱绞杀。执行的人，也由法警改为财政部的税警区（罗君强是该团的副团长），真有些不伦不类。

杨阳（第 253 页为汪曼云照片，第 255 页为罗君强照片）

陈诚在云南“遇刺”

故世前在台湾担任第三届“副总统”、国民党中央第九届副总裁的陈诚（字辞修），抗日战争后期曾去过云南，居留了8个多月。他和身居三要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滇黔绥靖公署主任、云南省政府主席）的龙云，有过一段暧昧的交往，亲自导演了一场“司令长官遇刺”的喜剧。

陈诚来滇，出于蒋介石的决策。为了筹划滇西战场的全面反攻，并配合英军反攻缅甸，1943年2月12日，陈诚奉令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统率由五十三军赵锡庆部和五十四军黄维部组成的远征军第一路，以及上年由缅甸退入印度的中国部队。同年2月23日，又把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官黄琪翔，任命为副司令长官。黄琪翔统辖驻守滇西的十一集团军宋希濂部、二十集团军霍揆彰部，以及五十三、五十四军。这就是说，陈诚已经成为云南西部和驻印中国部队的统帅了。2月下旬，陈诚到达昆明。龙云和他认识，那还是抗战前夕到南京开会时的事。只知道陈诚来头不小，为人又很专横。然而，陈诚对龙云却很谦恭。每次戎服相见，都毫不含糊地敬军礼，开口龙主任，闭口龙主任，就像下级对待上级一样。一般认为，陈诚对龙云之所以谦逊有礼，完全是尊敬“委员长”的缘故，龙云不是“委员长”行营的主官么！

一次，陈诚借西郊潘家湾昆明广播电台的礼堂，召集所部少校以上的军官讲话。宋希濂、霍揆彰、黄维以及刚被任命为第一路远征军副司令官的第五军军长杜幸明等，好几位将军坐在第一排。他在台上谈到某某军该注意什么的时候，对总司令、军长们都直呼其名。“上下有别”的态度十分鲜明。

陈诚对龙云毕恭毕敬，龙云感受十分深刻，见面时，总亲热地唤陈诚“辞修”，也常对身边的幕僚们讲：“人说陈辞修飞扬跋扈，我看不见得嘛。他懂礼节，挺不错的。”

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最初设在滇西楚雄，不久逐步西进，一度驻扎弥渡。不过，陈诚最初留在昆明的时间较多。和中央军有关将领的会议，和负责武器弹药等军需供应的美军将校的磋商，大都在昆明进行。

龙云的为人、作风，甚至家庭琐事，他也更进一步地有所了解了。

一转眼就到了6月，天气逐渐热起来。一个星期天的中午，陈诚带着一名卫士，乘坐黑色轿车，动身前往30多公里外的安宁温泉，想调剂一下生活，散散心。

距离目的地还有四五公里的时候，汽车必须爬一个山坡。轿车行近坡前，从后面传来急促的喇叭声，催促前车让路。轿车司机从未遇到过这样放肆的人，因而不理不睬，换了排档，驶上山坡。没有多久，一辆美军军用吉普驶近前来，依然不停地按响喇叭。

坡路很窄，只能通过一辆汽车，即使要让也让不开。可是，吉普卒却像恶作剧般地，一直跟在后面，喇叭声也一直不断。

轿车终于爬上坡头。正在这时，车后发出几声枪响。轿车的左后轮泄了气，车身向后侧倾斜，不能照常行驶了。

吉普超过了轿车，停了下来。一个身穿美军军服的中年汉子从吉普上跳下，后面跟了个身着中式对襟短上衣的男子，气势汹汹地骂骂咧咧，走近轿车，要把司机拖出来揍。

卫士从中年汉子颊上留有明显刀疤的特征，认清了那是龙云的第三个儿子龙纯曾。他报告陈诚说：是“龙三公子”！

陈诚想了一想，推开车门下车，怒目瞪视着疤脸汉子。此人果然是龙纯曾，看到对手气度不凡，领口佩戴的黄色领章又和龙云完全一样，一下子倒愣住了。他的随行认得陈诚，吓得目瞪口呆，说不出话。

龙纯曾毕竟有点机智，短暂的惊诧过去后，考虑到事情的严重性，马上返身跳上吉普，调转车头，和随从一道，飞快地向来路溜走了。

陈诚早已听说过龙纯曾不听约束，在昆明横行霸道的所作所为。“打狗看主面”，为了照顾到和龙云间的关系，他默无一言，只是吩咐司机赶快换胎。可是，事情并未就此收场。

龙云一向严于教子。他有三个成年的儿子，两个恪遵父训，致力于各自的事业。唯独老三桀骜不驯，吊儿郎当。早前，龙云有意识地把她留在故乡昭通，让很有魄力的妹妹龙志贞予以管教。1935年8月，妹妹不幸病亡。龙云才把他唤到昆明，要他读书，将来投考军校，仍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子继父业，当军人。

龙三根本不想上学，在昆明东游西荡，爱上了滇戏。最初和滇戏艺人们来往，学唱老生。后来又爱上京戏，向名伶李鑫培学习谭派艺术，乐此不疲。

龙云为老三的不求上进感到恼火，多次训诫他悬崖勒马，要务正业。他表面连声称是，但阳奉阴违，事后依然故我。龙云公务繁忙，在家里又经常看不到他，毫无办法。

卢沟桥事变后3个月，云南组织第六十军，出省抗日。1938年10月下旬，滇军在鲁南台儿庄英勇作战，重创敌军的同时部队也减员过多。次年3月，龙云在滇编成新兵团，出省补充六十军。出省前夕，特意把龙纯曾唤来，谆谆告诫，阐明国势危急，正是男儿报国的时候。要他随团出征，勉励他到抗日前线，一来杀敌报国，二来实地学习，建功立业。龙三依旧唯唯诺诺，只想赶快溜走。然而，龙云决心已定，严令不许离开，等待出发。

在父亲逼迫下，龙纯曾挂上少校领章，以团附名义，和新兵团一道出省。每当经过一些大城市的时候，他都强邀团长看京戏。团长不敢违拗三公子的意志，只得奉陪。等到到达前线交兵，按龙云的原定期限已经超过了半个多月。

六十军军长卢汉，看到龙纯曾随团到来，也认为他“浪子回头”，同样勉励他留下，表示可以很快提拔他当个团长。龙纯曾假意说他老子要他速去速回，拒绝留在前线。回到昆明后，反而禀告父亲，卢汉让他仍旧返家。交兵耽延了一段时间，龙云感到诧异。不久从随同前往交兵的朱参谋口中，得知龙纯曾一路看戏、并拒绝留在前线的事，于是勃然大怒，命令朱参谋立即通知护卫营，把龙三逮来枪毙，治他贻误戎机的大罪。朱参谋不敢照令行事，倒先去通知了龙纯曾。龙纯曾虽然天不怕地不怕，但对老子毕竟惧怕几分。当下慌忙溜到城郊的小公馆中，躲了起来。直到年底，还是大哥龙纯武讲了情，才回家向老父磕头认错，龙云也才不再追究，只告诫他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1942年底，龙纯曾除了京戏外，又爱上了吉普车。这种帆布篷的小车，是驻滇美军带进来的。他神通广大，居然弄到了一辆，很快学会了驾车。从此，除了组织票房，客串演出京戏外，没有事的时候，成天驾驶吉普，城里城外，开快车兜风。他特别欢喜超别人的车，不管什么人的车在前面，他都按响喇叭要别人让路。从未有人敢得罪“龙三公子”！

这天，龙纯曾无事可做，驾车到温泉闯荡，碰巧跟上了司令长官的轿车。

他按照老习惯，要轿车让路。于是，发生了上面谈过的事。在归途中，随从说出对方是陈诚后，他皱了皱眉头，反责怪随从不早些告诉他！

当晚8点多，龙云正和夫人顾映秋，在家闲话家常，重庆突然打来长途电话，指名要龙主任亲自来接。

电话是“军委会”打来的。说是陈长官白天在温泉遇刺，询问凶手逮到了没有？

龙云大惊失色，立即命公馆副官打电话到安宁县政府查询，但电话打不通。接着又拨长官部留守处，值日参谋回答：陈长官上午到温泉，现在还没有回来！

把重庆问话和留守处回话两相参证，遇刺的消息不像是以讹传讹。高级将军碰到刺客，作为行营、绥署双重主任的龙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龙云更多关心的是陈诚的生命，因而立即派出两名副官，连夜到安宁去调查真相。

副官们回来的时候，已是次日上午11点多。他们报告说，温泉昨天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大事，只不过伤兵闹事打架，但很快就平息了。再打电话到留守处，答复仍是那两句“陈长官到温泉，还没有回来！”

此后几天，陈诚依旧消息杳然。龙云忧心忡忡，认为此事如果外传，势必影响军心民心，不利于抗战。但不便兴师动众，四处查询陈诚遇刺的真相，只能派出几个亲信副官，叮嘱他们守口如瓶，暗中查访。

奇怪的是，重庆也没有再辛追究破案。龙云自然也不会去电请示该怎么办。他如坠五里雾中，坐卧不安，为这件非常突兀的事感到纳闷，那五六天，日子是很不好过的。

又一个星期日到来了。张副官中午报告龙云，上一天，在美军负责后勤的史密斯少校的周末晚会上，陈诚终于露面，谈笑风生，根本不像刚遇过刺的样子。龙云这才放下心事，打算找陈诚询问一下真相，可是没有找到人。晚会之后，陈诚就离开昆明，回到弥渡的长官司令部去了（事后许久，当“遇刺”一事成为公开的秘密之后，有人认为，“军委会”的电话是陈诚的布置，意在吓唬龙云一下。是那非耶？未便虚拟）。

龙纯曾在温泉途中打爆了陈诚的车胎，事后并未受到深究。这件事，首先使当时在场的那个帮闲，趾高气扬。此人在兄弟伙间大事吹嘘，说龙三公子了不起，敢于要堂堂上将让路，还打坏他的轿车后轮，对方却不敢“开腔”！这一来，在偏僻坡头发生的事终于露了馅。张副官听到后，一五一十向龙云作了报告。

龙云气得咬牙切齿，即刻派人把护卫营长唤来，命令他马上带一排弟兄，去逮不肖之子。然而，得人通风报信的龙三，又重施故伎，撒下义务募捐戏不唱，躲得无影无踪了。

1943年10月，陈诚从滇西回到昆明，特在甫屏街口新闻银行三楼大厅，开一次盛大的“音乐晚会”（舞会当年的通称）。特别吩咐，给龙主任送一张请帖。

龙云是位禁舞论者，早在30年代后期，就下过禁舞令。后来有了来昆美军，跳舞逐渐风行。虽说大势所趋，禁不了了，但他对友邦的舞会邀请，很少参加。云南上层官员的晚会，则从来不敢请他。

舞会当晚，还不到8点，中外来宾几乎全部到齐，可就不见龙主任的踪影。

当晚的来宾中，有不少外国军官。老美严格遵守时间，到 8 点整陈诚估计龙云不会来了，于是宣布开场。

刚跳过两只曲子，龙云身着戎装，上到三楼。陈诚看到他来，马上高声发出口令：“立正，敬礼！”还亲自迎向前去，举手致礼。

龙云非常高兴，要求陈诚和客人们继续玩，他坐一会就走。陈诚只得把他央请到舞池边的沙发上坐下。坐了没有 10 分钟，感到无聊，乘陈诚和外国来宾应酬之际，悄没声儿地站起身来，步下楼梯，走了。

此后，陈、龙两位还单独会见过几次。龙云没有问他初夏时“遇刺”的真相，陈诚也从未提起旧事。官场如戏场，是“心照不宣”，抑或“难得糊涂”，局外人无从理解。

当年军内传说，陈诚出任司令长官，曾有过增建第二路远征军的打算。又说，他从前线回到昆明，是因生了病。看来，他确实是告了病假。

同年 11 月 23 日，重庆传来电令，陈诚的职务，由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卫立煌代理。至于第二路，始终没有建成。

从此，陈诚在云南就销声匿迹了。

万揆一（第 258 页图为龙云（左）照片，第 259 页为陈诚照片）

李士群死于谁手

公元 1943 年 9 月 9 日，权势显赫的汪伪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江苏省省长、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负责人李士群突然中毒身亡。许多人都认为李士群的死因是，李凭借手中所掌握的特工组织横行无忌，群好为争权夺利，反目成仇。周佛海遂勾结其心腹伪税警总团副总团长罗君强、熊剑东，并伙同日本上海宪兵队特工科科长冈村，在上海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将李士群毒死。其实，毒死李士群的真正主使人却是国民党军统局头子戴笠，及中统局头子陈立夫，参与这桩谋杀案的除周、罗、熊三人外，尚有原 76 号总部负责人、汪伪社会部部长丁默邨，周佛海的妻弟、汪伪财政部总务司司长杨惺华，周佛海的亲信、伪储备银行总务处长马骥良。

李士群所控制的特工组织从 1939 年 9 月挂牌成立起，除了镇压共产党和其他爱国人士外，还要用相当大的精力对付蒋介石的军统与中统特务，以确保汪精卫的所谓和平、反共、救国方针的实现；而重庆国民党政府为了打击汪伪政权，不断派出特务刺探情报，进行暗杀和骚扰。双方特工人员以南京、上海为主战场展开了激烈的争斗。由于李士群及其党羽大多数是原军统、中统的特务，因此对国民党特工的工作方法、行动规律了如指掌，在争牛中屡占上风。先后逮捕了国民党第四战区少将参议戴炳星，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南京区区长钱新民，南京区筹备处处长尚振声，第三战区特派员平祖仁，江苏省党部主任委员马元放，南京市党部负责人陆玄南、陈觉吾，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国民党及三青团上海市负责人吴开先等人。李士群软硬兼施、恩威并用，使不少中统、军统特务倒向汪伪政权，国民党在沪宁的各种地下组织屡遭毁灭性的破坏。军统特务程克祥、彭木在给戴笠的报告中说：李士群“不但在陷区作上述之罪行，并于杭州设置无线电侦察台侦查我军军事行动及密电码供给敌军，并派遣情报人员潜赴内地侦查我方军情及探取其其他有利于敌人之情报，供给敌方……”“历查已经发觉之罪行擢发难数，实为我国抗战唯一之巨奸，而其党徒散布于陷区各地，阻挠战略、献媚敌人又无所不用其极。”因此，戴笠、陈立夫对李士群恨之入骨，必欲去之而后快。曾命令特工人员不惜任何代价杀掉李士群，但都没有得逞。

1942 年 1 月，丁默邨为留后路，亲笔写下悔过书由中统特务赵冰谷带到重庆交给陈立夫，愿“悔过自新，效命中央”。周佛海不甘人后，也于 10 月托程克祥、彭寿请戴笠转呈蒋介石请求准许自首，并表示“愿尽力以图报”。陈立夫、戴笠接到两人自首书后大喜过望，但又深恐周、丁重演黄盖的诈降之计，遂制定了“分化陈（公博）周（佛海）、制周（佛海）防熊（剑东）”的策略，并密电周佛海、丁默邨务必设法剪除李士群，掩护地下工作人员。以此考验他们的自首诚意。

周、丁二人一则出于与李士群的利害冲突，二则要急于“表现点工作成绩”，取得蒋介石的信任，遂开始策划杀李计划。

丁默邨在担任 76 号总部主任期间与李士群积怨甚深，以后又为争夺伪警政部长之职结下新仇，故早跟李士群誓不两立。他指使其弟丁时便于 1940 年去暗杀李士群，因射击技术不精，未能命中。李士群以牙还牙，欲报一弹之仇，终于在这年 5 月的一天，趁丁时傻去南京夫子庙喝酒时，派出便衣寻衅斗殴，用酒瓶将其击伤致死。李士群当然知道了默邨不肯善罢甘休，因此处处严加防范。

其时周佛海为了扩展个人势力，起先拉李打丁，他指责丁默邨“意气用事”，“局势如此危急，……尚不顾大局，徒知逞意气争权势”，颇获李士群的好感。以后李士群和周佛海的矛盾日益尖锐，但他始终把丁默邨当作头号敌手予以戒备。

谋杀李士群的工作由周佛海主持，丁默邨从旁协助。丁默邨指使人搜集李士群的“恶迹”，到处煽风点火。如逢人便宣传李主持的清乡毫无成绩可言，最大的收获是个人的腰包被塞满了，等等，挑起汪精卫和日本人对李士群的不满。二是想方设法分化李士群的力量，铲除他的得力助手。抗战胜利后，丁默邨在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受审时，就直言不讳地供认：“那时陈立夫部长叫被告杀他（李士群）”，“乃采取分化政策使李力量减少”，“吴世宝（李的心腹、76号总部警卫总队长）是被告害的”。周佛海为杀掉李士群，绞尽脑汁，曾指使李的对头之一的罗君强下毒，但李士群没有上钩。这时，李士群的后台老板日本人晴气庆澈奉调华北，继任汪伪政府最高顾问的柴山中将对李士群尾大不掉、桀骜不驯很不满意，也想找机会除掉他。杨惺华、马骥良建议假日本人之手杀李，并且说他们与日本华中宪兵司令部特高科科长冈村很有交情，可以利用他。周佛海、程克祥、彭寿商议，认为这个办法可以试一试。杨惺华、马骥良遂找冈村，为周牵线搭桥。据周佛海在1946年11月2日受审时供认：一天，我请冈村来，谈到杀李时，“他说你有兵，在车站叫人杀他即可，我说不可。他说一月后来回话。他说有人掩护即可，我说你到上海工作即可。（一天）我请日宪司令部（的人）吃饭，当时（我）说上海复杂，你们派冈村主持方可。一个月后，他们请被告吃饭，又无回话。后来不知何故，派冈村到沪，几次想杀李，但防范严不能下手。冈村说下毒药，此药一星期方发作，叫被告请他吃饭，由冈村接他到百老汇大厦去谈话。谈到九点钟，即叫吃西餐，饭内早已下药，同吃的有五人，布置得甚机密。后来他吃了，4日后药死了，死后报告中央（指重庆国民党政府）”。冈村、周佛海请李士群吃饭，名义上是为李士群和熊剑东消除隔阂，重修旧好。本来李士群对这场“鸿门宴”是有警惕的，谁知去了之后却被熊剑东一副坦露襟怀、真诚相见的假象所迷惑，大着胆子吃了宴席上的东西，结果丢了性命。军统局1946年10月30日致首都高等法院的密电中谈到此事时说：“在程克祥、彭寿策动下，周逆佛海策动罗逆授以毒剂制裁李逆士群，但未成功。嗣复运用熊剑东进行，将李逆士群毒毙”。

笔者有感于以往有关李士群之死多系局外人所谈，其中难免有误，特将此桩历史悬案的内幕公之于众。（引文括号内文字系笔者所加。）

杨宗仁（第267页因为李士群（右）与丁默邨合影）

中将程泽润被杀内情

程泽润是抗战时期继韩复榘以及酆悌等人之后又一名被处决的高级将领。但他们的情况又各有不同，程之被处决内幕情节颇为曲折离奇。笔者时任兵役署视察，对程泽润一案内情知之甚详。今将这一史事的始末追述如次。

税警团虐待壮丁，惨不忍闻军政部兵役署主管全国役政，包括新兵（壮丁）的征集、补充、训练，以及国民兵组训等工作，署内分设征补司、役政司、国民兵司、视察室和秘书室等承办机构。兵役署中将署长程泽润还兼任中央训练团兵役干部训练班主任（中央训练团团团长是蒋中正，教育长是王东原中将）。程泽润毕业于早期的陆军大学。抗战前国民党政府为了拉拢四川军阀刘湘等人，曾派程回四川活动。程又是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的主要幕僚长之一，他们之间关系颇为深切。

当时征兵工作弊端很多，各地强拉壮丁和买卖壮丁等事件极是普遍，最突出的是各县、区、乡，特别是保甲长买卖壮丁和欺压群众的事件最多。另外有些部队拉丁、拉伕和吃缺贪污等现象也极为严重，据兵役署视察室统计，1942年2月至1944年2月两年中，全国就有2000多件兵役违法事件，而实际上还不止此数。

当时国民党政府财政部自设有税警团，这种部队不受军政部管辖，官兵的薪的、服装等由财政部解决，其兵员补充也是独立行事。税警团强拉壮丁、扣留行人，用以补充新兵的情况是很严重的。1944年夏，财政部税警团一个连队经过重庆时，临时驻扎在市区内一处大院子里。这个连的“新兵”大多是从川东沿途各县强拉和乱抓来的，其中有农民、行商小贩，有的已是中老年人。这些被抓来的“新兵”，都是穷苦的老百姓，他们一路上受尽了打骂虐待。

连队带兵的排长在大院子里动辄打骂“新兵”，“新兵”被罚站、罚跪是常事，有时甚至被捆起来抽打。这些被辱打的“新兵”苦苦地哀求，哭声，打骂声，求饶声，交杂地时时传于院外，惨不忍闻。

五十寿辰被传见，厄运到来 1944年夏的一天，正巧戴安国路过此处，听到院内传出的斥打声和哭泣声，他停下来向院里一看，一位军官（该连排长）正在打骂“新兵”，样子非常凶横；“新兵”则跪于地上，其中还有年约半百的老年人，情状悲惨。他赶紧驱车到南岸找蒋纬国谈此事。戴安国是戴季陶（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的儿子，他与纬国象弟兄一般亲近，经常在一起随便交谈。安国把所见所闻告诉纬国，纬国便将此事禀告其父。蒋介石听说此事，决定去看看究竟，并要纬国随车前往。

当时抗战前方已很吃紧，同时人民对打内战颇有怨言，故蒋介石的心情确实不太好。蒋与何应钦的关系日益趋向低潮，他们虽是留日同学，但从西安事变以来，蒋何之间就有了裂痕。有关兵役工作是军政部兵役署之事，何当时是军政部部长，蒋可能因之对此事重视起来。蒋氏父子从南岸驱车进入市区，很快便到达那个驻扎“新兵”的大院门口，他们一进门就看到院内乱七八糟的，一个军官正在斥骂“新兵”，见蒋到来才停止处罚“新兵”。蒋见状后一气之下吩咐随从人员去叫兵役署长立即到来。

碰巧这天是程泽润署长五十寿辰之期，正在新建的公馆大楼里庆寿。那天宾客盈门，非常热闹。前来庆贺的有来自各省的军管区司令（中将）、师管区司令（少将），以及部局和亲朋，一共开了几十桌酒席，济济一堂。正

当席间觥筹交错，频频碰杯之际，突然副官进来报告：“委员长召见程署长，请速往。”程不知为何事相召，今天庆寿，觉得很扫兴，但他又不能不去，便赶紧稳住宾客，请稍等。程随即戎装齐整驱车前往。岂知这一去，竟是厄运到来，从此身陷囹圄，走向死亡之路。

顶撞蒋介石，被囚军法部兵役署长程泽润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驱车来到驻军大院子时，见蒋气呼呼地站在那里。程上前立正敬礼，蒋沉着脸，对程看了一下，劈面就说：“部队这样虐待新兵，你们兵役署是怎么搞的！”程到院里就知是税警部队，不属他管，他立即回答：“报告委座，这是财政部税警团的队伍，他们补充兵员都是自己搞，不是兵役署管辖范围。”蒋一听非常生气，说道：“兵役署不管征兵工作，谁管！”蒋在训斥程的同时，举起手杖来打程，并连声说：“兵役署不管兵役，谁管！”这一来把程泽润打懵了，财政部的税警部队也确实不归他管辖，他今天过五十大寿，竟在此受此屈辱，因而也有些气恼，竟脱口而出：“委员长，你不能随便打人！我身为国家中将，如果犯法，有国法处理。……”蒋听到程的反驳，也愣了一下。蒋自掌握军权以后，发脾气时从来没有人敢于当面顶撞他的，除了西安事变他被扣之时。所以今天程敢于如此，也出乎他意料之外，他只好说：“好，不比你。”他接着说：“这个部队搞得这个样子，你就站在这里好好看看。”蒋介石说过这句话之后，便准备走了。岂料这一下反而使事情弄成僵局，因为当时蒋的话如同“圣旨”一般，他说的部属就得服从照办。这样程泽润就必须老是站在那里看着。

正当蒋要离开时，钱大钧（当时任军政部政务次长，兼任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他听说蒋视察驻军，也驱车来到这里）便赶忙向蒋请示：“他（指程泽润）老站在这里也不是办法，不如让他去军法执行总监部（简称军法部）报到，等待处理。”蒋看着钱大钧说：“好，好。”便随即驱车走了。接着何应钦部长驱车前来，安慰程说：“你先去军法部，我即向委员长说一说。”程这时只好带着懊恼不安的心情去两路口大田湾军法部报到，实际上是接受看押，听候处理。程泽润中将突然遭此打击，当时情景悲凉：满堂宾客尚未散，妻女盼归心焦切，将军只身投囹圄，戎马生涯从此绝。

多方营救终不赦，刑前暂归见爱妻程泽润向军法部报到后，该部上将总监鹿钟麟认为程主管兵役业务，对这种部队虐待新兵事也有一定责任，但无须用军法处理。鹿感到程顶撞蒋倒是件麻烦事，他想只有等蒋消气以后，再为程缓颊说情。程在军法部受到优待照顾，其部属和亲友都可以去看望，也可以同其他在押的将领交谈。程也知道各方正在营救他，于是安下心来等待。

此事很快为四川各高级将领知悉，他们多方进行营救，邓锡侯、王陵基、王缙绪、唐式遵、潘文华、杨森等川军高级将领联名请求蒋从宽处理，并请冯玉祥将军出面向蒋说情。蒋一概置之不理，并催军法部处决程泽润。不久，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调任陆军总司令（何是贵州人，这次调任陆总，实际上是遭蒋排挤离开重庆），何到贵阳后，立即打电报给蒋介石，请调程泽润出任陆总中将参谋长。蒋知如何为程解围，不同意调程前往，于是程仍被囚禁于军法部，而且开释无望。

鹿钟麟看各方营救无效，他想尽力挽救程泽润，由军法部把讯问情况和该部意见签呈送蒋。签呈大意：程所犯之罪，尚未构成处决条件，请予以从宽处理。军法部送上签呈后，不久蒋发下手谕，批示要军法部“立即处决”。军法部接到蒋的批示后，感到很为难，认为处决程有些过分，但又不敢违抗

蒋的命令。怎么办？没有办法想。最后军法部决定让程回家几天，与夫人和女儿相会团聚。但军法部决定保密，暂不向程说出即将行刑之事。

程被暂释回到家中，与爱妻和女儿会见时热泪盈眶，悲喜交集。程的夫人当时约 40 岁上下，身材颀长，亭亭秀雅，仪态端庄，是扬州名门望族之女。程对女儿非常钟爱，视为掌上明珠。为了培养其女成才，一度曾请视察室罗永权（当时罗任少校视察，广东人，曾在香港读书，后毕业于军校）教授其女英语，由此可见程的儿女心也是很重的。程与家人团聚约 10 天左右，就又回到军法部去了。程哪里知道，他这一去，竟是与爱妻、娇女的永别呢！

读手谕中将绝望，临刑唯求保整尸程泽润中将回到军法部后，军法总监鹿钟麟实不忍向程宣告刑期，但蒋的批示催逼甚紧，使军法部左右为难。鹿是冯玉祥旧部，在当时国民党政府中，是一位做事稳重，为人正直善良的长者。其时他对程很想挽救，但又无法救之。最后军法部决定执行蒋的命令，定期行刑。

行刑地点在重庆南岸，时间 1944 年秋天。在行刑之前监刑官问程有什么话要交待家属，可以代为转达。程问监刑官：他为什么要受处决，犯了什么法，根据哪条法律？监刑官听了一愣，只好说：“程署长，这是委员长下的批示手谕，要我们立即执行。”一面把蒋的批示手谕取出给程看。程至此终于绝望了，他知道蒋既然这样做，再说也无用，但他的心仍是不服的。戎马数十年，竟然落得如此下场，这是他最痛心的。他在感到绝望之后，不想再说什么了，他等待着行刑。监刑官一再催问交待的话，他才提出：不要打烂头部，要求保住整尸。监刑官接受其请求，立即下令行刑。

枪声过后，一个魁梧的身躯终于倒下了，一位执掌全国兵役大权的风云人物，竟作了枪下之鬼。真是：中将生命如草芥，戎马半生终遭劫。

程被处决后，其家属前来领尸埋葬，爱妻、娇女痛哭不止，这使多雾的山城，增添了几分悲凉。程死后，全家人很长时间处于悲哀之中，后听说程的夫人回到老家江苏，曾在沪经商。

李承勋

高秉坊“贪污”案

公元 1945 年 2 月，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以直接税署长高秉坊与人串通舞弊、挪用公款经商等理由，命令财政部长俞鸿钧将高撤职，送交法院查办。重庆地方实验法院根据 CC 系的旨意，判处高死刑。是为轰动全国的高秉坊贪污案。

一孔祥熙的忠实信徒高秉坊，号春如，山东博山县人。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早在北洋时期，高秉坊就结识了孔祥熙，并为孔所赏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北洋政府根据巴黎和会上签订的有关和约，要求日本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占领的山东青岛，归还中国。为此，政府专门设立了一个鲁案善后督办公署，专司接收善后事宜。孔祥熙时任督办公署实业处长，高秉坊就在该处任科长，二人开始共事。后来孔任青岛电报局长，高就做总务科长。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孔祥熙任实业部长，高随孔到实业部任职，担任总务司司长。高秉坊办事干练，勇于负责，深得孔祥熙的信任，一直在孔手下任“总务”工作。

高秉坊追随孔祥熙并建立了较深厚的感情。因而，喜欢在孔家子女面前以长者自居，有时在孔家子女头上轻轻拍一下，表示亲近，但一贯骄横的孔家子女对于高秉坊的爱抚并不领情，他们常哭着回家，向宋霭龄哭诉被高秉坊打了头，宋霭龄因此对高秉坊渐生不满。尽管高多次向宋说明情由，赔礼道歉，但宋依然耿耿于怀。

1933 年 11 月，孔祥熙改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本来高秉坊是内定的总务司长，高秉坊本人也认为凭自己和孔祥熙的关系，总务司长一职非自己莫属。当孔祥熙把拟定的司处级干部名单交宋霭龄过目时，宋对高任总务司长提出反对意见，说“你既喜欢高春如，给高什么位置都不管，就是不能给高做总务司长”。凭宋的几句话，高秉坊好梦难圆。一边是亲信，一边是夫人，孔祥熙权衡利弊，只好临时把总务司长和赋税司长的名字用笔勾转一下。就这样高秉坊稀里糊涂地当上了国民政府财政部赋税司司长。

二把冷差事办成热场面财政部赋税司按规定职责是管理全国赋税，但实际上是有名无实，有职无权，没有赋税的实际征收权。在财政部内，盐税有盐政司和盐务总局主管，关税有关务署负责，货物税有货物税署掌管；田赋及其他地方财政问题，是各省各自为政，财政部无法过问，赋税司更是无可奈何，所以说，赋税司是财政部这个热衙门里的冷差事，高秉坊坐的显然是冷板凳。

但是，高秉坊不甘寂寞。1934 年，高秉坊抓住召开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的机会，由赋税司提出整理地捐税的议案，认为各省地方捐税，名目繁多，需进行整理。议案获通过，决定在赋税司内设立地方捐税整理委员会，专司其事。高秉坊对于地方捐税整理委员会的设立，从内心来讲是非常高兴的，一方面可以堂堂正正地干预地方财政，另一方面可以提高赋税司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可以泄一下心头的怨气，但是地方捐税整理委员会毕竟是一个空架子，高并不满足，更希望抓到赋税的实际征收权，真正提高赋税司的地位。高氏智囊团成员，号称谋士的宁承恩曾在日本学习租税制度，对所得税颇有研究，十分理解高的心情，乘机向高提出由赋税司开征所得税。高对宁承恩的建议，甚感兴趣，地方捐税整理委员会的委员们也随声附和，很快向财政部长孔祥熙打报告，要求开征所得税，高甚至称：“欲图改革我国财政，非

从改革税制人手不可，而所得税之倡办，实负有此项重大之使命。”孔祥熙是蒋介石的聚敛之臣，有些财源当然非常乐意；同时，高秉坊一直跟随自己，他也常为自己没有给高委以实权而感到内疚，有此机会，也可弥补一下，所以孔祥熙对高秉坊之议非常赞成。

1936年7月1日，财政部设立直接税筹各处，负责筹备所得税的开征、所得税稽征法令的草拟订立、机构的设立、人员的安排。高秉坊以赋税司司长兼任处长。当时，征收的所得税包括三类：第一类是营利事业所得税；第二类是薪给报酬所得税；第三类是证券存款利息之所得。同时，筹备处拟定所得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10月，直接税筹备处改称所得税事务处，随后在上海、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四川、甘肃、陕西、青海、福建、江西、云南等省设立办事处。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所得税于1937年1月1日正式开征，从而迈开了中国直接税开办的第一步。

继所得税开征之后，1940年又开征遗产税，直接税体系的两大主干税种因而确立。随后，由于直接税业务增加，地位日显重要，1941年1月，财政部将所得税事务处扩充改组，升格为直接税署，高秉坊兼任署长。此后，直接税体系又增加了新的税种，如过份利得税、印花税、营业税。直接税署成为财政部重要而庞大的热衙门，高秉坊也成为财政部的大红人。

三开罪陈果夫及中统高秉坊创办直接税是在孔祥熙的支持下进行的。在直接税开办过程中，高秉坊依靠孔祥熙的支持，大胆工作，完善直接税的征收制度，确实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也因此引起孔祥熙政敌的不满，加之高本人一贯恃才傲物，也惹恼一些人，所以高秉坊在创办直接税的一开始就为自己种下了祸根。

开办直接税在当时是一件新鲜事，高秉坊为打开局面，在创办之初就提出“新税、新人、新精神”的办税宗旨，任人选才都要经过严格的选拔考试，否则不予录用，为此他开办税训班，培养训练直接税干部。高秉坊此举在国民党那种腐败的社会空气中确实给人一种新鲜感觉，但是也引起了国民党CC系陈果夫的不满。当时，陈果夫把中央政治大学视为培养党政干部的摇篮，不但CC系的嫡系要经过中央政治大学这座熔炉炼一炼，就是高考及格人员，在经过系列训练后，也必须到这一座炉上煮一煮，受训半年，否则会视为异己分子。陈果夫把持如此严密，岂容高秉坊另起炉灶培训干部？陈果夫多次向孔祥熙要求打消开班之议，所需干部由中央政治大学提供，或税训班由中央政治大学代办。高秉坊认为直接税署属业务部门，业务骨干应由自己培养，拒绝陈果夫的要求。高秉坊为断其借口，后干脆聘请黄埔系骨干分子桂永清担任税训班训育主任。桂永清是蒋介石的大红人，得此兼差，欣然接受。高秉坊有桂永清出面支持，心里踏实了，但再加引起陈果夫的嫉恨。

1942年，各省市所办的营业税奉令合并于直接税，高秉坊负责接管。当时，四川各营业税分局中，有6个分局长是中统分子，中统局长徐恩曾为维护中统利益，派人持亲笔信面见高秉坊，商请留用这6位中统分局长。高秉坊坚持己见，当即表示直接税人员应有一定资历，合格的一律留用，不合格的，就无法通融，同时对直接税人员兼任中统工作多有微词，实际就是没有答应徐恩曾的要求。正式接管营业税后，高秉坊坚决将其中的4个不合格的分局长予以撤换，另2个分局长也异地调动。高秉坊的举动令中统十分恼火。

高秉坊不仅和中统结怨，而且和国民党另一个特务机构军统也结下了怨

恨。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当时兼任财政部缉私署署长，财政部所辖各地缉私机构都由军统人员把持。军统人员往往借直接税名义敲诈勒索，以致怨声载道。直接税署各分局时有反映，高秉坊常常在原件上批注“请雨农（戴笠的别号）兄阅”，或“送戴署长”，但戴笠根本不买帐，依然我行我素。久而久之，高秉坊产生了对军统的厌恶情绪，他曾在财政部部务会议上多次建议，各地部属机关只写机关名称，不冠财政部之字，甚至称财政部的名誉就是被缉私署搞坏了，令戴笠十分尴尬。后来财政部终于撤销缉私署，据称缉私署被撤，高秉坊主张最力，所以令戴笠恨得咬牙切齿。

四委员长兴师问罪，高秉坊忍辱入狱 1945年初，孔祥熙失势，在内外压力下交卸财政部长等职，高秉坊是孔祥熙的亲信，一般人猜他会联袂下台，但是实际上高反其道而行之，依然在那里稳坐钓鱼台。孔祥熙下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党政学系、CC系倾轧、排挤，CC系原欲取孔祥熙的财政部长之位而代之，哪知政学系捷足先登，接近政学系的俞鸿钧夺取该职，CC系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盯住财政部直接税署这个肥差，而高秉坊此时仍不识时务，CC系旧仇新恨一齐涌上，他们下定决心要拔掉高秉坊这颗眼中钉。

CC系出于利己目的，四处罗织材料，诬称高秉坊贪污舞弊，植党跋扈，故意激怒蒋介石，欲假蒋之手将高打入监狱。蒋介石在收到CC系的诬控材料后，盛怒之下，竟在1945年2月初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用代电形式，电告财政部长俞鸿钧，称“直接税署署长高秉坊与各地分局串通舞弊，类多藉词挪垫，移以经商”，“查该署经办税款保证金，竟无确实收支帐目可稽，开征已逾四年，亦从未清查，擅自提公款，违令存放商业银行”，责令俞鸿钧将高先行撤职，交法院查办。

高秉坊接到财政部呈蒋介石旨意将自己撤职查办的指示后，十分震惊，于是前往俞鸿钧寓所探问究竟，说明原因，但由于高与俞关系浅，俞不愿引火烧身，只是面露难色，委婉推脱，连说“对不起，对不起”。高秉坊认为自己无指控之劣迹，所谓贪污舞弊纯属无稽之谈，所谓植党跋扈实指开办税训班，系歪曲事实，乃于2月中旬直接前往重庆地方实验法院陈述案情。但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司法丧失独立，司法行政部及法院均为CC系所操纵，法院当即按查办令质询数语，就将高扣押。重庆法院羁押高秉坊后，侦骑四出，搜查高住宅，查阅卷宗，传讯有关人员。然而，他们是无功而返，所获材料皆证明诬控各节与事实不符。但是，CC系为达到预定目的，欲置高于死地而后快，一方面积极向蒋介石递交高的“罪行”材料，通过蒋继续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命令重庆地方实验法院按诬控的伪证对高提起公诉。

1945年5月，重庆地方实验法院对高秉坊“贪污”案开庭审讯。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担任高秉坊的辩护律师，社会贤达沈钧儒等人参加旁听。审讯过程中，中统审讯人员态度粗野，缺乏必要财经知识，强词夺理，多次提出中统、军统的调查材料作证，最后竟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判决书进行宣判：称高“连续意图得利，截留公款”，“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面对无理判决，章士钊表示极为不满，并说：“如此暗无天日，这部六法大全尚有何用？”司法院长居正当晚召见司法行政部长CC分子谢冠生及重庆法院院长查良鉴，怒斥二人：“你们上下其手，对高秉坊案如此处理，司法之尊严安在？”

高案的判决引起社会各方注意，街谈巷议均认为司法有欠公正，量刑不当。社会贤达吴蕴初、李烛尘与山东同乡丁惟汾等代表迁川工厂等19个团体，相继具呈法院，要求公正处理，保障人权。奉命送高案到法院的财政部

长俞鸿钧此时也因自己过分明哲保身而使高蒙受冤屈，备受良心责备，认为诬控严重失实，特将有关事实材料呈请蒋介石饬最高法院慎重处理。与此同时，孔祥熙意识到 CC 系如此对待高秉坊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于是托当时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向蒋介石说情，婉言判高死刑有欠民主。由于各方呼吁，蒋介石在 1945 年 8 月令最高法院撤销原判，发还地方实验法院重新审理。

但是，CC 系对高案的压力是有增无减。高案二审开庭后，审判长李坚夫发现指控材料不实，对高秉坊表示同情，但又不敢违抗上级旨意，处于两难境地，本欲罗致一二伪证，判高几年徒刑交差，但最后又只得屈服 CC 系的淫威，判高无期徒刑，判决书称：“高秉坊连续对于主管事务直接图利，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1946 年 4 月，最高法院核准通过。

二审判决后，高秉坊仍不服。高秉坊的辩护律师中央大学法学系主任戴修瓚也认为判决依据是凭空推断，无营私舞弊之实据，遂多次向最高法院申请，要求复判，但没有下文。实际上也有军统人员私下认为对高秉坊的指控不符合事实。1946 年初，军统人员王抚洲接任直接税署长，发现在该署内无法发财，“以前外面都说直接税署是发时机关，进来以后才知道，制度订得死死的，光见数字，不见钱”。显然，CC 系一方面知道事实，但另一方面又歪曲事实，在这种情况下，高秉坊是难以得到公正说法。高秉坊也在整个过程中，目睹身受所谓司法独立的戏弄，自认在劫难逃，如继续申诉，也是与虎谋皮，所以放弃申诉，忍辱入狱。

五 狱中获“嘉奖”

1946 年 5 月，高秉坊被押送四川省第二监狱。入狱后，高备感寂寞。当时同监难友大多出身贫苦，没有文化。高秉坊遂与稍有文化者商议，共同进行扫盲教育，这样既可有益于他人，又可自娱，聊解寂寞。高的建议得到监狱典狱长的支持，并改善其居住等必要条件。高秉坊根据实际情况与人讨论施教方法，决定先开识字班，再开读书班。后又东借西凑各种书籍，开办监狱小图书室。缺少教材，他又亲自动手，自编成人千字课本，四川省高等法院通令各监用作教材，当时国内不少单位函索样本。由于高秉坊教学方法得当，因人施教，耐心细致，全监读完千字课本者达百人以上，基本脱盲。与此同时，高秉坊还积极参加护理工作。高秉坊的行为感动了典狱长石济时，1948 年 9 月，石将高的事迹上报司法行政部，称高：“编抄教诲教材，裨益监狱教化甚多，其服役病监看护，在传染疾病流行之时，不顾一己之危险，日夜护视”，“此种舍己为人之行为，殊属难能可贵，足可表率，可以劝善”，请求给予奖赏。1949 年 1 月，司法行政部明令嘉奖。

1949 年 11 月 25 日，国民党“最高法院”根据居正等人的决定，通知高出狱，高秉坊实际服刑时间为 3 年零 6 个月。

高秉坊离开重庆后，迁居湖南。1950 年 6 月，中南财经委员会任命其为中南税务专员，7 月正式到职。1954 年 9 月，改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兼省税局专员，直到其晚年退休。

刘秋阳

抗联名将李兆麟死于谁手

关于抗联名将李兆麟的被害，外界明了真相的不多。现将笔者当年了解的事实介绍于下。

1945年日本投降后，李兆麟出任松花江省副省长。当年12月国民政府接收东北，李兆麟出任哈尔滨市中苏友好协会会长。那时正是国共两党重庆谈判和重庆召开旧政协会议期间，李兆麟在各种公开场合，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破坏和平，撕毁双十停战协定，制造重庆校场口事件，迫害民主人士等劣迹。李的言论，引起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头子毛人凤的密切注意。

1946年2月3日，正是农历大年初一，通化县人民，张灯结彩，欢庆东北解放后第一个春节。原敌伪通化支会宣传部长孙耕晓，现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书记长，勾结已被苏军缴械的日本关东军第一二五坦克师团参谋长滕田宝彦，网罗了一批日军军官，组织了一支约3000人左右的暂编东北边区部队，制造了一起“二·三通化暴动”。这次暴动迅即被中共通化省委和通化支队扑灭了。“保密局”毛人凤以此为借口，诬指此次暴动系李兆麟主使，设计谋杀李兆麟。派人在中苏友好协会门前埋伏。结果，特务把李钧误为李兆麟，致使李钧遭到残杀。

首次行动失败，毛人凤再次密令哈尔滨市警察局长余秀豪负责谋杀李兆麟，余为广东人，曾任浙江警官学校国际警察教官。

1946年3月8日，哈尔滨市举行庆祝“三八”妇女节集会，李兆麟出席了大会，并在会上抨击了国民党政府破坏和谈蓄意挑动内战的行径。当晚回到家里，李兆麟患了感冒，第二天（3月9日）在家休息。这天下午四时，有人送信给李兆麟，原来是国民党哈尔滨市市长杨绰庵，邀约李兆麟到他寓所谈话。一会儿一辆汽车来至李宅迎接李兆麟。开至中苏友好协会附近，汽车突然抛锚，李兆麟的警卫员下车帮助修车。李兆麟下了车，步行去水道街9号（与中苏友好协会相距100米左右）杨绰庵的寓所。一进门，就碰上杨绰庵的女秘书孙格龄（她便是余秀豪秘密安置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以监视李兆麟行踪的“保密局”女特务）。李兆麟对她也十分熟悉，随即脱下大衣，交给孙格龄，便进入会客厅，与杨绰庵市长见面谈话。交谈中，孙格龄送进了一杯茶。李边喝茶，边聊天，不久即感到腹部剧痛，他脸色苍白，满头虚汗，随即瞳孔放大，倒在地上，中毒而亡。

李兆麟被安葬在哈尔滨道里一座公园里，公园被命名为“兆麟公园”。

章微寒

棉纱面粉大王被绑票记

公元 1946 年 4 月 25 日早晨 8 点多钟，上海街头晨风习习，人们急匆匆地奔走赶着上班。一辆黑色福特牌轿车从麦尼尼路驰向高恩路时，转弯处突然闪出 3 个身穿长袍、头戴礼帽、墨镜遮脸的人，从腰间掏出手枪，拦住去路。车门开处，两个持枪人立即将车中两个比较年轻的人推下车，却把另一个微胖的老人挟住，将一张红色“逮捕证”在老人面前晃了晃说，“奉毛森处长命令，请你到京沪卫戍司令部第二处去一趟！”老人无话以对，被架进停在路那边的另一辆轿车内，一溜烟向西郊驶去。这就是当年震惊京（宁）沪的中国棉纱、面粉大王荣德生被绑架案。

正当荣家一片慌乱之际，突然接到一个来路不明的电话，说荣德生在他们手上，必须立即付给他们 100 万美金才能赎回；如果不达此数，不得生还。接着申新九厂经理吴昆生在家中也接到一个来路不明的电话，要他尽快出面筹款赎人，否则荣氏性命交关。后来绑匪又不断打电话给吴昆生，催他赶快赎人，这才真相大白。

5 月 13 日，吴昆生又一次接到绑匪的电话，说荣德生给家里人写了一封亲笔信，放在亚尔培路祥生饭店底楼厕所内的洗面盆下。荣家救人心切，立即派人去拿，果然有荣德生的亲笔信一封，信上说：“此间长官颇为震怒，余求之再三，乃允捐资美金 100 万元，并想出一切办法。……唯有各厂摊筹，内申一厂出 15 万，申二厂出 10 万，申三厂出 10 万，申六厂出 15 万，共 50 万，倘不足，由申九帮忙。”并盼望家中，速即办理。

荣家接信后正在商措之际，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突然又接到绑匪寄来一信，附有荣德生写给家中的第二封信，说价款已减至 50 万美金，“此事必须克日办妥，不可大意，以全余之残年，否则余之老命不保，汝等亦恐遭不堪设想之恶果”。绑匪的信说，“限文到两日内切实筹妥，以清手续，否则除将令尊处以死刑以外，阁下等惟以制裁令出之，非谓言之不预也”。荣家接到此信后，更是惶恐不安，遂在电话中答应以 50 万美金赎人。绑匪告诉荣家交款和接人的办法已分别贴在静安寺成顺典当和南京大戏院门前的墙壁上，是写在一张招贴纸的背面。绑匪相约的地点是多变的，一次是约在神州旅社 316 号房交款，一次是约在李美路 400 号顺兴袜厂内。然而这两次均未见绑匪出面。

绑匪为什么要绑荣德生？不言而喻是为了敲荣家一笔钱。这在抗战刚胜利后的上海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先是被称为“钻石大王”的嘉定银行经理范田春被绑架，又有号称“五金大玉”的唐宝昌被绑架，再有广东富商陈炳谦的两个儿子被绑 289 架。荣德生的被绑架，只是绑票案日渐升级中的一例。但此案要价是最高的，几乎震惊了整个中国，绑匪要荣家出如此巨款也是事出有因。

抗战胜利后，荣氏企业纷纷“复员”开张，虽不能与抗战前的盛世相比，但经营规模很大，利润成倍增长。1946 年荣氏企业已有纱厂 18 家、面粉厂 16 家，以及一批其它工厂和商业机构。拥有纱锭 665278 枚，布机 3712 台，粉磨 330 部，日产面粉 83500 包，称得上中国的棉纱大王和面粉大王。资料表明，荣氏在 1946 年套进的外汇美金达 400 万元以上。仅以申新二厂和五厂两个厂为例，1946 年一年内分红利 5 次，每次分红额折合黄金 11000 两以上，仅荣家大房和二房就分到 30 亿元法币。这怎不令人垂涎三尺，顿时国民党的

军、警、宪、特眼红起来，荣家将横祸及身，当可预料。

荣德生被绑架时，绑匪使用了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官处处长王公遐的15044号车牌轿车，手持第一绥靖区第二处处长毛森的逮捕证，不言而喻，此中背景便复杂了。因此荣家不敢请警方出面“破案”，只得暗中与绑匪讨价还价。这时，荣德生被绑架的消息不胫而走，上海的大小报纸都作为头号新闻报道，舆论哗然，有人指责这是国民党军警联合搞的，纷纷要求警备司令部和警察局澄清事实。因而国民党当局也做出破案姿态，一时便衣警察布满荣宅周围。

荣家与绑匪几次联系后，再一次约定于5月25日下午在蒲石路一手交赎款一手交人。这一消息被警方截获后，当即派出数十便衣军警埋伏在蒲石路一带，以便一举截获绑匪和赎人质的巨款。不料蒲石路正是国民党京沪警备司令汤恩伯的公馆所在地，当汤公馆的警卫发现大批便衣人员埋伏在附近，认为将有不测之变，立即报告汤恩伯，汤即下令调来军队保护，军方和警方一时气氛紧张，绑匪一见蒲石路形势不对，早就溜之大吉。荣家却仍派出代表顾鼎言乘汽车带着25万美元到蒲石路赎人，车到路口停住，不断探头张望。这时警方便衣一拥而上将车扣住，在车内一只黑皮箱内搜出25万美元巨款，连款带人一起押往沪北警所。荣家说明此款是赎人质所用，警方反说“按法律规定，出钱赎命就是违法犯罪！”强行将装有25万美元的一只大皮箱扣留，并几次到荣家搜抄。这样一来，荣家更吓破了胆，人未赎回，钱又被截去。经多方疏通，警方才答应俟绑匪查获后，再发还赎款。

这时，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和绑匪“接上了关系”，相约于5月27日下午一手交款，一手交人。荣家赎人心切，不顾一切，委托詹荣培全权办理。27日下午，一辆挂着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官处王公遐处长座车牌号的轿车开进了申新二厂，停在厂一长办公室门前，詹荣培立即叫人把两只准备好的大皮箱送到车上，驶出厂门。第二天晚上，荣德生即被绑匪用三轮车送回了家。

荣德生总算保住了性命，在获释后就闭门不出，不敢作声。但事隔两个月，上海各报赫然登出荣德生绑票案已破，匪犯15人被捕的新闻。

8月4日上海《民国日报》刊出《荣案经过前前后后》一文，说这次参与绑架荣德生的案犯共有18人，其中15人已经落网，首犯有骆文庆、吴志刚、张少卿、黄阿虎、朱连生、詹荣培等人。事情经过是这样的：骆文庆和张少卿等蓄谋绑架荣德生已久，经几次策划，找到无锡人朱连生，因朱认识荣德生，由他带骆文庆等潜伏在爱多霞路江西路口察看荣德生面貌，又在环龙路雷茜咖啡馆策划绑架方案。吴志刚是华太企业公司总经理，朱连生又是吴的汽车司机。由于吴与淞沪警备司令部关系极熟，骆文庆等约他一起参与，由吴志刚出面向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官处处长王公遐暗通款曲，借得他的座车，又拉第一绥靖区第二处的黄绍寅入伙，弄到第二处处长毛森签发的逮捕证，一切准备就绪后，便潜伏在荣德生住处附近劫人。

4月25日上午荣德生被绑架，是由朱连生开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官处王公遐的座车前来执行的，同时参预行动的有骆文庆、张少卿、黄阿虎3人。当骆文庆持枪截住荣德生的汽车后，黄阿虎即出示逮捕证，张、骆二人马上将荣德生架进轿车，朱连生立即将车开走，经贝当路转入梵皇渡路，到中山路，在闸北水电厂附近下车，将荣德生架到小河边的一只小船上，推进舱内，不准出声。又于次日晚将他转移到曹家渡五角场公益里100号一座石库门院内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屋内关押，由一男一女严密监视。房主就是绑匪黄阿宝。

荣德生两次给家里写信就在这间小屋里。绑匪们和荣家通电话是由沪西大流氓郑莲荣打的。由于电话多次被警方窃听，又改用信件，并与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直接联系。因为詹荣培和骆文庆、吴志刚是多年旧交，在绑架荣德生时已接上关系，成为绑匪内线。所以当荣家巨款被警方截去后，詹就公开出面做赎人的“中间人”，致使绑匪们能在大白天公开开车到厂内取走 50 万美元之巨款。

绑匪在申新二厂取得 50 万美元后，进行了分赃。与此同时，骆文庆用汽车把荣德生送到福开森路霞飞路口，用一辆三轮车将荣送到麦尼尼路荣的女婿唐熊源家。

警方在荣德生被绑匪放回后仍继续布置侦查。不料绑匪黄绍寅得赃金 7000 元美金后，急不可耐地挥霍起来，被警部第二处特工人员侦知，遂将其逮捕。于是绑匪逐个被捕，其中 8 人被判死刑。所谓荣案至此了结。

此案虽被侦“破”，报载荣家被勒索之美金也被“追回”，然而事实上国民党军第一绥靖区、淞沪警备司令部、市警察局等从中牟利达美金 14 万多元。荣家实际追回之款项不到 20 万美元，而事后又有许多达官贵人向其索取酬金，实际总花销达 60 万美金之巨。当然这笔巨款荣德生个人无力支付，只好由申新各厂摊派，极大地影响到申新系统各厂的生产。无怪乎荣德生在破案后曾感慨地写道：“闻绑案已破，匪犯逮捕，指使者起意离奇，可见人心险恶，但恐犹非真相了”。

陆仰渊

缪斌为何第一个被作为汉奸处决

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 9 个多月，1946 年 5 月 21 日，在江苏苏州一声枪响，南京国民政府拿一名汉奸开了刀。自此之后，一批又一批汉奸在受审之后被送上断头台。先后被处决的汪伪军政头目，大约有 2700 多名。

这第一名被枪决的汉奸名叫缪斌。他于 1946 年 4 月 3 日受审。4 月 8 日宣判，5 月 21 日执行判决。整个审判过程似给人匆促之感。当法庭宣布判处其死刑时，他表示不服，在庭上喊起冤来。

缪死之后，为他叫屈的不乏其人。如曾任汪伪政府教育部部长的李圣五说过，缪的妻子做了一件蠢事，公布了“暗示重庆高级官员与他丈夫的和平使命有关的文件”，“这些文件显然使某些人感到很尴尬”，因而缪斌很快就被处死了。

缪斌是何许人？判处死刑是否量刑失当？拿他开“杀戒”，是否有什么阴谋？我们还是从缪斌其人以及他的所谓“和平工作”谈起。

本来名声不佳缪斌字弼丞，号丕成，1895 年生，江苏无锡人。其父缪建章是无锡城内希夷道院的当家道长。缪斌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南洋大学电机科。他成绩差劲，若不是校方通融，怕就拿不到毕业文凭了。

缪走出校门，去广东考进了黄埔军校。后受蒋介石识拔，担任军校教官。1925 年，参与发起孙文主义学会。后历任国民党第二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教导一团党代表、三师政治部主任等。北伐时，任王柏龄为师长的教导师党代表。该部奉命攻打南昌，行至牛行车站附近，遭到孙传芳的部队谢鸿勋师的伏击，被打得溃不成军。缪斌落荒而逃，找了个地方躲了起来。北伐军拿下南昌后，他才惴惴不安地到南昌去见蒋介石。出乎他的意料，蒋不但没有责罚他，还委以第一军副党代表之职（该军军长为何应钦，党代表乃汪精卫）。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缪斌充任过军事委员会经理处处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经理处处长等职。1928 年 11 月任江苏省民政厅长。在此之前，这一职务由茅祖权担任。茅去职后留下的遗缺，宋美龄举荐江苏省政府委员缪斌填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次讨论未获通过。据孙云年《北伐逃将缪斌怎样当上江苏民政厅长》一文（载《民国春秋》1993 年第 1 期），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以缪斌品行不佳，年少任性，不宜主持一省地方行政为由，极为反对，第二次讨论，因缪事先做了吴老头子的工作（据说是巧妙地将一张 5000 元的支票塞到了他的口袋里），吴不再表示异议。缪斌如愿以偿，以江苏省政府委员兼任民政厅长。

他本来年轻气盛，这回得志愈加张狂。民政厅长不为民众谋利，却“以官谋私”。利用其母六十寿辰，大事铺张，闹了三天三夜，趁机广敛钱财。据云，寿礼中小型金佛特多，苏南、苏北各县县长、局长得知其母是虔诚的佛徒，为取悦缪斌，争相以金佛为献。

缪斌刚刚在江苏省民政厅长的位子上坐热，就被人参了一本，说他借为母庆寿之机卖官鬻爵。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派人调查属实，缪斌受到革职处分。此后一段时间，他在无锡老家赋闲，百无聊赖，乃想到了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当时日本已侵占东北四省，正在华北步步逼进，国人抗日呼声日高。就在这种形势下，缪斌草就了一部长达 10 万言的书稿，名曰《中日邦交的历史渊源》。送无锡各报馆要求刊载，均遭婉拒，因他的这部“大著”实在是时不合宜。他于心不甘，便让其父缪老道的义子陈一新出面办了一张报

纸，连载他的书稿。这张野鸡小报无人问津，书稿还没有登完，报纸就停刊了。

为谋求伪职四处奔竞后缪斌到日本转了一圈。回国后撰《武德论》一篇，由开明书局出版，宣扬“武力即道德”，为日本军国主义张目。

“七七”事变爆发后，他跟日本人打得火热。有日本人劝告他，投靠日伪，乘时而起。缪斌本来就有待机而动、东山再起的念头，日人的劝说正中下怀。于是，他为自我推销、谋求职位而到处奔走，极力巴结王克敏之流（后来还有汪精卫等巨奸）。在以王克敏为首的华北“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谋得了“新民会副会长”一职，实际上成为该伪组织的主持人。连有的日本人也鄙薄其奴颜媚骨。今井武夫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他（缪斌）那毫无气节的样子，惹起中国同事们的鄙视。”

今井武夫为筹建汪精卫伪国民政府之事，于1939年5月返回日本逗留东京时，缪斌请其把他介绍给汪精卫。今井武夫曾给他的“忠告”，大意谓：阁下是新民会的最高领导者，公开打出反对国民党的旗帜。而汪精卫依然以国民党副总裁自居，并正在重建国民党政权，他还要继续打国民党旗号。你和汪精卫，“不是在主义上不能同一步调吗？”但缪斌不听今井武夫劝告，瞒着华北伪政权，投靠汪精卫等人，千方百计往即将成立的汪伪南京国民政府中挤。后取得了伪立法院副院长的位置。

缪斌一面在华北“临时政府”任伪职，一面钻进南京汪伪政府。由于有这种双重身份，他既受到华北“临时政府”的攻击，又遭到南京汪伪国民政府同事的指责，结果是两边不受信任和重用，处于有职无权地位。

招致周围不满的缪斌，同南京和北平的伪政权疏远起来。他企图秘密地跟重庆政府联系，其子还曾奔赴重庆。他开始对南京汪伪政府进行批评，同时对重庆政府鼓吹“日华和平”。至于他是否真的跟重庆最高当局搭上关系，还很难说，恐只是跟军统局下属单位的负责人有些接触。

致力“日华和平”

日本在侵华战争后期，颓势已日益明显，败亡的端倪渐渐显露。1944年夏，太平洋上塞班岛日军全部被歼，东条英机内阁被迫总辞职，小矶国昭内阁取而代之。新内阁鉴于战况对日不利，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作出了积极地与重庆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决定。并由宇垣一成大将以私人名义前往中国试探和平。宇垣于9月中旬出发，到了中国东北、华北、华中的一些地方。频繁活动之后，无果而返。小矶在失望之余，遂决定不假手他人，而由日本政府直接进行所谓“缪斌工作”，通过缪斌跟重庆政府谈判和平。

1944年10月初，缪斌在南京接连几次拜访新上任的日本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向他提出：“我受重庆政府的委托，愿为日华和平而尽力，因此请从中斡旋”。并要求重新使用被日本宪兵队封闭的无线电台。今井武夫并不相信他，但鉴于日本政府急切地要找到跟重庆政府和谈的居间人，几乎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故答应了他的要求。今井向宪兵队打了招呼，默许缪使用无线电台。

缪斌的电台启封以后，今井便着人监听，发现他只有几次和战线附近的电讯所交换了买卖物资的情报，而自始至终没有截获他跟重庆政府联系的密码电报或其他重要电讯。今井对缪斌能否代表重庆始终表示怀疑。

日本驻汪伪政府“大使馆”和有关陆海军派出机关对缪斌的历史、现实表现、政治背景等进行了调查、审核，“共同对这个人选抱有畏惧之感，立

刻觉得不可信任”。

但是日本政府寄很大希望于“缪斌工作”。对缪斌的“重庆代表”身份，宁信其真，不信其假。

这时传出缪斌所提“和平条件”：作为和谈前提，应立即解散汪精卫的南京政府，建立“反映民意”的南京留守府。

1944年12月7日，日本驻汪伪政府的“大使”和两名武官回到东京，立即拜访了外务大臣重光葵，向他汇报了缪斌的情况。随后，外务大臣向小矶首相建议，停止“缪斌工作”，但不被小矶接受。于是“大使”及两名武官于12月10日直接拜见小矶首相，向他报告他们所知道的有关缪的情况。听了“大使”等人的汇报，小矶大为恼怒，质问道：“诸位为什么非反对日华和平不可？”“大使”等声辩说，他们身在战场，经常体验到战争的变化，比日本国内的人更加痛感到“日华和平”的紧迫性。但以缪斌作中介人是否得当，是一个值得研讨的重要问题。这次“和平工作”恐怕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万一失败，则时不再来。“希望政府不要盯在偶然拾到的缪斌路线上”。但小矶利用缪斌进行“和平工作”的决心已下，怎么也动摇不了。

早在9月5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就讨论了跟重庆政府谈判和平时日方的“让步条件”。内容包括：“同意蒋介石返回南京，建立统一政府”；“如在华英美军队撤走，帝国亦全部撤兵”；“关于满洲国，不变更现状”；等等。

1945年3月，小矶首相派他的士官学校同期同学，年迈的山县初男大佐，到中国邀请缪斌赴日。山县抵上海后，特地转南京拜访今井武夫，以闲聊的方式征求今井对缪斌的看法。今井“直率地讲述了来自当地各方面的情报”，及他对缪斌的观察。山县没有任何表示。16日，缪斌由上海抵东京，向日本方面提出了“日华全面和平实施方案”，主要内容为：取消汪精卫的南京政府，建立留守府。重庆政府和日本政府通过该留守府谈判日本停战和撤兵问题。谈判结果俟重庆政府还都南京后公布之。

缪斌的方案被提到3月31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进行讨论。陆军、海军、外务各大臣及统帅部一致反对该方案，理由是：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原先曾决定，对重庆政府的“和平工作”，必须通过汪伪政府进行，以缪斌作中介人不合适，此人不可信；再说缪斌所提条件中，关于撤兵一项，有日本撤兵之后，英美不撤兵之忧。4月3日，天皇裕仁亲自过问了缪斌问题。在缪斌的身份、资格及其与重庆政府的关系尚未弄清的情况下，就让他去日本，并将其作为贵宾安排在迎宾馆下榻，任其暗中活动，对小矶内阁如此轻率的做法，天皇表示不满。小矶内阁不得不在4月5日宣告总辞职。由于“中国的一个怪人物”的关系，内阁被迫总辞，这在日本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随着小矶内阁的倒台，缪斌也被赶出了日本国境。

《周佛海日记》中的缪斌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缪斌跟周佛海的交往很密。这期间，周佛海在日记中9次记录了缪斌跟他的接触。

据周佛海日记，汪伪国民政府成立之前，在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担任新民会副会长的缪斌，不时地到汪精卫、周佛海处走动。1940年2月21日，他赴上海，跟周谈了新民会问题，汪精卫还设晚宴招待了他。隔了三天，周回访缪斌，与他谈了华北情形。当时汪伪政权即将以伪“中央”形式出台，华北地区的伪政权（当时尚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很快就要换一块“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招牌），名义上将归汪伪中央领导。故缪斌要抱汪

精卫等大腿，而汪伪则要利用像缪斌这样的人，把手伸到华北地区。

汪伪政权于1940年3月30日成立后，缪斌往周佛海处跑得更勤。7月27日下午，缪访周佛海，广泛地交谈了华北的各种问题。就在这次会见中，周佛海允诺每月送缪斌“机密费”万元。这是汪伪对缪斌的笼络和犒赏。说明缪斌此时已心甘情愿供汪伪驱策了。

此后一段时间，缪斌曾卖力地为汪伪政府游说江北李长江等归降。1940年10月26日，缪斌由北平经南京赴苏北泰州，百般劝说李长江投奔汪伪政府。11月13日，缪斌到上海向周佛海汇报了劝诱李长江投顺的情况。周对缪的这次劝降活动寄予很大希望，他说：“此事如能办到，江北共党或不致蔓延长也。”12月1日，缪斌又向周佛海报告了日前赴苏北会晤李长江等的经过，并谈到了华北及“东亚联盟”等问题。不久，其劝降活动有了结果。1941年2月13日，李长江在泰州率部1万余人投汪。3月6日，缪斌带领李长江到南京见周佛海。周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晚，缪斌率李长江来见，希望甚大。渠为率部首先参加和运者，不予以相当满意，无以广招徕[徠]；……当慰勉之”。随后，汪伪“军委会”将李长江部改编为第一集团军，委李长江为“总司令”。缪斌因诱降李长江之功，被任命为汪伪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

汪伪政府原拟给缪斌安排一个“华北政委会内务总署督办”的职位，因“华北政委会委员长”王揖唐的反对而作罢。周佛海1940年12月4日的日记写道：上午接见缪斌等，“旋犬养（健）来，谈华北方面对于缪斌长内务督办表示不赞同，其理由谓缪斌不应来京活动。此纯系王揖唐之鬼怪！此獠不去，华北特殊化不能减轻也”。周佛海对王揖唐在缪斌出任“华北政委会内务督办”问题上作梗，深表不满，在日记中把王揖唐痛骂了一顿。但前引《周佛海日记》中一段话也透露，缪斌为谋取“华北政委会内务督办”一职，曾不惜卑躬屈节地到南京汪伪巨奸处钻门路，通关节。

缪斌在被日本政府召到东京谈“日华和平”问题之前，就于1944年11月16日，前往南京见周佛海，以重庆方面“代表”的身份，提出和谈的条件。缪称：重庆政府希望日本于美军在中国登陆之前，先行撤兵。周佛海回答说：日本撤兵一事，他本人可极力办到。但日本第一步撤兵之后，如重庆方面并无和平表示及相应动作，则日本方面会说，重庆乘机将日本军队逐退，以收复失地。这样要想使日本方面作第二步撤兵便不可能了。周佛海告诉缪斌，甚盼重庆秘密派一负责人前来洽谈和平问题。缪说不必另派，本人即可代表重庆。周一听，认为他口出狂言，不再与他就这个问题继续交谈下去。周在日记中写道：缪斌“真妄人也”。

看来周佛海对于缪斌自称是重庆政府跟日伪谈判和平的代表，根本就不相信。

第一个公开受审的汉奸缪斌从日本回到上海以后，把东京之行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四处吹嘘本人受到日本政府的隆重接待，又把他和东久迩宫及其他日本高级官员的合影放大，带在身边，逢人就给观看，借以炫耀、抬高自己。他这种无耻行径，为有爱国心的人们所不齿。

很快日本战败投降。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缪斌被作为汉奸逮捕。1946年4月3日在苏州江苏高等法院受审。

这天下午2时，江苏高等法院派6名武装法警至司前街看守所，将缪斌押至法院候审室。矮矮胖胖的缪斌，穿酱色长袍，藏青色夹裤，黑皮鞋，剃

着光头。一路上，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审判从2点半开始，至6点半结束。缪斌妻子项秀锦参加旁听。讯问中，问到职业时，缪答称：“一向是干政治的”，1922年加入国民党以后，从未开除党籍。石美瑜庭长问：被告已由检察官依惩治汉奸条例第二项第一款及第十三款起诉，你有何话说？缪斌大逞词锋，俨然演说，声称：他由军统局解送法院，撰有《我的对日工作》一书，甚愿借此机会，公布10年来对日策反之秘密。又云：他信奉的是“明哲保群”，而不是“明哲保身”。组织新民会，即为了从事策反，也即为了“明哲保群”。缪滔滔不绝地进行狡辩。庭长制止他作长篇大论，讯问改为一问一答。缪自称，1943年8月由军统局一站长及一“女同志”介绍，加入军统局，此后向军统局密报过几次，曾获嘉奖记功。缪斌甚至大言不惭地说，他对日策反，是有功于国的。庭上出示军统局电报，云缪斌对该局“略有贡献”，但缪跟军统局的接触是在日军节节败退之时，不免投机取巧，仍请依惩治汉奸条例予以惩办。缪斌要求向军统局调查证据，庭上驳回其要求。又宣读蒋介石手谕：将缪按律办理。检察官说，缪自辩各点，均无佐证。缪的三名辩护律师各作了一通辩护，都说至少应按“汉奸自首条例”办理，对缪从轻发落。缪本人则说：起诉书“前后矛盾得太厉害，要求调查证据，这个样子太冤枉了。”

4月8日下午，江苏高等法院宣布对缪斌的判决。2点10分，庭长石美瑜当庭宣布：“缪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这一判决，缪大感意外，不待惊魂稍定，便急急声明：“判得太重，请求复判。”

宣判总共才用了6分钟。

5月21日，缪斌作为第一号汉奸被枪决。

缪斌被处死后，日本前首相小矶国昭作为被告，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就缪斌问题交代数点：1939年他和缪斌见过两次面，缪斌是热心的“日华和平”论者，同时又是重庆方面要人何应钦的亲密朋友；缪斌在汪精卫的南京政府中，由立法院副院长调任考试院副院长，冷落一边，理由据说是因为和重庆政权有联系；据说缪斌巧妙地用无线电收发报机同重庆一直保持着联系；缪到东京后，曾向他出示重庆的电报，内容为可以去东京，但除了重庆早已提出的讲和条件外，不能提出其他条件。

小矶国昭接连用了几个“据说”。由以上交代内容看，小矶似还不能证实缪斌赴日谈判“和平工作”，是受重庆最高当局之命。

东京审判过了多少年，原日本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日本军方高级特务今井武夫（此人对缪斌作过考察），在其回忆录中，对缪斌1945年3月赴日时的身份，有如下推断：“传说由于蒋介石主席特别嫌恶贪污行为而被撤职的缪斌，不能认为他能得到对日交战已经七年、日益夸耀精诚团结的重庆国民政府最高干部的信任，即使进行联系的话，充其量只不过是充当谋略机关的唆罗进行活动而已。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也证实了这一点。”

自然，缪斌1945年赴日问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尽管如此，他作为汉奸被处决，是一点也不冤枉的。李圣五为他喊冤，这不奇怪，可理解为狐死兔悲。至于为什么要从数万名大小汉奸中把他第一个拉出来草草审判后枪毙，这可能跟他在捕前四处宣扬自己赴日谈判和平条件乃受重庆最高当局之托有关。他的多嘴多舌有碍国民党高层人物的声誉，为他们所忌恨和不容。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缪斌是自速其死。

夏里（第 295 页图为繆斌照片）

金号被盗

夜。大火！死尸横陈！湖南省邵阳县的人们，在惊愕中撕下了 1947 年 5 月 4 日这一页日历，可怎么也排遣不掉昨夜恶梦般的情景。

谁能想到，昨天还是高悬着金字招牌的永和金号，今晨却大部成了废墟！

破砖残瓦中成了焦炭的学徒金海水的尸骸，惨不忍睹。在火场前后幸存的房屋中，有五人昏迷，奄奄一息，有的口流涎水，似是中毒。“啊！”消防队员忽地惊叫起来。人们一看，是店员饶文清死于血泊之中，浑身刀伤十几处，两眼直瞪不闭。

小小的邵阳，谁不熟悉经营金银珠宝的永和金号，以前原是陈汉章等合资开设的同和金号，只因营业不振，顶让于永和。永和新任经理杨振华因常坐镇衡阳联号，乃派田瑞清主持邵阳店务。店中营业一帆风顺，内外协调，何以出此不幸，人们一时大为不解。

有仇家？他们一未与人打过官司，二未与人口角，从无冤家对头。有奸情？老板、店员，大小伙计人等，一向没有婚外的男女瓜葛。是强盗进城？夜间毫无动静，更未听得一声枪响。人们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就象那火场的烟雾，迷离难辨，猜不出半点头绪来。

经地方政、警、法、商各界现场勘察后，死者被检验收葬，昏迷未醒者急送医院抢救，细心的县长还特交待下属，对他们实行保护性隔离，严禁外人接触，以防再生枝节，干扰侦破。死的死，昏的昏，还有一名徒弟呢？到哪里去了？从衡阳赶来的经理杨振华，发现喻让贤不见了。论情理，凶手何以放过他？论身份，他不够做人质的条件。左思右想，不得要领。

正当经理百思不解的时候，他忽然听到一个消息，一位认得喻让贤的救火者说，他最早出现在火场外边，满脸灰尘，象是刚从里面跑出来，还向人讲了夜里的事，之后说他要告诉同业公会。杨经理听他一说，心中充满希望，恨不得一下见到这个学徒，也好问个究竟。于是，他大步流星地往同业公会跑去。

找到会长，不料他矢口否认喻让贤来过。可看那表情，杨经理有一种直感，不象是真诚的回答。他失望地离开，心中忐忑不安。这时，身后跟上一个邻居，悄悄地跟他说：“小喻被专署傅德明逮去啦！”“他们为何要逮他？”“嗨，看样子他知道点来龙去脉呢！……”

邵阳是第六专署所在地，傅德明是专署的秘书，杨振华想，可能是他们把小喻保护起来，作为破案的线索吧！想着想着，不觉步履如飞，直往专署奔去。

万万想不到，专署里也没小喻的踪影！杨振华心中一惊：难道他失踪啦？！要是那样，事情茫无头绪，问题就更复杂了！他折回头，还是去找县长徐君虎。所好，这县长较有头脑，人称“老虎县长”，形容他手腕硬得很。

徐君虎早就带领有关人员查了现场。除将昏迷不醒的几个店员送医院抢救外，还对永和金号保险柜存放的金银首饰被劫一空作了分析：是一桩有计划的抢劫杀人纵火案。他跟杨振华说，小喻显然失去了自由，眼下，一切希望寄托在昏迷店员的苏醒上。

人们看见几个店员眼睛紧闭，仅存一丝气息，吉凶不谱，心急如焚。

这些被害的当事人开不了口，大街上却传出了案情发生的重要线索：“是奸党所为！”这“奸党”的概念是什么，人们早就从专署等官员的口中听到

过明确的解释，谁能相信？但是秘书傅德明却是义愤填膺，说得极其严肃。何况他是一贯研究和搜捕那些人的地方知名官员，话出必然有因啊。

而且，傅秘书的话，似乎很快得到证实。专署孙佐齐专员，亲自传讯第六中学曾被定为“奸党”逼其自首的学生，他训斥说：“你们还不安分守己？听说你们的主脑刘步连潜来邵阳，永和金号的案子，就是他干的！他为了抢劫金银去做活动经费，不惜杀人放火，丧尽天良，本署一定捉拿归案，以正法纪，而保治安！”那学生说未曾见到他来。孙佐齐笑了笑，和蔼地说：“你也不必害怕，把他捉到，能代死者伸冤，扶植正气，就发给你奖赏：黄金二百两！说话算数，决不食言。本署一向是言出法随的！”专员训话的消息一经传出，全校马上失去心理平衡，风风火火，无心上课，上下一片惶惶不安。

凶手，究竟躲在何处？全邵阳充满着迷雾。

四第二天下午，昏迷的店员鄢子和苏醒了！

忙坏了医生护士，给他打针、服药，使他增加开口的力气。也忙坏了守护人员，他们必须保证这些受害者兼证人的绝对安全。

鄢子和一开口，便展示出案情的复杂与离奇！

5月3日晚上9点多钟，专员公署的秘书傅德明，来敲永和金号的大门，鄢子和开了门。因为他过去在公务中屡屡光顾永和金号，而且，就在昨晚还来店要杨经理陪同他巡视店房，所以迎接进来。

傅秘书进门后，转身把门扇拴闭，未及就坐，就拿出公文，是一张“传票”，上面写着要传讯永和金号的店员，把“店员一并带案”。店员们说，店中要人看守，不能前往，傅秘书便改为个别谈话。

五专署为啥要找店员谈话？店员对于傅秘书前来传讯为啥不感到诧异？此事外人不得而知，可是店中却是人人明白的。

原来，专员孙佐齐兼任保安司令，是国民党驻邵阳的头面人物，而年轻气盛、神通广大的傅德明又是他手下得宠的一名干将。近在两个月之前，永和金号就领教过他的威风。

永和金号的前身同和金号，原是陈汉章与人合资开设。新永和经理因联号业务常驻衡阳，另派田瑞清主持邵店。陈汉章以同人身份仍然服务于店中。两月前，傅德明忽然派人将陈汉章捉去拘押起来。店中追问陈犯何法，傅德明冷笑一声，拿出在邵阳邮局查出的可疑信件，是一个名叫邹之麟的，由邵阳旅社寄给香港同党邓文剑，其中提到陈汉章等秘密活动，触犯禁止异党活动的刑法，陈汉章力辩并无此事，专署审讯时说他妄图逃脱责任，严刑逼供。店中主持人田瑞清非常焦急，一面向在衡阳的经理报告经过，一面奔走求告，设法营救。

不料，数日之后，傅德明亲至店中找田瑞清，说关于陈汉章取保之事，须到专署面谈。田瑞清被带到专署，傅德明给他看了一份国府密电。田瑞清不看则已，一看大吃一惊，电报上分明写着田某“十余年来掩护奸党，着即拿办解省，转解中央。”田再辩解也无济于事，只好跟他去省里，因天晚暂住乐陶旅馆。一夜之间，傅训斥多次，田瑞清自忖必死，但求通知永和金号的戚友，转告衡阳经理。那知，第二天傅德明忽然告诉田瑞清：“真犯已经捕获归案，与你无甚干系，你可以自由了！”田瑞清获此“大赦”，如坠五里雾中。金号的主持人的位置也不要了，当日即赴衡阳求杨振华资助，返回江西原籍去了。只有陈汉章仍然生死不明；连店里送牢饭也被禁止。

这些是非，两月来一直缠绕着永和金号每个人的心胸，使他们寝食不安，走坐不宁。今晚，这个权力无上的专署秘书拿着传票又登门带人，不言而喻，就是要扩大审讯了。

果然“他一个一个地进行谈话时，劈头就问：“你和陈汉章有交情没有？是什么关系？”“没有什么交情，是同人关系——”头两个店员这么回答，傅德明大不满意：“你们都是一路货，很不诚实！”一阵数落之后，下了命令：“都给我集中到客堂里来！”说时，还摸了摸腰里的手枪，以壮威色。

“你们规规矩矩地给我听着！”他从西装左胸的内口袋里迅速掏出一个纸包，边打开边说道：“这是从外国进口的‘真言丸’，吃了就会讲真话。现在，你们每人吃10颗！吃了再回答我的讯问，我才能相信。”

大家在犹疑。傅德明说：“我家里也有子女，要积德，还哄你不成？快吃，快吃，别耽误了我的公事！”一个个都被勒令吃了。有的吃了8粒，咽不下，想不吃了，也不行。“10粒才能达到十分真诚。”但也有一人例外。那就是管帐的饶文清。傅德明说：“听人谈论，你才来不久，是吗？”“哎，”饶说，“我跟陈汉章还没谋面呢！”傅德明照顾似地说：“嗯，你就不必吃啦！”

吃了“真言丸”的人，开始回答问题。“陈汉章平时拉拢你吗？”“陈汉章有什么异常表现？”“陈汉章收到过什么汇款？”“陈汉章花钱大方不大方？”……东一扭头西一棒，直问得一个个舌头打转，两眼乏神，东倒西歪地要睡觉。这时，已快4点钟了。

“他们熬不了夜，快扶他们睡吧！”傅德明叫饶文清把店员311们送上床。炊事员吃“真言丸”的时候，在舌头下面扣留两颗，又是磨磨蹭蹭最后吃的，恍惚还记得被扶上床的情景。

“之后呢？”查案人员贪婪地还在问着。很可惜，“之后，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了。睁开眼，这才晓得自己躺在这医院里。”

店员陆续脱险，提供的证明材料完全一致。

水渐落，石渐出，傅德明这个最大的嫌疑犯被侦讯人员监禁起来。

自5月3日夜发生此案以来，社会舆论哗然。长沙民营《晚晚报》于5月5日率先将这一惊人血案公诸于世。标题为：《邵永和金号被动》。副标是《胁服丸药十枚店员昏迷不醒，放火灭迹烧死学徒杀死店员》。官方报纸听命于省政大员，讳莫如深，然而在群情愤激之余，也不得不在10天之后陆续披露案情。邵阳各界成立声援永和金号委员会，通电呼吁严惩凶犯。湖南省政当局见此形势，也派员前往查处。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犯罪分子该收敛凶焰了吧！

不，他们还在挣扎。

他们威胁律师。有人持枪闯入受理此案的律师廖奇的家中，搜寻各个房间，声言找人。当时律师幸未在家。

他们恐吓药房。有人警告出售（被拿去冒充‘真言丸’的）安眠药的店主：“你不能对任何人说，否则你的药铺开不成，命也活不了！”

他们给呼吁恁凶的地方名流写恐吓信：“事不关己何太劳，依时知休真英豪，忠言不听防后懊，手枪炸弹助吾曹！”

他们控制邮局，封锁消息；转移视线，诬陷学生和共产党。甚至给省方派来办案的检察官写黑信：“知趣一点，注意子弹飞进你的脑袋！”

七这种集毒、劫、杀、焚于一举的恶性大案，出在邵阳县，邵阳县长徐

君虎是力求速战速决的。

问讯受害店员的笔录一卷卷整理就绪。接下一步就是穷追不放。有个受害店员被逼吃“真言丸”时，在舌下压藏了两颗（当时傅德明是一个个掰开口检查的，但未发现），此刻，这两片安眠药不仅成了关键性的物证，更起着引导作用，使侦破工作向纵深发展。徐君虎等马上把目标转向药店。由县长、卫生院长和药剂师等组成的调查小组，查到中德药房，店主陈子庄业已外出，他的妻子申云英一听说查帐，脸色突变。经再三开导，晓以利害，并保证其身家安全，她的头低下去了：“县长，请你老人家房里坐。”于是买药之事真相大白。原来傅德明认识店主，在案发前一天晚上借口受人之托来买安眠药 100 片，当时店中无货，便向兄弟药房求援。案发后，专署派人来警告不许泄露。但店主又怕被人发觉，牵连坐牢，弄得忧心忡忡，终日躲在外面避风。店主妻子的谈话纪录，经她签字后被送往法院入卷。

八人证物证的初步获得，预示着进攻的时机到来了。

5 月 21 日晚上，在监狱专门布置的两个房间里，提审傅德明。审讯人员是省高级法院首席检察官汪廉、地方检察处首席检察官谢功预，和地方法院院长陈振球。后二人是避在另室配合工作的。

出现在审讯室里的 28 岁的傅德明，高高的身材，穿着蓝条哗叽西装，两只眼睛斜溜溜地在扫视左右，短时间的囚禁生活，仍未使他失去油头滑脑的一副混世模样。他是浙江嘉善一个小康人家三代单传的公子哥儿，娇养成性，长于挥霍。1940 年，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训练团受训，文化不高，能耐不小，历在各军事机关服务。后由同学介绍，充任湖南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机要秘书。此刻，他进屋看见只有一个生人讯问他，颇有惊疑之色。但一涉及案情，则百般耍赖，说永和之事系别人所为，栽赃于他，以报私仇……果然不失狡猾本色。检察官摆出所掌握的证据，言诚理喻，几经周折，直到深夜，他才技穷认罪。

他供认出购买安眠药、逼店员每人吃下 10 颗等情节，与药店女主人和永和金号店员所说，全部吻合。店员昏迷之后，他所干的勾当也供认不讳。当时，他不叫管财物的掌柜饶文清服药，心中另有打算。当大家头晕难支时，他命令各自回房就寝，之后便叫饶文清提着煤油灯带路，巡视各个房间。他看中毒的人都已不省人事，就决心下手。经过首饰作坊时，傅德明顺手窃取一把铁锤，然后对饶文清说：“陈汉章供称共产党的秘密文件，都藏在保险柜里，你打开让我检查一下。”走到柜前，饶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善良的人啊，为什么不从“真言丸”使人头晕中引起警惕呢？保险柜刚打开，他的后脑就中了傅德明猛击的两锤，登时昏倒在地。残暴的凶手，唯恐两锤不能致

死，又拿出刀来胡乱地砍戮一阵。然后，他拉下桌布，包卷柜中所存黄金与首饰等，再倒油放火烧屋，一走了之。他想，大火一起，人死证销，罪行可掩，他就能逍遥法外，升官发财，风流无羁了。

九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作案者的预料：永和隔壁商店一见邻居起火，惟恐波及自己，动作特快，全店员工居高临下，泼水抢救，首先压住了火势，加上城区消防队及时赶到，扑灭甚快。

中栋房屋焚毁，前后屋则幸免，昏迷店员获救，留下了“活口”。

所以，次日清晨火光渐熄时，万人欣慰，唯独傅德明气急败坏，带兵持枪急奔金店，以观究竟。但是“天不助匪”，又有什么办法呢？！

此时，有个学徒喻让贤从火场里跑出来。昨晚吃“真言丸”时，他怀疑

有鬼，以衣袖抹嘴吐出了7片藏在袖中。出店时，他报告同业公会，之后又回来想讲昨夜遭遇，不料碰上傅德明把他抓去关了起来，店中以为他失踪了。傅德明抓到他时，很为得意，特串通金号同业公会某人封锁消息。因为他是权有的活口，还发狠要枪毙他。及至其他店员相继苏醒，他就在傅的眼中无足轻重了。因此，他躲过“灭口”之灾，后被救了出来。

十夜审结束，主审人想得周到，仔细检查了傅德明的衣服，发现了3处血迹。同时，根据所供窝赃地点连夜起赃。其时，已是下半夜3点钟。他们电话通知各党政机关团体负责人到法院集合。县长徐君虎派建洽镇镇长吴总权会同地检处首席检察官谢功预，到专署第二科科长王雪非房中，将黑皮箱里的赃物取出。专员孙佐齐迫不得已已在封包上签了字。赃物带到法院当众开拆，实际只有黄金20两和少量银元珠宝（中间已被士兵窃逃），由永和金号经理杨振华出据领回。

赃物取出之日，向省内外报道这一消息的电话和电报，彻夜不断。邵阳各报都出号外，城中居民奔走相告：“赃物是在专员公署里起出来的！”有人在专署墙壁上贴了巨幅白纸标语，上面写着14个醒目大字：“细看官家真面目，专署原来是匪窝！”邵阳各界立即举行会议，一致声讨“如此官府”。

十一作为专署和保安司令部下属的机要秘书傅德明，主要责任是办“特种工作”。特种工作者，即暗算进步人士、迫害人民的“肃奸”勾当也。借此敲诈，冤案层出不穷。他们想发横财，四处择肥而食。永和金号就这样成了他们攻击的目标。先伪造“异党”信件诬陈汉章为“同伙”，后冒充上级来电解田瑞清赴省。为何捉了又放呢？原来，陈汉章银发美髯，长袍大褂，常常道貌岸然地端坐于柜房上座，被他们误认为大经理；及至关入牢房，刑讯之后，才知道他原来是个普通的首饰技工。后来又以为田瑞清才是经理，抓去后说要花300两金子方可免死，不料田也是个普通店员，折腾两天两夜，还是榨不出油水。傅德明害怕在省会旅舍私设牢房，一旦暴露，反而惹祸，只好出去转一趟，回来说已经抓到真正罪犯，托词将田释放。傅德明向孙佐齐等汇报前情，深感捕人刑讯敲诈钱财之法收效甚微，并且易于失风，倒不如索兴抢劫灭迹，既可马上兑现，又无死活对证，遂定下恶计，由傅执行。5月1日，他伪称陈汉章供认店内有一暗室，来店查看，由经理杨振华陪同巡视店内一遭，并将工人姓名和人数了解清楚，以便准备足够的安眠药。还派人向店中试探有多少存金。说来也合该出事，那人说要买500两黄金，店里回答要买1千两也有。其实永和金号和长沙、衡阳等地都有联号，有生意时可去电临时调运，并非店中现存着黄金。更巧的是，店中正好从衡阳调来一批现银，到别处收购沙金，他们得悉，认为又来了大批黄金。“千载良机，不可错过！”5月2日买好药片，5月3日夜晚，傅犯就身怀药片，携带刀枪，手持孙佐齐签发的办案手令，由专署直奔永和金号。

十二孙佐齐是邵阳土长，在大革命时期参加国民党内右派反共的“左社”，后来加入军统。当他得到湖南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现职时，物色了如狼似虎的班底，走马上任，回到邵阳。傅德明就是他班底中的一名干将。5月3日夜晚，傅在作案，孙则代为证明当事人在专署，并未外出，以图掩饰。掩饰不成时，又力争此案由他主办，以图包庇。法院初次侦讯收押傅德明，孙则出面保回。傅入狱后，孙又诱使自首学生假供永和惨案是“异党”所为，以图转移视线。并且两次呈报省府，一次吹嘘傅“劳绩卓著，请予保障”，一次请以军人身份将傅易地管辖，企图帮他逃脱法网。而到处进

行恫吓阻挠侦破工作的王雪非、白鸿钧、郭璋、宋绶章、孙忠瑞等，又都是他属下，按照他的指示进行了大量的威胁恐吓及其他犯罪活动。

十三永和金号惨案，经过两个多月的侦讯，终于在6月27日在邵阳地方法院宣判了。傅德明被判处死刑，孙佐齐、王雪非各处有期徒刑12年；白鸿钧判处10年；郭璋、宋绶章、孙忠瑞各判处6个月的有期徒刑。

邵阳各界声援永和惨案委员会，对判决公开表示“殊为遗恨”。还特发表了揭发性的意见书，列举大量事实，指出孙佐齐实为“发纵指示”的同谋主犯，评论对他的判决是“刑不当罪，罚不足惩”。意见书分送各有关当局，可惜都如石沉大海。

在参与侦讯和审理的人员中，有人目睹“党国要人”关照他们“法外原情，从轻发落”，后来孙佐齐提起上诉，竟连原判的12年徒刑也给撤销了。

事隔两年，邵阳解放，当年漏网的元凶孙佐齐，终于受到人民的正义审判。

李田

谷正伦诱杀刘伯龙

公元 1949 年 11 月 18 日上午，贵州省西南部晴隆县县城内，一片混乱。街上到处是国民党溃兵，大多数店铺都上着门板，没有开业，只有几家饭馆仍在开张，里面坐满了划拳、喝酒的国民党军官兵，市面上到处流传着省城贵阳已被人民解放军占领的消息。

晴隆县政府座落在县城一隅的一座低矮的山包上，院落相当宽敞。在通往这座山包的公路上戒备森严，几米就有一个手持步枪的士兵，身着破旧黄军装。他们是贵州省保安司令部所辖的地方保安部队。停在院落门前小广场上的 1 辆带有鞭状天线的美式中吉普和 6 辆美制十轮大卡车上坐满着头戴钢盔、手持卡宾枪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每辆车的司机棚上都架着两挺加拿大式轻机枪。士兵们右臂上佩带的臂章上的符号显示着，这是国民党陆军第八十九军警卫营的部队。

突然，院子里传来一阵自动步枪清脆的连发声，一名头戴钢盔的国民党士兵飞快地窜出了大门，直奔那几辆卡车跑去。

“弟兄们！快去救军长，军长被他们……”这名士兵一边跑着，一面大声疾呼，但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一阵排枪击倒在地上。

刹那间，围墙上、屋顶上、路边的树丛里都晃出许多保安部队士兵的身影，明晃晃的枪口都瞄准着这几辆卡车。

“八十九军的弟兄们！你们军长刘伯龙已被处决，赶快缴出武器，保证诸位的人身安全。”说着，门口走出来两名保安团的士兵，他们抬着一具肥胖的尸体，扔在了广场上。这个人的下腹部中了好几枪，鲜血把将校呢军服都染红了，领口上两颗将星的领章也被扯掉了一片，左轮手枪枪套还挎在腰间。他就是陆军八十九军中将军长刘伯龙。

刘伯龙与谷正伦其人刘伯龙是贵州龙里人。1924 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学习，毕业后任职军旅，是特务头子康泽手下的得力干将，曾任国民党军别动总队参谋长、师长、军长等职。

刘伯龙历来粗暴异常，嗜杀成性。在他任国民党新二十八师师长期间，曾在黔东一带搜剿当地苗族领袖潘致和、潘致祥的队伍。在一次冲突中，新二十八师参谋长陈瑞在镇远县的元兆、贵马两寨附近被流弹击毙。刘伯龙闻讯大怒，亲自下命令攻下对方所占的村庄，并且见人就杀，实行屠村。从此刘伯龙便有“屠夫”之称。

1948 年秋，人民解放军发动了战略决战，歼灭了大量国民党军。蒋介石为挽救其灭亡的命运，在长江以南各省设立了许多编练区，扩充军队，将地方部队编组为正规部队投入内战战场。贵州省也成立了以第三二八师和第三四三师编组而成的陆军第八十九军。刘伯龙被蒋介石直接委派为军长。由于刘到处抓权、抢权，与当时的贵州省政府主席、贵州全省保安总司令、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谷正伦发生了一系列尖锐的矛盾冲突，终于惹出了一场杀身之祸。

谷正伦也是贵州人，早年曾赴日本留学，并加入同盟会。他参加过辛亥革命，后就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谷正伦担任首都卫戍司令、首都戒严司令兼国民党军首任宪兵总司令，曾控制国民党宪兵部队十余年。谷正伦不仅杀人如麻，而且城府很深，颇有谋略。他的两个兄弟（谷正纲、谷正鼎）也都是在国民党政府的要员。因而，谷氏三兄弟是国民

党贵州省籍人士中权势最显赫的家族。1948年，蒋介石任命谷正伦担任贵州省政府主席等要职，就是想利用其家族在贵州的号召力，驾轻就熟，调动大西南后方的人力物力资源，支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

矛盾起因 1948年底，驻扎在贵州的第三二八师、第三四三师奉令编组为陆军第八十九军。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谷正伦认为刘伯龙在黔东名声不好，乡人多仇恨他，且无指挥大军作战的能力，所以想从贵州籍的黄埔军人陈铁、王文彦、刘汉珍3人中选一人担任军长。但是蒋介石没理睬谷正伦的意见，却直接下令让刘伯龙担任八十九军军长。

1949年3月，刘伯龙到贵阳组建第八十九军军部，他自恃手眼通天、目空一切，很快就与谷正伦等人产生了摩擦。

首先，谷、刘两人在对待国民党桂系的态度上产生了分歧。当时国民党政府名义上是由代总统李宗仁控制。谷正伦认为自己与桂系向无渊源，在当时这种特殊的政治局面下，贵州省地处西南腹地，必须搞好与邻省尤其是与广西桂系搞好关系。况且白崇禧又手握数十万雄兵坐镇武汉，实是贵州前方的屏障。而贵州扩军军费所急需的烟土出口必经广西境内，也要取得桂系的合作。他曾多次派人前往联络。

然而这件事很快就被刘伯龙知道了。他认为逼蒋介石下台的桂系是他不共戴天的敌人，绝对不能与桂系合作。于是用电台直接向蒋介石作了密报。谷正伦为此十分恼火。

接着，双方在扩军问题上也发生争斗。谷正伦根据当时战局判断贵州早晚必有一战，特制定了临战应变措施。计划让出大城市，退到偏僻山区打游击，与解放军周旋。谷正伦深知扩军需统一筹划，慎重处置，粮、饷、械都是难题。因此，他在请示了行政院长阎锡山后，决定将贵州保安部队改编为一个军，由全省保安副司令韩文焕兼任军长。尔后又将原来的4个保安旅长、两个县长兼三县联防司令任命为6个师长，经费和人员都得到落实。

但刘伯龙却无视绥靖公署、省政府及省保安司令部的统一部署，借扩军以抓权，自恃手眼通天，随便下达委任状，委任师长、旅长。这就把谷正伦气得怒火万丈。

1949年秋，谷正伦为进行游击战，在贵阳设立了贵州自卫干训团，谷自任团长，以韩文焕为教育长，受训者多系省内的绅士和军人。一个星期天，刘伯龙突然派人秘密逮捕了干训团的王富文（凯里人）和王瀛洲（岑巩县人）。干训团见这俩人久不归队，就报告了谷正伦和韩文焕。由韩文焕出面给刘伯龙打电话询问此事，不料刘伯龙蛮横地一口回绝，拒不承认。后来得知这2人都被刘伯龙处决了。谷正伦听到这个消息，气得把茶杯都摔碎了。

同时，刘伯龙总想挤走谷正伦，觊觎省主席、省保安司令、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要职。他每次进见谷正伦时，常常趾高气扬，说话蛮横，也使谷正伦忍无可忍。

1949年11月初，人民解放军乘胜攻入贵州东部，国民党军望风而逃。当国民党军撤出贵阳之前，谷正伦决定邀请一位名叫卢焘的前辈军人带领一支民间武装，维持贵阳秩序。卢焘是广西人，民国初年曾任黔军总司令，是谷正伦任黔军旅长时的老长官。这事又引起了刘伯龙的不满。他认为维持贵阳秩序就是把省城拱手让给共产党。11月14日，他率八十九军路过贵阳，派人将卢焘逮捕，不由分说押到西郊就给枪毙了。

这时，谷正伦已率部撤至晴隆县。当他得知卢焘遇害的消息，气得吐血

病复发，当下表示非杀死刘伯龙不可。

设计暗杀当时，谷正伦与其保安副总司令韩文焕等人都住在晴隆县政府内，谷下定决心捕杀刘伯龙后，立即指示韩文焕布置执行，并召见了第八十九军的两位师长张涛和项荣，将其决心告诉了他们。这俩人平时对刘伯龙的专横也十分不满，加上谷许愿他俩在刘伯龙死后都可升官，因此两人都表示支持并保守秘密。最后，谷正伦等人商定，11月18日上午以任命刘伯龙为贵州绥靖公署主任为由，诱骗刘到晴隆县政府来。然而由保安司令部的部队将刘处决，尔后由张涛控制第八十九军的部队。

当夜，贵州省保安副司令韩文焕命令保安一团团长李成举负责处决刘伯龙。李成举立即抽调了大批神枪手连夜进入县府大院内。

11月18日早晨，贵州绥靖公署参谋长张法乾以谷正伦的名义与刘伯龙通电话，告诉他谷正伦愿将绥靖公署主任让给他兼任。

刘伯龙一听这个消息喜出望外，立刻想乘车赴晴隆县办交接手续。有人劝他慎重，认为电话真假难辨，还是看一看再说；也有的说“晴隆”与“擒龙”是谐音，此地为凶险之地，还是不去为宜。

但是刘伯龙当官心切，怕时间拖长了事情会有变化，他“官令智昏”，认为自己的部队就驻扎在附近，不会出什么大事，就决定带上警卫、副官和一个连的警卫部队向晴隆县进发。

刘伯龙乘车来到晴隆县政府，首先拜见了谷正伦。这次可能是由于升官了心里高兴，刘伯龙非常尊重地向谷正伦请示这，请示那。谷正伦一边与其周旋，一边对他说：“由你任贵州绥靖公署主任的布告正在东厢房里起草，你去看看吧！”刘伯龙告辞谷正伦来到东厢房，看到了正在书写着的布告。他趾高气扬地出了东厢房，又来到西厢房贵州绥靖公署参谋长张法乾的房间里吹牛聊天。

刘伯龙这样磨蹭，可急坏了保安一团团长李成举。他请示韩文焕，能否进屋去刺杀刘伯龙，韩文焕害怕会误伤自己人而没有同意。这样，李成举只好只身来到西厢房，向刘伯龙敬礼后说道：“军座，您门前的警卫连长催您赶快启程呢。”刘伯龙这才站起身来带着4个卫士向门口走去。他们刚刚来到前院，李成举用手一揭帽子（这是规定开枪的暗号），顿时，屋顶上、墙头上的伏兵都开火了，刘伯龙和他的卫士纷纷倒在血泊中。

尾声事后，谷正伦派张涛接任第八十九军军长。并以“克扣军饷，紊乱军政（指刘伯龙乱委派师、旅长），纵兵殃民，擅杀无辜”四条罪状作为处决刘伯龙的理由，呈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备案。

蒋介石得知刘伯龙被谷正伦处决的消息，勃然大怒，以“危险关头，不计精诚团结，却自戕手足，擅杀军事大员”为由，密令军统局西南站将谷正伦逮捕归案。岂料老谋深算的谷正伦早知这次要闯大祸，已为自己安排了后路。他曾任国民党宪兵总司令多年，门徒、爱将遍布全国。当时驻扎西南地区的6个宪兵团团长都是他的门生弟子。在此危急时刻，个个都肯鼎力相助，搭救老师。谷正伦经过化妆，携带着大批黄金、美钞在宪兵部队严密控制的机场上乘飞机逃往香港作寓公去了。军统局西南站因兵力单薄，根本无力与宪兵部队对抗，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谷正伦乘飞机扬长而去。

杨玉文

宋子文晚年在美险遭暗杀

宋子文是蒋介石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他为蒋奔波效力多年，在蒋介石和美国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宋子文为蒋介石政权卖力的若干年中，多次遭到蒋介石对立派系的“暗算”，他都“大难不死”。到了晚年，他怎么也没想到，他会再次遇到“暗算”，险些死在蒋介石的手里。

1949年1月，蒋介石政权覆灭前夕，宋子文离蒋而去，赴美国当寓公。蒋介石和宋美龄对宋子文的此种作法极为不满。1950年，蒋介石为了继续求得美国的支持，拍电报给宋子文，要他回台“操持政府公务”。由于当时台湾面临的形势严峻，以及宋子文同蒋介石之间历来就有矛盾，所以宋子文对蒋介石的“邀请”未予理睬。而且，宋子文心中一直酝酿着一个秘密，他要静观时局，等待时机。此时美国政府中的当权者早就看不上蒋介石了，他们也在筹划一件事，那就是让宋子文代替蒋介石，只是苦于没有机会。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蒋介石想借此机会反攻大陆，于是他也要派兵赴朝参战，但是以杜鲁门为首的美国政府不同意蒋介石参战，加上杜鲁门等美国当权者对蒋介石丢失大陆有种种看法，蒋介石和杜鲁门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坏。蒋介石把反攻大陆的希望寄托在朝鲜战争上，可是美国在朝鲜战场上节节失利，这急坏了蒋介石，于是他就派夫人宋美龄赴美，利用其过去在美国的影响到处演讲，鼓吹让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下台，实际上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杜鲁门。宋美龄在美国的宣传和演讲正好同美国大多数人的反战情绪合拍，所以有一定影响。这期间，美国不少地方都爆发了反战和要麦克阿瑟下台的游行示威。这种情况使杜鲁门意识到，以宋代蒋的机会到了。杜鲁门立即秘密召见58岁的宋子文，委婉地提出希望他到台湾掌权。杜说：“只要您愿意，我们一定把您推上政治舞台。您才是中国的希望。”这话虽然说到了宋子文的心上，但宋表面上却说自己不行。杜鲁门继续说道：“不要客气了，据联邦调查局调查，您购买了大批枪支弹药，包括美国机械公司的最新产品——恩菲尔德步枪，您一下子就买了4.5万支，储存在加拿大仓库里，准备从温哥华运到台湾。而台湾当局并不知道这件事。这就意味着……”宋子文极为惊讶，他暗中购买枪支弹药，联络国民党军队中同情他的将领，密谋发动一次政变，推翻蒋介石的统治，成立以他为首的新政府的计划竟然被杜鲁门获知。宋子文叹了一口气道：“既然总统先生已经知道，我也不否认想改变一下台湾的局势。管它‘三民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我更愿当一个‘没有主义’者，注意实践，倡导各种经济和社会试验，更注重效果。”杜鲁门说：“太妙了，我支持您！但您也应该支持我，要阻止您的妹妹对华盛顿施展她的老魔术。只有您能与她对峙。这不是与您妹妹为难，而是与您最讨厌的‘芝麻脑袋’（蒋介石）为难。”

由于得到了杜鲁门的许诺和支持，宋子文从五角大楼出来后就行动起来，并成立了一个反对麦克阿瑟下台的指挥部，向支持杜鲁门的人提供各种帮助，宋还亲自向美国公众和议会发表演讲。当宋美龄得知宋子文这一系列的行动后，恼火至极，她不顾兄妹情意，决心击败宋子文。在外甥孔令侃的策划和帮助下，搞了一次对宋子文的暗杀行动。

一天，宋子文在纽约曼哈顿摩天大楼前发表了激昂的讲话后，走到停车场，正要钻进自己的轿车，突然有人从他的两侧同时开枪。宋本能地感到这枪是朝他开的，立即把十分显眼的白色硬壳太阳帽甩掉，跑进人群，躲到一

根柱子后面。乱枪从四面八方打来，宋子文的保镖们进行回击。当警察赶来时，刺客们已经不知去向。宋子文的一个秘书倒在血泊里。宋子文的这次遇险不禁使人回忆起 30 年代初他在上海北火车站的遇险，这两次对宋的未遂暗杀是何等的相似，相似的简直令人吃惊，同样都是秘书当了替死鬼。对于宋子文晚年在美国遭遇的这次未遂暗杀，有人说是蒋介石要干掉宋子文，也有人认为这是对宋的“警告行动”。不过自这次暗杀行动后，宋子文再也没有卷入政治的漩涡中，把晚年的精力用在收藏青铜器和书画上了。他的妹妹宋美龄却一直对他耿耿于怀。当 1971 年宋子文在美国旧金山逝世时，宋美龄拒不参加其葬礼。

连若雪本文及以后几篇文章都写了民国时期有关人物在民国结束之后的活动和遭遇，为的是让读者对这些人物有更多的了解，特此说明——编者。

孙立人案件始末

台湾省台中市，是台湾佛教文化的中心。城中的宝觉寺，每年都要举行全台的佛法大会。有时，在熙熙攘攘的香客和观光者中，出现一个满头银发、面容清癯的老人，他看上去是这样的平凡，丝毫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然而，有谁知道，这位象个退休教员似的老先生，几十年前竟是一员被誉为“东方隆美尔”的虎将（隆美尔是德国著名将领）。“八·一三”抗战时，他与日军搏杀，血战沙场；滇缅战役中，他率一师劲旅，打通雷多路；抗战胜利后，他出任国民党“五大主力”之首新一军的军长，后来升为陆军副总司令，到台湾训练新军；国民党迁台后，他官拜陆军总司令、总统府参军长。他，就是至今仍具神秘色彩的国民党二级上将孙立人。

孙立人，祖籍安徽舒城。他本是清华大学工程系的高才生，由学校保送到美国深造，获得印第安那州普度大学工程学士学位。然而，这位才智超群的年轻人，发现当时的中国是军人的天下，于是毅然投笔从戎，转入著名的弗吉尼亚军校，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归国之后，他一度担任蒋介石的副侍卫长，以后历任各军职，直至升为陆军总司令。

在步步高升的过程中，孙立人也饱受嫉妒倾轧之苦。与他平辈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多数是黄埔军校前五期的“天子门生”，他们虽号称军校毕业，实际只受过几个月的短期训练，和孙立人的令人瞩目的学历相比，不免相形见绌，因此有意无意地视孙为“外人”。而孙立人偏又恃才而骄，他仗着当过蒋介石的副侍卫长，且立有战功，对同僚显出鹤立鸡群的神态，把人际关系弄得很僵。他当陆军总司令时，提出什么建议或要求，往往受到参谋总长周至柔、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空军总司令王叔铭的联合抵制。有时把老孙气急了，竟当着蒋介石的面要同桂永清和王叔铭“比一比”，或比文、或比武，或比立正稍息、或比X加Y，任由桂、王二人决定。至于向蒋介石“攒纱帽”，更是他的家常便饭。

尽管孙立人桀骜不驯，但蒋介石在迁台后的头几年里却一直容忍他，原因很简单，当时蒋介石离不开美国的保护伞，而美国人最欣赏孙立人。美国报刊称孙立人是“最西方式的军事领袖”，是“美国军事学说的说明人和美国自由主义的代言人”，是“台湾陆军中亲美派的首脑”。美军驻台顾问团团长蔡斯，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观点都与孙立人不谋而合，因此，蒋介石要整他，不免有投鼠忌器之感。

美国虽然为蒋介石撑起了保护伞，却一直在暗中打自己的算盘。据1985年台湾版《蒋经国在台三十年》一书透露，早在1949年2月，美国即曾向当时的台湾省主席陈诚建议，让他和孙立人撇开蒋介石，在台湾另立政权，陈诚没敢答应。美军入侵台湾海峡后，又向台湾当局提出，将国民党最精锐的部队配备美式武器、支领美国薪饷、由美国顾问负责指挥，蒋介石急忙谢绝了美国的“好意”。此后，美国又建议在台湾设立“中美联合作战中心”，协调区域内的双方军队共同御敌，该中心的美方指挥官由美军顾问团团团长蔡斯担任，而台湾方面的指挥官，美方则要求让孙立人担任。此建议亦被蒋介石婉言拒绝。

对于美国的建议，孙立人本人很可能并不知情。但何以美国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推孙立人出台？此中的原因，不能不引起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对孙的疑惧。

国民党在台湾曾开展所谓“整军建军运动”，其中最主要的两项措施，一是重建军队政治工作，在军中遍设政工机构和党组织，规定部队长命令非政工官副署无效；二是实行“师级以上主官任期制度”，规定正师以上军官任期两年，可连任一次，两任期满便须调任或退役。这两项制度，美国顾问嗤之以鼻，特别是对军队政工制度，认为完全是效法共产党。孙立人也与美国人持同一腔调，他不仅在暗中对这两项制度进行抵制，甚至公开对亲信部属流露其不满。他还在陆军中组织“庆生会”、“良心会”，让高级军官到会听士兵的“良心话”，这实际是同蒋经国主持的军队政工唱对台戏，为此更招致蒋氏父子的忌恨。

按照军官任期制度，孙立人的陆军总司令，到1954年3月将满两任，必须调职。这个时期，美国已由亲蒋的艾森豪威尔当政，美台关系正处于“蜜月期”，故孙立人的“门面”作用已大为减少。而军队内部的各派势力，又纷纷活动，散布对孙不利的流言蜚语。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很可能趁这次调任之机削去孙的兵权，因此孙立人不得不未雨绸缪。

1953年11月，孙立人召见他在台湾训练新军时的下属江云锦（陆军司令部第五组中校督训组长），让他串连当年受训的同学，在军中“结成一股力量”。孙并指示，要在每个团中找出一个职位较高、学识较优、服务年龄较深之同学为负责人，与其他同学联络。江云锦得令后，秘密活动，几个月内便在每个团布置了负责人，甚至在一些营、连里都指定了联络人。

1954年1月，孙立人又命令江云锦把各部队中的负责人“串起来”，使每个人不仅知道本部队内的成员，也知道其他部队中的“联络人”。江云锦此时已感到这不象是一般的“联络同学感情”，他心存顾虑，活动日趋消极。孙立人在半年中屡屡查问，对江之“工作不力”深感不满。

1954年6月，蒋介石下令免去孙立人陆军总司令职务，调为总统府参军长；同时免去周至柔参谋总长职务，另有任用；又免去桂永清海军总司令职务，调为参谋总长。这一人事调整，当时颇招人们物议，因为很多人认为孙立人是更适当的参谋总长人选，而却被摆在无实权的参军长的冷板凳上。

孙立人卸任前，让江云锦把各部队的“联络人”造具名册。7月，陆军总司令部督训组副组长于新民把孙所要的名册呈报给孙。8月初，孙立人因不满于江云锦的畏缩不前，召见其老部下、陆军学校少校教官郭廷亮，让郭接替江云锦作总联络人。

8月12日，刚就任两个月的参谋总长桂永清突患急病去世，这对孙立人来说，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因为此时于情于理，参谋总长人选已非孙莫属。但蒋介石却下令“陆军中将彭孟緝加上将衔，任代参谋总长”，这不但使孙立人大失所望，而且很多蒋的亲信也感到意外。因为孙立人任陆军总司令时，彭孟緝只不过是个省保安副司令，而且彭是以中将军衔就任参谋总长，这在国民党军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这件事促使孙立人加快了抓军队的步伐。他付款给郭廷亮作活动经费，并频频召见郭廷亮、江云锦及田祥鸿、刘凯英等各部队联络人。1954年11月，孙立人指示田祥鸿注意掌握军中交通和通讯。同时指示郭廷亮三点：各同学要多联络；各同学要把兵带好；各同学不要随便请调。据郭廷亮、田祥鸿、刘凯英等后来供认，他们此时已通过孙立人的谈话和暗示，明白孙是“要建立好领导部队的力量，硬性向政府提出改革事项”。1955年3月，孙立人让江云锦向各联络人传一句话，以试验其小组织之间的联络通讯是否

能迅速畅达。5月15日，郭廷亮到台北晋谒孙立人，报告联络情况，并建议采取行动。

由于孙立人从未担任过行政职务，在党务和财经系统也无亲信干部，他本人在台湾并不具备号令四方的个人威望，而对军队也只是控制其中一部分而已。因此他预谋“行动”的目的，并不是要举行政变推翻蒋政权，而是要效法张学良举行“兵谏”。

当时他与郭廷亮商定，要趁蒋介石1955年6月初到台南检阅军队之机，将蒋“控制”起来，并呈上对军中不良现象的意见书及改革方案，以迫蒋接受。为此郭廷亮须在5月22日至6月2日之间先到其受阅部队发动力量，孙立人则定于5月底南下到某地建立指挥所。孙估计在发难之后，美国会乐观其成并以中间人身份保护起事者不受惩罚，万一失败，亦可向美方寻求政治庇护。

孙立人等准备提出的意见书中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呢？台湾当局至今对此讳莫如深。但从当时外国驻台记者的报道中，可知孙等至少有下列五点要求：

1. 反对蒋介石一人包办党务和反共事业，要求结束政府私人化局面，实行美式民主。

2. 虽希望反攻大陆，但在美国不肯支持的情况下，要求面对现实，放弃“反攻大陆”口号，努力把台湾建设好。

3. 反对蒋经国领导的特务统治，要求铲除政府和军队中的贪官污吏。

4. 反对军队政工制度和师以上主官任期制度。据说在郭廷亮等人拟就的意见书中，有“如不废除这两项制度，将采取没有说明的行动”等恐吓语言。

5. 要求孙立人担任参谋总长。

但是，郭廷亮等人的活动早被军中政工人员和特务分子侦悉，在起事串联者中也有20多人向当局告密。5月22日，郭廷亮按计划行动，命令某部受阅人员配发实弹，特工人员更据此证实了郭等图谋不轨。于是台湾保安机构紧急出动，于5月25日逮捕了郭廷亮。孙立人原定于5月28日动身去“指挥所”，当天突然接到总统府电话，命令他跟随蒋介石行动。孙无奈只得派随从参谋陈良垵驾车南下，沿公路线通知各地人马，但陈出城不远便被特工人员追擒。与此同时，江云锦、田祥鸿、李成亮等骨干分子也纷纷被捕。只有刘凯英逃脱，于6月2日潜入孙宅，向孙立人报告事情败露经过。孙立人拿出一笔钱，让刘凯英化装逃走。岂知此时孙宅早受监视，刘一出门即被捕。6月中旬，孙立人也被软禁起来，至此，这场兵变胎死腹中。随后台湾当局在军中大搞清洗，逮捕审查少壮派军官300多名，后来证实参预这一事件的共103人。

如果据实将孙案定性为“兵谏未遂”，则对他的处理不能，过重，这将为他以后东山再起留下了余地；而且人们自然会打听孙立人“兵谏”究竟是为了什么，但因孙的某些意见颇击中时弊，容易引人同情，所以台湾当局不愿将事件真象公开。更使当局为难的是美国肯定要为孙讲情，如照顾美国的面子从轻发落他，等于放虎归山；若是重办孙立人呢，又不免要得罪美国“靠山”，真是进退两难。

台湾当局为了摆脱困境，决心找替罪羊。为此特意把案情性质从军人内部的“兵谏”改为共产党“间谍”的叛乱。扣上这顶红帽子，美国囿于反共立场便难以出面干预，而重办孙立人也有了根据，至于孙氏到底要“谏”些什么，人们也不敢打听了。

但是，孙立人毕竟名声太大，把他打成“共谍”是无人相信的。于是特工机构便逼迫郭廷亮“合作”，由郭承认自己是“共谍”，图谋利用孙立人在军中搞小组织活动以达到“兵变”和“颠覆政府”的目的。这笔交易作成后，台湾当局始公布破获“共谍郭廷亮叛乱案”的消息，并披露了孙立人因卷入“郭案”，在接受审查中。

1955年8月3日，台湾报刊刊载了孙立人的辞职书。他在辞职书中承认“知人不明，涉有重大之罪嫌”，自请“赐予免职、听候查处”。8月20日，蒋介石指定陈诚、何应钦、王宠惠、许世英、张群、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等9人组成调查委员会。经过50天的调查，包括几次与孙立人本人“详谈”，到10月31日，调查委员会公布一份长达1.6万字的调查报告，指明此案主犯是“共谍”郭廷亮，孙立人则是对共谍“失察”，客观上“被敌利用”。调查报告还指摘孙立人在军队中搞小组织，“实为一种别有用心之行动”，他“对于军事上若干事项与国防部或若干同僚持不同之见解”，“以对外间流露其不满情绪是务，尤喜对其亲信部属发表批评指摘上级与同僚之言论”，还说孙立人“虽非主谋，但对于此次阴谋事件并非全不知情”。

其实，除郭廷亮一人外，江云锦诸人均供认孙立人是主谋。而郭廷亮的“共谍”身份更纯属虚乌有，江南先生在《蒋经国传》中对此有详细论述，感兴趣的读者不妨参阅。

10月20日，蒋介石下令，指孙立人对“郭廷亮叛乱案”负有“重大咎责”，但念他“久历戎行、抗战有功，且于该案发觉之后，既能一再肯切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兹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查考，以观后效”。

郭廷亮原被判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他服刑若干年后获释并离台赴港，这是“共谍”绝对得不到的待遇。参与此案的其他人，则分别被判3至15年徒刑。

孙立人在案件处理结果宣布后，曾拜访此案调查委员会主任陈诚、对陈的“公正”和蒋介石的“宽大”表示感激，并提出他曾获工程学士学位，希望今后能献身于水利建设。一个多月后，蒋介石亲自召见孙立人，不同意他去搞水利，而要他认真读书，特别要读懂中国的“圣贤之书”。从此孙立人迁居台中市向上路的一座幽静的小院之中，每日看书、作画、养花，有时还打打网球，孙夫人则以念经拜佛为事。夫妇俩深居简出，并要随时接受特务的“查考”。

20多年后，1980年4月，台湾《自立晚报》披露孙立人的近况。称当局已解除对他的“查考”，但因他是二级上将，仍要对他进行“保护”；而孙立人则“希望自在一点”，为此他主动要求辞去二级上将的终身职，以便不再受“保护”，据说当局批准了他的辞呈，当时的“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还去看望了他。至1985年，孙立人已85岁，他曾先后5次向当局申请赴美探亲，但都被拒绝。1988年1月，蒋经国逝世后，台湾兴起翻案风，孙立人案又成为热门话题。目前已肯定了孙立人无意搞“政变”，也证实了此案确与共产党无关。

1988年3月，台湾“国防部长”郑为元亲自去探望孙立人，对他说：“现在你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你是完全自由的。”5月，台湾当局解除了对孙宅的“监护”。至此，孙立人终于得到了他朝思暮想的“自在”，为了这一天，他竟苦苦等待了33年。

黄嘉树

孙立人案件的案中案

孙立人案件曾轰动台岛，近年来，台湾为孙立人平反的呼声日益高涨，披露出大量案件细节。然而，孙立人至死，也未得到真正的平反。原来，孙立人案件本身还存在着一个案中案——郭廷亮“匪谍”案。郭案不翻，孙案难平。

孙立人死不瞑目 1988年初，随着“总统”蒋经国的去世和新“总统”李登辉的接任，已经过去30多年的孙立人案件，重又成为台湾岛的热门话题。舆论站在孙立人一边，而刚刚发生的“总统”更迭，又为此案的澄清，提供了一线生机。

这年3月20日，曾在孙立人麾下担任过师长的“国防部长”郑为元，向孙立人宣布：“现在你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可接见任何人。你有行动和言论的充分自由。”5月，“总统府”解除了对孙宅的“监护”，撤走了驻在这里的最后一名警卫。台湾当局用这样的方法，婉转地表示了对于孙案处理不当的纠正。

但是，社会上要求为孙立人公开“平反”的呼声，仍然居高不下。而孙立人本人，也以“谁能还我清白？又有谁能还我公正？”为题，发表了文章。他并向记者发表谈话说：“我从未‘反’过，何‘平’之有？我只希望在我的余生之年，政府能还我清白，如此，亦将含笑九泉。”

1990年11月19日上午，因帕金森症住入台北荣民总医院的孙立人，神智昏迷，呼吸极度困难，血压急剧下降。虔诚信佛的孙夫人张晶英和子女商讨后，一致希望孙将军能平静地在家中安逝，便向医院申请自动出院。10时15分，医师拔掉插在孙立人身上的胃管、导尿管、呼吸器和心脏监视器，派出主任医师和两位护士将其护送回家。在救护车上，医护人员不断为孙注射强心针，并进行人工呼吸。返家不久，孙立人的脉搏即停止跳动。

孙立人终于没有能等到“还他清白”的一天，他死不瞑目。

离奇的案中案 1955年8月20日，蒋介石发布了如下的“总统令”：

总统府参军长陆军二级上将孙立人因匪谍郭廷亮案引咎辞职并请查处，应予照准，着即免职。关于本案详情，另组调查委员会秉公彻查，报候核办。

派陈诚、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组织调查委员会以陈诚为主任委员，就匪谍郭廷亮案有关详情彻查具报。

台湾当局认定，郭廷亮“匪谍”案与孙立人案密切相关。在陈诚等九人调查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书”中，公布了郭廷亮“匪谍”的来历：

郭廷亮是孙立人多年的部属，曾跟随孙立人作战、训练10余年。他是云南河西人，1938年毕业于云南省立昆华师范学校，次年考入设于都匀的税警总团干部教练所学员队2期；1940年3月毕业，留所任教育班长、区队副、区队长等职。从这时起，他便开始成为税警总团团长沙立人的下属。此后，孙部先后改编为新编第三十八师、新编第一军，郭廷亮始终跟随孙立人，先后任排长、连长，军衔至少校，并参加远征缅甸、印度的对日作战，以及在东北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

1948年1月，郭部驻沈阳，经三义和米栈老板白经武介绍，郭与青年女子李玉竹结婚。4月，郭部奉调赴前线作战。10月底，因战事激烈，沈阳城

一片混乱，郭只身返沈。11月2日，沈阳城已告解放，郭廷亮请求白经武设法向解放军取得路条，以便离开解放区。白允介绍其兄白经文与其晤面。

白经文时在解放军吕正操部任联络科长。郭廷亮先后由白经武陪同，四次至沈阳铁路饭店会晤白经文。白经文从与郭的接触中，了解到郭为孙立人之旧部，在国民党军中关系颇多，遂嘱郭去台湾为中共从事“兵运”工作，“长期潜伏，掌握部队”，一面制造台湾国民党军中的大规模变乱，同时俟机策应解放军进攻台湾。

郭廷亮表示，愿为中共从事“兵运”工作，并填写了自己的详细履历及有关文件。后又由解放军一位姓马的科长与郭谈话，当面约定：以“沈阳铁西二道街三义和米栈白经武先主收”为通讯地址；中共派去台湾与郭联络的人员则以“白先生要我来看看你”为暗号。郭受命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兵运”工作，即：在高级将领间寻找矛盾，扩大矛盾；广泛联络中下级干部；确实掌握部队；在军队中制造变乱，配合大军解放台湾。在郭廷亮认可了上述约定之后，马科长即交给郭一张路条和黄金10两。

郭廷亮1948年底携妻李玉竹抵台，继续投入时任陆军副总司令的孙立人麾下。他曾按照解放军马科长约定的联络方法，写信向中共方面报告抵台情形，但未获回音。

1954年9月的一个晚上，忽有一名不速之客来到郭廷亮凤山家中。来人操北方口音，约三十七八岁年纪自称姓李，对郭说：“白先生要我来看看你。”郭从此暗语中知道，对方系中共派来秘密联络的人员，遂向其报告了自己的工作情况，并称已联络到部分同学。对方又说：“白先生要你积极进行，不久他会到台湾来。”郭最后表示：“请白先生放心好了。”来人旋即辞去。此后，郭即以第四军官训练班学生为活动对象，加强联络，图谋“变乱”。

九人调查委员会，为郭廷亮“匪谍”案及其与孙立人的关系，所作的结论是：

一、郭廷亮为匪谍并利用其与孙立人将军之关系执行匪谍任务，阴谋制造变乱，其本人业已承认不讳。

二、孙立人将军对于郭廷亮信任甚深，不仅未觉察其为匪谍，且因孙将军企图利用郭廷亮在军队中建立个人力量，乃至堕入郭廷亮匪谍活动之阴谋而不自觉。

台湾当局就这样，把孙案与它的案中案郭案，巧妙地编织到了一起。

郭廷亮三十年的囚徒岁月1955年5月25日下午6时，郭廷亮正与家人及朋友在家中吃晚饭，一位中校军官前来对郭说：“郭教官，校长请你立刻到他办公室去一趟。”郭廷亮一踏进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吴文芝少将的办公室，便立即被押上一部吉普车，关进凤山郊外的一栋对外保密的房屋，并被绑上老虎凳，进行严刑逼供。郭廷亮自述：“如此经过十昼夜不停的刑求、拷问、逼供，至6月4日才将我从老虎凳上放下来，奄奄一息的躺在地上作生死的挣扎。”与此同时，正有身孕的郭妻李玉竹与4岁的儿子郭志忠、2岁的女儿郭志强，亦遭囚禁，家中被抄。

6月6日，郭廷亮由南部的凤山被移送台北保密局监狱，在这里又经过一年多的威逼利诱。1956年9月29日，郭被台湾“国防部”判处死刑，当天，又经蒋介石核减为无期徒刑。

郭廷亮在保密局（后改为情报局）一间不足2平方米的小黑牢里，被单身囚禁了10年，并且不许用笔，不准阅读报纸，只每天上下午各放风15分

钟。1964年6月，结束单人囚禁，被移送情报局桃园看守所服刑，一关又是10年。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台湾当局对所有在押犯实施减刑。郭廷亮依减刑条例规定，由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15年，而此时他实际已服刑整整20年。他获得了“国防部”代监字第0067号释放证明书，明令于7月14日零时准予开释回家。但是，7月14日，他并未能出狱回家，而是被押送到了太平洋中的一个海岛绿岛去“担任英文教官”。

郭廷亮踏上绿岛后才知道，他虽可以得到月薪5000元新台币，但没有休假，不准过海到台湾；在岛上的工作，也不是教英文，而是管理车辆和图书。名为“分配工作”，实际上是监禁的延长。他在这个只有17平方公里的小岛上，又被禁锢了7年。

直到1982年7月1日，郭廷亮才获准离开绿岛，返回桃园县平镇乡儿子郭志忠的家里。军方告诫他：“回家以后，平平静静地过生活，做一个与世无争的隐士。”

郭廷亮回家后，开始不断向有关部门呈递“陈情书”，要求澄清自己的冤案。他不但未能如愿，而且1983年中秋节一过，他又被“要求”与绿岛签约，去该岛养鹿。此后，虽然他的工作性质属于签约聘用，且担任养鹿中心主任，月薪由2万元台币增至6万元，但始终被“要求”与绿岛继续签约，不能回家安度晚年。

又一个死不瞑目者

郭廷亮的死刑判决，竟惊动了“总统”蒋介石，蒋亲自出马，为他核减为无期徒刑。据台湾新梅出版社出版的《孙立人冤案平反》一书披露，郭廷亮的家属竟于1956年初，搬进特勤室主任毛惕园在圆山的家中居住；1981年，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出资30万元新台币，买下永和一处房产，将产权交给郭廷亮的儿子郭志忠；1982年7月，当郭廷亮从绿岛获释返家时，又从台湾警备司令部一次获得60万元新台币的“生活补助费”。这一切，对于一个犯“匪谍”罪的“死囚”来说，似乎过分“仁慈”了。

另一方面，当1975年7月14日实施减刑条例时，许多与郭廷亮一样被称为“叛乱犯”的人，都如期获释，只有郭廷亮一人，被发配到绿岛上继续监禁。他虽曾一度获释，但仅隔一年多，又被以另一种方式，禁锢在遥远的小岛上，这似乎又显得太残忍、太严酷了。

在30多年的悠悠岁月中，许多权威人士，已经公开声明，郭廷亮不是“匪谍”。曾经代表九人调查委员会向郭廷亮作过核查的王云五先生，曾对他的学生、台湾政治大学李瞻教授说：“我告诉你一句话，你就明白了，孙立人和郭廷亮是中华民国的模范军人，这样你就了解了。”孙立人在被幽禁33年之后，发表了《谁来给我清白？谁能还我公道？》的文章，指出：“郭廷亮是一位勇敢忠贞的军官，我始终对他有信心，他不会是非谍。我对九人小组谈话时这样说，对五人小组（“监察院”组织）谈话也是这样说，今天也相信郭廷亮不是匪谍。”孙将军的这段话，可以从当年作为“监察院”五人调查小组成员之一的陶百川回忆录中得到证实。陶氏在1984年出版的《困勉强猗八十年》一书中写道：“孙（立人）并说，不独他个人无辜，连郭廷亮等也是冤枉的，请求我们救救他们。”

郭廷亮自从他部分地获得自由后，就一直在不停地向社会呼吁：“我绝对不是匪谍，因为我从来就没有与任何共党官员有过接触。”

1991年11月16日上午，郭廷亮在参加筹备孙立人将军周年忌辰活动后，自台北乘上109次列车，准备返回桃园家中。他本应在中坜车站下车。但不知什么原因，直到列车在该站已经缓缓开动，前行了30公尺时，他才突然从车厢中坠落月台，摔成重伤，并且从此昏迷不醒，没有再说过一句话。

郭廷亮最初被送到中坜车站附近的新国民医院，后又移送省立桃园医院，当晚再被转送至台北荣民总医院的神经加护中心病床，依靠药物和器械维持血压和生命。荣总的值班主治医师何治军表示：“郭廷亮有严重脑水肿现象，脑干完全衰竭，昏迷指数只有三分，生命垂危。”

围绕郭廷亮坠车受伤一事，社会上众说纷坛，疑窦丛生，新闻界予以极大的关注。

铁路警方坚持认为，郭是在列车上睡觉睡过了头，过站后方才惊觉，遂致跳车摔伤。

郭廷亮的大女儿郭志强则认为：郭廷亮“平日身体健康，不致构成他中午午睡过站跳车的行径或者失足”；他“平日随身携带一些有关孙案、不利于当局的重要文件，坠车原因恐是怀璧其罪”。郭女怀疑其父系被人“谋杀”。

《台湾时报》11月19日更以“郭廷亮意外中的意外”为题，报道了一则耸人听闻的消息：省“议员”黄玉娇透露，郭廷亮身上所携35份事关孙立人案翻案的文件，均已不翼而飞。这就使得郭廷亮的坠车事件，更加扑朔迷离。

1991年11月24日下午1时45分，郭廷亮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同整整一年前去世的孙立人将军一样，未能看到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一天，死不瞑目。

翻案书遗留人间

郭廷亮留下了厚厚的翻案书，为郭案和孙案的澄清、平反，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郭廷亮第一份公开发表的“陈情书”，是写给前“孙案”调查委员会委员张群和“总统”蒋经国的，经其子郭志忠捅出，由台湾《自立晚报》于1988年3月23日作为独家新闻发表。这第一次的案情曝光，使舆论界大哗。在郭廷亮坠车昏迷不醒后，《自立晚报》又于1991年11月17日全文刊登了郭致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宋楚瑜的“陈情书”。11月25日，《中国时报》又刊登了郭氏致“总统”李登辉，并抄送“行政院长”郝柏村、“国防部长”陈履安、“国防部副部长”陈守山，以及“参谋总长”陈桑龄的3万言“陈情书”摘要。

郭廷亮那充满血和泪的揭发和控诉，令人发指。

揭发之一：刑讯逼供。

郭廷亮在1955年5月25日被秘密逮捕后的最初10天，不停地被严刑拷打，强迫其承认是“匪谍”，“有谋叛之意图”，以及与孙立人将军有“非法”关系。据郭陈述：“由数十名政工侦讯官，不分昼夜的轮流着刑讯、拷问、逼供。在身心完全崩溃及非自由意志之下，依照侦讯官们所设计的奸险政治阴谋，捏造了许多荒谬而毫无事实根据的口供和自白。”

接着，郭又于6月5日，接受有100多名政工人员参加的彻夜大公审，他们实行疲劳轰炸，将前面10昼夜中所有的逼供，又再度提出，“作密集紧迫的指控”。郭后来在回忆中叙述：“到了深夜以后，我的身心均陷于崩溃边缘，但仍然必须被迫喝下提神的黑色咖啡，恍恍惚惚的回答审判官们所提

出的荒谬问题。”

揭发之二：威逼利诱。

自 1955 年 6 月 20 日起，特工人员开始公然要求郭廷亮“扮演假匪谍自首”。保密局特勤室主任毛惕园等人对郭说：“由于被捕军官三百余人，而今又找不出你们的罪证，致使中外舆论哗然，社会谣言四起，众说纷坛，所以你必须站在党国利益的立场，来与我们密切合作，扮演假匪谍自首，使政府对舆论及社会各界有所交代。”

1955 年 7 月 14 日，情报局长毛人凤用自己的专用轿车，把郭廷亮接到毛公馆谈话。毛说：“为了使这次的案情不要扩大而能圆满解决，只有委屈你了，所以我要毛（惕园）主任劝告你，站在党国的立场和我们密切合作。这不但是为了当前党国的利益，也是处理好参军长孙上将的唯一办法。……我保证你的军籍、军职和事业前途，绝不会因本案而受到任何的影响”。他并以郭妻及子女的安危来作为诱饵。毛人凤的软硬兼施，使郭廷亮不再抗拒。他后来追叙说：“当时我听了毛上将的训示，为了党国的利益，只有遵照他的指示去做。因此，后来所有的自首书和口供笔录，都是以当时案情发展的需要，由毛主任等所杜撰编造。”

揭发之三：应付核查。

9 月 9 日晚，保密局长毛人凤亲临侦防组，召见郭廷亮，对他说：

“为使本案能圆满顺利的结束，你必须毫不迟疑地照我的话去做。特别是王云五先生约谈时，一定要根据我们为你所编的资料去回答，以免引起不良后果。王云五先生现任行政院副院长，他不仅在学术界有崇高的地位，而且也是无党派人士有力的代表人物。作为一个革命军人和忠贞的国民党员，绝不可在无党派人士面前，说出有损党国利益的言论。……现在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本案之所以要这样做，我们完全是执行最高当局的决策。”

9 月 10 日，郭廷亮在严密的戒护下，由保密局侦防组乘车到军法局，接受王云五的约谈。陪同王云五“调查核实”者，正是对郭廷亮刑讯逼供的政工军官，包括总政治部第四组组长宋公言、国家安全局局长魏宜生和侦讯官苏忠泉。郭廷亮只有按照既定的口径，回答了王云五的核查。

揭发之四：欺诈哄骗。

特工部门，先以“不公开”、“不起诉”的允诺，诱骗郭廷亮承认他们编造的口供。毛人凤在 1955 年 7 月对郭的谈话中曾保证：“本案是以你的自首来办理，所以既不公开，也不起诉，仅在政府内部办个手续，然后我将真实情况向领袖提出报告，以政治方式来解决。”

但是，10 月 20 日，台湾中央社全文公布了九人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书，公布了“郭廷亮所担负之匪谍任务及其所利用之因素”等内容。台湾特工部门自食其言。12 月初，特勤室主任毛惕园突然通知郭廷亮：“你的自首虽获上级批准，但仍须经过军法审判。”郭廷亮当即争辩说：“上级既已批准我的自首，依法就不应该再军法审判；既要军法审判，就是自首没有批准。”12 月 26 日，毛人凤又一次在自己的办公室约见郭廷亮。毛说：“由于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及新闻界的传播，上级不得不决定依法来处理，因此本案必须移送军法局办理。但无论将来案情如何发展，我再度向你保证，你的军籍、军职和事业前途都不致受到丝毫的影响。将来无论军法局对你的判决如何，都只是一个形式而已。”郭廷亮按照侦讯人员的要求“供认”并按上手印后，他却被判处了死刑，后经蒋介石核减为无期徒刑。郭 36 年的时间几乎都在囚

禁和流放中度过。

孙宅巍

布拉萨酒店行刺蒋经国案

公元 1970 年 4 月，蒋经国以“行政院副院长”的身份访问美国，恰值此时，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美国新闻界竞相报道，对蒋经国的来访却反应冷淡。然而，有一件事却使他一夜之间成了全美的新闻人物。

布拉萨酒店前的惊人一幕

六、七十年代之交，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1969 年 1 月入主白宫的尼克松提出：“美国需要改变它外交政策的哲学和实践。”其目标之一就是要改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从 1969 年下半年起，美国政府不顾台湾当局的一再反对，采取了一系列缓和中美关系的行动。

对于最重要的盟友美国的变化，台湾当局忧心忡忡，急欲摸清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真实意图，拉住自己的盟友。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1970 年 4 月 20 日，蒋经国一行踏上了美国的土地。第一站到首都华盛顿，美国以“国家元首”的礼节接待蒋经国。在华盛顿期间，蒋经国几度与尼克松总统、罗杰斯国务卿会谈，均未取得预期的成果。当时陪同蒋经国访美的“外交部次长”沈剑虹事后回忆，美国之所以邀请蒋经国访美，只不过“是尼克松向他在中华民国的友人道别”的一种方式。

4 月 24 日，是蒋经国 60 岁生日，他特别邀请了台北各报驻美记者共进早餐。席间，蒋经国在致词中强调“国家的处境虽然很困难，反共复国的前途，还是充满希望与光明。”9 时，餐会结束，蒋经国乘飞机赴纽约。中午 12 时 10 分，蒋经国的车队离开下榻的纽约庇尔旅社，在警车的开道下，驶往仅隔两条街的布拉萨酒店，去参加远东工商协会为他举行的宴会。

12 时 15 分，蒋经国座车抵达酒店门口。“台独联盟”组织了一些人手持标语大声呼喊反对蒋经国的口号，对此，蒋经国表示不以为意。

为了欢迎蒋经国，布拉萨酒店正门的台阶上铺上了红色地毯，当蒋经国走上台阶正要进门之际，突然有一亚洲人从正面的大理石柱后面闪出，冲过警卫圈，正欲拔枪射击，跟在蒋经国身后的便衣警察哈利·苏尼兹，将他拉住，并大喊：“注意，这人手上有枪。”两人随即扭成一团。随后赶至的台湾“行政院顾问”、“国防部办公室副主任”温哈熊也被绊倒，压在下面。

刺客一边与警察搏斗，一边举枪瞄准蒋经国射击，幸而，蒋经国已经急急地闪进了扇形旋转门里。子弹射入正在转动的两扇玻璃门间。当刺客极力要挣脱警察开第二枪时，另一警察立即用脚顶住旋转门，刺客随即被制服。刺客名叫黄文雄，在他行刺失败后，躲在一边的同伙郑自才冲入人群，企图营救黄文雄，被两旁的警察抓住。

三重保护圈仍出了疏漏

为了蒋经国的美国之行，美国驻台湾“大使”马康卫先期回国“作最妥善的安排”。美国方面作了周密的布置：在蒋经国的车队进行时，由摩托车开道和翼卫，其座车有防弹装置。上下汽车、进出饭店和电梯比较容易受袭击，为保险起见，美方向蒋经国的随行人员提出：他们一行在华盛顿安德鲁机场下飞机时，由美国安全部门拍下彩色胶片，并复制了若干拷贝，让地方安全机构人员认清随行人员的面貌和特征。希望台湾随行人员在访美期间不要更换与原来截然不同的服装，或将发型、胡子作太大的变化。美方安全部

门还设了三层保卫圈：以蒋经国为中心划半径 10 米内为“内围”，里面除了美国国务院的礼宾官，就是台湾随行人员；半径 10 米至 20 米为“中围”，由美国便衣和穿制服的安全人员担任警戒；20 米至 50 米为“外围”，由纽约警察负责。在这些范围内一有陌生面孔出现，立即驱走。

按说这样的保安措施可谓“滴水不漏”，但偏偏刺客冲破了“外围”、“中围”两层保护圈，在距蒋经国仅 10 余米的地方开枪。事后美方辩解说是因为刺客是中国人，在美国人眼里东方人长得都很相像，故而错把刺客也当成了随行人员，如果刺客是白人或黑人就绝不会发生这种疏忽。

发生行刺事件的第二天，美国总统尼克松、国务卿罗杰斯当面向蒋经国道歉，但同时又表示美国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国家”，此类事件的发生，绝非特例，就连肯尼迪总统也一样遇刺，因此希望勿因“意外事件”而介意。主人话已至此，蒋经国只好说，“一天之后，如果不是总统先生和国务卿先生提起，我几乎都已忘了这一‘意外事件’了。”

事实上，蒋经国对此事件是难以忘怀的。从事后他对有功人员的论功行赏即可窥其一斑。蒋经国把自己戴的手表送给了抓住刺客的警察，而关键时刻助了一臂之力的随员温哈熊以后更是青云直上，曾经官至驻美军事采购团团长和联勤总司令等要职。

刺客来自“台独联盟”

“台独联盟”全名为“世界台湾独立联盟”，于 1970 年 1 月在美国成立，鼓吹“台湾法律地位未定”，否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主张以暴力推翻国民党，建立所谓的“台湾共和国”。行刺蒋经国的黄文雄和企图营救他的郑自才，均是“台独联盟”的成员，郑自才还是“台独联盟”的秘书长。

“台独联盟”成立后，其影响甚微，行刺蒋经国的目的之一就是为扩大该组织的影响。正如郑自才事后回忆：“蒋经国当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并且负责台湾的情报系统，‘台独联盟’认为如果行刺蒋经国，对台湾独立运动的宣传将会有帮助。”另一个原因是希望杀死蒋经国，使 84 岁高龄的蒋介石面临继承人的危机，造成台湾社会的动乱不定。因此，当蒋经国访美行程确定后，“台独联盟”的行刺计划经过 2 个星期的策划也酝酿成熟。行刺手枪是由“台独联盟”负责海外事务的陈荣成购买，具体由郑自才与黄文雄负责执行。

行刺事件使尚不为人所知的“台独联盟”开始为世人注意。由于 70 年代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十分猖獗，遭到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台独联盟”为了避免作为恐怖组织被美国政府取缔，4 月 25 日即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该组织的声明，声称：“本联盟为热切维护人类尊严的组织，对施用暴力和动用政治暗杀手段的行动，只会感到叹息，被指控为该桩事件有关的个人，其行动并非代表本联盟，他们二位的作法，本联盟绝不同意。”

“台独联盟”翻脸无情的声明引起了黄文雄、郑自才的强烈不满。两人以“蓄意谋杀”罪被起诉后，“台独联盟”为他们聘请了辩护律师，但郑、黄认为“台独联盟”的目的是想澄清其组织是非暴力团体，并不是替他们辩护，于是决定放弃辩护以抗议“台独联盟”。

1971 年，纽约地方法院判决黄文雄、郑自才有罪。在择期判刑期间，两人分头逃亡，黄文雄从此销声匿迹。而郑自才先逃至瑞士，再转到瑞典，同年，获瑞典政府的政治庇护。

1972 年，瑞典政府又逮捕郑自才，美国政府向瑞典要求引渡，得到瑞典

政府同意。但在押赴美国的飞机上，郑自才因绝食而昏迷，飞机紧急降落在丹麦，因丹麦不愿接受，只好飞往英国伦敦，英国以“非法入境”的名义收押郑自才9个月。1973年4月，英国法院将郑自才押到美国，同年8月，美国纽约州高等法院判处郑自才5年徒刑。

1991年，郑自才又重新在台湾公开露面。

马洁如

